

# 中國之春

## 江澤民時代能維持多久？ 白衣行動

84

1990.5

CHINA SPRING

中共中央文件：  
對蘇共二中共全會的批判  
東德：一個精彩的右轉彎  
蘇聯：莫斯科聳起民主牆

金三角和中國販毒通道  
一九八〇年北大競選風潮  
一個大學生按摩女的自述  
馬祖事件：中共投石問路？  
三十八軍徐軍長走上軍事法庭  
我一個玩笑把雷鋒捧成世界明星  
中共中央關於留學生政策的文件

# 白衣行動 悼念國喪

## 告全國同胞書

全國同胞們：

六四國殤日臨近了。

一年前的這一天，在首都天安門廣場和十里長安大道，成千上萬中華優秀兒女，留下了他們的鮮血，留下了他們的生命，留下了他們對祖國、對民族真誠的愛、留下了他們對我們的深切的期許和永恆的激勵。

人類對痛苦的感覺或許有它的極限。超過極限，便是麻木。專制統治者何嘗不知道屠殺會引起憤怒，但他們指望着在憤怒之後的淡忘和麻木。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在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向全國每一個有人性有記憶、有良心、有情感的同胞呼籲：

在六月四日這一天，讓我們大家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達我們對六四英魂的悼念。莫道神州人心死，白衣如海祭國殤。

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當局永遠分不清在衆多的穿白衣的人中，誰個是表示悼念，誰個是純屬偶然。是的，那個坐在火山口上、終日驚恐不安的專制統治集團甚至可能悍然下令禁止人們在六四這天穿白衣服。僅此一點，他們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極端虛弱，在歷史上留下千古笑柄。我們可以裝聾作啞。如果他們問我們為什麼你今天要穿白衣服？我們就反問他們：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為什麼今天不能穿白衣服？我們用裝作忘記六四的辦法來紀念六四。與此同

時，我們要把那些威脅人們不准穿白衣服的人暗暗記下來，將來給這些爲虎作倀的傢伙們來個「秋後算賬」。

同胞們，讓我們每一個人告訴每一個人，用一切可能的辦法。請相信，一個殘暴政權的土崩瓦解，就在於我們這一點一滴的默默努力之中。

北京市民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

請張貼 請傳閱 請復寫 請寄送  
莫道神州人心死，白衣如海祭國殤

## 說明

上期「中國之春」刊出了一篇署名「一群北京學生和北京市民」的題爲「到天安門廣場散步去」的傳單。由於廣大讀者的努力，這份傳單已經以多種方式傳入大陸內部，美國「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和台灣「聯合報」駐北京記者都發表了有關這份傳單在國內廣爲流傳並引起中共方面驚恐失措的報導。這是海外廣大民運人士和愛國人士協同國內人民默契配合、展開切實有效鬭爭的一次重大成功。

最近一段時期，大陸內部地下組織和地下活動

正在暗中發展。不久前，北京成立了一個名爲「中國民主救國陣綫聯合委員會」的民主組織，該組織發表宣言，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改革經濟，開放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其發言人翟偉民（前北高聯負責人）對外國記者發表了談話。據我們所知，這類組織已經成立了很多，其中一些已經和我們海外民運組織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在本期雜誌正要付印之時，我們又高興地收到了一份大陸傳真。現發表於此，我們熱切

地希望一切關心中國民運的人士，繼續採用各種傳播方式，包括廣播、報刊、書信、電話、傳真、會議和耳語，讓這份傳單的內容盡可能廣泛而迅速地深入到全中國各地。這是我們海外民運人士和愛國人士的義不容辭的光榮責任。中共的專制大廈正在倒塌，讓我們再加一把勁。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於紐約

# 東歐的右轉給我們的啓示

路邊

東歐在向右轉。其轉動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出了一般外人的想像。這不僅體現在：

一、在東歐各國（只除去微不足道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一黨專制已經終結；以及  
二、許多共產黨都改名換姓。而且更體現

在  
三、只要一進行自由競選，原先執政的共產黨、即便他們已經改了名字，都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失敗；還有  
四、新上台的政黨都立即宣佈實行全面的市場經濟。

在此之前，不少人推測，取消了一黨專制後的東歐，將走上一條既不同於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又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所謂「第三條道路」。有些人認為，共產黨在放棄了專制權力之後，仍有可能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的統治權力；即便是那些預見到共產黨垮台的人們通常也認定，取而代之的將是某種中間偏左的勢力。在經濟上，這些人則估計市場化的過程將逐步地推展而不可能急速施行。如此等等。但是，歷史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給從去年春天以來、席捲整個共產世界的革命性變化作出一個較為準確的判斷了。毫無疑問，這是一場革命，和平的或非和平的革命。因為它是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一種根本性轉變。而且，它是一場歷史史上少有的保守的革命。因為它並不是在創造某

種以往所不會有過的嶄新的制度，而是恢復被共產革命所一度否定的那些價值和原則——這些價值和原則，早在兩三百年以前就由西方的思想家亞當·斯密、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確立下來了。這些價值和原則，縱然不是像福山所說具有終極的意義，至少也是目前人類所能發現的最好東西。目前，這場革命在東歐已經基本勝利，在蘇聯正方與未艾，在中國則是蓄勢待發。有的人總是強調中國與東歐的不同。也許確有不同，但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搞得更糟糕，中國的共產黨遠比東歐的共產黨更惡劣，因此，未來的反彈只可能更強烈。

從東歐向右轉的變化趨勢中，中國民運人士應該學習到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當進一步堅定建設市場經濟的決心。這又包含了兩個方面：其一是我們要明確市場經濟的目標，拋棄所謂「第三條道路」的神話；其二是在由舊的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採取一次到位的決斷措施。

毫無疑問，從舊的經濟體制向完整的市場經濟轉化，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因此不少人設想，這一過程應當採取分期分批的漸進方法來完成。然而，如果你試圖用跳兩次的辦法跨過一道深溝，其結果只能是掉到溝裡爬不起來。中共改革派搞的經濟改革正是這樣失敗的

。我們萬不可重蹈覆轍。其間道理，胡平在「中國經濟改革向何處去」（刊於「中國之春」一九八九年二月號）早有論述，茲不重復。

第二，民運組織必須堅持自身的非共產黨特性。這也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當共產黨搞專制時，我們堅決反對它；其二是，即便共產黨不再專制了，我們仍然要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共產黨搞了幾十年專制，積重難返，即便有一天它不專制了，專制心態一時間都祛除不乾淨。中國人民吃盡了共產黨專制統治的苦頭，他們需要的是一支顯著地區別於共產黨的政力量。而我們正好是這樣一種力量——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的人士都是多年以前就堅持黨外路線的。在今日中國，絕大部份優秀人才在野而不在朝，在共產黨外而不在于共產黨內。民聯不過是潛力深厚的黨外力量的冰山一角而已。在這一點上，我們民運人士自己要有充分的自信。常常有人問：如果你們掌權，能把中國治理好嗎？我們的回答很簡單：無論如何，我們做的總不會比共產黨更差、比李鵬之流更差吧。當然，話說回來，我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共產黨相提並論的水平上。我們要不斷提升自己，永遠兢兢業業。另外，在堅持黨外路線並以此為榮的同時，我們也要理解和尊重原先在黨內從事改革的朋友。這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在變，而且變得很快。一切有志於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應當隨時調整自己的步伐。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 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 中國之春

# CHINA SPRING

1990年5月號 84期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1990. 4. 15. 出版  
1982. 11. 17. 創刊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 觀察家

2 白衣行動悼念國殤——告全國同胞書

北京市民

## 封面故事

3 東歐向右轉給我們的啓示

路邊

## 時事分析

6 江澤民時代能維持多久？

馮磊

## 參考消息

8 八九民運的反思之二

胡平

22 從大陸內部來的電傳

黎音

24 吃貨單專吃國家外匯

嘉陵

25 大陸報告之四：我們沒有明天

李遠

28 金三角和中國販毒通道

未名

## 特稿

31 一九八零年北大競選風潮——從四五到六四（之二）

劍軍

## 五四專輯

36 當好演員，導演留給上帝

丁楚

39 解除歷史的魔咒

華一夫

43 我們不改變方針了

越人

45 希望不再紀念「五四」

亞衣

## 東歐觀潮

46 東歐觀潮

楊漫克

蘇聯：莫斯科聳起民主牆

東德：一個精彩的右轉彎

捷克：我們的外交原則是理想主義的

匈牙利：共產黨大選敗走麥城

## 紫禁城

63 中共中央文件：對蘇共二中全會的批判（原件）

## 民主牆

65 新二月革命浪拍南岸

68 倒霉的馬克思和幸運的馬克思主義

林青

楊小凱

# 遷址通知

中國民聯總部已遷到華盛頓  
中國之春雜誌社仍留在紐約

中国民联总部已迁到华盛顿

P.O.BOX 15273, WASHINGTON DC 20003-0273

TEL: (202) 547-2299 FAX: (202) 546-9194

中国之春杂志社仍留在纽约

P.O.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FAX: (718) 476-1602



## 十年反思

- 70 我們用什麼去迎接下次高潮？  
73 民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伍凡  
陸丙甫

## 人物

- 75 走出農民、政府、市民的百慕大三角——改革反思之二  
79 三十八軍徐軍長走上軍事法庭  
79 斯大林的替身  
72 納吉在絞刑架下的遺言

靜光

## 大陸沉浮

- 80 一個大學生按摩女的自述  
84 我一個玩笑把雷鋒捧成世界明星

少君  
徐原譯

## 留學生

- 85 我就是耍上路的羊  
88 中共中央關於留學生政策的文件(原件)

姜原

## 爭鳴

- 94 下一個聯合目標是誰？——與李三元商榷

河鳴

## 兩岸風雲

- 86 馬祖事件：中共投石問路？  
87 台北幹得比北京漂亮  
89 台灣：大選危機有驚無險

李三元  
楊力宇  
朱永德

## 譯文精選

- 91 一九八九年國際人權報告中國部份

本刊摘譯

## 讀史偶拾

- 93 宋教仁：典型的民主主義政治家

陳雪

## 大事記

- 98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薛偉整理

主編：丁楚  
主筆：胡平  
採編主任：楊漫克  
責任編輯：何言發  
執行編輯：李遠  
美術編輯：蘇洋  
經理：尚平  
行：薛偉

# 江澤民時代能維持多久？

鄧小平之死的意義與其說是一個權威的喪失，還不如說是一個讓大家動手的信號。江澤民時代絕過不了這一關。

馮磊

## 一、一個出替罪羊的時代

我們曾有過毛澤東時代，也有過鄧小平時代，現在，我們進入了江澤民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在於它的不確定性。

有人把江澤民時代比作轉瞬即逝的華國鋒時代，其實並不確切。文革結束後的時期畢竟是個人心思定，百廢待興的時代。華國鋒盡管缺乏魄力，但雄心尚在。他提出的「四化新長征」的戰略口號還頗能鼓舞民心。而今天的時代則人心思亂，積惡難返，江澤民最宏偉的戰略目標也僅僅是維持安定團結。如果說華國鋒時代是個造英雄的時代的話，那麼江澤民時代就是個出替罪羊的時代了。

## 二、誰也打不死誰的僵局

六四之後，人們對政局會作出兩種基本的估計：一是趙紫陽將被清算，落到劉少奇林彪的下場；二是李鵬將會被當作替罪羊拋出，罷官以謝天下。可是近一年來的局勢發展使以上悲觀和樂觀的人都大失所望。趙紫陽雖被批判，但既沒開除出黨，也沒上法庭審判。李鵬雖被千夫所指，但繼續當他的總理，沒有去職的跡象。這是個地地道道的僵局，在這個僵局中，高層人事安排不會有戲劇性變化。

其實，這個僵局並不奇怪。中共的領導人

們早就在歷次「路線鬭爭」中學乖了。原來他們總是拋出別人來保護自己，可是往往事與願違。劉少奇當時就曾犧牲彭德懷自保其身，誰知彭德懷一倒，毛澤東的刀就架到了他的脖子上。現在，趙李兩方陣營的人都不希望犧牲趙紫陽和李鵬。在雙方眼裡，趙李兩人都是對方陣營中最臭最黑的代表，雙方的相互攻擊都集中在兩者身上。只要頂住趙李兩人不倒，趙李兩人就會像擋箭牌一樣掩護他們身後的次黑人物，使他們感覺相對安全。去年人大常委會多數否決了審判趙紫陽的提案很能說明問題。因為趙一倒，萬里就要變成最黑的人物，成為下一個保守派攻擊的靶子。萬里一倒，又會輪到下一個，於是產生多米諾骨牌倒塌效應……甚至鄧小平也要保住趙紫陽，否則保守派之劍就會直接對準他自身。同理，楊尚昆等人，包括鄧小平，也都不讓李鵬倒，因為李鵬一倒，他們就成了最臭的人物，千夫所指就會對準他們的臉。很多人以為殺李鵬可謝天下，其實多看一步棋則不盡然。在這種格局中，李鵬盡管很臭，但是不可缺少，所以有可能做到任滿，以最不引人非議的形式下台。維持這個僵局關鍵人物還是鄧小平，趙李兩人任意倒一個他都要受攻擊，所以他要立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江澤民為太子，作為緩衝。

一個充當緩衝角色的第一把手，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做為。

## 三、兩年內不要爭論六四是非

今年二月底老人黨們開了一個會，現在活着的新一代的領導人基本上都參加了，鄧小平說這大概是他們這些老人最後一次機會聚齊了。所以在大家見馬克思之前先給一些重大問題定一下調子。趙紫陽也出席了會議。會議討論了對趙紫陽的處理問題。經過鄧小平做工作，大家基本同意讓趙紫陽出來工作。但具體擔任什麼職務發生分歧，所以暫時沒有決定。但包括趙紫陽在內，所有人都同意在兩年內不討論六四的是非問題。

今年一月，李瑞環在一個宣傳會議上公開說：政府要對六四屠殺負責。李鵬聽聞大怒，在政治局會上與李瑞環吵起來。李鵬堅持說政府當時採取斷然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而李瑞環則強調一個巴掌拍不響。此事傳到鄧小平處，鄧派人轉告二李，了結此爭。後來李瑞環的講話被收上去了，僅作個人意見，不准外傳。顯然，江澤民現在最關心的是平安和穩定。他希望用時間來撫平六四在人們心頭留下的傷口。這個政策可用兩個字概括：一是拖；二是混。在這個宗旨之下，江澤民時代將是思想相當沉寂的時期。各級幹部對所有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都不會輕易表態，對所有的中央號令都敷衍了事。在高壓下，他們也許會強吞下

心中的異議，但大家都在為自己留後路，小心翼翼地和六四血案劃清界綫。為了安定的宗旨，從前所有改革方案都偃旗息鼓了。官方的宣傳機構又在強調指令性計劃的意義。最近不但重彈學雷鋒的老調，甚至連學大慶學大寨的旗子也重新打出來了。

可以說，江澤民時代，穩定的價值高於一切。所以不會有任何創新，只能走過去熟悉的道路。為了穩定寧願犧牲效率。

#### 四、外鬆內緊的大小氣候

六四前後，中共命在旦夕，所以它要命不要臉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大開殺戒。現在，中共的命暫時保住了，因此也要顧及一下臉面了。當時為了保命，得罪人的事兒由李鵬做了，現在為了要臉，江澤民要做一些得人心的事了。

今年以來，公安部陸續釋放了六四期間被捕的五百九十餘人，其中包括和劉曉波一起絕食的高新。同時放出風來，不久就要審判劉曉波和王丹等學運領袖。中共顯然在向西方做出一個軟姿態，緩和國際輿論的仇視情緒，以便吸收海外的資金。為了收買國內人心，中共當局改變了調子，不再強調讓老百姓勒緊褲帶，規定在企業開工不足的情況下也不准扣工資，有困難的企業由地於政府解決。同時還給行政和事業單位在職退休人員普遍加了一級工資，從去年國慶算起。但這筆錢到現在還只是口頭承諾，什麼時候兌現遙遙無期。當局以為有了這把青草在人們眼前，群眾就不希望動亂了。

為了抵禦蘇聯東歐開黨禁的衝擊，中共發表了一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文件，做一番表面文章。可是緊跟着統戰部副部長宋坤發了一份秘密文件，內對各民主黨派公佈二十四條禁令，嚴禁它們接受新黨員和發展組織機構，同時要對民主黨派進行組織整頓。中共既想要命又想要面子的兩面手法，可見一斑。

在表面寬鬆的情況下，中共高層也在拉屎握拳頭——暗使勁。動兒主要使在軍隊上。最近雖然黨政官員沒動大手術，但軍警方面的人事變動却非常頻繁：改組軍委，升楊白冰，貶洪學智；撤換武警部隊司令李連秀，下一步準備撤換公安部長王芳並清洗國安部，同時調換各大軍區司令。蘇聯發生二月革命後，凡留蘇的軍官都被集中到國防大學辦學習班。最近召開的人代會在經濟狀況嚴重惡化下仍將軍費預算提高了百分之十五，遠在教育與農業之上。



大兵封鎖廣場，不准市民散步，  
中共隨時準備用牛刀殺雞。

從今年四月到九月亞運會是江澤民時代的最危險期，中共高層高度戒備，如履薄冰。江澤民在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中說，只要度過這個危險期就會有一個長時期的穩定。最近北京市民發起廣場散步運動，中共立即如臨大敵。苦心安排一羣小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活動，然後派大兵封鎖廣場，名曰保護。看來在這個危險期內，中共時刻準備用牛刀殺雞。

#### 五、江澤民時代等於鄧小平的壽命

有人擔心，江澤民時代會類似於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平淡無奇，但可以有一段安穩的日子。此實乃過慮。當今國內外大小氣候已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已年過八十五。可以說江澤民時代是拴在老鄧的命牌上的。正如北大學生對老人黨說：「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但你們活不過我們。」據國內消息，最近陳雲、鄧穎超、王震、李先念、薄一波等一批老人相繼入院，生命垂危，看來鄧小平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很多人把鄧小平死的意義看作是一個最高權威的喪失。其實不然。鄧小平的權威並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重要。鄧小平的死的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行動的信號。

當今大陸，人心思亂。人人都對現狀不滿，不但百姓有不滿，軍人和幹部中也有不滿。人們都希望改變現狀，但在言論封鎖和政治高壓下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大家儘管可以估計到其他人的不滿，但每個人都會擔心：一旦我先行動，而其他人不動怎麼辦？冒很大風險不說，而且孤掌難鳴。這樣，一個共同行動的信號就是至關緊要的了。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樣一個信號是很難事先約定的，它只能是不約而同的。鄧小平的死，正是這樣一個信號。

每個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想到，鄧小平一死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所以要動手就要選在那時。而正因為人人都想到那天會有事發生，那麼那天就真的會有事發生了。政變、兵變、學運、工運，每一個心懷不滿的人都盯着鄧小平死那一天。

只要鄧小平活着，江澤民幸許還能過兩天安穩日子。可是江澤民時代絕熬不過鄧小平死這一關。\*

# 八九民運的反思

(之二)

胡平



## 第四章 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教訓

### 一、總結經驗教訓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意義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們已經說明了兩點：(1)八九民運遭到了失敗；(2)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這兩個觀點對我們在下面要展開的對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很重要的。如果八九民運並沒有失敗，總結經驗教訓就顯得不那麼必要；如果八九民運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總結教訓就是不可缺——因為要尋找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如何避免之道，這在邏輯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謂總結八九民運失敗的教訓，意味着我們要找出我們民運力量自身在這場運動中有什么失策之處。因此，有些關於八九民運失敗原因的分析解釋和我們此處要討論的主題並不相干。

### 二、總結教訓要避免「文不對題」

比如，有的朋友試圖用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結構特點（諸如政治上的極權、經濟上的公有制等等）來解釋八九民運的失敗。這種解釋應和總結教訓無關。因為我們意欲回答的問題恰恰是，在具有如此這般的一些結構特點的現階段中國社會，民主鬥爭應當如何開展以及如何獲勝？如果你的答案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民主運動之所以難以開展和未能獲勝，是因為現在社會具有如此這般的一些結構特點。那麼，你其實並沒有給問題作出任何答案，你只不過是用陳述句的形式重復了一遍問題（疑問句）本身而已。

把八九民運的失敗歸因於中國還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這種解釋，正好是上述「文不對題」的答案的一個典型。關於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此處暫不論及。問題在於：假如在現階段的中國

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既是一個給定的事實，又假如我們在現階段就希望推進中國的白由民主事業（如果你甘願把此一追求延遲到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之後，那自當別論），那麼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便是：我們應該怎樣在一個缺少中產階級的社會中推動民主運動？因此，你當然就不能把民主運動的失敗再反過來歸結於缺少中產階級這一給定的前提本身。基於同理，把八九民運的失敗歸咎於中國文盲太多、缺少自由民主傳統等因素，對於總結八九民運教訓而言也是文不對題的。

### 三、不論是失於知彼，還是失於知己，都是失誤

有人說，在八九民運中，廣大學生和民衆表現得極其出色。運動的失敗不是因為我們犯了什麼錯誤，而是由於鄧李楊太兇殘，或者是由於趙紫陽的太軟弱。這種觀點當然很有道理，不過却依然是誤解了我們提出的問題。

首先，我們說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意思是說要從我們民運力量的主觀方面找出問題。因此，一切把原因歸結到民運力量之外的其它客觀因素的說明便都是與主題無關的。

其次，假若鄧李楊不是那麼兇殘，趙紫陽不是那麼軟弱，八九民運當然就不會失敗。但是問題在於，民運人十，尤其是民運領袖們，事先對此是否有準確的判斷呢？如果我們原先以為鄧李楊不致那般兇殘或是趙紫陽不是那般軟弱，並在此判斷的基礎上擬定了我們的方針策略，那我們已然是犯了錯誤，而且是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如果我們原先就清醒地估計到鄧李楊可能的兇殘和趙紫陽可能的軟弱，那我們的求勝計劃就應該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對運動結局的消極作用，既然我們後來未能成功，可見我們低估了它們的作用或是高估了我們自己克服這些消極作用的力量。因而也是犯了錯誤。不論是失於「知彼」，還是失於「知己」



，我們都應看到自己的失誤。如果你硬是爭辯說，我們早就知己知彼，並已經盡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是由於敵強我弱，所以終不免於受挫。顯然，這種觀點事實上又回到失敗必然論上去了。

從敵強我弱的事實，並不能得出民運必敗的結論。敵強我弱，充其量表明民主力量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全面勝利，但那決不等於說我們不可能打贏一場又一場的「有限戰爭」。漸進改革的戰略，就是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假如我們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急於進行決戰，失敗當然不可避免，可是在這裡難道不正是我們自己首先犯了倉促決戰的錯誤嗎？

#### 四、總結教訓須注意不可脫離實際

如前所說，總結八九民運失敗的教訓，就是要找出民運力量自身有何失策之處，確切地說，就是要找出我們有些本來可以做好，但實際上沒做好的地方。因此，某些原來做不到的缺失之處，就無需乎去檢討。這一點也是需要說明的。

比如，有不少人說，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在於當時沒能形成一個旗幟鮮明的反對派組織。這句話的意思如果是說今後我們應致力於建設一個這種組織，那自然不錯；但若是批評當時應該有這種組織，則顯然是脫離實際。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一般學生、知識份子和民衆的覺悟和勇氣都還沒有達到這高度。我們看到，在當時，像北高聯這種溫和的學生自治組織尚處於爭取生存的艱難過程之中，我們又怎麼能指望一種比北高聯激烈得多的政治反對派組織反而在當時會有更多的成功希望呢？中國民聯能夠存在是因為它身在海外。如果說民聯曾經對運動發生過一些有益作用的話，那也在於它所提出的一些意見和建議，能夠適應當時廣場上民衆的覺悟程度和勇敢程度。政治是權衡可能性的藝術。從政治上着眼，我們不但要

考慮一件事情是否正義或是否必要，而且還要考慮它是否可能。

#### 五、必須高度重視對民運自身經驗教訓的總結工作

我強調，我們應該、我們必須從主觀方面認真總結我們在此次民運中的失策之處。這一類工作是極其重要的，也是長期以來不幸被忽視的。中國的民主運動，遠的不說，單從民主牆運動算起，至今也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十年以來，究竟有多少人在這方面下過深入細致的功夫，有多少人注意過這一工作呢？就拿民主牆運動來說吧，它為什麼能夠破土而出，為什麼能存在在一年左右，又為什麼最後被封殺？我對此寫過一些文章（主要的一篇是『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刊於『中國之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但幾乎沒有引起輿論的重視。多年來廣為流行的解釋是，起先，鄧小平想利用民主牆打倒「凡是派」，「凡是派」打倒後，鄧小平等於是就認為民主牆不再有用價值，故而下令封閉，於是民主牆運動便遭到失敗。這種把民主運動的盛衰僅僅歸結於最高執政者意願的解釋是十分幼稚膚淺的。像這樣幼稚膚淺的解釋居然能夠長期流行，許多自認是民運人士者竟然能夠無批判地接受這一答案而對更深刻的研究毫無興趣，那難道不突出地反映出我們在理論反思方面的不可原諒的貧乏與懶惰嗎？時至今日，在民運付出了血的代價後，如果我們還不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從事這一工作，我們就是嚴重的不負責任。

#### 六、八九民運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

以下，我將對八九民運的主要失策之處加以分析。所謂「主要失策之處」，就是指直接導致失敗的那一個失策。在政治上，如同在戰爭中，雙方都會犯下一大堆錯誤。鬭爭的勝負與其說取決於誰個不犯錯誤，不如說取決於誰

個少犯錯誤，或者說誰個不犯大錯誤，不犯關性的錯誤。依我之見，在這次運動中，民運人士（此處主要是指學生）的主要失策之處就在於他們未能「見好就收」。

有人會說：既然當局一直拒不接受學生的要求，學生無功而還，豈不意味著失敗？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應當承認，曾經一度，在學生絕食抗議及各界人士同情聲援的強大壓力下，當局事實上已作出了若干讓步。這包括：(1)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但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指責。李鵬在和學生代表對話時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所謂「從來沒有說過」云云，顯見是強詞奪理；另外，在「廣大同學」這個詞的背後，還留著「抓一小撮」和「抓背後長鬍子的人」的一條大尾巴。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看到，李鵬這句話是對著王丹、吾爾開希等人公開講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論而言確屬一種退讓。其它一些溫和派領導人的講話則更明確一些。(2)當局雖然沒有公開地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並沒有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並且，(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

第二，在任何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中，都存在著這樣一個普遍性的特點，即事實先於名義。很多新生事物，首先是作為一個公開的事實頑強地存在了，過一段時間後才能取得官方的正式承認。譬如承包制私人企業，先是人民自發地搞起來了，當局最初表示反對，然後不再表示反對而不置可否，最後才是公開表態認可。在台灣，民進黨是在成立了一年之後才獲得法律上的明確承認的。蘇聯最近宣佈放棄一黨專制，但在此前很久，不少民間的政治組織就已經活動多時了。

應該說，這種「反對——默認——承認」

的三段論，在漸進改革過程中是一種很自然的正常現象。我們不應該、也沒必要指望當局對這些具有重大挑戰意義的事物一下子採取肯定態度。從負數過渡到正數，一般都要經過零這個點。這未必都是壞事，因為新事物往往需要這樣一種自然的、充分自發自生的發展過程。凡是經由了這一過程而鞏固存留下來的東西，才會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我當然理解學生們執意要求當局立即承認北高聯合法性的的心情。既然當局一開始就公開指斥其為非法，而後又拒絕公開糾正先前的錯誤，拒絕公開承認其合法，那固然表示了一種退讓，但是這種退讓明顯是出於心不甘、情不願。在默認的背後無疑隱藏着巨大的敵意。和民主社會不同，在民主社會中，凡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便都是許可的。在專制社會中，凡不是當局明確肯定的事，幾乎都是不許可的，至少是當局隨時可以禁止的。因此，就像「文革」中群眾開始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時，總是要要求被他們反對的這個當權派自己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同樣的，學生們也總是要求當局立即表態肯定其組織的合法性，以期去掉他們的不安全感。當局愈是拖延着、迴避着正面答復，愈是表明他們內心深處的反感，故而愈是令人不安。這的確不只是個所謂面子放不放下得下的問題。

然而，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學生們不必執意要求當局的即刻承認。固然，那將使得我們到手的勝利變得不可靠。但是，凡是要打一場有限戰爭的人，他必須滿足於這種不可靠的勝利。好比打仗。你把侵略者逐出國門之外，照說你就勝利了。可是，既然敗退的敵軍「人還在，心不死」，那就總是存在着捲土重來的危險。如果你要求個徹底心安，除非你直搗黃龍府，打得他們徹底投降。於是，有限戰爭就變成了全面戰爭。所以，你得學會滿足於那種強敵在側的不可靠的勝利，保持戒備，隨時準備回擊敢於再次入侵之敵。回到八九民運這個

問題上來，學生們完全可以滿足於（當然是暫時的滿足於）當局的對北高聯的默認態度，充分利用這種默認所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鞏固自己，發展自己，然後再作新的進發。事實上，閻明復已經把這層意思講得很明白。他向學生解釋了政府不可能公開認錯，並保證不會秋後算賬，同時相當坦率地告訴學生要給改革派時間。應該說這些話既是誠懇的，也是合乎實際的。

### 七、關於「秋後算賬」

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即當局是否可能「秋後算賬」的問題了。

有些朋友斷言，不論廣場上的運動在何種情況下收兵，當局都會對民運份子「秋後算賬」。這種論斷的依據是，他們相信，中共強硬派在內心深處早就打定了鎮壓的主意，隨着廣場上運動的結束，百萬民衆化整為零，正好讓當局各個擊破；外界輿論一旦失去了集中關注的焦點，便很難對事變作出及時有力的反應。尤其是運動的領袖人物，在失去百萬民衆的堅強後盾後，必然成爲孤零零的靶子，中共當局一定會本着槍打出頭鳥的原則殺一儆百。人們都注意到，當局方面一直拒不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而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學生們就無法在以後遇到某種事變時迅速地發起統一的後援行動。如此等等。

應該說，人們的這些考慮都是很有道理的。不過我們還要充分考慮到事件的另外一面。首先，在這次運動中，中共領導人，甚至包括若干強硬派領導人，都公開作出了不秋後算賬的承諾。

有人一定會說：難道你以爲他們的承諾是有用的嗎？

對於這個貌似有力的反問，我們正可以提出另一個反問：假如你們認定當局的承諾沒有用處，那你們爲什麼還要求他們作承諾？你們爲什麼要當局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爲什麼要

當局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爲什麼要當局宣佈「高自聯」是合法組織？難道它們不會是同樣的毫無用處？倘若如此，我們何苦要提出他們？而當局又何苦不滿意口應承（這後一點尤其值得大家深思）？當百萬民衆踴躍廣場之時，當局何不立即宣佈：接受學生提出的全部條件。騙得大家滿心歡喜地撤離廣場，然後再來個分而治之，秋後算總賬？

顯然，我們需要考慮的深入一些。

粗淺地說，我們應該懂得：有承諾總比沒承諾好。麻索不及鋼索的束縛力強，但總勝過沒有繩索。作出承諾而後又違反承諾，且不在道義信譽上是丟分，而且它本身會構成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從而客觀上會起到動員民衆一齊起來反對的作用。

深入地分析下去，我們會發現，在權力和諾言之間，本來就存在着一種密切的關聯。在相當程度上，權力是受制於它的公開承諾的。因爲正是這種公開的承諾確定了發佈命令者和執行命令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從而也就規定了掌權者（即發佈命令者）的實際控制能力。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像五七年毛澤東的「陽謀」，先是歡迎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後來又把提意見者打成右派？

原來，共產黨的承諾一向有個含糊其詞的特點，這就給了他們以相當的靈活餘地。四月三十日，李錫銘、陳希同向學生代表保證，爲要求民主改革而示威的學生將不會受到懲罰。如果李、陳事後要搞秋後算賬，他們只消說那「一小撮」被抓捕的學生並不是爲了要求民主改革，而是要推翻共產黨就可以了。毛澤東的陰謀也是陽謀，正是出於同一個手法。

但是，李、陳的承諾還是要硬性一些。因爲他們的承諾畢竟是對學生的這一次遊行示威而作出的。這也就是爲什麼學生們一再要求當局具體地、明確地肯定他們的這一次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因爲學生們——即便不是從上述理論層次上，至少是從經驗直覺中——意識到

當局的承諾愈具體明確，其有效性便愈大。因為一旦給予了某一承諾以明確的界定，那多半也就意味著對權力本身的一種限定。我們知道，到了五月份，有更多的中共領導人公開作出不秋後算賬的承諾，其中，例如閻明復的承諾應當說是相當明確的。

大致上說，統治者作出讓步的承諾，拋開其有無誠意不談，其效力的大小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1)、承諾的公開性。  
(2)、承諾的確定性。這兩點的意思較明確，茲不詳論。

(3)、承諾的被迫性。假如統治者的承諾是在統治者的基礎尚很鞏固、統治者的氣勢猶處上風的條件下主動作出的，則承諾的效力就比較小。恩賜的權利常常靠不住，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反過來，如果統治者的基礎業已動搖，統治者是在民衆的沉重壓力下被迫作出承諾，這種承諾的效力就會很大。因為監督這個承諾履行的方面有自信、有力量。統治者意識到，一旦違背承諾，只會激起人民更強烈更廣泛的反抗，到頭來必然失去的更多，因此只好履行承諾。我們注意到，東歐各國共產黨在群眾壓力面前作出了讓步的承諾，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方面作出了讓步的承諾，實出於不能，出於不敵。

中共當局關於不秋後算賬的承諾，一是公開的；二是比較確定的（但仍不十分確定）；和三是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下被動作出的。因此具有較大的效力。

假如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及民衆，在充分顯示了巨大的組織能力和堅定的理性態度，並贏得了廣泛的團結與支持後勝利撤退，當局報復的可能性實際是很小的。一般說來，當局若要報復，只能採取以下三種較間接的方式：

(1)、對投身運動而又從事過比較廣場上的人群主體更激進的活動的那些人，扣上諸如「借學生運動之機進行反革命破壞」或「與反動

組織或反動勢力秘密勾結」一類罪名加以監禁。

(2)、對參加過運動的某些活躍份子，抓住他們在與運動本身無關的其它方面的過失進行懲罰。

(3)給運動中的頭面人物「穿小鞋」，也就是從組織或行政而非專政的角度製造困擾。對於這三種形式的報復，民運力量完全有能力進行防止與反擊。因為我們擁有若干有利條件。

第一，由於上一次運動的凱旋而歸，大大增強了廣大民衆的民主覺悟、鬪爭勇氣和成功的自信。

第二，憑借着在上次運動中建立起來的橫向聯絡渠道和協調行動機制，我們不難再度發起大規模的統一行動。

第三，新的行動僅僅是針對着當局中強硬派的秋後算賬，背信棄義，因此師出有名，理直氣壯，且順理成章。不但「有理」，而且「有節」，其訴求目標並未升級，這就使得當局比第一次時還更難於下手鎮壓。

第四，上次運動的「見好就收」，必然會影響到中共上層的權力格局，強硬派地位會有所下降，溫和派力量會相對上升，這就大大增加了新行動的成功率。

第五，上次運動的結果，還會對整個朝野雙方的互動帶來一種深刻的變化。當代政治學者提出的所謂「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雖然並非規律，但確實是一種很普遍的政治行為特徵。倘若整個八九民運是以「見好就收」(反四二六社論)為開始，以「見好就收」為結局的話，那很可能從此開啟了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新局面。在相當程度上，它也就使得後來的互動沿着類似的規則前進。換句話說，假如中共當局通過上一次運動發現，如果他們對民間的抗爭採取惡劣打擊的態度，那只會使事態進一步擴大，而如果你們採取對話和解決的立場，則可能使事態較好的解決，那麼在今

後的衝突中，他們就更有可能採取對話的態度。包括一些原先持強硬態度的人也會轉而採用溫和的辦法。

八、中共當局是理性的嗎？關於「理性」一詞的歧義性

也許有人會說，你上面的分析，特別是最後一條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中共當局是理性的行為者這一假定之上的，因而站不住腳。我以為並非如此。

理性一詞含義很多，在有關眼下的討論的問題上，理性一詞便有兩種很不相同的意義。當我們說某一政治集團是理性的，我們的意思可能是說它是講道理的。然而爭執的雙方倘能彼此認為對方講道理，那往往又意味着他們共同贊成某些前提。因此，當甲方指責乙方不講道理或不理性時，常常是由於乙方立論的前提大不相同之故。你認為政府應該建立在民意之上，對方却認為打天下坐天下。你說對方不講理，實際是他的理不同於你的理。在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書中，李自成赴土城邀張獻忠舉義，張表示同意後問李：等到朱家的江山垮台後，天無二日，你我二人該怎麼辦？李答曰：到那時，你我二人擺開陣勢，堂堂正正地打一場。張點頭稱是。在這裡，李、張二人都是講道理的，而且講得很坦率。但這個理在我們今人這裡就通不過。王震說：共產黨的江山是死幾千萬條人命換來的，誰想奪了去，他也要花上同樣的代價。我們都說王震不講理，不過倘若李自成、張獻忠聽到這話倒是會認為王震是講道理的。不錯，你可以說「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理不合理。也就是說，雙方可以就此彼此不同的立論前提進行爭論，然而這種爭論又勢必離不開更深一層的立論前提。於是我們又只好不斷地上溯倒推。到頭來我們要麼是發現有一個一切人公認的客觀理性，從那個絕對大前提出發，經過一連串的三段論推演，一直可以推出主權在民、三權分立以及我們現今尚不得而知

，後世將發現為合理的一切結論。要麼我們就會發現並沒有這樣一種普遍之理，有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同的假定，區別僅在於有些假定我們認為是善的，而另一些我們認為是惡的。到那時，兩種理要分個勝負，恐怕就無法再通過講道理來解決了。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指責中共當局不講理，因為共產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或鄧小平思想原本都還是承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僕這個大前提的。我們便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譴責他們不講理。但是倘若我們意識到，中共強硬派骨子裡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這個理，而這個理與主權在民的理之間孰是孰非又未必找得出一種靠邏輯推論能夠作出最終裁決的辦法，我們就不好說他們不講理，而只是他們的理不被我們今天大多數人所贊同罷了。

許多人指出，中共當局是只顧自己利益罔顧其它。這種說法倒和某些經濟學或政治學中關於人是理性行為者的定義相當接近。按照某些經濟學、政治學的假定，人的一切行為都是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為依歸，由此而把人定義為理性的行為者（順便一提，這種定義只是為了研究方便引入的一個抽象的假設，它並不表明現實中每個人都必然如此。否則，這個世界上將沒有高尚邪惡之分而只有狡猾愚誠之分了。不少朋友對此點常有誤解，引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論）。我們知道，前面提到過的「一報還一報」的原則乃是當代學者們在研究囚犯難題中提出來的。它正好表明，在雙方存在著利害衝突並且互不信任的前提下，一方通過「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策略，會誘導對方作出同樣的反應，從而建立起良性互動的關係。這並不要求對方是君子，只要求對方不是白痴或瘋子，因為白痴和瘋子不知好歹，不知怎樣做對自己最有利。中共統治集團中的個別

人可能是白痴是瘋子，但作為一個整體，應該說並不是毫無理性的。假如民運力量在展示了巨大壓力之後見好就收，完全可能誘導（或曰迫使）中共也走上與我們良性互動的軌道上來。反過來，如果我們見好不收，對方就會覺得讓比不讓更吃虧，就會回過頭來作困獸之鬥；又如果我們當時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服這種狂獸反撲，我們就會遭受失敗。

### 九、續前

注意，上述分析決不等於說，八九民運的不幸結局，過錯竟在學生而不在當局，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這裡有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道義上的是非，一是策略上的得失。在道義上，當然是學生對，當局錯。學生的缺失是在策略上。我們在從事政治活動時，必須要分清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如前所說，我們確實應把中共當局視為一理性的行為者。當我們說中共不講理、喪失理性、不按牌理出牌，其實都是指他們的行為邏輯與我們不一樣，但並不是他們的行為本身沒有自己的一套邏輯。他們是壞蛋，但並不是瘋子或傻瓜。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否則，我們又如何能理性地分析其行為、制定出正確的戰略、合理地推測其未來的走向呢？假如我們的對手不是理性的行為者，則我們搞政治就不需要勇氣、不需要智謀，而只能靠純粹的撞大運了。那些斷言中共不是理性行為者的朋友們都相信，這批屠城元兇決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忽然心血來潮，完全主動自顧地，甚而是滿心歡喜地放棄各種壓制手段，帶頭實行民主，與高采烈地等著別人審判自己。因為那樣做違反他們的利益，那也就是違反其行為的固有邏輯，也就是不合情理。可見，包括那些否認中共當局是理性行為者的朋友們，實際上都仍然是把中共視為理性行為者的（注意此一概念的含義）。既然如此，那麼我前面的第五條分析就是站得住腳的。

以上這番說明雖然冗長，但却必要。因為許多人在討論問題時，不去注意「理性」、「非理性」等詞的歧義性，已經使討論陷入混亂

。所以需要加以澄清。

### 十、「進兩步，退一步」就是成功

根據前述五條分析，我以為民運「見好就收」，當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強硬派的「秋後算賬」。退而言之，即使當局仍在某些方面進行了間接的報復，那麼，這種報復的程度必定是相當有限的。在整個民運行情大漲的背景下，少數被捕入獄者，大致都不會受到很嚴酷的刑罰。至於「穿小鞋」，嚴格說來屬於政治歧視而非政治迫害，更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們一般均不足以對民運人士造成實質性的傷害。有時倒會提高他們的道義形象及加倍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慷慨悲歌之士非但不會躲避這種懲罰，反而會勇敢地面對它並以此為榮。與此同時，這種「獨裁無禮、民主無量」的半途而廢的懲罰也不可能起到威懾阻作用，倒適足以激發更強烈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故而不值得過份顧慮。另外，我們也要看到，一場群眾運動，只要它還不是「一次到位」，那麼當它中止下來之後，通常總會出現某種「縮水效應」。進兩步、退一步或退半步都仍屬正常。但那無礙大局（古語說：殺敵三千，自傷八百。也是同一意思）。從整個運動着眼，民運就是實實在在贏得了輝煌的勝利。假定八九民運是這樣一種結局，再有了爾後東歐及蘇聯演變的巨大鼓舞，新的一場民主運動必然以更大的優勢地位、更強的樂觀與自信、更扎實更成熟的姿態又一次爆發在天安門前，它很可能會一舉而宣告中共一黨專政歷史的最後終結。今天的中國大陸，早已邁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怎能不為八九民運的功虧一篑而扼腕痛惜。

### 十一、群眾運動為什麼常常以失敗告終？

有位美國朋友曾經問我：為什麼你們中國的群眾運動，每一次都以失敗為結束？我回答

說：因為它不失敗就不結束。

這個回答並不完全是開玩笑，其間包含了大量冷峻的真實。歷來群眾運動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控制，有如決堤之水一發而不可收拾，除非遇到它沖不過的障礙，很難自行停止。在這期間，雖然有不少有識之士試圖讓它見好就收，但終究未能奏效。

為什麼運動做不到見好就收，這非常值得深入的探討。

首先，整個運動缺乏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這可說是使運動在後期成爲脫疆野馬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在此次民運中，民衆建立起了自己的獨立組織，這是一個十分偉大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借助於這種組織的力量，天安門運動才能發展到如此驚人的規模和取得過不止一次的輝煌勝利。但是嚴格說來，廣場上的組織自身都不健全，在關鍵時刻缺乏有效的統一指揮能力，也缺乏有足夠威信的領導核心。普遍的情況是，組織約束不住自己的成員，領袖指揮不動下面的群眾。這就使得廣場上的組織難以勝任組織應有的功能。

其次，廣場上組織太多，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這無疑給本來就不夠十分堅強的組織又增加了難以克服的外部困難。我們都知道，有組織而不能在必要時統一行動固然等於無組織；同樣地，組織太多且各行其是，從宏觀上看其效果也差不多等於無組織。

再者，運動缺乏兼具聲望與謀略的領袖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此次民運湧現出一大批很優秀的領袖人才，尤其是學生領袖。不過，除王丹在學運前即有些民運經驗及知名度外，大部份領袖都是在民運過程中才脫穎而出的。而凡是在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領袖，大多數是由於他們敢於帶頭衝關。後起的領袖，正如後起的組織一樣，要能夠嶄露頭角，通常是由於他們比舊領袖或舊組織更敢衝關。這就形成一種越往後來激進派越佔上風的趨勢。要克服這種趨勢，那些具有正確策略眼光的人們就必須

須作出十分堅決而頑強的努力。可惜的是，他們差不多都沒有這麼做。不少人都及時地提出了撤的主張。那是需要勇氣的。我相信，在形勢正好、士氣正旺的時候，提出「收」與提出「上」相比，不僅需要更多的見識，而且常常也需要更多的勇氣（要不怕內部激進派罵「叛賣」）。可是，他們一般都沒有十分堅決、十分頑強地去推行自己的正確主張。這和共產黨內部很長一段時期內，反起右來很堅決，反起左來很軟弱是一個毛病。

上述幾種缺失大概都是事實。不過嚴格說來，這些缺失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都是很難避免的。以組織方面的缺失爲例，你怎麼能指望一個在運動期間才倉促成軍的組織能夠那麼統一、那麼有效率呢？民聯成立了六、七年，海外其它的民運組織也差不多都成立了半年以上，我們在組織的統一性和效率性上又做得怎麼樣呢？前面說過，我們要找出八九民運中民運力量自身的缺失教訓，說到底，是要找出那些本來可以做好、但實際上沒做好的地方。如果我們去責備人家犯了一些原本就很難避免的錯誤，那並不合適。

但是，有一種觀點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說，群眾運動嘛，你怎麼能要求它收放自如？問題在於，假定群眾運動真的是注定了做不到自我控制；而且你又並非不知，一個脫疆野馬式的群眾運動很容易遭到悲劇結局，那你爲什麼還要支持、鼓勵它的發生和發展呢？我們不准小孩子玩火，就因爲小孩子自己控制不了火勢，到頭來很容易燒壞自己。如果我們相信運動可以自我控制並且致力於此但終未成功，那說明我們的能力不夠；如果我們本來就不相信運動可以自我控制但又要去鼓動風潮，結果釀成不幸，或者是主觀上不去做任何努力使運動自我控制，從而導致失控的悲劇，那表明我們缺乏責任感。缺乏責任感無疑是一個更大的過錯。

說到責任感，我當然不是說，八九民運的

悲劇結局，責任應該由民運人士來負。八九民運的悲劇結局的全部罪責都在中共當局。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共說，我們讓了步，但學生得寸進尺，越鬧越大，北京城已經陷入動亂，所以我們必須軍管。這話看來也有些道理。廣場後期運動的失控和混亂的確是不容否認的。當時，不少民運人士都對此表示憂慮和無能爲力。戴晴在六月四日說：直到六月二日之前，她都是支持戒嚴的，認爲天安門應該軍管。據我所知，持此看法的民運人士遠不止戴晴一個（順便一提，連戴晴等民運人士到後來都贊成戒嚴，其它那些由原先反對戒嚴而後轉爲支持戒嚴的人一定就更多，這是戒嚴令終於能夠實施的基本原因。這證明了強硬派壓制民運的主觀意志，只有在得到相當一批人的自覺支持的條件下，才真正有可能轉化爲實際的壓制行動。這再次向我們揭示出權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由此也再次證明了那種認爲只要鄧李楊下定了壓制的決心，壓制就必然發生的觀點是膚淺的）。但是，戴晴說，她實在沒想到所謂戒嚴會搞得那麼殘酷（事實上，所謂戒嚴比戴晴在六月四日所意識到的還要殘酷，當時她認爲自己是不會被捕的，她說，如果連她都抓，「夫復何言！」可是，她很快就被捕了）。相信這也是許多一度支持戒嚴的人們的共同感受。然而，如果戴晴等人事先能夠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她們本來是應該料到這種結局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共真的只是爲了恢復秩序，那麼，爲了解決天安門廣場上的混亂，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辦法。那就是立即宣佈接受示威者們的條件。不錯，我承認，假定中共作此宣佈，民衆選可能得尺進寸，受到勝利鼓舞和相信自己力量無敵的人們很可能立即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由於中共這一宣佈，人民對當局不再有任何恐懼，因此很可能有更多的人群、更多的地方會發生更強大的民主運動。不過，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那也只說明中共的此一退讓已經作出得太遲。爲了克服這一情況，中共當局大概

就必須一下又作出比示威者們提出的要求更多一些的讓步。一九八七年春天南朝鮮爆發學生示威，也大有無休無止之勢。光州屠城事件的元兇、當時的總統全斗煥最初打算再開殺戒，遭到黨內強烈反對。爾後，由執政黨總裁盧泰愚出面，一下子作出了比學生們的基本要求更多的讓步，遂使形勢得以緩和。

當民衆向政府舉行巨大規模的曠日持久的抗議活動，那表明政府的權威本身已經遭遇到極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做出令大部份民衆滿意的讓步，要麼實行嚴酷的鎮壓。前者是用贏得人民的信任的辦法重建權威，後者是用使人民陷於恐懼的辦法來重建權威。一個人民既不信任又不恐懼的政府是無法立足的。中共既然拒絕作出令人滿意的讓步，它就必然要採取嚴酷的鎮壓。所以，它的所謂戒嚴，其目的決不在於僅僅是恢復廣場的秩序。它必須要恢復的是人民對它的恐懼。由於人民的勇氣已經通過民運而空前提高，因此它就必須採用空前恐怖的手段才能達到目的。

六四屠殺的滔天罪責完全在於中共。這點毋需再論。不過，從民運方面來說，我們輸掉了一場本來可以獲勝的鬪爭，我們應當負另外一種責任。

如前所說，八九民運到後期失去自我控制未能見好就收是一大失誤。然而我們又承認，我們幾乎不可能要求這場運動具有堅強的組織領導和很難企求它會有享有足夠威信的智勇兼具的領袖的指揮。那又該如何看待這個責任問題呢？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再次回頭去考察這場運動。

## 十二、民衆缺乏足夠的共識是八九民運

### 失敗的基本原因

事實上，作為一場有上百萬人投入的、持續近五十天的群眾運動，我們必須說，它的自我控制已經得到相當出色了。在很長一段時期

，運動的基本目標都是相當明確、統一的，運動的組織紀律都是相當令人讚嘆的。這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共識，是千千萬萬個參與者的堅強共識。正是靠着這種堅強的共識，才使得本來很不堅強的組織一度表現出極為堅強的整體行動力量，才使得本來缺乏足夠威信的年輕領袖們一度表現出相當的具有權威。構成這種共識的觀念來自何處？來自在此之前衆多的民運人士的長期的、大量的努力。一大群來自四面八方、以前素不相識、更不曾共同排練過的演奏員，在沒有一個公認的高明指揮的情況下，竟然成功地合奏出一支支高度和諧的樂曲，那是因為每一個演奏員早在集中之前就各自獨立地把樂譜爛熟於心了。因此，只要有人起了音頭，一切就像預先統一準備好似地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了。如果說這場起先是近乎天衣無縫的演奏後了亂了套，那道理也是簡單的：因為輪到後面這幾段，各人原先的樂譜是殘缺不全的。如果說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需要十條共識，那我們已經有了九個。所以它取得了那麼驚人的進展。所以它功虧一簣。八九民運未能做到見好就收，那是因為在此之前大多數參與者們本來就缺乏見好就收這一策略原則的明確觀念。這就是關鍵之所在。

長期以來，我們民運人士在研究和闡揚民主理念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我們往往只注意了對民主的研究，而相對地忽視了對民主化的研究；只注重了對目標的研究，而相對地忽視了對過程的研究。我們熱心於推展群眾運動，我們對在現階段適宜提什麼口號、採用什麼行為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天時地利等等都有過很不錯的洞見，但是我們却相對地忽視了對運動過程之中的進退動止，對於群眾運動的各種政治行為特徵以及如何使運動不失去必要的控制等問題進行細致的研討和廣泛的傳播。「行成於思毀於隨」。思考上的懶惰招致行動上的報復。什麼是運動？運動就是觀念掌握了群眾。運動的失誤反映了觀念的不完整。在這

一點上，正是我們這些具有一定理論基礎並以推動中國民主為奮鬥目標的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學運的文章中，提到過群眾運動常有不撞南牆不回頭傾向。當時也計劃著寫一部對民主牆以來大陸民主運動成敗得失以及未來鬪爭的目標策略等進行詳細研討的東西。後來因諸事纏身，時寫時綴，終未能竟。八九民運興起時，我也只是忙於吶喊助威、廣造聲勢。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寫下「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當前民運策略的緊急建議」一文時，我心中已隱隱感到為時晚矣。我並不能肯定，我要是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就把我對此類問題的系統觀點公諸於世並努力使之能讓國內的民運人士見到，到底會起多大作用。但是，我沒有及時地做好我能夠做好的份內之事，這不能不使我十分痛心。

## 十三、對「見好就收」的幾點說明

對於「見好就收」這一策略原則，有人提出一個很實際的疑問。現在回頭去看整個八九民運，我們或許可以說，如果運動在五月十六日闡明復赴廣場談話後撤離、或者是在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政治局發表書面講話後撤離，當是最佳時機。但是這個最佳時機在當時怎麼能準確無誤地判斷呢？四二七遊行後的形勢就是「好」了，可是後來的事態證明，在四二七後不是一個「好」而是繼續「上」，完全可能得到更大的一個「好」。因而運動若是在四二七後便「收」未免就不合算了。問題是，等到五一六或五一七時，誰個又能斷定那時已到達最好？誰個又能肯定再上一步就必壞呢？這的確是個問題。五四之後，北高聯負責人周勇軍等認為應見好就收，遂宣告五四後復課。結果遭到很多學生反對，被撤掉主席職務。五月十二日，一批更激進的學生開始準備絕

食。絕食行動的發起，迅速地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在五·一七、五·一八，又有不少學生領袖（包括吾爾開希）主張收兵，又遭到否定。五·一九中共頒佈戒嚴令。但在此後的幾天之中，民運形勢不但未見衰減，反而呈現出更為壯觀的形勢。可惜這種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的形勢未能持久。那時候多數人才終於發現，最佳時點已經過去了。這樣看來，只是懂得「見好就收」的原則還是沒什麼用處的，因為這條抽象的原則本身並不能告訴你何時是「最佳時點」。

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可從四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大多數策略原則，本身都是抽象的，它需要人們正確地應用於實際。這就離不開經驗和直覺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這個意思。但是，第二，這些抽象原則畢竟還是十分重要的。八九民運之所以未能見好就收，在更大的程度上，還不是因為人們對何時為最佳點有爭論，而是因為有相當一些人頭腦中本來就沒有見好就收的概念，而是迷信所謂「越壞越好」的「辯證邏輯」。如果廣大民運人士都對「見好就收」的原則有明確的共識，八九民運的結局斷然不致如此。另外，第三，西諺云：「更好是好的敵人」。人們常常是貪圖「更好」或「最好」而不重視已經到手的「好」，結果反而得到了「壞」。中諺云：「過猶不及」，是說事情做過了頭和沒做夠都是不好的。但相比之下，「不及」者尚可增補，「過」了很難倒退，因此我們要寧可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過」。現在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即使學生在五·四之後就復課，其後果也肯定要比在五·一八之後仍不撤離好得多。最後，第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錘子買賣。「見好就收」的意義不僅在於得到了「好」，更在於它有助於開啟一種雙方良性互動的新局面。「見好就收」並不是「見最好就收」，也就是說，它並不要求我們一定要贏得了「最好」後才收。因為這裡的「收」並不是永遠的停止，而只

是一個輪次的結束。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鬥爭，並不是傳統的改朝換代，而是在朝野之間建立起另一套不同的行為規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真正價值在於建立新規範。這才是至關重要的。

#### 十四、當戰鬥打響後，我們才發現：武器還沒有準備好

我們未能在八九民運之前對有關民主化的過程、有關運動的進退動止、有關群體心理與行為特徵、有關非暴力方式的各種技巧等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闡揚。這是我們真正的失誤。之所以是真正的失誤，乃是因為這些工作本來都是有條件去做的。海外自不必言（不要低估海外民運、海外輿論對大陸內部的影響）。即使在國內，這種條件也是存在的。衆所週知，在前兩年，國內的政治氣氛還是比較寬鬆的。不少很「反動」的書籍都有可能公開出版或是以「內部讀物」之名流行（例如「古拉格群島」、「一九八四年」等）。至於各種大小討論會、民間沙龍，言論幾乎是百無禁忌。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充分地運用這些條件。我們早就預感到一場風暴即將來臨（老實說，我們也是這場風暴本身的製造者之一），它果然來了，而且比我們預想的還猛烈。我們終於等到了用武的大好機會，然而就在這時，我們才發現，我們還沒有把武器準備好……

#### 十五、關於「見壞就上」

「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一組配套的策略。現在海外有一批激進的朋友們，他們不贊成「見好就收」却很同意「見壞就上」。他們認為，八九民運的失誤不在於沒有「見好就收」，而在於「見壞沒上」。其實，這種批評我早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中提出過了。在這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

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我當時就相信所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決不僅僅是「清場」、「恢復秩序」而已）。既然我們沒能在此前形勢有利時收兵，那麼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退了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後來民衆一度表現出很有力的反抗，可惜未能持續。由於後勁不足或者說是人乏馬困，廣場上的聲勢明顯地由盛而衰。然後，我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興奮。但是我很快就獲悉他們的這一行動並未挽回廣場上已出現的頹勢。大多數人在逐漸退避，或出於疲乏，或出於恐懼，或出於對未來事變的殘酷性的低估。柴玲是運動中的強硬派，在此前數次有利形勢下其它領袖主張撤離時，她的極力抵制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我以為她的意見是錯誤的，但到了最後階段，我認為為她和其它堅決留在廣場的人的作法是正確的。因為事已至此，不得不拚死堅持。據後來侯德健說，他在六四凌晨勸說柴玲等撤離時，柴玲告訴他，趙紫陽、閻明復派人傳話來叫堅持到天亮。我不知道此事是否確切，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

對於這後一點，我需要多說幾句。

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

中共強硬派之所以選擇在黑夜屠殺，而且不惜採用現代化重型武器，那是出於兩個考慮。第一，它力圖借用夜色的掩護以較順利地進行屠殺。古人說，月黑風高，殺人放火。黑夜模糊了人的雙眼，也模糊了人的良心。黑夜能

減少人作惡時的犯罪感。第二，採用重型武器是爲了速戰速決，爭取在天亮前解決問題。

起先，強硬派借口對話政策已經失敗，下令戒嚴。但由於民衆頑強抵制，致使戒嚴令在十餘天裡根本無法貫徹。可以想見，這必然再度引發黨內的尖銳鬭爭。強硬派深知，除非他們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盡快地造成既成事實，否則他們公然屠殺和平市民的作法必定會招致內部的強烈反對，從而使自己陷於內外夾擊的困境之中。在這裡，最關鍵的一點是，強硬派必須在上層其它人士來不及作出強烈反應之前便造成既成事實。在政治上，既成事實一向有很大的作用，因爲它一下子就限制了人們的選擇餘地。「事實」是「可能」的剋星：一旦「事實」鑄成，很多「可能」就不存在了。畢竟，黨內上層中，除去強硬派和溫和派這兩個極端外，大部分人的態度是猶豫的、矛盾的。他們既不願意接受民衆的要求，又不願意屠殺和平的民衆。假如在不出作較多讓步的前提下，對話政策能夠平息事態，他們就會支持對話的政策；假如戒嚴令能夠在流血不多的情況下貫徹成功，他們就會支持戒嚴。由於對話政策未獲成功，這些人轉而贊成戒嚴，但是倘若戒嚴令無法實施，他們就可能會回頭去重新考慮對話（再度對話必然要作出更多的讓步，這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假如所謂「清場」工作直到六四白天都遲遲不能完成，天安門一帶血流成河、慘不忍睹的現狀令人無法避而不見，那就很可能會迫使這些人再一次改變立場轉而反對強硬派。到那時，黨內、軍內的分裂將公開化並白熱化。大局出現轉機便絕非沒有可能。強硬派很清楚這種危險，所以他們借用夜色的掩護，讓這批中間派「眼不見、心不煩」地能夠躲避艱難的選擇，同時更用速戰速決的辦法造成既成事實。這樣一來，中間派人士既可以用「清場沒有死人」的謊言自欺（將來也可以用「不瞭解清場真相」爲詞推卸歷史責任），同時又感到木已成舟，反對也來不及

。既然這些人原先並沒有做好公開反叛的思想準備，那麼此時也只好接受既成事實了。在溫和派一面，他們當然希望「清場」工作進行下去並引發更大的動亂，此時他們才有機會指控對方的錯誤而東山再起。一旦「清場」工作迅速地完成，那麼不管它有多麼殘酷，他們也很難再作反攻了。簡言之，假如屠殺不能速戰速決，假如民衆的抵抗能再持續一段時間，整個局勢的改觀確實是有可能的。套用一句樣板戲「沙家灣」中郭建光引述的毛澤東的話：有時，戰爭的勝負即取決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雖然整個運動未能再最後時刻再一次「見壞就上」，但仍有成千上萬的民衆表現出極大的英勇並付出了重大的犧牲。這些犧牲都不是無謂的。無論如何，經過拚死奮戰而失敗要絕對地勝過不戰而潰。因爲它保留了一股氣勢，保留了一種精神，保留了一種追求。

#### 十六、關於「打不贏就跑」

有人問，假如在六四之前，民衆便撤離廣場，後果又將如何呢？我們知道，在五月下旬就有人建議，開展一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然後宣佈凱旋收兵。

我認爲，在戒嚴令之後再撤離，其後果必定要比在此之前的撤退差。因爲它已經不再具有明顯的主動性。很難避免別人產生「敬酒不吃吃罰酒」、「勸是勸不動的，一嚇就嚇回去了」這種印象。其大致後果恐怕和八六年「八七年那次民運的結果相類似。搞一個「凱旋在子夜」固然能爭得幾分主動，但終究不能改變整體上的被動。八六—八七年那次學潮的最後一仗，是北大學生衝破軍警封鎖深夜進軍天安門，終於奪回了白天遊行被捕的同學，應該說也贏得了部份主動。但總體上講它仍是失敗了。在戒嚴令之後再撤退，如果搞得漂亮，民運方面的有生力量的損失也許不會太大，但士

氣影響肯定不會小。「秋後算賬」一定會發生，上層溫和派的倒台也不可避免。如果搞得漂亮，給人的感覺是「共產黨不動真格的，大家就鬧個沒完沒了；共產黨一要動真的了，個個都打退堂鼓」，那麼也許更糟糕。

有人或許會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這有什麼不好呢？郎郎的一篇「逃跑學」把這點說得很明白。他的觀點，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先說同，而說異。

我不認爲搞民主就非得遭受重大犧牲不可。政治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業。勇敢並不是唯一的因素。更確切說，我們要爲「勇敢」正名。匹夫之勇並不是最了不起的。我們欣賞的勇敢，應該包含兩個條件。其一是目標的正義性；其二是知道如何最能獲得成功。如果不問目標及手段的高尚或卑劣，「以成敗論英雄」，便是一個大謬論，如果顧及到目標及手段的正當性，「以成敗論英雄」便是大真理。一個民族倘若總是最敬服那些悲劇英雄，那本身就是個大悲劇。它絕對是個不祥之兆。一個悲劇的民族才會有那麼多悲劇的英雄，而一個民族愈是片面地敬服悲劇英雄，它的前途也就一定會充滿悲劇。

少時讀史，對漢之清流與明之東林的一批儒生甚爲敬服。成年之後，敬依然敬，服却是不那麼服了。想想看，這批儒生一度都很有力量，權奸閹宦無不畏避三分，到頭來却搞得家破人亡，讓敵人幾乎全盤贏了去。這等政治才能怎麼能讓人服？如果一批忠貞之士把很有希望的事業給搞敗了，即使他們個個都成仁取義，從政治的角度講我們也不能一味頌讚。那和一個輸掉了可勝之仗並英勇陣亡的將軍並沒有什麼兩樣。因此，離開了事業本身的成敗去孤立地歌頌冒險犧牲，使人們浪漫有餘而理智不足，這並不是什麼好事。

但是，「打不贏就跑」是有條件的。那要看你對失敗是否負有直接的責任。如果是因你



的指揮、你的命令，才使隊伍陷入敗局。見勢不妙，你就開跑，還自認爲是很正確，很恰當，那總是說不過去的。你至少需要引咎自責。所以我認爲搞民主不一定非流血犧牲不可，是因爲我相信一種高明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基本上可以使對方無從使用其暴力工具（此觀點的根據，前文已有論過，後面還會補充。這裡姑且置之不論）。假如出於種種原因，當局已經動手鎮壓，我們民運人士該怎麼辦？

應該說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能一概而論。首先，政治不同於軍事。在戰爭中，敵我分明，你死我活。在寡眾不敵時，跑似乎並無不當。如果我們的每支軍隊在明明打不贏的情況下都硬要全體拚死沙場，那麼我們的實力會迅速地在幾次挫敗中喪失殆盡，那當然是愚蠢的。然而，要是我們的每支軍隊、乃至每個官兵都抱定了「打不贏就跑」的心理，那麼我們就根本打不起任何硬仗，從而注定了沒有贏得勝利的可能。一支軍隊之不同於一群手執兵器的烏合之衆，區別在於前者有統一的指揮號令，有軍法軍紀。「打不贏就跑」的原則只是對於整個戰役的最高指揮官而言，決不是對每個下屬官兵普遍適用的。都說美國佬允許軍人保命投降，但那顯然也是有條件限制的。否則你很難想像美國人還有打勝仗的時候。

搞民主運動不同於打仗。參加民主運動、參加民運組織不同於參軍，後者無異於立下生死狀。民運組織的紀律再嚴，絕少能有權力要求其成員去坐牢殺頭的，更不用說無組織的群眾了。因此，民主運動一旦遇到很大的風險，我們幾乎只有聽其自然。跑掉的你無權譴責其怯懦，不跑的你不能責備其愚蠢。戊戌變法失敗，康梁出逃，譚嗣同可走而不走。詩曰「去留肝膽兩崑崙」。他肯定了去者的意義——當然也有前提，那就是「去者」必不當負眾望，務必將事業進行到底。譚嗣同本人留下來從容赴義。雖然說「各國憲法，無不流血而成」，而譚的死難並沒能使變法成功，但他的死難

激勵了多少後來者的奮鬥，那是無庸置疑的。後人也有批評譚不該赴死的。爲什麼要去死呢？爲君嗎？這個觀念太陳舊，不值得；爲維新事業嗎？據說譚嗣同早就更傾向於革命而未必信賴改良。所以有人嘆息，如果譚嗣同能逃出來直接投入革命，豈不更好。有趣的是，似乎沒有人去批評出逃的康梁的。莫非他們真的都相信譚氏所舉程嬰、杵臼的故事，以爲死更容易活更難嗎？

在軍事上，「打不贏就跑」的意思是保存實力。保存實力和單純的保住性命顯然不是一回事。保存實力意味着你必須依舊具有和原先差不多的戰鬥能力。一支軍隊必須依然還是一支軍隊。如果一支軍隊丟掉了武器、其成員又星落四散轉爲表面上的順民——只有心不死，那應叫做潰敗，和此處的「跑」即轉移完全不相干了。民主運動「打不贏就跑」又是什麼意思呢？除了極少量人跑到海外共產黨權力之外的地方尚可堅持抗爭——但已是另一種形式的抗爭了——之外，其餘絕大部份人又將如何呢？假如大家除了心不死外，失去了以前曾經擁有的——組織、公開發言的場地、相互之間的廣泛而公開的聯絡渠道和抗爭方式、等等，這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叫做是保住了實力呢？再假如其中不少人變得比過去更少勇氣、更少自信，更多消沉和更多恐懼，那還能算是「打不贏就跑」嗎？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

考慮到這一點，你就能理解民運在高壓面前流血犧牲的偉大意義了。和兩方打仗不同。當一方將士寧死不逃、全部捐軀沙場時，對方會爲之震撼。對方會對你方更尊重，但他們仍然會把你們視爲敵人——因爲這是戰爭。然而，當一個政府派兵鎮壓民衆時，如果這些被稱爲「暴徒」、「罪犯」、「野心家」的人們竟然不肯逃散，甘願以和平的態度去迎接一切襲來的橫逆，那麼它將產生的是另一種震撼：這種震撼足以使相當一批政府官員和相當一批軍人武警，深刻地懷疑鎮壓的正義性，深刻地懷

疑執政者的合法性；乃至於拒絕鎮壓甚而掉轉槍口。其結果決不是使鎮壓變得更容易（假如大家都不跑的話），而只會使鎮壓變得更艱難——因爲這是政治。前面說過，獨裁者的力量在於他們有成千上萬的人自覺地服從他們，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無知；不是天良喪盡，充其量是有若干麻木。我們不能去感化獨裁者，但我們可以也必須去感化這成千上萬的人。否則我們休想勝利。奉行「打不贏就跑」的原則，一方面不能免於嚴重地喪失戰鬥力，他方面又失去了感化對方（不是指一小批獨裁者）的力量。所以可能造成更不幸的結果。

### 十七、兩種激進派

在戒嚴令之前，民運未能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民運未能堅持着見壞就上。這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兩大失誤。但是，嚴格說來，我認爲八九民運只有一大失誤，那便是前一個失誤。因爲，要求廣大民衆在巨大的危險面前長盛不衰、屹立不動，那顯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種脫離實際的過份要求。我批評柴玲的錯誤，決不是懷疑她的人格、她的信念，而是說她未能準確地把握群衆的承受能力。而說她未能準確地把握群衆的承受能力。柴玲可算是廣場上的激進派。但同時她又是一個堅定的非暴力主義者。有兩種激進派：主張非暴力的激進派和主張暴力的激進派。現在海外開始出現後一種激進派，他們最不能同意的莫過於像「和平」的最高原則是犧牲——類口號了。這深刻地揭示出兩種激進派的原則區別。前者的特點是對人們的獻身精神以及感化的作用估計過高，而後者則對這些估計過低。

### 十八、民主運動不僅僅是道德運動，而且也是政治運動

是的，當我們爲八九民運未能見好就收而深表遺憾時，那也就意味着我們對那些在關鍵

時刻採取冒進主張的民運領袖提出策略上的批評。我深信這種批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回顧以往的大多數民主運動，幾乎都是越到後期冒進的思潮越佔上風。伴隨着運動聲勢與熱情的增長，差不多總會導致人們思考水平和策略水平的下降。運動演化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更冒進的新領袖取代較謹慎的老領袖的過程。在民運隊內部的爭執中，冒進的一派常常具有一種在氣勢上的優勢。我們知道，在整個八九民運中，不止一次，不少人（包括一些被以往的事實業已證明為有膽識的民運領袖）及時地提出了收兵的建議，而他們立即被對方扣上「學賊」、「出賣」一類帽子。這無疑是不公正的。與此相對照的是，即便到了運動結束，那些導致運動受挫的冒進思想也很少得到批評和反省。這顯然是不正常的。相反，由於激進派在道義上、勇氣上和信念上都容易顯得突出，再加上這些人事後總是受到專制者更惡毒的咒罵和更嚴酷的迫害，因而在衆人心目中是殉道的英烈，所以對他們策略上的失誤的批評就有可能被看作是對他們偉大人格的某種不夠尊敬。這自然就妨礙了人們冷靜地總結經驗教訓。

在此，我要提出兩點重要的意見。第一，我們必須學會就事論事。我們必須把對「人」的評價和對「事」的評價區分開來，我們必須把對這件事的評價和對那件事的評價區分開來。

第二，我們必須強化政治意識。民主運動不僅是一個道德運動，同時它也是一個政治運動。從事民主運動者，不但需要秉持堅定正確的民主理念和道義原則，同時還需要具有強烈的求勝意識或曰成功意識。我們不但要追求正義，而且還要追求成功。民主運動，從道德的角度講，我們需要提升每一個人的精神素質與境界，我們需要把不完美的人變得完美些；然而從政治的角度講，我們則應着眼於如何使不完美的的人做出比較完美的事；我們需要的是在現實的人們的素質基礎上，如何達到我們的理

想的具體政治目標。當運動後期柴玲抱怨起中國人的素質太差時，這種錯誤就已表明朗化了。或許她對中國人素質差的批評全部是正確的，但那對於批評家或道德家而言才是正確的，而對一個政治家而言便是錯誤的。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問題上、不同的時期中分別擔任批評家、道德家或政治家，但他（她）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同一問題上兼具這兩種功能。

### 十九、持不同政見者與民主運動政治家之間的區別

對社會不同角色的不同功能不作區分，也許是我們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普遍的毛病。這裡，我順便要談一談一般的持不同政見者與民主運動領袖的區別。因為有許多人似乎不明白這二者的區別。他們往往把一個優秀的持不同政見者徑直地等同於一個民主運動政治家。波蘭團結工會顧問米奇尼克說得好：持不同政見者的特點是他的簡單性和純潔性。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意味着始終堅持一種道義的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總是需要妥協。對於政治家而言，如米奇尼克所說，「要取勝這一點變得非常重要」。搞政治，你必須學會贏得人心，贏得別人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對方營壘中盡可能多的人的同情與支持。你必須學會尋找同盟者，也就是設法讓那些和你有不同的目的與利益的人在目前這一階段圍攻中站在你這一邊。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他應當不怕孤立，「舉國皆吾敵而不改其度」；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必須要有群眾，他必須把敵人限制在最必要和最少量的範圍之內。毫無疑問，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應當有勇氣堅持正確的主張而敢於反對流行的錯誤意見。但是，這裡所說的正確，不惟是指道義上的正確，更是指政治上的正確。這又是一個人們常常不加區分的重要區別。八九民運中，那些及時提出收兵主張的領袖們在政治上是正確的，而與之對立的一派人在政治上則是錯誤

的。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談談民主牆運動。自去年一月國內知識界發起簽名信呼籲釋放魏京生以來，我們欣慰地看到，作為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英勇先驅之一的魏京生，終於贏得了世人的肯定與讚揚。可是我們也注意到，有越來越多的人把魏京生的觀點視為民主牆運動中最正確的主張。這就把發表不同政見和從事政治活動混為一談。作為這場運動的參與者，我很清楚地知道，當魏京生直接批評鄧小平的大字報貼出後，我所接觸到的民主牆人士幾乎都感到不安。我們並非否認其觀點在道義上的正確性。民主牆人士真正信賴鄧小平的人，如果有的話，也是很少的。即便是對鄧懷有某種好感者，至少也不認為人民無權批評鄧小平。使我們不安之處恰恰在於：正因為我們不相信鄧小平是個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所以這張大字報才很有可能招致報復，並由此而招致對民主牆這塊尚未鞏固的自由陣地的封殺。不錯，我們修築民主牆的目的是為了抗擊一切專制，但是，你不能指望一面剛剛築上一部份的還很不完整、很不堅固的牆立刻去承受最強大的打擊。正如你不能把剛剛破土的樹苗立即置於風暴的中心一樣。否則你永遠得不到參天挺拔的防風大樹。政治的藝術就是下棋的藝術，關鍵不在於你要說什麼、做什麼，而是先說什麼、先做什麼。那些不急於「捉將」而妥善布局造勢者，往往才是更高明的棋手。「四五論壇」的朋友趕快寫了一張反駁魏京生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要點有二：一是為鄧作正面肯定，二是強調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凡是善於從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的人，都不難看出這張大字報旨在保護魏京生、保護民主牆的良苦用心。遺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不明此理。有道義感的人在投入政治時最常犯的一個毛病就是，他們在其中只看到道義而沒看到政治。這大概是從古代的清流、東林黨直到當代的若干民運人士的共同悲劇。我希望，我

的這番批評，不致招來一些性急者們從道義上的匆匆譴責，而有助推動大家從政治上進行更深刻的思考。

基於同理，我們在對八九民運的領袖們給予同樣的道義上的高度評價之外，還需要認真細致地對其中各種主張在政治上的或高明或不高明作出恰當的判斷。比如對高校對話團的領袖們（項小吉等），他們的主張較成熟、較正確，由於他們不那麼激烈，由於他們在後期被錯誤地排斥出學運中心（那正是這次學運悲劇之所在），反而被人們、包括輿論界所冷落和漠視。這不僅有失於公正，更重要的，它不利於在我們這個本來就政治智慧不足的隊伍中小心翼翼地培養出一種成熟的智慧之風，從而對我們的未來可能造成極為嚴重的傷害。

這裡要糾正一個普遍的誤解。不少人以為，誰個在策略上愈激進，就表明誰的鬭爭目標愈徹底，其實不然。我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見好不收的人事先都沒有料到過中共會血腥屠殺，那恰恰表明他們本來對中共抱有過多幻想。我們必須懂得：目標徹底不徹底是一回事，策略的激進不激進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堅決徹底的鬭爭目標，必須通過溫和和節制的策略才能實現。這一層並不深奧的道理，務必請熱衷於激進策略的朋友們深思之。

## 二十、關於五一七宣言

在八九民運中，民運方面還有一些次要的失策。一批知識份子聯署的直指末代皇帝的五一七宣言，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在當時情況下並非明智之舉。這個宣言的出現是和趙紫陽五一六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一段講話分不開的。據當時在北京現場收看到這一講話的不少民運人士說，他們都感到趙紫陽的這一舉動極不尋常。不少人相信這是趙向鄧公開攤牌的信號。那又使他們猜想趙一定會有後續動作或曰手中別有王牌。「鄧小平完了」，這是至少一部

份人在聯署五一七宣言時的一個念頭。

根據以上情況，有人認為，五一七宣言是試圖把學運納入黨內權力鬭爭的軌道。這種批評並不準確。因為宣言的簽署者並不是先就打定了擁護趙的立場，然後根據趙的暗示，發動民衆去倒鄧。正相反，他們是從民運的立場認定鄧是改革的阻力，認為對學運表示容忍的趙可以接受，從而願意和趙配合一起逼退鄧小平。五一七宣言的不智之處在於它給民運不必要地增加了敵人；它使得一些原先可能中立的人（不是指鄧本人）對民運反感，又使得另一些原先就反對民運的人對民運更加敵視。它的積極作用在於強化了一批民運積極份子的反抗熱情，但遺憾的是它同時也助長了大家的輕敵情緒。它顯然不可能起到進一步擴大民運力量的作用。一般來說，在運動過程中，保持原有目標，強化抗爭方式，往往可以起到增加壓力的效果；直接提升抗爭目標却常常會起到減低壓力的效果——這一下子是很難判斷的。因為你會聽到同樣高昂乃至更為高昂的呼聲，但仔細辨認便可發現，那並非喊口號的人在數量上增加了，而是他們在質量上增加了，數量也許倒在減少了。這是對民運力量方面而言，至於它在增加敵人的數量和強度上的消極作用則是顯而易見的。故而此舉得不償失。

趙紫陽為什麼要在五一六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講出鄧小平仍是中共最高這袖這番話？其間是否別有深意？部份民運人士和強硬派都認為此話寓意深長。不過，按照陳一諮的解釋却並非如此。據陳一諮講，五一六上午戈氏與鄧會談，晚間與趙會談。在與趙會談時，戈氏曾說：這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最高首腦的會談。趙則說，事實上我們的最高首腦是鄧。如此而已。

趙紫陽說這番話的真實動機如何，外人只能作出種種推測。依我之見，它很難說是一種成竹在胸的攤牌訊號，不如說是一種公開的自我表白。由此，民運人士應該瞭解到趙實際上

同情民運但尚無力左右中共決策的困境。這既給我們一個有利的消息——總書記是在這一邊的，又給我們一個提醒——在中央，強硬派意見仍佔上風。因此，民運人士除了應該更堅決外，尤其要更清醒、更謹慎。當然，你可以說趙紫陽應該更明朗、更果斷些，或者，他根本不該講這番話。不過那是對趙而言。對民運人士來說，我們由此而更激烈，那總不是明智的。

談到趙紫陽在運動中的各次表態，有一件似不應忽視，那就是他在五月十七日對絕食同學的一次書面發言（刊於次日人民日報）。把這次講話與趙在五亞銀年會上的發言相比，立場顯然更要溫和。意味深長的是，強硬派後來對趙的五四發言大加攻擊，却根本沒有提及這個書面發言。當然，趙的五一七書面講話一開始就明確提到「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這不可能是撒謊。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李鵬、姚依林等在五月十七日還會贊同這樣一個低調的講話呢？難道不就是在這同一時刻，強硬派的鎮壓方針幾乎已成定局了嗎？

這就又回到我此前多次指出的問題上來了。從這篇講話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推測出：在五月十七、十八這幾天，上層的力量對比正處於一種緊張對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極其微妙的階段。兩派意見都已十分明白：是「實軟」還是「實硬」？雙方暫定的共同前提是必須盡快讓學運退潮，一派力稱採用更正面的、更溫和的對話能夠奏效，另一派則斷言非鎮壓不可。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只有同意先試一試軟辦法（因為你不能先試硬辦法）。基於「先用你的辦法試試看」的心理，強硬派同意趙以政治局常委集體的名義發表這個講話。大體上我們可以說，倘此舉成功，溫和意見也就獲勝；倘此舉失敗，強硬主張便會決付實行。我們看到，在上層人事佈局給定的前提下，此時此刻，不是上

層的權力鬭爭決定了下面民運的命運，而是下面民運的進退走向，決定了上層的權力鬭爭。

廿一、關於五一八對話

這裡，我們再談一談五一八學生領袖與李鵬等人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學生領袖的第一個失誤之處在於，他們未能努力使已經爭取到手的對話機會保持下去。應當看到，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民運人士必須始終要求和當局對話。我們要求對話，表明我們的理性和自信，表明我們不希望暴力、追求和平。一旦當局同意對話，那本身就是民運力量的一個偉大勝利。它意味着當局對民運力量的某種認可，意味着當局中主張暴力鎮壓的思潮退居下風，它使得鬭爭轉移到對民主最有利的領域進行。因此，對民運人士來說，一旦我們贏得了對話的機會，我們就務必要把這種機會保持下去。如果對話的情況不能令人滿意，我們也不應放棄對話，而必須繼續堅持對話。在這裡，正如我多次強調的那樣，形式重於內容。一次談不好，我們就約好和他們下一次再談；下一次談不好，我們就約好下一次再談。關鍵是，我們要讓對方接受用對話解決問題這種形式。因為這樣就可以比較有效地防止對方使用暴力。

具體談到五一八這場對話，我們尤其要懂得，這一對話的舉行，本身就已經宣告了民運力量的勝利。因此，學生領袖本來要做的就是把這一爭取到手邊的勝利確認下來。按照王丹的說法，絕食學生提了兩條要求，一是肯定學運是愛國不是動亂，二是對話、現場直播。第一點要求，可以說在當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趙紫陽書面講話（此講話明言是代表整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經得到肯定；而李鵬等人前來與學生領袖會談並現場直播，也等於實際上滿足了第二點要求。換句話，李鵬的到來，本身就意味着學生的勝利。但在政治上，勝利往往會被披上一件難以識別的外衣。因為失敗者總

是盡可能地掩飾自己的失敗。倘若你沒有把它認出來，不去及時地把它抓住，你就可能會失去它。你不能指望李鵬一上場就說：「同學們，趙紫陽已經代表中央肯定了你們是愛國的，現在我又來和你們對話並讓現場直播。我們已經接受了你們的兩個條件，你們可以撤退了吧？」如果李鵬這麼說了，很可能學生一下子就意識到自己的勝利，那場對話恐怕一開始就結束了。但是，我們無法指望中共當局在自己不得不接受失敗的時刻還肯公開地宣佈自己的失敗。迫不得已前來對話的李鵬一開口就提出：

「今天見面只談一個題目，如何使絕食人員解除目前的困境。」用主動要求學生撤退的說詞掩飾自己被迫接受學生要求的尷尬。這就迷惑了學生。學生們發現，如果他們同意撤退，那好像是他們接受了政府的要求而不像是政府接受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倒顯得被動了。出於這種感覺，學生們未能以勝利者的姿態宣佈凱旋收兵。為了表現主動，他們只好在對話中堅持強硬態度。作為這次對話的主角之一的吾爾開希，更提出了兩點進一步的要求：一，要求趙紫陽或李鵬親臨廣場與同學直接講話；二，要求人民日報發社論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向全國人民道歉。吾爾開希說，做到了這兩點，學生才可能將絕食改為靜坐，然後在這種情況下繼續解決問題。盡管我們可以相信，吾爾開希的這一立場在道義上是正確的，而且很可能代表了廣場上許多學生的意願，但是與此同時，它顯然會使得某些原先中立的人們轉而對學生的得寸進尺感到不滿，並且刺激黨內保守勢力完全放棄對話手段而支持戒嚴。此外，一些學生代表在對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年輕氣盛，無疑也減少了一些人對學運的同情與支持。不錯，吾爾開希在對話中的鋒芒畢露，強化了他個人作為少年英雄的形象，但反過來却影響了整個對話的政治效果。台灣的李敖向以言詞尖刻、笑傲王侯著稱，連他也指出吾爾開希的表現有失風度。他舉出當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對蔣介

石的溫文有禮為例，說明學生代表的欠缺成熟。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本來，在五一八對話中，學生的地位是很主動的。這一來是因為五一八對話的進行，本身就意味着學生的勝利，二來是因為學生代表的特定身份，使得他們天然地具有一種極大的靈活性。學生領袖是作為群眾性民主組織的代表，作為群眾運動的代表去談判的，這種身份其實給了他們一種極大的便利。當對方的答覆令人滿意時，代表們自然可以一口應承，得勝而歸。倘若對方的答覆不令人滿意，代表們在略加反駁的同時，大可不必把話說死。代表們可以表明：作為民主組織的代表，我們只能應承大家預先表示過贊同的東西，如果政府方面的意見既然和大家原來的要求有距離，那就需要大家民主討論之後才能作決定。學生代表應用強調民主程序、民主原則的辦法避免對政府的意見直接地、毫無商量餘地的表示拒絕，以免讓親政府的一方得出談判破裂的責任在學生代表的不利印象。這種辦法，既在事實上肯定了政府的意見，同時又贏得了進一步迴旋的時間，既保留了繼續施加壓力的手段，同時又保留了進一步對話的機會。我們還記得，最初，政府只派出較低級的官員出面與學生對話，其目的有二：其一是盡量壓低學生組織的地位；其二就是為了使政府本身具有更大的迴旋餘地。當低級官員與學生對話時，如果學生的要求不高，他們便可答應下來；如果學生的要求較高，他們則可表示「把你們的意見帶回去匯報，研究研究」，以避免直接觸怒士氣正盛的群眾運動。等到後來，政府高級負責人不得不直接與學生對話，政府就失去了這種便利。由此看來，政府是很懂得運用這種便利的，而天然具有此種便利的學生却不知善用。這就使得學生們不能有效地把對話這種大好方式保持下去。當吾爾開希說廣場是多數服從少數時，那明顯是個失誤。它不僅不合於民主，而且顯得不近情理，似乎是只要有一個人任性執意而為，

所有人都必須為之讓路。不管這少數人的主張多麼正確，也是說不過去的。我們知道，早在五月十六日闖明復來廣場時，吾爾開希就主張撤，由此可以推斷他在五一八對話中的強硬立場，並非出於他個人意願，而是為了代表廣場上一些同學的要求。所謂「多數服從少數」之說，說明了在廣場上許多同學之所以堅持不撤，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牽就更激烈的少數同學。沈彤曾經談到民運領袖的「從眾」性，也就是遇事不是去引導群眾，而是讓群眾推着走的特性。事實上，這裡存在着兩個問題：一個是領袖追隨群眾，另一個是群眾追隨少數激烈份子。這就造成了運動中少數激烈份子主導局勢的結果。由此我們應當引出一條重要的教訓。那便是，在群眾運動中，民運人士、尤其是領袖人物，一定要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不僅要敢於反對權勢，而且也要敢於反對內部的錯誤主張，尤其是要敢於反對那種以過激姿態出現的錯誤主張。民運隊伍內部，同樣需要糾正「寧左勿右」的危險偏向。這一教訓，人們切切不可忘記。

## 廿二、關於六四屠殺

最後，我們還要談一談六四屠殺。我們知道，直到屠殺前夕，絕大多數人都未曾料到中共當局會採取如此殘酷的手段鎮壓民眾。這無疑表明了大多數人們對中共當局的心理與行為邏輯的認識不清，從這裡，我們又該引出什麼教訓呢？一方面，我們似乎可以批評說，人們應該事先便對中共政權的兇殘本性有清醒的瞭解；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考慮到，假若人們果然都早就預見到了中共政權的兇殘，他們究竟還會不會投入這場運動？這看來是一個矛盾。要知道，八九民運之所以能夠爆發、能夠發展到如此驚人的規模，那是和人們普遍地認為中共當局不可能對他們悍然血腥屠殺這一信念分不開的。你可以批評這種信念是天真

的幻想。然而問題在於：如果沒有這種信念，人們就不會去投入非暴力的抗爭。你可以說，對付中共這樣的政權，非暴力鬥爭本來就是無效的。但是我們要問：那你為什麼不從一開始就告誡人們不要去從事這種徒勞無益、白白犧牲的鬥爭呢？你或許會說，非暴力鬥爭儘管是無效的，但却是必需的；非暴力鬥爭的全部意義就在於自我否定；非暴力鬥爭必然失敗，它的失敗會進一步喚醒人心，教育人們放棄非暴力手段轉而從事暴力的反抗。顯然，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八九民運必敗論。有關這一觀點之反駁，我在前面已有論述，此處不再重復。在我看來，大多數人們對六四屠殺深感意外，那確實表明他們對中共政權的殘忍一面缺乏清醒的估計，但它並不意味着我們從事非暴力反抗徒勞無益，它只是說明了我們在進行非暴力的反抗時務必要更加巧妙和謹慎。在軍事上，對手越強大，你越需要注重戰術；在政治上，對手越兇殘，你越需要注重策略。不少人在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時，總愛批評國人的懦弱。我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一定就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懦弱，我也不知道中國人的這種懦弱究竟是中國長期陷於專制統治的原因抑或是它的結果。

從現實政治出發，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所謂的改造國民性，而是如何在給定的國民素質的基礎上，致力於推進政治環境的轉變。固然，自由的神祕在勇敢，但我們畢竟不能指望大家都勇敢。現在人們都已懂得，為了實現良好的政治，我們不能指望執政者個人素質的完美，而應致力於制度的健全。基於同理，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中，我們也不應指望民眾都具有「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氣，而應注重於恰當的戰略和策略。倘若人人都勇敢，民主運動大概就用不着考慮策略；正因為並非人人都勇敢，所以策略問題才變得十分重要。歸根到底，人類贏得自由的歷史，並不是人性改造或人們的品質提升的歷史，而是人類經驗與人類理性成熟和發展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強調政治智慧與民運策略的原因。一九八五年，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宣稱：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力量，團結工會已不復存在。與此同時，瓦文薩則說：不。我們會贏的。但是今後我們一定要做得更聰明、更巧妙。在八九民運遭到鎮壓、中國民運陷於低潮的今天，我們也應抱持這樣的態度。

## 廿三、必須強化責任觀念

馬克斯·韋伯指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必須要具備三項品質：判斷力、熱情和責任感。其中，責任感一項最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強調自己的良好意願而不顧自己主張與作為的客觀效果。他必須考慮自身行動在現實世界中的意義，必須願意為其行動的後果承擔所有的責任。民運人士的特殊地位，常常使我們意識不到這種責任感：運動成功了，大家都誇我們；運動失敗了，大家都罵政府。結果便是，無論運動是成是敗，我們民運人士都感覺不到自己有什麼責任要負。也許，不少人倒是從失敗而能獲得更多的聲望。這種偏向在公眾感情上有着很自然的土壤。然而政治不能沒有腦而只

有心。古往今來所有成功的運動，無一不是從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訓。自我檢討多少是一件有點掃興的工作，而且，它有時也會變成沒有責任積極成果的相互推諉抱怨。但是，我們終究不能迴避這項重要工作。畢竟，我們這裡的討論是對事而不是對人。至於談到責任，那當然不在年輕的、初出茅廬的學生身上。是我們這些年齡較長、閱歷較多的民主運動的理論與策略的研究者和闡揚者們，應當深刻的自省。

至於那些年輕的學生們，他們則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努力地提高自己、充實自己。中國的民主運動需要一大批成熟的政治家，強化我們的責任觀念便是一個有志於投身政治者的基本訓練。（下期待續）

# 從大陸內部來的電傳

本文記錄了最近大陸政治活動中的種種新的景觀。

穆黎音

## 一、台灣政情列入「北大」政治課

現在在河北省石家莊進行軍訓的北京大學八九年入學新生，在其政治課程中，將分析台灣政治現狀編排為一項重點內容。其主要消息來源是台灣當地報紙的報導，編寫成教材對學生進行洗腦教育。最近，在台北開的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期間，所出現之種種抗爭暴力情形，均經過誇張渲染編進政治課教材，企圖向學生證明，民主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多黨競爭制會引發社會動亂，祇有中共堅持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惟一正確的。同時，政治課之所有內容，都是圍繞一個基本中心，就是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尋求依據，以證實「八九民運」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動的，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才真正具有「優越性」。

## 二、江澤民訪朝另有玄機

江澤民決定於三月中旬出訪北朝鮮，外界一般估計其訪朝目的可能有以下幾方面：

(一)、向北朝鮮方通報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情況；

(二)、在蘇、歐等共產國家發生連鎖巨變的危勢下，研究如何加強中朝聯防，以鞏固「共產主義運動」僅剩的陣地，維護住雙方孤立的

政權；

(三)、討論亞洲形勢與朝鮮半島問題；

(四)、金氏父子在交接班之前，金日成把金正日介紹給江澤民，以期今後得到中共的支持並密切合作。

然而，據瞭解中共上層動態的人士透露：去年十一月金日成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帶去金正日的一項行動計劃與鄧小平等中共要人討論。該計劃的大致內容是，如果西方插手共產國家的內政，而共產國家的連續質變又在不斷擴大，那麼，北朝鮮在適當時機會對南韓發動「祖國統一」的行動攻勢（意欲南侵），希望中共能予以配合，採取「解放台灣的行動」。當時，鄧小平未表同意，鄧的意見是：現在中國需要和平的因素大大超過需要戰爭的因素，政權存在的危機並不嚴重，朝鮮也是同樣。鄧又說：當初，地球上祇有一個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看起來他是孤立的，但是後來發展為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陣營」。今天在世界上還不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怕什麼？關鍵是要抓牢槍桿子。

據接近鄧小平的人透露：鄧事後曾在一次會見王震的時候說：「金正日是個炸彈娃娃，搞不好會鬧出事來。」顯現對金正日的不放心。因此，這次江澤民赴朝訪問，肯定帶有鄧小平對即將接班的金正日的「摸底」及安撫之意。

## 三、江澤民懇求鄧小平「明退暗不退」

在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中央產生之後，鄧小平就提出全面退休。瞭解他的人都清楚，當時他的心情十分矛盾：通過天安門事件，他感到了民眾對他的厭惡，特別是「六四」之後，他內心更有一種無法安寧的壓力，因為他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宣佈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的最高領導者，他意識到自已很可能與毛澤東同樣的千古罪人。他想退休，這樣也可轉移一些人民的不滿情緒，並能帶動其他老人退下來，他曾說：「還是退下來好，老來不退位，無罪也有罪。」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老不捨心」，惟恐他退位天會塌下來。最終他還是迫於形勢，決定退休。

但是，江澤民與他的前任胡耀邦、趙紫陽却截然不同，胡、趙是企圖擺脫那個「鄧氏太上皇」，江是離不開這個「小平上方劍」，他要時時處處由鄧小平作主，才能站住站，張開嘴，挺起腰。所以，當接到鄧的請求退休信後，他曾三次求見鄧，懇切表示挽留。後來考慮到內外局勢的需要，鄧做出個「明退暗不退」的承諾，即鄧表面辭去一切職務，做一個「普通黨員」，但在現階段仍然是黨、政、軍關

鍵大事的「掌舵人」，繼續做「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尤其是東歐共產黨國家政局發生巨變以來，鄧小平的工作量反而比「退休」前增大，在他的中南海住處，常常徹夜召集中共要人開會，許多重大決策仍由那裡定局。所以，深知內情的人都說，鄧小平退休，不過又是虛幌一招而已。

#### 四、獲釋民運人士形同「黑五類」

因參加「八九民運」而被捕，經過嚴格審查不夠判刑條件，不久前被釋放的民運人士（約五、六百人），實質是走出了公安局的小拘留所，又進入了被全社會管制的大拘留所。據最近來自北京、上海、廣東一帶的消息證實，他們目前的遭遇形同過去的「黑五類」。

上述獲釋的民運人士，一律仍被看作是危險份子。有少數人已被原所在學校或工作單位除名，成為無學可上，無工可做的無業遊民。他們的行動受到當地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的經常監視，如離開本地（市）外出，必須事前向派出所報備，獲得批准；定期參加派出所組織的「勞改」、「勞教」刑滿釋放人員的政治學習和思想匯報會；每逢在具有紀念性的節假日之前，他們都會提前受到警告，不許亂說亂動。今年的四月清明節還沒有到，他們就在一個月內被公安方面告知，絕不允許在清明節期間參加任何集會活動，更不許聚眾滋事，否則嚴懲。

已經回到學校上課或單位工作的獲釋者，由學校或單位負責監管，不僅言行自由受到限制，而且還要忍受各種歧視與人際關係上的冷落。因為在目前人人接受嚴格政治審查的形勢下，誰也不敢與危險份子有來往，無論你心裡怎麼想，但表面必須界綫分明。現在，學校及工作單位普遍做到「三恢復」，即恢復密告「檢舉箱」、恢復「向黨交心匯報」、恢復「政治學習制度」。所以，密信、小報告、揭發檢

舉搞得人人自危，這對於那些參加過民運而又剛剛獲釋的「危險份子」來說，所承受的壓力無疑大大超過別人。上海市輕工系統盧灣區的一家工廠青年女工馮某，原是工廠的團支部書記，廠先進工作者，去年民運高潮期間曾是遊行、靜坐的骨幹，後被拘留審查近五個月。馮某獲釋後仍准其回原單位工作，但被開除團籍，受留廠察看一年處分；未婚夫與其分道揚鑣，而新提拔的黨支部書記處處給她「穿小鞋」，她出全勤，完成任務不但拿不到獎金，而且加班費也祇能拿應得的百分之四十，其餘被扣做「損失費」（彌補因她參加遊行而給工廠帶來的損失），但她不想加班還不行；使她難以忍受的是，廠裡每逢開政治會，她都被當作「鬧事」、「影響安定因素」的靶子，被點名進行批判。誰也不敢和她說話，連到食堂買飯她也要等到最後。今年「三八婦女節」廠裡給每個女職工買一張滬劇戲票去看戲，就是沒有馮某的份，還要她在廠裡打掃衛生，待看戲的女職工回來座談。馮某在極端、難耐地屈辱與憤怒之下，飲烈性農藥（殺蟲劑）自殺。事後該廠的黨支部書記却說：沒什麼了不起，這樣的人少一個，國家就多一份安定。

人們都說：去年參加過民主運動的人，現在的處境真和當年的「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份子）一樣。

#### 五、民衆被逼「學雷鋒」

今年三月份以來，由中共上層提倡，又掀起了一股「學習雷鋒」的熱潮。二十七年前，曾喧嚷一時的鬧劇，今又在大陸重演。當年，毛澤東題字號召人們學雷鋒的時候，許多人就會懷疑是否真有雷鋒其人，事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以後，就更難查證了。不過，是否真有雷鋒這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當中共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民心浮動不穩之際，總要祭起「學習雷鋒」的法寶，在為他人做好事和



宣傳學雷鋒，比六十年代時髦多了。

為社會做貢獻的幌子下，宣揚愚忠觀念，鼓吹「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以便使千百萬民衆變成命是從的馴服工具，這似乎已成了中共救急的傳統「強心劑」。

現在已有一些地方，將「學雷鋒」列為學生評操行、工人評獎金、幹部評表現的重要內容。三月四日，北京有的工廠就警告工人，如果不上街「學雷鋒、做好事」就會被扣發當月一半獎金。因此，迫使許多人不得不絞盡腦汁搞一點「學雷鋒」的作秀花樣來交差。北京有的中學生讓自己的家長冒別人的名字給學校寫信，表揚自己「助人為樂做好事，是個活雷鋒」；也有的人把假裝拾到的數千元現鈔送到派出所，然後讓朋友去認領，再附上一封感謝信；不久前，在北京郊區豐台站附近，被扒車竊盜團夥由火車上盜卸下十多筐新鮮水果，案發後，作案人對警察交代說：我們是要拿這些水果去「擁軍優屬」，學雷鋒做好事，你可不能把我們當盜竊犯。在北京火車站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結夥的中學生為旅客提行李、提包裹、扶

老携幼學雷鋒。可是，後來出現了幾起冒充中學生拐騙旅客手提箱事件，搞得「學雷鋒」聲譽大跌。現在，旅客們一見學生過來幫助提東西，都是急忙搖頭說道：「不必啦，還是我自己來安全方便。」同時還可以聽到諷刺意味的順口溜，說道：「雷鋒好，雷鋒好，可惜皮包不見了。」

絕大多數人對「學雷鋒」絲毫不感興趣，一提起雷鋒這個名字，就想起了過去那個愚昧、禁錮、飢貧、瘋狂的時代。瞭解內情的人都清楚，雷鋒是一個虛構的形象，今天重新號召全體國民效仿一個沒有頭腦，沒有個性，祇會做中共統治者馴服工具的禁慾主義奴才，其目的不過是再次實行愚民政策和挽救那不齒於人的軍隊聲譽。現在的小學生、中學生乃至大學生，對雷鋒都所知甚少，雷鋒為什麼能那樣「完美無缺」，那樣「集所有高尚品德於一身」，誰也說不清楚，誰也不會相信，可是現在誰也不能公開表示懷疑。三月四日，北京商學院的一名學生在西單商場「學雷鋒，站櫃台」時，由於服務熱情，顧客稱讚說：「你這位營業員服務態度不錯，應該表揚。」學生說：「今天我們學雷鋒的日子。」顧客說：「學雷鋒還真頂用，那你們就天天學嘛。」學生苦笑：「天天學？誰受得了啊，剛學了半天兒就累得頭暈眼花，天天學雷鋒可要真累瘋了。」他的話被同學打了小報告，他受到嚴厲批評。

### 六、「反動標語」無法禁絕

目前大陸各地日益增多的所謂「反動標語」，成了中共治安當局一件很頭痛的事。據內部資料最近透露，僅今天一、二月份以來，各地已發現並向上報告統計的「反標事件」就達三千餘起，超過去年同期的六倍。據分析與蘇聯、東歐共產國家局勢變化及整個民主運動形勢有關。

不久前，「人民日報」宣傳：現在青年開

始反思，提出「找回毛澤東，懷念周恩來，愧對鄧小平」之說。報載當天傍晚，人們就在北京大學的「新開壁」上發現一張小字報，上寫：找回毛澤東（向他算總賬），懷念周恩來（再掀起一個祭奠高潮），愧對鄧小平（可以請他再上台——斷頭台）。

今年舊曆正月十五（燈節）夜晚，北京遊人在景山公園內一棵樹下，看到用些碎玻璃瓶壓着一張白紙，紙上寫有一首醒目的詩句：灑淚祭英靈，含憤砸小瓶，翻江倒海日，利劍斬鯨鯢。

北京市公安方面的人表示：現在大部份「反標」都沒有偵破，因為像北京這樣城市，每

天有大量流動人口來自全國各地，破案是很困難的。

### 七、近期審判劉曉波

據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消息證實：因參加「八九民運」，與學生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中共已決定近期對他進行審判，他的私人律師已經請好，祇待聽候出庭日期。據北京方面瞭解情況人士分析，今後陸續受審者將包括王丹等一批著名被捕民運領袖。▲

## 吃貨單專吃國家外匯

嘉陵

近年來，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下屬各專業外貿總公司，以擴大業務為名，競相在海外派設辦事處，建立獨資或合資公司。而這類機構如何維持為數眾多的工作人員的生活、辦公費用等開支？據熟知此中內情人士披露，凡以辦事處為名的機構，其開支主要來源於國內外貿易公司撥款；而凡以公司為名的機構，則主要靠「吃貨單」為生。

所謂「吃貨單」即管外貿總公司代理國內企業進口貨物時，不是直接向國外有關生產廠商調價購買，而是先向所下屬的海外公司詢價。該海外公司再向國外生產廠商詢價購買。貨單經這樣一轉手，往往多增加一個或多個中間商。層層加價，同樣的貨物，到國內企業手中，貨價便增加了百分之幾十。不言而喻，增加的貨款自然流入了相應的海外公司和其它中間商戶頭上。以中共在美國辦開的經營機電商品

的某公司為例，僅靠此法，該公司在二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共獲利一百五十萬美元以上。

羊毛只能出自羊身上。進口貨物的貨款都是用國家外匯承付，其中許多項目的外匯來自世界銀行和外國政府貸款。靠「吃貨單」方法佔用國家外匯事半功倍，又無任何風險可擔，只需內外配合默契，利益分配公平。真可謂是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貿易方式。

從這幾年的情況看，專長「吃貨單」的海外公司對擴大外貿業務並未起到任何積極作用，但卻爭先恐後，越辦越多；而且「吃貨單」的胃口也越來越大。其原因就是可以巧妙地「合法地」使國家寶貴的外匯，流入小團體和個人腰包。更要緊的是，這些海外機構乃是中共高幹相互照顧安排其子女、親屬的絕好去處。



# 大陸報告之四： 我們沒有明天

導致主編撤職的「中國教育報」的奇文；大學生高超的算命先生；  
小學生開 PARTY 成風……

李遠

九〇年代的第一個春天來了，但大陸却感受不到一絲春意。廣播裡老調重談，雷鋒再一次從墳墓中請出來，用來愚弄人民。可九十年代的中國人畢竟不同於六十年代，「學雷鋒」成爲一種帶貶意的形容詞。對六四的餘孽使中國人無法安寧，雖然中共新聞界被解放軍嚴格控制，李瑞環四處宣揚中共對宣傳工具的絕對性，但再嚴實的鐵桶也會漏水，就在「六四」大屠殺發生的兩個星期後，六月十五日，「中國教育報」一版頭條刊登了一篇文章「關於動亂的十一個爲什麼」。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因爲該報發行量太小、範圍太窄。但一九九〇年初該報主編因此文被撤職審查後，該日報紙成爲北京文化界的珍品，大有洛陽紙貴的勁頭。大家坐在一起，細細品味該文，寓意深刻，用語巧妙，成爲六四之後一篇難得的好文章。爲饗讀者，筆者不忍割愛許多，摘錄十條如下：

## 一、十個爲什麼？

一場以民主、愛國爲核心的學潮演變爲動亂——局勢趨於緩和，不少青年學生已轉入了思考。筆者感到有幾個問題頗值得研究，謹供讀者參考。

(一) 從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爲胡耀邦同志

治喪期間，爲什麼少數人把李鵬總理作爲集中攻擊的目標之一？有的人提出要「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但胡耀邦一直未在政府任過職。一九八七年初處理胡耀邦的辭職問題時，李鵬同志還只是政府副總理，也不是政治局常委，爲什麼向他提出此事？到四月二十六日爲止，李鵬也還未公開講過話。關於「官倒」的流傳也沒有涉及到他個人。在這段時間裡，就把矛頭集中指向他，這是爲什麼？

(二) 五月十九日以前，中央的核心機密，從四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二十五日的鄧小平同志講話，一直到五月二十日首都要戒嚴、戒嚴部隊的番號、進軍路線都被學生組織事先知道了，並在十九日就加以阻擋。但十九日以後洩露核心機密的這種情況爲什麼又突然不再出現了？

(三) 廣大青年同學出於愛國心，提出要反腐敗。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鄧小平曾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發展下去會成爲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但近年來腐敗現象仍發展較快，一九八七年以後，却一度出現了開始發展的國家中社會腐敗風氣是「不可避免」的論點。誰都知道政府、大公司和中大企業的領導幹部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但却出現了要把黨風問題「淡化」的說法，要把政府、企業中黨員的風氣與黨風分開。這對不對？

(四) 學潮到了五月四日已趨於平息，五月五日首都高校基本趨於復課。此後，動亂又突然愈演愈烈。到五月十八日，首都新聞界除了少數以外，在「新聞自由」的口號下發生失控現象，對遊行、示威、絕食極力火上加油，向黨和政府施加壓力。爲什麼會有這個轉折？

(五) 一九八八年起的物價上漲過程，引起群眾不滿。誰都知道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太多，是物價上漲的原因。這不是一年形成的。鄧小平同志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會見烏干達總統時講，如果三年以前採取治理、整頓的措施，情況就會好得多。他並承擔了自己的責任。李鵬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一九八八年以來的政府工作作了自我批評。報告在人大會以四票棄權、二票反對獲通過。那麼，對前幾年經濟改革中的失誤，究竟應該怎麼看？

(六) 鄧小平在三月二十三日指出：十年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方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得不夠。並指出這個問題比通貨膨脹還嚴重。以後李鵬在答中外記者問時指出：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建設的失誤。那麼，爲什麼有些報紙發表鄧小平這個談話時，沒有「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這一句話。從談話的上下文看，這句話又是指整個社會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估計。報紙不發表又是說明了什麼？

(七)五月十六日，我國領導人先後會見了戈爾巴喬夫。為什麼五月十七日，首都遊行隊伍中反對鄧小平的標語驟然增加？

(八)在首都空前的學潮中，為什麼以「三所一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名義出現的人特別活躍。他們與北京好幾個大學的非法組織有聯繫。而且直接到天安門廣場去出謀劃策。這到底說明了什麼？

(九)首都「高自聯」不懂得某些外國，特別是美國的某些輿論的支持，並在他們控制的校內電台中大肆加以傳播。而且「高自聯」是很有錢的。他們從國外及香港的某些人手中得到大量資金，又說明了什麼？

(十)首都發生如此嚴重的動亂，國家和人民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的目的是反腐敗、反官僚，推動民主嗎？這場鬪爭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應該怎麼看？

(出)……？

## 二、大學生的心態

面對上述十個問題，北大的一同學對筆者說：「其實這十個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共產黨統治中國四十年後的今天，會遭到全民的反對，一種不懼死亡的抗爭。」

進入九十年代的大學生，談起未過一週年的六四，仿若隔世之感。因為面對他們的問題太多太多了。大陸國家教委(一九九〇)十四號文件「關於具有大學和大學以上學歷人員自費出國留學的補充規定」猶如一記悶棍，打碎了無數人的出國夢。大多數中國人，申請護照出國只有一條路可走——留學。這也是所有大學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唯一可以寄托的一條生路。現在路被堵死了。根據文件規定，凡「全日制高等教育機構公費本科和專科畢業生、獲雙學位畢業生、研究生班畢業生、碩士和博

士畢業研究生，在讀四年級以上(含四年級)學生、研究生及在這段學習期間退學的人員，全日制成人高等學校本科和專科畢業生，均有為國家服務的義務，完成服務年限後方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這個服務期限長達五年，而中途退學者要償還「培養費」，一年二一五千元人民幣不等，這種天文數字對靠工資養家糊口的中國老百姓來說，實在是一筆無法籌措的巨資。於是出國之路就這樣被砍斷了。

大學生中絕望的情緒決不亞於六四之後的失落。繼續讀下去，等待的是「到基層去，到邊疆去」，不讀了，無顏面對付出血汗錢的父母，且更找不到立足社會的機會。所以大學生如今是最迷茫的一群生靈。他們複雜的情感流露著一種失望，成熟中含著幼稚，現實中藏著夢想，認真裡隱著遊戲。所以，走進今天的大學校園，你會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滋味。舞會天天人滿，課堂上耳機套頭，圖書館情侶雙雙，宿舍裡男歡女唱。

筆者走進清華大學七號樓的一間男生宿舍，牆上波姬·小絲秀髮瀟灑，一頭濃密的黑髮上，費翔雙眸含情脈脈。窗戶頂上掛一橫幅「神機妙算」。

劉波，機械系三年級學生，是此屋「算命先生」。六四後苦研「易經」、「星座百解」等卜算未來的書籍，在圖書館門口貼出廣告後，門庭若市。一到晚飯後，各系青年男女便仁仁倆倆地來七號樓這間屋子，求算前程、婚姻、成績、工作，信不信隨便，但客人不斷。與劉波同宿舍的小閩告訴我，劉波曾為機械系系副主任夫人八八年出國後一直未歸，副主任中年分居十分難熬，一日聞劉波有神機妙算之功，便屈尊求教。劉波左掐右算，曰：三十天之後他夫人將為其辦成出國手續，團聚於美國西部某大城市。二十天後副主任果然得到舊金山某社區大學聘書，一切手續順利，副主任臨走前逢人便替劉波宣傳，使諸多老師都前來拜

訪這位年輕的「算命先生」。

算命，是一種不能把握自己前程的表示，六四之後的大學生對前程已完全失去信心，整日消磨在無望的虛度中。走進北大，伊甸園的亞當和夏娃已目中無人，一對對手挽手，肩靠肩地漫步於林蔭小路和未名湖畔，在艷艷的春光裡，你還可以看到一對對摟摟抱抱的男女躺在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充滿浪漫和虛無。據統計，目前北京高校在校生談戀愛的占百分之七十，有的班高達百分之百。尤其是女大學生，宿舍有「三寶」：復方十八甲、避孕套、採親避孕藥。她們自己則是「一年傲，二年挑，三年急，四年沒人要」。儘管有著如此之高的戀愛比例，可成功率却微乎其微，不到百分之十。有人將大學生戀愛分為四類，不妨照錄：A 憂慮型：大齡大學生，特別是女大學生，擔心畢業後到社會上成為大齡青年，難覓佳偶，於是飢不擇食。B 寄托型：剛上大學的新生，往往感到孤獨、空虛，無所事事，尋找異性以求解脫。C 浪漫型：雙方均為多血質性格，精力過剩，多為一見鐘情，沉緬其中。D 功利型：為了畢業分配、將來出路等功利原因，尋找能成為自由選擇支點的異性，以求前途。然而實際上，畢業之後的亞當和夏娃在品嚐了禁果之後，多因社會、家庭等各種因素而分手，留下一片回憶的田地。

不知從何年何月起，反正是六四之後，北京大學校園裡常常聽到「一張考卷約來了千萬個你我，小題不會做，大題更別談，多少年的考試是束縛你我的枷鎖，折磨你，折磨我，我們擁有一個目標及格。再嚴的考場，我們都見過，再難的考題我們都抄過。這是我們的傳統，這是我們的傳統，從來沒變過。手遞手，什麼也別說，哪怕教師眼前過。因為我們擁有一個目標——及格。」

這首以港台流行歌曲為基調的校園歌曲普及極快，流傳甚廣，幾乎每個大學生都會唱。現在高校期末考試十考五抄，作弊現象十分嚴

重。某教授直言道：「現在考場上不存在抄與不抄的問題，而是抄多抄少的問題……」據介紹，如今作弊屬於聯合作弊，整班、整專業地配合作戰，從翻書傳字條到收買印刷工人偷試題乃至冒名頂替，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如考標準判題試卷時，選擇A、B、C、D四組答案時，摸：鼻子—A，嘴巴—B，耳朵—C，腦袋—D。只要如此「思考」一下，全班成績保證一致而高水平。盡管學校臨考前總是再三強調考場紀律，但監考老師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混差。學生也不會使「明白」事理的老師為難，盡量憑技巧得分，可謂「寒窗數月苦，哪抵考場靈機動。」

作弊和厭學的情緒緊密相關，成爲一種惡性繁衍。有一青年教師講，某日他冒雪騎車從家趕到學校講課教室，上課鈴響後，他拿出講義，却發現教室裡僅坐一對正談戀愛的同學。他以為走錯了教室，出門一看門牌號，「沒錯」。可這門課有兩個班八十多個學生必修，怎麼……?!答案出乎意料的簡單，他的學生們還在暖暖的被窩中享受着甜蜜的夢。

當前，大學裡的曠課、遲到、早退都已成司空見慣的常事。許多學生懶得上課，有的甚至一學期一堂課也沒上過，到考試時，不知從哪個角落裡鑽出來，靠最後幾天的拼搏和考場上的技巧，混過去。他們的目標是及格。

不少教師發出感嘆：現在的大學生學習越來越被動，缺乏發奮精神，大有九斤老太太之感。但目前的中共政策，不准出國，分配基層，變相懲治的做法，怎麼能叫大學生去發奮呢？國家前途尚難叵測，個人前途就更是未知數了。

走進大學生宿舍，到處是煙霧繚繞中的牌局，五花八門的空酒瓶加上金庸、亦舒的小說充斥於床頭桌下。嘩嘩嘩的麻將聲加上聲嘶力竭的叫喊，發洩着青春的能量。這就是今天大學生的虛無心態。前途是一片灰色的空白，人生是一幅無主題無節奏的動畫。

### 三、富有的小學生

當六四的槍聲打破大學生的希望，擊碎中學生的夢想之時，中國的「小皇帝」、「小公主」們則生活在溫柔鄉中。隨着物價開放，通貨膨脹，人們手中的鈔票日益增多，許多爲人父母者開始在下代身上進行投資，希望他們過的好一些。所以，大陸小學生所擁有的錢越來越多，開始以購買者的身份步入消費市場。據有關部門調查，北京、廣州、上海幾個大城市的小學生每月零用錢爲四、八元，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小學生有五元以上的零用錢，而且還有個人戶頭的存款。其中存款額在一百元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四，二百—五百元之間的占百分之三十六、六，存五百元以上的有百分之二十、四。有的小學生還有外匯存款及一萬元以上的巨額存單。幾大城市的獨生子女人均存款額高達四三、八、六〇元。在問及這些年幼的小學生的存款動機和用途時，他們直言不諱地說用於購買零食和玩具，有的則聲稱「存起來，結婚用。」學校裡同學之間比「私房錢」的風氣嚴重腐蝕着那些幼小的心靈。

今年春節，廣州市小學生「壓歲錢」平均爲一二〇元，有的高達一千元，使許多小學生從小就鑽到了錢「眼兒」裡不能自拔。

有了錢，自然花起來也大方，成爲大陸一支不可忽視的消費隊伍。前一陣「變形金剛」熱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小學生投入其中，平均開銷一百五十元。另外扔進電子遊戲機的「鋼鏢」每月平均超過七元。有百分之三四、二的家庭擁有大型或中型電子遊戲機。小學生戴手錶已不再被人們驚奇，擁有收錄機、自行車、高級電動玩具的「小皇帝」達百分之四五、四，遠遠超過中國農村家庭的占有率。

現在小學生過生日開Party成風，人均花費一百元，多邀請十人以上參加，甚至在餐廳包桌大請一頓。小學生之間攀比之風甚盛，生日卡的規格已在十元以上才拿得出手。做父

母的日益感到生活艱難。爲了不使自己孩子在同學們面前丟臉，他們背負着沉重的消費負擔。小學生一放學，校門口立刻成爲一個集市，賣冰棍、冰激凌的和賣菓丹皮、玩具的小販每年從大陸小學校的門口賺到數以千萬的金錢，小學生手中無錢的歷史已不復存在。

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人們對前途的無望和對下一代的寄托，他們面對獨生子女的現實狀況無可奈何，希望自己的兒女盡情享受一下物質生活的快感，彌補自己早年的缺欠。今天的父母大都有六十年代大飢荒的經歷，深知空腹的痛苦，這種「恐飢」的後遺症，使他們無節制地滿足下一代的物質欲望。

以北京西城區幾所小學爲例，從入學到畢業的小學生人均購買書包四個，文具盒七個，最高的則一學期換一套。這與我們上學時一個書包用到高中，一隻鉛筆盒用到大學畢業真是天地之差。據老師反映，現在有些學生丟了書包、文具盒，即使七、八成新，也不去認領，而是回去讓家長買新的。小學生穿皮鞋日漸增多，一人五、六雙球鞋不算稀奇。「耐克」、「派西努」等名牌鞋也時常出現在校園操場上。不正常的社會發展，產生了不正常的教育觀。大陸人對子女的這種「縱容」和寵愛勢必會影響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長，一些青少年專家已呼籲社會引起注意，不要讓此風泛濫。

但家長們有他們自己的聲音：我們這一代是最痛苦的一代，生在紅旗下，沒過過好日子，一懂事就撿野菜、拾破爛，長身體的時候喝清湯過日子，愛美的年紀穿帶補丁的衣服上學，整個少年時代是在窮苦和飢餓中度過來的。而如今我們又沒了希望，剛剛好起來的日子被坦克車碾碎。我們當然只能把全身心的精力放在兒女身上，我們不能讓孩子看見雪糕而眼饞，不能讓孩子帶着饅頭咸菜去公園。我們已經沒有明天，可我們要盡我們的所能讓我們的孩子過好今天。

※

# 金三角和中國販毒通道

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中國在世界性販毒中  
扮演什麼角色？請看本文。

## 少君

### 一、暗道逃出牢籠

六四後的中國，猶如一個大鐵籠，進籠容易出籠難。幾個月來，我在沿海幾個城市飛來飛去，手持湯加和泰國兩國假護照，但始終不得其門而出。後來，一位香港朋友勸我走緬泰邊境，從思茅景洪綫的暗道出境。他說他可以提供幫助，以泰國總理之子彭彭的關係派人接送。

於是我立即飛往雲南邊境城市個舊，然後租了一輛個體戶松花江牌小卡車，星夜奔往景洪。也許是天氣，中共剛剛解除雲南、廣西的邊防證限制。以往戒備森嚴的邊防地區，由於為了吸引邊民貿易、搞活經濟而放鬆管制。大片大片的樹林和灌木也使這個邊陲小鎮成爲外逃者最好的出境點。據司機講，僅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八萬人從這個小鎮出逃到緬甸、泰國、老撾和越南。六四大屠殺後，也有不少大學生從這條路跑出去。這裡的村寨沒有黨支部，很多人有雙重國籍，三國（中、老、緬）均有家，難以管理和控制，特別是八五年後，控制邊境地區的土匪和雲南省有關部門簽署了「發展貿易，維持邊境繁榮」的互不侵犯的協議書，這一帶就成了政治真空地。

### 二、罌粟，搖撼世界的毒果

當夜，我在向導的兩輪摩托車後座上飽受顛簸之苦，不知爲什麼，我們繞道里車多走了一百多公里，才又轉回到拿猛進入老撾的信孟地區。一路只聽山風不見燈影，如入鬼域一般。不知過了多久，向導猛然剎車，我從昏睡中驚醒，在一輪冉冉昇起的朝陽下，眼前是一片荒蕪綿延起伏的叢山峻嶺，我們所行駛的羊腸小道蜿蜒曲折、險象橫生，若向導不是天天過此路便是有神助之力，回頭望去，不勝唏噓。

從上路後沒說過一句話的傣族向導此時示意我抱住他的腰，便開始朝山下衝去。HONDA二五〇的清脆轟鳴聲響徹山谷，帶來一陣陣不斷的迴響，彷彿有千軍萬馬之勢。穿過一片叢林，我突然發現在一大片開闊地上，遍地紅花怒放，火一樣耀奪目——罌粟花，金三角的特產。我知道，我現在進入了世界著名的產毒區金山角地區。

毒品——戰爭——死亡。近五十年來，吸毒像瘟疫一樣蔓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從富極的美國到窮困的非洲，從共產制的東歐到自由的澳大利亞，幾乎無一幸免地存在着吸毒問題，成爲本世紀一場災難性的社會問題，肅毒與反肅毒的激烈鬥爭已醞釀成一場全球戰爭，舉世矚目。

美國和西方各國政府每年投入幾千億美元用於禁毒工作，但他們却無法遏制毒品的非法種植和加工。在美國毒品管理總署的辦公室裡，南美和金三角是兩個最大的目標，按緝毒官

員的話：「恨不得將十顆原子彈扔到那兩個地方去。」可見之恨。實際上，近年來由於美國的壓力和支持，哥倫比亞政府已下了極大決定開始緝毒，目前從哥倫比亞進入美國的毒品已比一九八三年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五。這個空缺的市場使亞洲的金三角乘虛而入，使這個原來位居第二、三位的貨源地上昇爲全世界第一大貨源地。一九八九年鴉片產量一躍上昇爲八百噸，半成品海洛因九十餘噸，使金三角成爲最大的毒品基地。

### 三、毒品王國

金三角，我是在中學時代從小說中看到過這個名字，充滿神迷和誘惑的地方。當我身在其中之後，面對那一幢幢傣式茅屋，現代化的內飾和手握自動武器的士兵，我感到置身於一個神話中的王國之中。這裡有自己的法規，有一套自訂的處世準則，有系統的管理機構，封閉而不呆滯，偏遠而不貧窮。看着主人嘴裡抽的萬寶路，手拿松下攝影機，聽着邁克的搖滾樂，你簡直像在做夢，因爲那——一身手織的佬衣和包頭巾，那一張張黑乾皺多的枯臉使你不得不想起窮人和貧困。這就是金三角的特徵，貧富的巨大差別使這個具有六百萬人口的金地帶被分割成十七個部落式的幫派割據狀態，他們內部的組成形態千姿百態，連年的內鬪槍炮不斷，但他們的生存方式却一模一樣：製造毒品。

金三角地區遠離城鎮，叢山峻嶺，地域偏僻，交通極不方便。當地人以馬爲主要交通工具，成千個村落居住着九個民族：佬、傣、苗、瑤、佤、拉祜、阿卡、傈僳和被稱之爲「賀」的漢族人。到金三角接我的泰國朋友告訴我，他們政府管這一帶人叫「山民」。鴉片的主要耕種是這些山民所爲，他們用刀耕火種的原始方法，放棄了原爲賴以糊口爲生的山地稻而改種罌粟，以換取生活必需的食鹽、刀斧、布匹、火柴等物，利潤明顯高於種任何莊稼。所以

，盡管政府軍幾次掃蕩這裡，並搗毀罌粟田勸他們種稻子，但實際利益的比較使他們成爲金三角毒品生產的生力軍。

爲了保護鴉片種植業，以村落或民族爲基礎劃分爲十幾個勢力範圍，各自爲政，占山爲王，成爲一個個金三角的毒品把頭。這些勢力不但有自己現代化裝備的武裝力量，還有完整的管理體系，相互之間雖然時常打鬥爭奪，但一週政府武裝或緝毒部隊，則團結一致，全力抵制，所以至今爲止，泰、緬、寮三方誰也治理不了這塊黃金之地。一九八〇年以來，美國緝毒總署也參予進來，雖然至今已耗資百億，但沒有任何進展，紐約街頭的金三角白麪有增無減。金三角，已成爲名符其實的毒品王國。

#### 四、毒品大王和中國顧問

在金三角的一個星期內，坤沙的名字時常被我聽到，我的泰國朋友告訴我，坤沙就是傣族語言中大官人的意思。而坤沙本人則是金三角地區緬甸傣族人的領袖，是金三角最大勢力的頭目，其經歷的一生頗富傳奇性，是世界無數記者和緝毒人員追逐的目標。然而直到今天，年過半百的老坤沙仍然統治着他的毒品王國，並朝着建立「傣國政府」的方向努力。由於筆者也是記者，便刨根問底地打聽起這位金三角奇人的故事。泰國朋友經不住我的死纏硬磨，說：「中國政府在坤沙那有幾個顧問，他們合作有三、四年了，等我們到龐斯瓦卡鎮坤沙的大本營後，我請坤沙的手下找了中國顧問給你談談吧。」

第二天我們驅馬來到泰國豐碩距緬甸邊界只有三公里的龐斯瓦卡鎮。在一間典雅的酒館裡，一個傣族打扮的中國人被帶到我面前，他只知道我是泰國新總理披猜的中國親戚，奉命聽取有關坤沙的情況，因此這位雲南口音的顧問便毫無顧忌地用漢語給我講起了有關坤沙的情況：

坤沙，緬甸傣族人。多少年來，他一直是個神秘的「黑暗王子」，國際上許多人曾千方百計地想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和他的鴉片王國，但只有少數人如願以償。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坤沙生於緬甸傣邦靠近中國邊界的來莫山弄堂大寨，他的父親坤海是受到中國皇帝御封的世襲土司，他的母親是中國傣族人，叫南彤，所以坤沙有個中國名字叫張奇海。

坤沙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予英國軍隊抗擊日本不幸陣亡，母親在他五歲時病死，他是由祖父母撫養大的。二十歲時，祖父去世後，他便成了世襲土司。三年後，他開始打起傣邦民族獨立運動的大旗，招兵買馬，成立了一支開始只有四十人的私人武裝。一九五七年，傣邦地區的土司們要求脫離緬甸獨立，開展反政府的武裝鬥爭。由於財力的需要，這期間金三角地區開始發展鴉片種植業。一九六二年春，奈溫政變掌權後，爲了對付傣邦土司的反政府武裝，宣佈傣邦的任何人只要效忠政府，抗拒叛亂的土司，就可以組織武裝部隊。坤沙抓住這個機會，對奈溫政府加緊靠攏，被委任爲「弄堂地區民衆自衛隊指揮官」，不但發給他武器，還派軍事教官對他的部隊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使其成爲一支驍勇善戰的山地兵團。坤沙如虎添翼，不久即控制了整個傣邦地區。爲增加收入，坤沙開始無限制地擴大鴉片種植面積，逐步成爲聞名於世的毒品大王。一九七〇年後，他組織了一支至今仍被人稱爲「世紀商隊」的鴉片武裝販運隊伍，把金三角的毒品源源不斷地以各種手段輸送到世界各地。

目前坤沙的隊伍人數數千，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從美製衝鋒槍到蘇製薩姆導彈，使緬甸政府軍已不敢再輕易動武，與泰國武裝衝突幾次下來後，勢均力敵，雙方也趨於停火。一九八五年國際間曾風傳坤沙死於糖尿病，各國反毒官員紛紛舉杯慶賀。誰想到一九八七年一

月二十日，五十四歲的坤沙在泰國邊境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美、泰、馬、港、星等國記者幾十人和各地貴賓二百人之衆，在漂亮的女衛兵的簇擁下遊覽了金三角的美麗風光，參觀了他的軍事學校七百名學員的軍訓表演。

坤沙在宴會上向記者們宣稱：他的傣邦聯軍與金三角地區另一支大武裝力量「傣族革命委員會」合併爲一支一萬六千人的隊伍，他任總司令。他宣佈，一九八八年他將生產鴉片一千一百噸，提煉海洛因八十噸，價值八十億美元。如果美國政府支持並幫助傣邦獨立自主建國，他將以「傣國」政府長官的名義禁止走私販運毒品活動，使之不流入國際毒品市場。否則，誰也無法禁止金三角的鴉片種植和海洛因的加工生產。

#### 五、中國通道

當那位中國顧問說坤沙的有關情況時，我突然發現從酒館中進出的許多持槍者手中的步槍竟是中國大陸生產的K—十四半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甚至他們穿的上衣也是大陸士兵的夏裝短袖軍服。我忽然打斷他的話說：

「請問你是國家安全部的嗎？大陸也拿武器換鴉片嗎？」

對方眼睛裡充滿敵意地說：「這是金三角的內部事，不屬於泰國方面應該知道的，對不起，告辭。」

我的泰國朋友忙責怪我失言，叫我立即起身速奔豐碩而去。一路上，泰國朋友對我講：中國顧問大都是軍人，大概來自大陸總參情報系統。由於坤沙與中國人有着血緣和歷史上的特殊關係，所以他特別注意與大陸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原因有二：第一是因爲他的參謀長張蘇泉，是他極信賴的軍師，聽說張以前就是中共黨員，五十年代追擊國民黨九十三師殘部，負傷後被坤沙救活留了下來，成爲生死之交。第二是由於美國政府連年來對泰緬兩國不斷

施加壓力，並派人出錢進行緝毒，幾乎切斷了金三角通往各地的陸上運輸綫，並加強金蘭灣海面的控制。剩下的就是中國大陸通道，這是目前最安全也是最暢通的一條通道。為此，坤沙與中國大陸軍方保持了十分默契的合作，將大筆外匯從西方調往中國軍方公司，購買中國槍炮，但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一九八五年後，坤沙通過大陸軍方上層關係和一些高幹子弟從中幫助，已成功地建成一條年輸運量三十噸左右海洛因的「大陸通道」，為其穩穩地賺了幾十億美金，當然，那些為他出過力的大陸「朋友」也少不得要分成，有的還得挑幾個心腹陪着這些朋友去曼谷逍遙幾天。

以鄧小平女婿賀平為首的總參實利公司和鄧樸芳的康華公司都曾與坤沙做過大宗生意，對大陸毒品通道的建立提供了不少幫助。甚至連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永做經理的中汽公司也曾售給坤沙四十輛北京吉普。

坤沙的付款條件是整車拆散運往美國，在洛杉磯裝配後再發往泰國。衆所周知，在汽車零件中藏運毒品是最難檢查的。去年美國十億美元毒品大案案主任某，就是將白粉藏入幾十個汽車輪子中安全進入美國。我們無法知道坤沙和薄某的暗底交易，但却知道在北京拆車包裝時有幾位來自泰國的「技術工人」。

### 六、美中關係的暗礁

對於坤沙與大陸的合作，美國政府曾派專人到北京提出抗議，並將有關個案線索提供給中方公安部，要求立等破案。官司打到楊尚昆處，老楊頭一晃說：「洋鬼子嘛，想看中國人出醜，你們不會抓幾個外國人給他們看。」

一九八六年八月，大陸雲南省公安機關宣佈偵破一起從金三角取道中國大陸，經港澳至歐美毒品市場的販毒大案，繳獲純度海洛因二二七六八克，價值三八五〇萬元美金，三名販毒分子均為外籍人士，並於一九八八年判處死

刑。算是向老美交了差。

但美國人何曾知道，坤沙為了擴大海洛因的加工產量，以中外合資形式在昆明、景洪、廣州投資「藥品加工廠」，專門從事鴉片提純和海洛因的加工业，近來在海外毒品市場出現的「紅玉」和「雲白」海洛因就是這些合資企業所生產的，再通過香港或福建、青島漁船帶往美國、日本等市場中銷售。

由於「中國通道」的開通，使坤沙的軍師張蘇泉開始在香港投重金建立自己的轉運站。內中人士告知，位於九龍東北偶的「九龍岩城」這一黑社會集中的地方，坤沙的勢力正在形成一股力量。香港最大的販毒組織「和勝和」為了不得罪這一貨老闆，不得不忍痛讓出一些地盤來給張蘇泉。從一九八五年開始，張蘇泉的族弟張得滾在九龍岩城掛起坤沙代理人的招牌，一時間賓客盈門，生意興隆。

張得滾，父母為雲南墨江縣人。一九四七年專家移居泰國，對中、泰、緬邊境如入家門之熟，能操數種方言談話，具有三十多年販毒歷史，經驗十分豐富，常年來往於泰、緬、星、港、美等地，是國際販毒集團中的名人。坤沙起用此人，如魚得水，生意越做越大，利用張得滾的經驗和中國大陸通道，使販毒生意日見興旺。

坤沙的得意和狂妄，終於得罪了金三角另一幫販毒集團的頭子雷雲田。雷雲田原為抗日名將，一九四九年率原國民黨第九十三師殘部，被中共趕進金三角地區，從此安營扎寨，開始了以種植、販賣鴉片為生的流浪生活。幾十年來，雷某的地盤越來越大，生意也越做越紅，但他十分瞧不起坤沙和共產黨的合作。當他的底下報告坤沙利用大陸通道在香港設轉運站時，立即通過舊時同僚之綫，向美國中央情報局告發了這一條綫索。這樣才有美國緝毒總署官員赴北京抗議之說。八六年八月，雲南公安廳逮捕的三人中，泰國籍的張得滾就是其中之一。雖然坤沙透過他在北京的那幫「小朋友」

不斷向中共高層說項，但人贓俱獲，涉案極大，美國方面死咬不放，加上泰、緬、星等國的壓力，中共方面拖了整整兩年，不知用什麼辦法安撫了坤沙之後，才宣佈判處張得滾死刑。據說判決當天，國際毒品市場海洛因價格一夜之間上漲三倍。

### 七、此戰綿綿無期

我和朋友在馬上隨着馬步頓上頓下，感覺有些累，朋友為了安全考慮催馬躍上一高坡，四面開闊的一片山頂出現在眼前。於是我們從馬背上取下食品和水，躺在毯子上休息一下。朋友告訴我，依賴種毒販毒為生的坤沙集團，並沒有因為張得滾的死亡而關閉中國大陸通道，一些新人新綫正在開發，金錢面前必有勇夫，相信目前中國大陸內從事毒品運輸的人不少於千人。

對於金山角，泰緬兩國十幾年來反復掃蕩過多次，摧毀罌粟田四萬多英畝，並誘捕過毒販頭子坤沙，却又不得不釋放。八八年，緬甸政府在中國法院處死張得滾等人的第三天，二月二十日，對金三角地區的勐撒、勐搭郎、勐滾三個重要毒品加工基地發動了一次代號為「魔亨十一」的軍事行動，此次美方出費用和裝備，毀滅罌粟田四萬多畝，激戰十餘次，迫使他向北轉移。但僅僅僅打擊一下坤沙的囂張氣焰，對於毒品種植、販運、加工幾乎沒有作用。

金三角地區槍聲不斷，而世界其它地區的肅毒與反肅毒的戰鬥方興未艾。美國為毒犯出兵攻擊巴拿馬，不惜破壞國際公約，哥倫比亞為緝毒犧牲數名大法官並驅跑司法部長。紐約的街頭白粉不愁貨源，香港的毒販已形成難以控制的黑社會集團。整個世界陷入毒品的威脅之中。

展望未來，前景黯淡，肅毒與反肅毒的戰鬥將繼續下去，綿綿無期，不知何時是了！

# 一九八〇年北大競選風潮

## ——路漫漫：從四五到六四（之一）

這一次競選向歷史證明，中國當代青年不但具有實踐民主的勇氣，而且也具有實踐民主的能力。

劍軍

### 一、選擇合法的突破口

八十年代的北京之春隨着當局對民主牆的鎮壓而轉入低潮。於是，當時很多參與民刊運動的有識之士開始思考怎樣以合法和策略的行動在專制體制中進行有限的突破。這個突破的契機選擇在一九八〇年秋季文革後的第一次地方人民代表的普選。

這是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第一次出現的共產黨操縱不了的選舉，它的火星始於湖南長沙，接着燃到上海，最後在北京各大院校形成燎原之勢。其中尤以北京大學的競選風潮最為壯觀。凡眼目睹了那場競選風潮的人回憶起一九八〇年那個難忘的秋冬，都能從中感覺到一種青春活力的騷動。校園在沸騰，大學生們興奮不已，他們溜出課堂，參加各種各樣的答辯會。競選的熱浪夾着歡呼，夾着憤怒，夾着嘲笑，夾着爭吵席捲了北大的禮堂、飯廳、教室、宿舍，掠過每一個人的心胸。競選人面對選民暢所欲言，激烈辯論。討論涉及的問題從對三十年社會主義制度的評價，對共產黨的質疑，對毛澤東的否定，到對人性的頌揚，對前途的預測。王軍濤的勇敢，胡平的機智，房志遠的坦誠，張偉的達練，張蔓玲的奔放曾給人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胡平說：「我們這一代的聲音

被忽視得太久了。」現在，歷史給了他們一個機會，用選票去選擇那些代表他們的聲音。

### 二、準備身敗名裂的人

耀眼的閃電總是在黑暗中醞釀的。在人大公佈選舉法那天起，它的準備工作就在悄悄進行了。有一個人競選程序幕拉開一個多月前就寫好了他的競選宣言，組織好了競選班子。他是國際政治系的房志遠。

房志遠當時系學生會的宣傳委員，經常組織國政系和經濟系的聯合講座。在一次講座中，他宣讀了人民代表大會剛通過的「選舉法」，號召利用這個機會在北大掀起一個競選運動，為全國的普選創立一個差額選舉的典範。會場就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大家當場舉房志遠為競選候選人，經濟系的方覺、賈遠、鄭棟等人立即成立競選班子助選，當場起草了競選宣言，鄭棟請他的女友將房志遠的競選宣言和綱領打印數百份，準備起事。在最初的準備過程中，人們的預期並不樂觀，他們沒有想到過後來出現的熱烈場面。屆時，湖南師院競選者陶森、梁衡遭官方鎮壓的消息傳來，更為民主牆的陷落增添了蕭殺的氣氛。選舉中我曾採訪房志遠，他說，他當時想得更多的是官方

刁難和迫害，群眾的冷漠和奚落，所以他在他的競選宣言中悲壯地宣稱他準備身敗名裂。因此我在「七十年代」撰文介紹房志遠時冠以「敢於以頭撞牆的先鋒」為標題。

打開局面需要更多勇敢的先鋒。這批點火者的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要動員更多的人出來競選，以造成更大的聲勢。房志遠找到王軍濤，相約同舉旗共進退。方覺等人也動員了本系的夏申出馬，並願同時為他助選。王軍濤當時是北大團委委員，團中央候補委員，天安門廣場事件的英雄，夏申是北大學會學習委員，在學生中均有較高的知名度。

作為民刊「北京之春」的副主編，王軍濤的背後有一整套參謀班子。「北京之春」的活動家陳子明、李盛平、呂朴等人決定全力支持王軍濤競選，為他準備了競選宣言和綱領，李盛平在北大一分校選舉答辯會的錄音，立即整理好送到王軍濤手中，供其參考。當人們為這二十二歲的年輕人那敏捷的答辯和洋洋萬言的大字報「中國過去、現狀、未來的分析」所折服時，有誰想到他背後的無名英雄？他是這整整一批人的代表。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日，夏申、王軍濤、房志遠在北大三角地點貼出競選宣言，拉開了競選的序幕。

## 三、百舸爭流，各領風騷

答辯會和大字報，是選民瞭解競選人觀點和個人素質的主要方式。北大競選中，答辯會之盛況令人難以忘懷。

十一月六日，房志遠舉行首次答辯會。由於事先對群眾的反應估計過於悲觀，故只借用了一個容量三百多座椅的大階梯教室，誰知那天來了五百多人，連過道和窗台上都擠滿了人，人民日報內參部的記者及北大黨委辦公室的官員也在其中。面對選民凌厲的提問，房志遠顯得略微緊張，可能是得知官方記者在場，他回答問題比較拘謹，但他仍以他的樸實和坦誠贏得了選民的好感。這最初印象的好感一直保持到投票。連人民日報的記者余某也認為這為答辯會的形式非常成功，為北大競選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從性格上說，房志遠屬於那種不太愛拋頭露面的人，着眼於開拓基於收穫。面對「你最佩服的人是誰」的問題，他的回答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房志遠面臨的是一潭不知深淺的水，他自稱自己是投石問路的石子，人們從他的答辯會中摸到了群眾的脈搏。一石激起千層浪，北大人中間蘊藏的熱情一下子迸發出來，悲觀的情緒一掃而空。此後，胡平、張偉、張蔓玲、楊百駿、楊利川、劉娟、田志立、姚禮明、易志剛、于大海等競選人接二連三地站出來，答辯會一個接一個地召開，北大沸騰了。

次日，夏申在大飯廳對選民演說，圍觀者八百餘人。也許從昨天的答辯會中看到了大多數人的傾向，夏申一掃房志遠的拘謹，痛快淋漓地喊出了人們的心聲。如果說房志遠昨天還只能拐彎抹角地用「蒼蠅再完美還是蒼蠅，英雄哪怕有缺點也是英雄」和「護法不護人」來為魏京生辯護的話，夏申則振臂高呼：「釋放魏京生！平反大冤案！」全面的現代化，一切為了人！夏申具有煽動性的演說引起了聽眾陣陣歡呼，同學們把帽子和飯盒扔上天，為

他鼓掌助威。競選運動加溫了。

緊接着，王軍濤的答辯會將競選推向了一個高潮，盡管會場設在能容納千人的禮堂，但聽眾來了一千五百人，會場上熱烈緊張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王軍濤充分發揮了他的口才，他縱橫閭閻，指點江山，從政治談到經濟，從歷史論到今天。辯論也達到白熱化，提問者跳上講台爭搶話筒，歡呼聲、叫罵聲、掌聲和噓聲交織在一起，此起彼伏。王軍濤出身革命軍人家，又是團中央候補委員，在共產黨的體制中本應有很光明的前途。但他不顧這些束縛，勇敢地向共產黨的歷史開刀，哪壺不開提哪壺。他說馬克思主義是宗教，批評毛澤東犯重大錯誤，為反右運動平反，替彭德懷喊冤。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是跨歷史階段的產物，所以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他聲稱人民代表大會是聾子的耳朵，需要改造。為此他起草了「人大組織法建議草案」。王軍濤像一個好鬥的勇士，專揀有爭議的問題開刀，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引起了一場最激烈的辯論。據他自己分析，這個炸彈至少炸掉了他五百張選票，使他從呼聲最高的候選人降到了胡平之後。盡管倍受爭議，但他一夜之間成為北大的明星，找他聊天辯論的人和傾慕他的女生在他宿舍門外排起了長隊，以致同房的同學不堪騷擾，集體決定將他開除出宿舍。逼得王軍濤像個游魂一樣徹夜和來訪者在未名湖邊漫步。人們普遍的評價是，王軍濤的個性魅力要遠遠超過他筆下的文章。

如果說王軍濤的感染力來自他的激情的話，那麼張偉則是以他的通達和精明征服了選民。作為現任的北大學生會主席，張偉的出馬競選當時頗受爭議。二十五歲的張偉從小就一帆風順，他二十一歲就成為武漢一家中學的革委會副主任，進入北大後即被任命為學生會主席，不久以全國學聯主席的身份率團出訪日本，被譽為年輕政治家新星。盡管張偉一再聲明他只代表個人，但很多人仍把他看作官方的代表

。作為學生會主席，張偉在知名度上佔有天然的優勢，但是他的官方色彩又使他處於一個天然的劣勢。中國的選民被共產黨操縱了三十年，對於官派代表有強烈的排斥心理。張偉在這一逆境中仍能贏得一千七百多票，實在需要比別人有更出色的表現。張偉的答辯會接着王軍濤，同時和王軍濤形成鮮明對比。相對於王軍濤的熱情激昂，他冷靜沉着，對一千多人選民的提問對答如流。自稱務實派的張偉主張中國的改革要先從經濟入手，循序漸進，提高生產力是首要任務。當選民問他最欣賞的格言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於是引起一片笑聲和掌聲。選民從這個答案中看到了張偉的風格。

在北大的競選人中還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中豪傑張蔓玲。她別出心裁地把她的答辯會稱為懇談會，充分顯示了女性的人情味。她的懇談會圍繞的中心問題是婦女的解放和人性的回歸。她認為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出現「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趨勢，中國的女性需要恢復「東方女性美」。她年近三十，仍獨處其身，當選民對此提問時，她十分坦然地向人們介紹了她的戀愛婚姻觀。張蔓玲的獨樹一幟為北大競選增添了最富有戲劇性的一筆。她那開朗奔放的個性受到很多選民的讚賞，同時也遭致不少人的非議和譏諷。與她同班的六名女生認為張蔓玲不能作為東方女性的代表，呼籲大家不要投她的票。某些不嚴肅的男同學在她的懇談會上向她提出一些帶有侮辱性的問題，氣得張蔓玲當眾落淚。事後她在三角地貼出一張抗議大字報，悲憤地高呼：女子也是人。接着，幾乎所有的競選人聯名呼籲制止人身侮辱的提問，以免競選運動走入歧途。張蔓玲雖然得了六百多票，但她的知名度却遠遠地躍出了北大校園。

## 四、言論自由的旗幟



如果說競選運動曾經使北大沸騰過的話，那麼它的沸點是胡平的答辯會。

曾在民刊「沃土」上因發表「言論自由」一文而顯山露水的胡平，來自四川的布衣家庭。他的父親曾被共產黨鎮壓，這一背景使他對共產黨多少懷有一點怒而不發的心理。這也是為什麼他對於「你最敬佩的人」一問的回答是「馮羅克」。那個十四年前就敢於為黑五類申張正義，並寫下「出身論」的作者，和胡平具有相近的家庭背景。也許正是他被殺害的遭遇使胡平想到了爭取言論自由的緊迫意義。現在，競選終於給了這位懷才不遇的六六屆高中生一個暢所欲言的機會。他以言論自由作為競選的旗幟，無疑將整個北大競選的理論水平提高了一個層次。「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專制主義的大廈」胡平平靜地告訴他的選民，「這個支點是言論自由」。人們從胡平那裡得到的不僅是言論自由的定義和概念，而更重要的是一個新的思維角度，從這個角度他們看見了結束專制的戰略突破口。

胡平的答辯會幾乎完全圍繞着他的言論自由的綱領。最多的一次有兩千多聽眾，將北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甚至連講壇背後的舞台上都站滿了人。晚上七點開會，但下午四點鐘所有座位已被書包和各種物品佔滿。胡平回答問題的風格機智詼諧。他善長用一些深入淺出的邏輯推理最終將圍攻他的對手裝進自己的圈套，然後在人們的笑聲中凱旋。當一位選民起身高聲斥責胡平「只會清談不會務實」時，胡平立即謙卑地點頭稱是，道：「我承認，我只會清談。但是我希望大家首先搞清楚你們在選什麼人。你們選的不是總理，不是市長，也不是勞動模範，你們在選議員，議員的職責就是清談嘛！」會場爆發出一陣會心的哄笑，那位提問的務實派選民只好灰溜溜地把頭縮回去了。可是胡平還不罷休，他又挺委屈地申辯道：「叫議員去務實？這不是叫他不務正業嗎！」又是一陣禮堂大笑，一些人笑彎了腰，一些同學

開心地將帽子扔上了天。胡平自有胡平的風格，他那出色的口才和慎密的邏輯令北大的選民折服。儘管圍剿胡平的大字報從他的思想啟發到他的文字，盡管他從競選開始到結束也沒能拼湊起一個屬於自己的競選班子，但他還是以兩千八百多票的成績遙遙領先於其他人，並作為唯一超過半數的候選人當選為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入選的不是這個貌不驚人的哲學研究生，而是一面言論自由的旗幟。

當胡平在為他的言論自由搖旗吶喊的時候，房志遠、方覺、王軍濤等人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將言論自由的原則付諸現實了。十二月十日，他們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法草案」在三角地帶貼出，上面已經有二十二人的簽名。同時，幾百張徵集簽名的油印件在同學們手中傳開了。接着，這張兩頁紙的傳單被翻印，被海外出版物轉載，被北大學生們寄回家鄉各地。在民主牆和民刊被封殺後倍受打擊的民運人士立即接過了這一反攻的武器。他們在鄭州、武漢、西安、青島、廣州、成都等各大中城市的鬧市擺起宣傳台徵集簽名。兩個月內，成千上萬的集體簽名信雪片一樣飛向聯絡人方覺和房志遠手中，其中有工人、有幹部、有軍人、有海外華人，甚至還有農民。徵集簽名的運動一鋪開，各省的黨委紛紛向中央告急，中宣部長王任重立即召見北大當時北大學生工作部部長劉昆、處長王德欣，命其收集房志遠、方覺和王軍濤的材料，研究對策。

胡平的「言論自由」和房志遠等人的「出版法草案」，以及王軍濤等人的「人大組織法草案」可以說是北大人競選中能夠留給歷史的最重要的文獻了。十年過去了，當我們重讀「北大競選資料選編」時，發現很多人當時的觀點都被後來的歷史所超越了，可是言論自由仍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首要任務。胡平說過：「共產黨可以用剝奪反對派的綱領來鞏固自己，消滅對方，可是言論自由這面旗幟它却偷不走，它只要一失去言論控制，它的末日就來臨了。」

### 五、君子競選，虛實之爭

自張偉豎起務實派大旗之後，北大的競選人被分為兩大派。一派為務虛派，又被稱為激進派，以王軍濤、房志遠、胡平為代表，他們主張中國的改革應以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為先導；另一派是務實派，又稱穩健派，以張偉、楊百際、楊利川為代表，他們基本主張經濟改革要走在前面，同時他們傾向於多代表學生的具體利益來爭取選票。

可是，北大的競選運動有它的特殊之處。在北京其它大專院校，基本上都是務實派佔上風，趨使競選人爭相向選民的福利許願。可是北大的選民們似乎並不十分強調他們的具體利益，相反，他們更關心候選人的理論修養和政治素質。選民的傾向決定了競選人的傾向，所以，北大主要的競選人都在比賽高談闊論政治經濟改革，而即使是他們中間的務實派所討論的問題，也大多是小小的區人民代表根本摸不上的。因此，在北大，務虛派相對於務實派佔壓倒優勢，這也可以從初選的結果看出來。以下是兩派前六名主要代表的選票：

務虛派得票		務實派得票	
胡平	二八一二票	張偉	一七一二票
王軍濤	二四〇〇票	楊百際	九三三票
房志遠	一六一五票	楊利川	六九三票
合計：	六八二七票	合計：	三三三八票

選民對以上競選人的劃分也許不是沒有道理的。除了政見之外，兩派人甚至在背景上也可以找到相同和區別之處。務虛派的代表幾乎都捲入過民辦刊物的活動：胡平——「沃土」

、王軍濤——「北京之春」、房志遠——「人民之聲」。而務實派都是黨員，而且當過基層幹部：張偉——革委會副主任、楊百揆——公社副書記、楊利川——黨支部書記。也許沒有人懷疑，所有的競選人都是改革派，但他們不同的背景決定了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評價和推動改革。

有人說，務虛之風在北大競選中佔主導地位說明了北大的學生浪漫不實，好高騖遠，其實北大選民對於競選的態度恰恰表明了他們是最明智最現實的。沒有人對區區兩席海峽區人民代表能為他們謀得多少利益抱絲毫幻想。正因為大家都看透了這一點，所以站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無論競選人還是選民，都具有一個共識：競選形式的成功比誰當選更重要。

為了選舉的成功，各位競選人曾舉行多次聯席會議，協調行動。第一次聯席會大家決定統一口徑：在公開場合均承認「競選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把北大黨委綁上戰車。這一決策後來證明是非常明智的，比較開明的北大黨委後來果然拚死頂住了來自中宣部和高教部的壓力，保護了參加競選的同學，也保證了競選的成功。第二次聯席會議召開，是在北京市委壓制競選運動的三項指示傳到北大之後。當時楊百揆正在開答辯會，一位同學打斷發言，跳上台宣佈了所謂三項指示，台下立即群情激憤。第二天，所有競選人開了一個聯席會，決定誰也不在高壓下退縮，誓將競選運動進行到底。第三次會議是發生張蔓玲和胡平受到人身攻擊之後，所有競選人達成協議，決不慫恿自己的助選班子在他人答辯會上搗亂，堅決杜絕人身攻擊行為。

儘管有觀點之別，派系之分，但筆者所熟悉的北大競選，自始至終都充滿着君子之爭的氣氛。幾乎每一個候選人都宣稱，不在乎是誰當選，重要的是保證選舉形式的成功。王軍濤在決定提出「評價毛澤東」的爆炸性問題前，徵求房志遠意見，房雖然與王觀點相似，但認為不可行，會失去大批選票。後來王決心一拚

，對房說：「你不要動，我炸掉的選票你想辦法兜着。」到投票前夕，房志遠為了使選票能相對集中給王軍濤，保他過半數，寧願退出選舉。但王堅決反對，認為這不尊重選民。王軍濤和張偉盡管被視為是兩個不同派別的代表，但兩人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君子協定，絕不互相搞人身攻擊。

投票前的最後一場答辯會是十三名競選人的聯合答辯會，每一位候選人演說十分鐘，十分鐘回答問題。這真是一場精彩萬分的表演。每個候選人都充分展示了他們的個性和傾向：楊利川誓做大地安泰，呼籲選民警惕花言巧語的野心家；楊百揆推銷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堅信流通也能創造價值；張偉闡述中產階級的作，強調吃飽肚子再談民主；房志遠認為民主制先是瀉藥後是補藥，治官僚腐敗唯有此方；王軍濤揚言扔重磅炸彈，批評毛澤東非馬克思信徒而是草莽英雄；田志立則拚死捍衛韶山同鄉，頌揚毛主席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夏申提醒選民珍視手中權利，聲稱北大人正在創造歷史；張蔓玲維護女性尊嚴，憤怒反擊人身攻擊。兩派代表王軍濤和張偉的支持者在提問時的撞擊閃出的火花，令全場兩千餘人如痴如狂。在激烈的辯論中也曾出現過不理智的場面，但肇事者立即被台下理智的選民趕下去。房志遠在他的演說中呼籲：無論務虛派還是務實派，各演各的角色。一台戲需要各種不同的角色才能成功。

確實，北大競選這台戲的成功，每一個角色都作出了貢獻，其中包括台下和幕後的無名英雄。

## 六、台下幕後的無名英雄

在競選運動中，助選班子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甚至一點也不亞於競選人本人。如果說競選人在這場運動中還能得到點兒什麼，比如說知名度，那麼他們身後的這批人則完全是無私的奉獻了。為夏申助選的同學被公認是

競選中最活躍的競選班子，其中方覺、費遠、鄭棟、李小平、祁亞申等人不但為發起競選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還直接參予了「出版法草案」徵集簽名活動。競選後期，他們曾獨立貼出大字報，論證共產黨沒資格領導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這張六人大字報後來被官方視為最反動的言論立即消毀。房志遠將經濟系的一套班子讓給了夏申，在國政系又形成了一個新的助選班子，同班同學輪流在宿舍值班接待選民來訪。王軍濤的競選班子是最大的，幾乎整個技術物理系都在為他助選，他那經常長達幾十頁紙的大字報都是這些無名英雄通宵達旦抄出來的。胡平雖然沒有成形的助選班子，但不少人慕名而來，自願為他義務勞動，抄大字報，籌備答辯會。

在選舉過程中，一些自稱中立的人士，劉曉峰、潘維明等，還舉辦了為競選服務的新聞媒介，如定期報導和評論競選活動的「競選短波」、「競選之聲」、「動態」、「觀察」等。搞抽樣調查，公佈民意測驗結果，甚至出面組織競選人的集體答辯會，為講演者評分。最後一次十三人聯合答辯會就是由「競選之聲」召集的，在那次會上，房志遠扭轉了拘謹的形象，得到了最高評價。

歷史系的黃河等人為了讓這段有意義的歷史留傳世人，花費了大量精力編輯了一本三萬字的北大等高校運動資料選編，命名為「開拓」，其中幾乎匯集了北大競選運動的錄音、大字報、提問紙條、油印傳單等。然而，這本書在付印前遭官方突然查封，後沒收銷毀，使之在很長時間內失傳於世。唯有一本孤本經特殊渠道流入民間，歷經曲折，由我保存十年之久並冒險帶出海外，由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發行，成為中國民主史冊上一本重要的歷史文獻。

## 七、損失少收復大的運動

為了擴大競選運動的戰果，北大的王軍濤、房志遠、胡平、北大一分校的李盛平、科學

院陳子明和人民大學的劉沃中在北師大開了一個會，共同發起北京十四校競選活羅份子聯席會議，交流經驗，將競選這種形式推廣。聯席會議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在人民大學召開，與會的各校競選人和助理班子代表近一百人。包括人民大學競選代表韓宇紅、蘇華、北師大的李世渠、王本公、北師院的劉源、張宗天、清華大學的顧立基和華興如、北京商學院的陳子華等。會上王軍濤作了一個發言，題為「對當前形勢的基本看法」，房志遠作了「關於競選的總結」的發言，經過激烈的辯論和修正，到會者在這兩份文件上集體簽名，作為會議公報。中共當局對人民大學聯席會議非常緊張，他們最擔心是民運份子的跨校橫向聯繫，將競選之火引向社會。中宣部驚呼，要防止青年學生的「第三次造反」（前兩次是反右和文革）。第二天，書記處就派人將會議兩份文件手稿索走。不過比較開通的胡耀邦對競選還是取基本肯定態度。胡耀邦後來和一批競選人座談時說：「我不認為競選是錯誤的。不過幹的事情本身正確並不能說明你明智，只有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幹正確的事情才是明智的。」

胡耀邦有他的難言之處。他對競選從一開始就持默許的態度，否則競選運動也不會在北大成燎原之勢。但十二月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擴大會議，陳雲提出經濟面臨大調整，為保證調整順利進行，必須確保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杜絕一切動亂因素。於是最高當局臉色驟變，全力撲滅競選之火。為殺一儆百，高教部長蔣南翔要求北大開除發起「出版法草案」簽名運動的房志遠、方覺和王軍濤三人，因北大黨委頂住方作罷。但房志遠仍被扣住了寒假回廣州的車票。北大保衛部勒令他必須停止簽名活動並交出名單方准離校。事後，當局還組織力量對競選中出現的「自由化」言論進行批判消毒。

記得筆者在競選高潮時曾和一位瑞典留學生傅瑞東在北大四十一樓「每週一餐俱樂部」



房志遠(丁楚)現任「中國之春」主編

裡談起競選人的命運。這位曾在美國、英國、蘇聯歷學多年，對中國孔老莊學均深有研究的北大歷史系研究生，以他西方人的觀點預言：北大的這場競選，將會造就一批悲劇人物，但它同時也會造就出一批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戰士。後來的歷史果被他言中。事後，當局又對激進派的競選人進行了秋後算賬。當上海淞滬區人民代表的胡平分配時無單位敢要，在家失業三年；王軍濤被分到一個山溝研究所，冷凍兩年，後憤然辭職。房志遠被分到粵北韶關師專，幸好他的家鄉廣東擇業相對自由，他考上了其他單位，留在了廣州市。方覺、費遠等人被禁止考研究生。但是，這批人後來都被逼上了梁山，成了民主運動中反對派的骨幹。王軍濤，在八九民運中再一次成為天安門廣場的英雄；胡平，成為中國民聯的主席，房志遠（丁楚），任民聯總幹事和「中國之春」雜誌主

#### 八、競選意義：形式重於內容

大學生競選運動的勝利並不在於人們選了

什麼人，也不在於競選人說了什麼話，而這個勝利的意義在於它以其示範效益將一個民主的具體形式確立下來了。此後，中共當局無論多麼不情願，也無法再恢復指定等額候選人的選舉形式，同時也無法否認差額競爭的原則和候選人自薦的權利了。如果說這四十年來所有的民主運動，從右派鳴放，「四五」運動、民主牆、「一二·九」大示威，到「八九」民運，都只能說是「爭取民主」的運動的話，那麼這場競選運動則則是一場貨真價實的「民主的」運動。它的意義不在運動的目標，而在運動本身。正如房志遠在「開拓」一書的開篇所言：「當今的青年一代是善於總結經驗的，他們將向歷史證明，他們不但具有實踐民主的勇氣，而且也具有實踐民主的能力。」

讓我們再回頭去回味一遍胡平的「競選宣言」，也許能得到一點新的啟示：

「我們這一代的聲音被忽視的太久，太久了。」

「一個是，生命之輪沒有因此放慢它的轉速。」

「機會，像初次赴約的少女，踟躕來遲。也許是爲了試探我們的誠心，她有意穿上最不起眼的衣裳。我們這些飽嘗了多年的希望和失望，被這種冷熱病折磨的人竟然猶豫了，考慮着是否有必要迎上前去……」

「是的，一個大國，尤其是一個權力還相當集中的大國，縣區級人民代表的選舉也許是太無關宏旨了。不關心大事的人嫌它大，關心大事的人又嫌它小。但是應當看到，這畢竟是一次真正的機會。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能賦予這場選舉更豐富的内容，更鮮明的色彩，以及更深遠的意義。」

「它可以成爲一次真正的民主訓練，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開論壇，一場偉大進軍的光榮開端。有時，巍巍大山下不過是渺小的耗子，相反，有時一泓不大的泉水，却成爲萬里江河的發源。……」

# 當好演員，導演留給上帝

## 從五四精神中得到的啟示

丁 楚

五四運動的精神就是多元化。五四運動最終失敗是在於中國人對一元終極真理的不懈追求。「多元」是今天我們從五四中所能得到啟示。

### 五四運動是多元化的運動

每年的「五四」，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要照例熱鬧一番。此時您也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平時政治立場截然不同的黨派團體幾乎都在一致高唱「五四」的讚歌。

不過只要仔細聽一下您就不難辨別出，在這個大合唱中混雜着各種不同的調子。有人將這場運動稱之為「五四愛國運動」，譬如共產黨官方；有人稱之為「五四民主運動」，譬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一些民運人士；也有人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譬如台灣及海外的一些知識份子和文化人，還有人寧願將之稱為「思想解放運動」，譬如說本人和與本人持同樣觀點的人；當然，在這一片讚歌聲中也不乏有唱反調的人，譬如劉曉波，他稱五四運動是一場「失敗的啟蒙運動」。

我相信，每一方對五四運動的評價或定性都有其目的和理由，也會有一套劃得圓的說法。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恰恰體現了五四精神。五四運動說到底是個思想多元化的過程，是一場外來的思想和新生的思想對原來佔統治地位的一元化思想的衝擊。正因為「多元」是五四運動最明顯的特徵，所以它有不同性質的涵蓋面就不奇怪了。也許以上說法每一種都是正確的，每一方都看到了五四運動所展現出的某一面。但是如果每一方都堅持說只有自己看到的那一面才是唯一正確的話，那麼這恰恰就是違

背五四精神了。

我頗同意劉曉波的看法，五四運動最終失敗了。因為它所開創的思想多元化的局面最終凋謝了。其原因恐怕在於中國人對一元終極真理的不懈追求。正如中國人在政治活動中總是企圖找到一個好的統治者一統天下，他們在思想領域裡也總是企圖找到一個極終的真理去一統天下，歸根結底，還是中國人一元化的思維方式作祟。

今天，發揚五四精神意味着恢復七十年前那個思想多元化的局面。打破一元化的局面走向多元，外力的衝擊是不可避免的。海外留學生正是這一外力的主要載體。不過為了不重蹈五四運動失敗的覆轍，我希望作為外來思想載體的留學生能夠清醒地認清他們的使命。他們的使命在於開創一個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而不在於找到一個極終真理去武裝國內群眾。他們所要開創的這個兼容並蓄的格局比他們所傳送的思想本身具有更大的意義。這個多元化的局面中不僅僅要包括民主科學的思潮，也不妨讓馬克思主義和新權威主義存在。形式重於內容，為了這個局面的到來，我們最好忘記極終的真理。

### 我們是演員不是導演

「中國之春」第八十三期刊登了王國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用什麼思想戰勝刀槍——

與曹長青商榷。如果從作者的思想體系來說，這篇文章是很有說服力的：思想的力量在於掌握群眾，那麼什麼思想能掌握絕大多數群眾呢？作者認為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可能對大多數中國人產生感召力，最有力量動員群眾的還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我不得不承認作者對中國國情的透徹瞭解。可是遺憾的是作者的思路恰恰重蹈了五四運動失敗的軌跡。五四運動之後，國民黨人找到了能掌握大多數群眾的思想，戰勝了軍閥的刀槍，接着共產黨人又找到了最能掌握大多數群眾的思想，於是戰勝了國民黨的刀槍。可是中華民族並未因這些勝利而得救，反而一再陷入更黑的深淵。今天的問題同樣存在，我們要戰勝共產黨人的刀槍並非僅僅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合理更繁榮的社會。那麼請問當我們戰勝了共產黨的刀槍以後怎麼辦？再去面對另一群人的刀槍嗎？能夠掌握多數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能為我們提供什麼答案？

中國最需要多元化，這是任何一種民主制度建立的先決條件，將不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介紹到中國去，衝擊那裡的一元化結構，是海外留學生責無旁貸的使命。他們應該承擔這一使命，無論介紹到國內去的是什麼思想，也無論能掌握多少群眾，做就是了，總有它的價值；他們也只能承擔這一使命，因為在他們踏出國門那一刻就命中注定要扮演這一角色。在國內人眼裡，吃着洋麪包的留學生去扛愛國主義

的大概不但沒有感召力，甚至頗為滑稽，這杆大旗要扛也輪不到留學生，相反，西方民主思潮的大旗由他們扛回家去便頗有權威了。很難說西方民主思想在戰勝刀槍時沒有它的作用，即使沒有主要作用也總有次要作用。我相信戰勝刀槍的將是各種思想而不懂僅是其中的一種。

中國的社會變革猶如一台戲，每個人每個團體都只是台上的演員。在唱台詞之前最好搞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唱得再好，串了角兒，也只能被喝倒彩。手裡沒有刀槍，就老老實實唱小生，黑臉自有耍刀槍的人去唱，也許每個人都有當主角的時候，不過誰也不可能總當主角。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動不動就擺出一付治國平天下的氣勢，覺得自己是社會舞台上的導演。靠一套治國方略而平天下的故事在一元化的社會中大概會有，可是在多元化的社會中絕無僅有。所以每個人最好是演好自己的角色，導演還是留給上帝去當。契柯夫說：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給它們的嗓子叫好了。筆者拍案叫絕。

從歷史的過程來看，新生和先進的思想總是先被少數人掌握的。如果強調掌握大多數群眾的話，要麼守舊，遵從大多數人的習慣思維；要麼欺騙，像共產黨一樣，先用土地所有權將農民調動起來打贏一場戰爭，然後再剝奪他們的土地。把掌握大多數作為衡量真理的標準，我們將永遠不會有真理，社會也永遠不會出現新的思想。所以，作為新思想的傳播者和多元化局面的開拓者，最好首先忘掉「大多數」，別管農民怎樣想，你怎麼想就怎麼說。別忘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應表現於此。

### 自尊心是弱者的專利

我剛到美國時，一個美國朋友對我說：「什麼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壞的」。這句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

又一次拍案叫絕。美國之所以有今天之強大，均受益於其博大的胸襟和多元的文化。僅憑它能容全球各民族於一爐，作為世界的領袖也當之無愧了。

美國人的多元化是最徹底的，其容量之大可以從世界最好到世界最壞的，無所不包。美國人從來不想要揮霍什麼國粹，也從不擔心會失去什麼傳統，結果他們什麼都得到了。當然，要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不得不以吸收最壞的東西作為代價。相反，中國人在面對外來文化時總是列出諸多需要保護和需要抵禦的禁區，其結果什麼也學不好，窮困潦倒。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毛澤東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百年換湯不換藥。五四時期，是中間最輝煌的時期，可惜轉瞬即逝。愛國主義的思潮在中國近代史上久盛不衰，從頭到尾都是最能掌握群眾的思潮。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的靈魂無非是維護民主自尊心。自尊心只有弱者才需要，而強者根本不需要。強者的地位擺在那，不需要用精神的力量來自動自慰。也有的人瞧不起美國，美國人會泰然處之或一笑置之，你瞧不起他總有別人瞧得起，反正是國家要求上門，有的是人願意變成美國人。自尊心在那些過去曾經強大過的弱者身上表現的猶為畸形，這種自尊心簡直就是包袱。也許每一個留學生來到海外都必須經歷一個砸碎自尊心，扔掉包袱的考驗。留學生們在國內都是精英，有些還小有名氣，可來到海外却成了半文盲，要幹最低級的活，給人打下手吹來喝去。那些放得下這個架子的人，很快就會適應這個社會，活動心情愉快，而那些不願放下這個架子的人，始終融不進美國社會，過得痛苦不堪。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一經歷具有同樣的意義，中華民族如果不想游離在國際主流文明之外，恐怕首先也要砸爛自己的自尊心。

自從「河殤」公演以來，引起了不少愛國主義者的憤慨。他們痛恨「河殤」的作者對中

華民族文化的鞭撻幾乎摧毀了中國人的自尊心，其後果顯然不利於振興中華的民族大業。我不知道他們看懂了「河殤」沒有，至少我自信是看懂了。「河殤」的主題可以用四個字概括：開放多元。作者把中國古老文明衰落的原因歸結為一元化的封閉，同時指出這一古老文明復興的唯一途徑是多元化的開放。作者顯然是有意摧毀中國人的自尊心，將這個民族置於死地而後生。正如我前面對海外學子的心態分析，要想成為真正的強者，這一步是絕對必要的。作者那近乎殘酷的手術背後，恰恰浸透著愛國主義的心血。

崇尚西方文明的人並非一定不愛國。那些會把西方的文明帶進中國的人，從嚴復到孫中山，哪一個不懷着一顆赤熱的愛國之心。在四萬留學生中，回國赴湯蹈火投身民運的，不是高叫愛國主義的人，而恰恰是高呼要中國「全盤西化」，甚至「當三百年殖民地」的劉曉波。

### 學會多元的思維方式

職業道德和就業精神在西方是很受人尊敬的品格，一個人選擇了什麼角色就要扮演好什麼角色。既然歷史賦予留學生傳播外來文明的使命，那麼他們就不能有辱使命，就該研究好洋文化，帶回中國去。至於發揚民族文化，挖掘並保護國粹的使命，這自然也是很必須的工作，還是讓那些研究國學的專家去操心吧。留學生們在這裡插一手，不說不務正業也是班門弄斧。各演各的角兒，各唱各的調，多元化的局面才有可能出現。如果看見哪一個調子詭取悅大多數人，所有的人都跑去唱，那麼中國就永遠也不可能走向多元。

中國人有時也不拒絕接受外來思想，但引進之後同樣逃不脫一元化的命運。例如馬克思主義就是外來思想，最後也成了一元化的極終真理。我在北京大學時曾假學生會名義搞過一個民意調查，問卷收上來後我把統計結果登在

一個黑板報上。其中有一條是：相信共產主義的學生佔百分之七十五，而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佔百分之六十。儘管在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高得足以令共產黨喜出望外了，可是在十一年前還是把黨委嚇得夠噓。於是這個黑板報在露天展出不到一天就被黨委沒收了。當我怒氣衝衝跑到黨委辦公室去討還黑板時，黨委一位負責人對我說：「你的統計根本不可信。怎麼可能相信共產主義的佔百分之七十五，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却只有百分之六十？你要是能解釋這個荒謬的答案，我就把黑板還給你。」我心中大喜，忙問：「一言為定？」他說：「絕不食言！」於是我答道：「這太簡單了，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共產主義學說中的一個流派。」他目瞪口呆，無言以對，眼睜睜地看着我把黑板搬走了。

一九八四年，長春曾召開過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研討會。會上年輕人 and 老學者們分成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前者對馬克思主義展開了強烈的批判攻勢，後者則百般抵抗，拚死捍衛馬克思主義。最後老教授們悲憤不已，全體起立，含着熱淚高唱國際歌，場面極其悲壯。幾個年輕學者後來向我論及此事，大笑不止。我不以為然，說：「其實老教授們拚死捍衛的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還不如說是他們的飯碗，要知道，為飯碗而戰的人是不可戰勝的。各位何必要如此認真，只要人家把馬克思主義當學問來作，而不是當宗教來傳，也不妨給人一口飯吃，不能一概批倒批臭。」培根說過，新思想戰勝舊思想從來不是在論戰中取勝的，而往往是相信舊思想的一代人死光了，相信新思想的新一代佔居了社會主導地位，這個勝利就降臨了。自然，在此之前，兩種思想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相互共存此消彼長的階段，每一個人都應有信仰自由，包括信仰舊思想的自由。

其實，馬克思主義既不像過去共產黨吹得那樣神乎其神，能包醫百病，也不像人們今天

咒得這樣荒謬絕倫，一無是處。它只不過是人類思想史中的一個流派。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這樣心平氣和地用多元的眼光還其本來面目，無需大動干戈就足以解放思想了。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學會多元地思維，就會少走不少彎路。

共產黨願意相信馬克思主義，願意把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可惡的是它強迫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相信共產主義，並且用棍子將人民趕進它指定的天堂。共產黨的罪惡不在它幹什麼，而在它怎樣幹的。其惡劣不在它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只要我們透過那用於宣傳的華麗詞藻，就不難看出共產黨辦事的邏輯非常簡單：絕對性、排他性、強迫性。其腳下的基礎是：一元論。其實一元論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元」，唯我獨尊，順昌逆亡。在這裡，同樣形式重於內容。

明白了這個道理，民主志士們實在沒有必要去和共產黨糾纏於關於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是對還是錯的爭論，我們要努力的是用自己的存在和各種異端思想去造成一個多元化的局面。「化」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元」。市場的存在比買賣什麼重要得多，形式重於內容。

多元，也許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五四精神中所能得到的啟示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號的「中國之春」上，程玉寫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文章：「五四思潮的回顧與分析」。在文章的結尾她寫道：五四是一個充滿年輕魅力，極具感染力的時代。翻閱五四知識青年的激揚文字，你會覺得步入了一座演講的大廳。在講壇上，可以看到那喧騰激烈的爭辯。講演者們，雄辯的，機智的，謙和的，辛辣的，潑辣的，保守的，無不充滿青年的朝氣和自信。那一派生龍活虎，躍躍欲試的姿態安今何在？環視四週，只能感到一種寂寞。五四，給我們自信和朝氣，讓我們使這個思想的論壇再一次沸騰！

這個結尾太精彩了，我再一次拍案叫絕。

## 新書介紹

「開拓：北大競選文獻」黃河等人撰編。本書收錄了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競選運動主要文獻資料，其中包括主要競選人胡平、王軍濤、房志遠、張偉等人的演講紀錄、大字報、競選中的問卷回答和民意測驗結果。本書還同時介紹了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北京鋼鐵學院、民族學院等其他院校的競選運動實況。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定價港幣五十元；美金八元。訂購者請與「中國之春」編輯部聯繫。  
電話：(七一八)四二九一六七七七。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房志遠著。本書收錄了房志遠以丁楚、張綱、楊天樹等筆名發表的「改革死了，改革萬歲」、「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形之手，無力回天」、「哭黨」等十幾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共註定該亡的命運。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定價港幣五十元；美金八元。訂購者請與「中國之春」編輯部聯繫。  
電話：(七一八)四二九一六七七七。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胡平 著  
本書收錄了「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等七篇論文，對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思想及其它一系列重大哲學謬誤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 一九九〇年一月  
定價：HK\$ 50.00 NT\$ 180.00 U.S.\$ 7.50

# 解除歷史的魔咒

上世紀中葉，兩位先知宣稱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徘徊，本世紀中，這一幽靈支配了半個地球，又過了三十年，它在頃刻之間幾乎土崩瓦解。這就是歷史上所有魔咒現象所固有的神秘色彩。

華一夫

五四運動七十一週年了。

聯繫到去年五四運動七十壽辰時，北京發生的震撼世界的一幕，聯繫到其後在東歐和蘇聯爆發的改變世界歷史的澎湃浪潮，我不由得想起世界歷史上「濟古老而又常新的現象：歷史的「入魔」和「脫魔」的問題。

無疑，當代世界正處於一輪新的歷史性「脫魔」時期。

所謂「入魔」，係指一種世界性的心理體驗，即被魔咒所籠罩所支配。魔咒使人類的群體心理感受到某種迷狂、某種召喚、某種烏托邦式的幻影，從而堅信有某種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無所不能，戰無不勝。這種類似宗教神諭式的感應，在歷史上像陣陣狂濤，驟然而起，呼嘯而去。

所謂「脫魔」，正如著名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所描繪的：「世界的脫魔，就是從魔幻中解脫出來，……脫掉了那層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為的外殼，……進入從各種宗教預言中脫穎而出的有條不紊的倫理生活方式的偉大理性主義。」簡言之，這裡的脫魔，就是拒斥神秘力量的世界理智化進程。

就廣義而言，從古典多神教開始發展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幾千年的持續過程，就是一個總體的脫魔過程。就狹義而言，亦可說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入魔與脫魔的交替。

遞的更迭。以本世紀為例，法西斯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以伊朗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是其典型代表。

本文旨在討論狹義的脫魔，特別是二十世紀人類的一項重要標記——共產主義魔咒的興衰；另外，也對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略作考察。

讓我們先來看一張時間表。

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的先知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宣佈共產主義幽靈降臨世界。

一九一七年，過了約七十年。中國的龐大北鄰——俄羅斯，走火入魔，被共產主義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共產主義經俄國傳入中國。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魔咒全面籠罩中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中國陷入高度的共產迷狂，構成入魔的巔峰狀態。

一九八九年，又過了約七十年。中國、東歐、蘇聯開始偉大的歷史性脫魔。

有誰會料到，當兩位先知在上世紀中葉宣稱共產幽靈在歐洲徘徊時，該幽靈竟會在下一世紀支配了半個地球，使落後世界陷入迷狂？

又有誰會料到，當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勢力鼎盛，似乎將席捲全球時，三十年後它竟然在頃刻之間，幾乎土崩瓦解？這或許是歷史上所有魔咒現象所固有的神秘色彩。

由此引出本文關注的三個基本問題：

？

第一，共產主義何以應如實地被稱為魔咒？

第二，五四運動何以既是脫魔又導致入魔？它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雙重資源以及科學與民主這兩個口號是如何相互衝突並導致悲劇的？

第三，掌握政權後的共產主義魔咒的基本特徵及其命運如何？

共產主義無疑是一種極複雜和重要的歷史現象。其重要性不會因為它在政治上的勢力迅速瓦解而消失。問題是，以科學自命的共產主義學說為何應被恰當地稱作魔咒呢？

研究共產主義的書籍業已汗牛充棟，本文無意在此重復。我只想強調指出當代大多數學者的一項基本共識，即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科學，而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憤怒的抗議。

現代社會學的創始者涂爾幹研究馬克思主義後大為詫異：它從科學借用的資料是那麼稀少、那麼薄弱，但是從此引伸出來的實際性

結論却那麼多，而且這些結論却又正是社會主義的中心論點——當我們看到這二者之間這種不成比例的情形，誰能不感到驚訝？塗爾幹在考察「資本論」後指出：「馬克思為了要確立（社會主義）這種學說才去研究它，而不是因為研究它才產生這種學說。……這些體系中充滿了情緒化的內容；它們的產生以及它們的力量都是對一種更完美的『正義』之嚮往造成的。……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科學，也不是社會學的縮影——它是痛苦和吶喊。」

實際上，作為一位對人類的痛苦有着敏銳感受的抗議者，馬克思本人負有一種宗教式的使命感，他期望自己能像先知一樣拯救全人類。因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種內在的激情和道德上感人的力量。其結論是預先就給定了的，然後再去搜集材料。於是，這些經過篩選的極不充分的材料實質上不過是某種經過刻意經營的辯護詞而已。鑒於此，遠在上世紀末，學者們就指出：「馬克思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主要因為它算是個道德上的導師；因此，他或許也能夠在自十八世紀以降的偉大的世俗改革家中佔有一席之地。」

明乎此，當我們看到共產主義幾乎總是在那些貧窮專制的國家得手，而不是如馬克思預言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成功時，就不會特別詫異了。因為它以天啟式的預言勾畫未來，以先知的形式傳佈福音，在感情上和道義上調動了這些國家文化較低的窮苦者對烏托邦天堂的內在嚮往，從而產生了某種神秘的控制力量，導致了魔幻式的迷狂。

對於知識份子，共產主義學說以其龐大的帶強烈黑格爾思辨色彩的理論體系，構成了雄辯的科學真理的外觀。它堅信有某種神秘的內在矛盾推動社會從一種形態變到另一種。這種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驅使社會達到終極天國——共產主義，於是，人類得救。這在相當程度上吸引了知識者的想像力，滿足於其潛在的理想主義心理需求。並且，馬克思主義內蘊的極

強烈的道德感和批判色彩，引發了這些國家備受壓抑而強烈反叛的知識者共鳴，從而在感情與理智兩方面都征服了其中不少人，進而使其喪失了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懷疑和實證的基本態度，弱化了其判斷力。

如此，在這些落後國家，共產主義也就携有了現代魔咒的主要特徵。

在中國歷史上，五四運動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脫魔，其主旋律（民主與科學）甚至迴響在七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上；另一方面，毋寧諱言，中國現代史上的再次入魔，與五四也有一定關聯。實際上共產主義魔咒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導入中國的。

這種脫魔與入魔的雙重作用，導源於五四運動的複雜性，導源於支配五四運動的兩種精神——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導源於五四之後「德、賽」兩先生的此消彼長的平衡發展。它們撕裂了五四的靈魂。

有兩個五四，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

其一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即以「新青年」為中心，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掀起的一場啟蒙運動狂飆。它的基本精神資源是自由主義，其基本口號是「民主、科學」。其二是作為民族救亡運動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天因巴黎和談外交失敗而爆發的學生遊行示威並火燒趙家樓事件，並延至六月三日的上海罷市為止。它的基本精神資源是民族主義，其基本口號是「外抗強權，內懲國賊」。

上述區分已成了近年來學界的基本共識之一。

雖然，上述兩個五四略有一點銜接之處，但其基本精神却大相逕庭。五四之後中國的基

本路向都與五四運動的上述精神分裂相關。外患深重，是當年中

國所面臨的基本態勢這一情勢加諸中國人以極大的心理壓力並支配了大部份人的價值取向。民族主義成爲他們深層的最高判準。自由人權民主科學價值種種，在人們心中，無非是拯救這個古老民族的藥方之一而已。即使是以自由主義自命的知識份子，當他們認爲人權自由會妨害國家利益時，就會決絕地拋棄之。對其中的大多數而言，如下這一更根本的問題似乎從未進入其視野：民族國家強大的根本目標是什麼？難道不正是保障並實現國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等？倘若離開了這些個人的基本權利，富國強兵何在？國家主權何用？徒然滿足專制統治者的虛榮心而已。

他們所開的更大的歷史玩笑還在於，當犧牲了國民的基本人權後，人們發現，與其預期相反，不僅沒能富國強兵，與其他國家相較，中國反而更加貧弱。這種雙重失落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悲劇。

反之，七十年過後，縱觀世界，以保障基本人權爲立國之本的國家，大部份竟然意外地同時獲得了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富國強兵的結果。簡言之，富國強兵的目標常常是在以保障人權爲本的民主法治社會中附帶獲得的副產品。這一目標在開初是並非置諸首位刻意追求的。胡適之當年的一句話點明了其中的邏輯關係：「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然而，談到這裡，筆者以爲不能不首先澄清近年來頗流行的一種決定論推理：五四的主流——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在邏輯上導致最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支配中國思想界，這就使一九四九年中共奪權成爲必然。

上述推理是過於簡單化和武斷了。其中每一論斷都經不起推敲。五四的主流是激烈的反傳統還是其他？五四的真正傳統是應以綿延未絕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爲代表還是以中共爲



代表？中共四九年勝利的主要因素是思想上的勝利還是抗戰之後基於國民黨腐敗而導致的刀槍上的勝利？在上述這些基本問題上筆者都不贊成前述的流行見解並想進一步指出，這一見解中有些本來就是中共解釋歷史時造成的認知混亂。但這些並非本文主旨，尚須專文闡述，故不贅言。

但是，客觀而論，筆者不想諱言，五四的兩種精神資源之一的民族主義佔了自由主義的上風確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瀰漫創造了一定的社會心理條件，而五四之後的著名的科學玄學論戰中科學派獲勝導致的科學迷信，也為共產魔咒的生效產生了某種催化作用。

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偉大的脫魔運動。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神秘色彩雖不如歐洲基督教文化那樣濃烈，但其宗法社會中黑暗的非理性因素，強調天人感應的直覺式渾沌化的感知方式等與歐洲的入魔狀態並無根本的歧異，不過少有歐洲式宗教意味極強的狂熱態而已。只是到了五四，開天闢地，新文化運動的個性解放、民主科學為中國引入了一套新的價值系統和理性化方法，才開創了一條嶄新的路向。五四的自由主義理想，雖然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蓄意淡化，乃至淹沒不彰，但一條精神的脈絡仍時隱時顯，綿延不斷。從蔡元培、胡適之、聞一多、朱自清、上海七君子，到胡風、羅隆基、儲安平、傅雷等右派份子及殷海光、方勵之……雖屢遭橫逆，仍不絕於縷。作為五四傳人，他們共享一條精神上的道統。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是當之無愧的脫魔運動。

但是，五四何以又同共產主義魔咒在中國興起有一定關聯呢？這就勢必涉及一段複雜曲折的歷史。

前已述及，自由主義的價值被民族主義熱狂所壓倒，是共產主義趁虛而入的原因之一。此外，三十年代西方民主營壘的經濟危機和法西斯國家的強盛導致的對自由民主的普遍懷疑

，又進一步弱化了自由主義理念。

此時，科學迷信的風氣隨科玄論戰後，科學主義的勝利而泛濫開來了。這是一種超越本份的無批判性的科學概念。科學成了終極真理的等價物。它可以無所不包地解決一切問題，從自然到社會到人生。它成了一個價值判斷詞，任何學說一旦被稱為科學，似乎就獲得了不受懷疑和批評的豁免權。科學主義陣營的主帥胡適之描述道：「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經歷了現代科學革命之後，在今天的無論哪一派科學哲學看來，上述關於科學的觀念都是令人吃驚的幼稚，它本身就是反科學精神的。人們看到，當年那種科學萬能、神聖至尊的崇拜，已使科學染上了一點萬能咒符的色彩了。

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之下，以最新最前沿科學的面目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出場了。它聲稱自己正像牛頓與達爾文揭示了物質和生物世界的因果律一樣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鐵的因果律。它的強烈自信加上前述的共產主義在落後國家作為魔咒的基本原因，對當年部份知識份子產生了巨大的征服力和催眠作用。

更重要的是，對處於焦慮救國心態的、重視實效的中國知識者而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掌權無疑表明了它是救國的靈丹妙藥。鑒於此，「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成爲最新咒語，甚囂塵上。

於是，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這些當年的知識精英們，迅速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並向他的朋友兼科學主義主帥胡適之推荐這種「最新最完美的社會科學——經濟一元論」。雖然胡並未接受，但他何曾想到，他自己爲科學迷信大行於世所做的拓荒工作，已經爲新的魔咒——共產主義的加冕準備了一條小小的紅地毯。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前賢。在某種意義上

，面對如此巨大的精神磁場，要不被吸引是極其困難的。倘若人類沒有這七十多年特別是近四十年的共產主義實驗，也絕不會有今天的脫魔狂魔。因此可以說，共產主義這種魔咒導致的迷狂症，正如天花等疫病一樣，倘若人類從未患過，就不會具有免疫力。因而，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認爲，五四以及之後共產魔咒的興起，也許是中國的劫數，在在難逃。

於是，人們看到，依靠更根本的方面，借助抗戰的機會，中共坐大待機，積蓄武力，借助國民黨戰後的腐敗，共產主義憑藉槍桿，支配了大陸。

作爲現代魔咒，共產主義迷狂最充分的表演，還是在它與權力溶爲一體之後。

一九四九年之後，「政教合一」，共產主義魔咒變成了中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教。

在這種國度，統治者掌權的合法性溯源於他是否這一魔咒的持有者（即是否馬列主義者）。實質上，倘若壟斷了魔咒的解釋權，也就獲得了統治的合法性。由此，我們很容易理解，何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切行動和言論都必須訴諸共產主義諸先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而且，闡釋上述先知的符咒有愈益簡化的趨向。因爲只有簡單明瞭，訴諸情感的咒語，才可能造成廣大範圍的號召力，產生群體催眠的效應，陷入精神的迷幻。魔咒的另一基本功能在於，它在人類的精神與外在現實之間築起了一道人爲的屏障。這一魔障使人類無法直達現實，不能獲得正常的判斷力。中邪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被引導透過這一魔障去觀察事物，從而使萬物染色並變形，乃至脫離了常識。人們當記得，透過這一魔障，人們是如何虔誠地相信水稻畝產十三萬斤，以及老教授比工農更無知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脫魔」也就是摧毀這一魔障，使人們重返實在人間。

當然，任何熱狂都有退潮的時候，魔咒的

催眠時間更不是無限的。畢竟，人類的基本感覺（吃、穿、住、行）是無法由魔障全面隔絕或消解的。當餓腸咕嚕時，任有念念有詞的精神魔咒也敵不過一頓美妙的晚餐。而共產魔咒的致命傷恰恰在於，它的實踐證明它無法提供「美妙的晚餐」。

這就導致了它的衰亡。

共產黨國家在經濟上的潰敗是二十世紀這一主要神話破產的基本原因。自然，它也是剝奪公民基本人權之後的邏輯後果。為了挽救這一魔咒消亡的命運，十幾年來，共產世界興起了一場場的教義改革運動，這場改革使共產主義諸位先知之間發生了分裂和格鬥。最先被逐出局的，是斯大林這個先知，然後是先知毛澤東的神聖性被貶值，往後受到挑戰的是恩格斯，目前輪到了列寧……，掌權者們節節後退，「回到馬克思」一度成為部份念咒者的響亮訴求。於是，共產教義的原教旨主義應運而生，他們力圖挽救共產神話被脫魔的歷史命運。

然而，原教旨主義並未表明它在解決基本經濟問題方面有任何特別高明之處，並且，根本的困難還在於，盡管節節敗退，但是原教旨主義仍有一道基本底線不得逾越。他們以魔咒掌權，因此，盡管任何其他東西皆可變，但魔咒的稱號不能變。原因在於，一旦放棄了這一名稱，他們的統治合法性也就喪失了。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魔咒體系內的改革派們盡管咬緊牙關忍痛割愛了許多過去被視為神聖的內容，但最終仍然祭起了那最後的四道魔咒——四個堅持，絕不退讓。這並非表明他們真心相信或欲竭力維護四個堅持的具體內容，因為那些內容（如：何謂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其實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要害在於他們欲堅持的，是這些魔咒必須對人們享有支配權，以及他們自己必須享有對魔咒的壟斷權和解釋權。這是他們的四塊通靈寶玉，權力基礎，萬萬丟失不得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經過去

年的歷史性劇變之後，共產神話的世界性脫魔前景業已呼之欲出了，其結局，連瞎子也能看見；其喪鐘，連聾子也能聽到了。美籍日裔學者 FRANCIS 福山較早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趨勢，並聳人聽聞地用「歷史的終結」來為時代命名。我想，就將來相當一段時期的歷史大勢而言，福山是具有洞見力的。但是，「歷史的終結」這一用語畢竟有嘩眾取寵的黑格爾主義之嫌。誠然，共產神話在世界史上的破產是無疑義的，然而，鑒於在科學昌明的時代竟有約一半左右的人類被這種烏托邦魔咒催眠達一世紀之久的事實，鑒於歷史上曾經反復出現過的人類迷狂的同期性循環的事實，我們不能不對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弱點和難於駕馭的本能懷有深深的警惕。試想，在若干年或若干世紀之後，當對手已消亡，當大部份人厭倦了平淡無奇的自由民主體制下的生活時，有什麼超自然的力量能夠擔保人類不會再創立一套嶄新的咒符並再次掀起世界性的烏托邦狂熱？這類同期性的漲落在世界史是屢見不鮮的。

記得本世紀初葉，馬克斯·韋伯斷然向世界宣佈：「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世界理性化、智能化，特別是脫魔化的時代……」我注意到他演講的時間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他何曾料到，就在此時，一種新的魔咒已經潛入並支配了俄羅斯大地，一場世界性的入魔迷狂已經開始蘊釀了。

明慧如韋伯者尚且如此，福山憑藉什麼靈感來保證自己不重蹈韋伯覆轍呢？

沒有任何東西能一勞永逸地保證自由的確立，唯有永恆的警惕和不懈地抗爭。

共產主義神話在二十世紀的肆虐，給予人類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或許是：凡是借助理想王國的美好訴求以批評現存秩序者，倘若這種理想世界是理想家構思設計出來的，並非自然生長演化起來的；假如它從未曾在現實世界試驗過，那末，最穩妥可行的辦法是如實地把它視為一種批判力量、淨化力量和改革力量，從而

促使現存社會的良性變遷。倘若把該理想王國當作某種必然歸宿和正面目標來狂熱追求，並不惜任何手段強制實施革命性總體動員，則對人類往往是一場血腥的悲劇。簡言之，各式各樣的烏托邦，作為批判性的因素是富有價值的，作為肯定性的目標是極其危險的；作為遙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它具有淨化現實社會的作用，作為在現實人間強行施工的天堂藍圖，則這條通向天堂之路往往導致地獄。

這是人類從共產主義神話中獲得的歷史智慧，簡單而樸素。但是，凝結在這個單純的智慧和背後的，却是七十多年間數億人的生命、鮮血和熱淚！



## 社會主義的六個奇跡

- 一、沒有人失業 但沒有人工作
- 二、沒有人工作 但大家都拿薪
- 三、大家都拿薪 但買不到東西
- 四、買不到東西 但我們擁有一切
- 五、我們擁有一切 但沒有人滿意
- 六、沒有人滿意 但還要堅持社會主義

# 我們不得不改變方針

越人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大潮都是由學生運動引發的偉大歷史事件。在迎接下一個民主運動高潮到來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研究一下學生運動的特點。這裡向大家推薦一篇題為「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的文章，作者羅家倫，五四運動著名學生領袖。該文寫於一九二〇年，為紀念「五四」一週年而作。文章對於學生運動弱點做了極為深刻的反思，而這些弱點與七十年之後的情形有驚人的相似。

「萬能」的結果是「萬不能」

羅家倫認為，學生運動有致命性的三大弱點。一是「萬能的觀念」。此種觀念表現為易被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以為學生「什麼事都可以辦，所以什麼事都去過問，什麼事都要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而且目標不專，精力不粹，東衝西突，自己弄得精疲力盡，而敵人也得乘機而入。」實際上，把如此一個「福祿腐敗、草味蒙塞、百孔千瘡」的中國交給誰也是辦不好的。盡管學生有把中國弄好之素志，若把全部政權交給他們手裡，他們怎麼辦呢？羅家倫捫心自問：「我們自己對於全國的財政，能有什麼整理的方針；對於全國的教育，敢有什麼具體的計劃；對於全國的實業，研究出了什麼通盤打算的企圖；我們自己的選舉都辦不好，有什麼妙策可以整頓全國的選舉；我們自己的評議會都往往不足法定人數而且討論不得要領，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組織強有力的議會……」羅家倫坦白說他在運動中每逢一往直前，興高采烈的時候，一想到這些就不覺汗流夾背。因而在文章中反省道：「我們自己萬能的結果必至於萬不能。所以，我從前總覺政治沒辦法。後來我覺得社會沒辦法，最後覺得我自己沒辦法。」

以此點來對照，不難發現這與八九民運中學生們的表现簡直如出一轍。學生們似乎覺得自己是最純潔、最徹底的民主派，誰都不願聯合。不但不主動同工人、市民聯合，而且在自己失掉對運動方向的控制力後拒絕同政府中的改革派合作。正是學生的這種幼稚的「萬能」意識使自己陷於孤立，從而使保守派有可乘之機，導致了最後悲劇的發生。不知吾爾開希、柴玲等同學是否曾有過當年羅家倫那樣的自知之明，希望他們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

謹防「思想之破產」

二是「學術的停頓」。五四與六四有所不同，五四是以勝利告終。但有得必有失。羅家倫描述道，「五四的時候，我們幾乎做什麼有什麼人；到了現在，做什麼事也都沒有人。」這種情況，倒是同我們這次海外的民運經歷有相似之處。什麼原因呢？「難道以前熱心做事的，現在都不熱心了嗎？難道以前出來的，現在都厭倦了嗎？難道除此之外沒有人上來補充嗎？」回答是「不盡然」。羅家倫接着分析道，「須知五四運動的成功，並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事前已經醞釀許久了！大家有幾年的郁積，幾年的休息，正是躍躍欲試的時候，陡然一下爆發出來，所以智者盡其智，勇者盡其勇。現在經過一年之久，以前的儲蓄，一齊發洩盡了。加之一年以來，大家的的生活，都是奔走呼號，東聲西應，對於新的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那裡還有再傾倒出來的呢？所以我往往見到北京的同鄉人，北京的同鄉人說『不得了，沒功夫讀書』；見到天津的同鄉人，天津的同鄉人說『腦子空』；見到上海的同鄉人，上海的同鄉人說『無法想』。可見感受知識的空虛，不夠應用，是各處一樣。」羅家倫警告說，「我們若是長此下去，不但人材破產，而且大家思想一齊破產。」

這一段話對於我們認識學生運動局限性有

所啟發。大多數學生不可能長期地專門從事民運活動，而民主文化的建設則是一項長期的工程，需要各種各樣的專業人材。方勵之先生一貫倡導大學生應首先在所學領域中有所建樹，然後才能擔當好作為知識份子角色。現在民運已進入了低潮，我們學生的首要任務便是讀書，和為下一次高潮的到來作思想上的準備。人人都做職業革命家是不現實的。

並非「什麼事情都要有表示」

學生運動的第三點弱點是易於「落於形式的窠臼」。羅家倫分析道，「當五四的時候，大家東謀西劃，都有一種創造的精神，而如今則一舉一動，都彷彿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來，一定要打一個電（報），或是發一個宣言，或是派幾個代表，而最無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行。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則一方面因於萬能的觀念，無論什麼事都要想有一種表示；一方面又限於思想破產，想表示也想不出什麼表示的方法。於是在無法表示之中，想出一種無聊的表示。」羅家倫強烈地建議「我們此後實在不能再有這種無聊的舉動了！如果沒有良好的辦法，僅可以不表示的；倒是不輕易的表示，還可以養成自尊。若是輕易表示，則不特社會習以為常，喪失我們表示的信用，而且謀害我們的人，也就可以預先想好辦法對待。」

這段談論與萬潤南先生所主張之民陣「蓄勢待發」戰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回顧八九民運，學生們一方面創造了許多新的鬭爭形式，如絕食、對話、豎立民主之神像等，起到了積極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難免陷於形式的窠臼，例如天天遊行，使其喪失了威力；長期靜坐，使北京市民支持不起。

不能濫用市民的同情心

羅家倫在分析了學生自身的弱點之後指出，社會對學生運動所持態度的改變也是導致該運動脫離群眾而致失敗的重要原因。具體說來，社會對學運的態度有三種變化：第一，學生的地位因初戰告捷而被抬得過高，而各界希望於學生的也愈大。學生在虛名底下其實離離，這是最危險的，因為社會把學生抬得愈高，對於學生的責難也就由此愈甚，因為對於學生的希望愈大，所以弄到後來失望愈多。第二，社會在凋敝之餘，有人心厭亂之勢。一則市民的思想當然比學生和緩，不徹底；二則當喪亂之秋，他們的生活也有種種實際困難。學生如不體諒這些，而濫用市民的同情心，必失去支持。第三，在運動開始時學生被認為是社會的一份子，所以同情者多，而到後來，學生「恍惚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而且這個特殊階級，往往什麼事都過問，並常常站在監督和指導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也就不不能另眼相看。」因此學生便不再得到同情，而終究不能不歸於失敗。因為另眼相看固然是尊敬，而「尊敬的背後，同時就有嫉妒兩個字呵！」

接着，羅家倫指出，只知道做「群眾運動」是使學生自身的弱點和社會態度的改變達到「圖窮匕現」的原因。他認為群眾運動只不過是各種社會運動之一部份，並不是唯一的運動形式。而把其他運動一筆抹煞，只知道做群眾運動，實在錯了。另外，做群眾運動也得明白群眾的心理才能發動得起來。羅家倫總結群眾運動有三個要素：(1)群眾是有情性的，他們必要等到認為「只須一舉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五四時提出罷免曹、陸、章，群眾本以為只要政府下一個命令就可以馬上辦到，但後來全國罷課、罷工又罷市，一直鬧了七天方才罷免，也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在八九民運中學生不提「打倒共產黨」而只提「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是明智的。這樣不僅有利於發動黨內群眾參加，而且使大家覺得容易辦到些。(2)群眾運動的口號要簡單，最好

口號本身，不用再解釋。如果運動的口號一定要使人轉個彎去想，這運動就很難成功。羅家倫舉辛亥革命為例說，其所以會成功和大家捨身去死，是因為他們的公式很簡單；「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滿州政府——推翻滿州政府中國就會好」。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起來，也是因為「除賣國賊」幾個字本身是不用解釋的，而另一口號「直接交涉」四字，本身就要費許多解釋，便成為運動的一種障礙。以此來反思八九學運提出的「民主、自由」口號，就不難理解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口號太抽象、空洞，群眾不知道學生到底要什麼，還不如提「開放報禁」、「自由選舉」之類的口號好些，如能再具體則更好。(3)發動群眾運動必定要一種極大的刺激。因為既然說到群眾運動，就當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賴乎極大的刺激。感情的刺激常同同情心和犧牲的精神聯繫在一起，如八九民運中絕食、堵軍車等。

### 群眾運動的危險

群眾運動也有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因素。羅家倫分析道，群眾運動的好處在於「大家分開來想不出辦法的時候，合攏來的思想就湊成一種辦法，分開來不敢做的事情，合攏來的勇氣就可以鼓勵去做。」然而，真正的群眾運動，是要不但能合起來做，而且要能合起來想的。但是，令人感慨的是，「中國的群眾運動只能合起來做——有時不免亂做——而不能合起來想的。這是最危險的一件事！」而其所以構成這種種危險的現象，有三點原因：

一、群眾沒有組織，往往一哄而散，是最不好的情形。而且開會的時候，沒有訓練，對於開會的規則，一點不能遵守，而且一點都不知道，如何能得一個集合的思想，生出良好的結果來呢？

二、個人的僥倖夾在群眾裡面，實在是很

不好的事。老實說，群眾運動所以不及個人運動之點，也在此地。因為個人運動的個人必須先有自己一定犧牲之決心，才去做這種運動；至於群眾運動雖然不能保沒有危險，但是個人可以僥倖而免的。譬如我參加一次遊行大會，雖然也明白難免與軍警衝突，但是衝突起來首蒙其難的，不見得一定是我；至於將來衝突而我適首蒙其難，也不過是我「偶爾的不幸」罷了！我雖然不敢斷定作群眾運動的都有此心，而此心實群眾的一種背景，為心理學上不可免的事實。況且當群眾集合的時候，個人激於僥倖心而發不負責任的言論，毫不過問成敗事與否的，多得很呢？

三、領袖的投機實在是在當今作群眾運動最危險的事。人類的奮發，多少帶點虛榮心的色彩，而在群眾面前的表現尤甚。當這個無組織無訓練的群眾之前，最危險的就是群眾的領袖，不能有正當指導群眾的能力，而看見群眾稍微有一點向哪方面轉動，就立刻見風駛蓬，博一時的拍掌。況且當群眾運動的時候，愈是「似是而非」的話，愈有吸引力。而其結果，往往開到不可收拾為止。至於群眾的領袖聚攏來開會的時候，不問時機，不問環境，不問籌備，而只是想由自己譁譁烈烈生出一點事來，以博得群眾一時的歡心，而不辜負自己這番會議。這也是一樣的投機，其結果亦至於不可收拾。

最後，羅家倫總結道：「群眾運動雖然有許多優點，也有許多弊端，而在未成熟的群眾運動為尤甚。所以群眾運動決不是我們唯一的方法，我們不能不改變方針了！」當前，怎樣使我們翹首以待的民運高潮在汲取四六教訓的基礎上成熟起來，不再重蹈五四以來學生運動失敗的覆轍，應當成為我們大家思考的課題。



# 希望不再紀念「五四」

亞衣

一年一度春風柔。各式各樣的人物又在想着用各式各樣的方法紀念「五四」了。我也在想。想的一個問題却是：何時我們能不再紀念「五四」？

(一)

人真了不起。人會把一個人（例如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變成神，也會把一件事（例如某個革命運動）變成神。於是，諸神們一一凌駕於活生生的人之上。一批又一批的個人在神的陰影下生活和思想。哲學上，這叫「異化」或「疏遠化」（ALIENATION）。

首先把「五四運動」編入「中國聖經故事」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是毛澤東。把們把「五四」說成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準備和思想準備（包括新文化運動）。五十年前毛澤東就宣佈五四運動的方向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這個方向一直被堅持到六、七十年代百千萬知識青年超大規模的上山下鄉。五月四日還是中國的青年節。它成了共產黨改造青年學生的好機會。

(二)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共產黨領導人害怕紀念「五四」了。一九八九年四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的一個議題就是如何對付即將到來的「五四」。

而在另一批人群中，紀念「五四」的興趣

却越來越濃烈。不過，「靜默三分鐘，各自想拳經」。有人着眼於思想啟蒙，聲言亟需一次新啟蒙運動，呼喚人們的憂患意識；有人落筆於文化傳統，或倡導新儒家，或盼望再來一次「打倒孔家店」；有人直言借助波瀾壯闊的民主政治，沖刷現今中華大地沉重日加的污垢；更有人試圖重新揮舞那民主和科學的兩桿大旗，為今日的政治改革裝置新的助推火箭。總之，現實感都很強，政治針對性也大多明顯。

雙方心中都有數。當權者更害怕。

一九八八年初，離開紀念「五四」七十週年還有一年多。各路雜誌、研討會已經在約稿、組選題。許多人在莫名其妙地盼望着那一天。

這一天竟然提前來到。結果是「五四」之後加了一個「六四」。又一個失敗的紀念。我真擔心再來一個「七四」。這種紀念日太多，中國人吃不消。

(三)

「五四」運動和天安門緊緊聯繫在一起。人們一說起「五四」，總會想起天安門廣場。提起「六四」也是。

天安門廣場太大，世界第一。西歐北美國家的首都廣場暫且不說，連得如此遼闊廣大的俄羅斯，她的首都莫斯科的紅場，也只不過是一條稍寬一些的街。廣場越大，民主越小。這是我的怪論之一。因為現代民主政治不是廣場民主，街頭民主，而是議會民主、廟堂民主

。民主要討論，幾十萬人的廣場上如何討論？民主要表決，人山人海之中何以表決？

一次理論討論會上，一批人在爭論：八九天安門廣場運動是「民主運動」，還是「爭取民主的運動」，還是「反對不民主的運動」？起因是對「什麼是民主」的理解。真是個難題。

難題沒完全解開。但人們大致知道了實施民主本身與爭取民主的過程不全是一回事。

幾年前看到大陸報紙採訪復旦大學歷史系名教授周予同。這位歷來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統戰對象原來是「五四運動」參加者，火燒趙家樓的勇士之一。當然的民主先驅者和革命鬥士！「歷史跟歷史學家開了一個大玩笑！」當時記者不無感嘆地說。時至今日，我心中冒出另一個大問號：民主是否需要火燒？或者說，火燒算是民主嗎？（掀餐桌、砸玻璃當在此列）

(四)

饑饉們喜歡畫餅。因為沒有民主和科學，所以對七十年前「五四」請出的這兩位先生愈加心向往之。倘若我們身處廣泛的民主政治和昌明的科學環境之中，那麼，也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動力再去做各種紀念了。國家強盛之日，肯定不必「外爭國權」，國內政治清明，也無須再「內懲國賊」。

我最怕看到人們悼念親人，因為那時總有人傷心地痛哭。我曾經主張只紀念誕辰，不紀念忌日。而「五四」就像一個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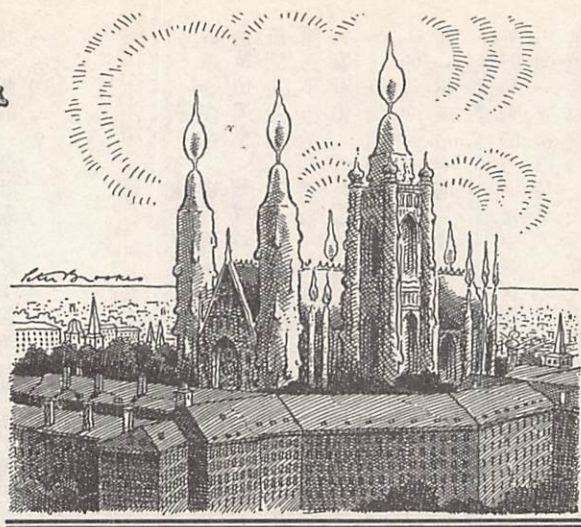
中國有許多節日可資紀念和慶祝。元宵、端午、中秋、重陽、還有那春節。再可以加上一些外來的如聖誕節、父親節、母親節，以及有許多人手捧鮮花的情人節。

紀念勝利，不紀念失敗；紀念誕生，不紀念死亡。我知道這是近乎童稚的幻想。但我還要等待這個時代：中國人不再紀念「五四」。

\*

## 東歐觀潮

楊漫克



「以革命的名義」，造成暴力傾向肆虐，經過半個多世紀、三次流血復辟和重建共和，方始革命的原始目的得以完成；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曾引導歷史潮流，席捲整個人類，貫穿二十世紀達八十多年之久，然終未能按其先師馬克思、列寧的設想，達成一個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相反，共產主義制度以獨佔真理和武斷理想的極端方式，在二十世紀的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中，留下專制暴政最後一頁醜惡的插圖。

從中國的六四慘案到羅馬尼亞的聖誕節革命，在破的方式上，八九年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既有絢爛多姿的風采，又帶着暴力的血腥氣。中國學生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東德的燭光遊行，捷克的天鵝絨革命，羅馬尼亞的起義槍聲，這些事件的深刻社會內涵和歷史價值，尚有待人們進行認真的總結與回味，汲取豐富的營養。

在東歐各國的社會變革中，不同社會階層的角色功能，更具現實意義，亟待研議。本刊通過在東歐革命過程中的實地考察，作出如下總結：即波蘭的工人，捷克的學生，匈牙利的改革家，羅馬尼亞的士兵，東德的難民。他們在各自的特殊國情中，充當了打破舊制度的關鍵角色。這個總結說明，在東歐社會變革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所謂「中產階級」或「知識精英」這樣的必要社會條件或政治角色。

自三月十九日東德率先舉行議會選舉，整個東歐正在從世紀性的革命震蕩，踏入民主程序的運作和公民社會的重建。她的變遷與成長，較之前些時候的革命，更為吸引舉世的關注。因為，正常民主秩序或者說民主文化的確立和重建，遠比打破舊秩序的革命更為艱巨而且具有關鍵的意義。

「破」易「立」難。

人類歷史上歷次重大的社會轉型，無不說明這樣的道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

在考查東歐這場偉大歷史變革時，值得提

醒的是，我們絕不可忽略事變的另一面——共產黨的重要角色，即它的政治妥協功能與角色。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的碩偉貢獻，顯然已確立了他在歷史上的空前地位。他的這種地位，不僅遠遠超出其前任列寧或斯大林的業績；而且可以說，在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偉人，不用征戰封疆，不必著書立說，便能使自己載入史冊。形象地說，戈爾巴喬夫的偉大，恰恰在於他能夠使一個龐大的超級帝國「自動退出歷史舞台」而獲甦生。

在時間順序上，八九年共產世界的革命始於波蘭。曾經在八一年血腥鎮壓工會運動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於去年四月與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舉行妥協談判，不僅拯救了波蘭，而且也拯救了自己。這個當年在沾上血腥的劊子手，因審度潮流，及時妥協，終得以繼續作象徵意義的總統，而保持晚節和安祿無憂。他雖不及戈爾巴喬夫那麼偉大，但却同西班牙的卡洛斯王子一樣，擁有值得欣賞的政治聰慧。

「改革之國」匈牙利亦給予人們恰當的啟示。以波茨蓋和涅什為首的共產黨改革派，在四鄰皆陷入革命危機的當口，順應潮流，改共產黨為社會黨，放棄共產主義。在東歐諸國中，唯有匈牙利及時避免了社會動盪，以和平的方式順利完成了權力轉讓和社會變遷。人們不得不讚許的口吻說，這是一個歷史的傑作。

從二一五年英國皇室與貴族妥協的「大憲章」起，民主政治便具有一種超越人性惡質而難於運作的特徵。統治者在需要退出歷史舞台時，必須在生存與妥協之間作出抉擇。戈爾

巴喬夫、雅魯澤爾斯基、波茨蓋以及東歐諸國的其它共產黨人，做了正確的抉擇，國家、民族與個人均得以保全。否則，我們不妨再看看相反的例子，羅馬尼亞的暴君齊奧塞斯庫身敗名裂，遺臭千古。中國的昏老太上皇鄧小平前功盡棄，躲到西山的地道裡亦食寢難安。曾經風雲叱咤的政治家落到今日的田地，哀莫大於此焉。

截止四月初，東德與匈牙利兩國完成大選和初選，兩國的政治未來已見分曉。其結果具有普遍意義，略作評述如下：

——一黨專制束縛解除之後，東歐各國雖然革命的方式、角色及文化特徵各有不同却均能順利納入民主政治的軌道，迅速完成代表社會左右利益的政黨重建，呈現出一個排列完整的光譜式順序。各國都出現了右翼的自由黨，中間偏右的社會黨，以及左翼的共產黨。社會各種利益獲得體現的渠道，是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東歐各國以這種驚人的速度完成政黨政治的重建，顯見以往各種「經濟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假說，未必符合實際，而造成共產黨世界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就是專制制度對民族活力的束縛。

——一旦一黨專政壓抑解脫，社會將出現巨大的反彈效應。人民在大選中自由選擇時表現的意志，是一步跨入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而不願意考慮任何形式的「過度形態」，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東德和匈牙利的選舉結果，皆是代表右翼的黨派獲得壓倒性優勢。

——共產黨在已完成的或即將到來的大選中，皆不可避免地敗走麥城，充當左翼反對派的民主角色。不論它在社會變革中發揮過多麼重要的作用。如前述，匈牙利共產黨的改革派在事變中起了主導作用，仍然未能避免排除於前三名之外的結局。這雖然顯得有欠公平，但

却是不可改變的合理現實。共產黨今後當修習民主政治下的生存之道，而民主政治的公平競爭原則，對共產黨亦不可例外。

——東歐各國順利過度向民主政治，除了衝破舊制度束縛，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多歐東歐國家在長達四十年的共產制度下，並未停止過反抗專制的公開或地下運動，形成了與當局專制文化平行的反對派地下文化。波蘭、捷克大選前便迅速建立了非共產黨的看守政府，用捷克七七憲章人士的話說，從民心而論，我們早已統治了國家。

東歐各國建立平行對壘的地下文化，其經驗與方式值得中國民運記取。在捷克，以哈維、瓦楚雷克等人為代表的社會精英，多年來堅拒與共產黨合作，進入「體制內」從事改革或改造，而是堅定地置身於「黨外」，定位於民間，藝術家寧願幹苦力而拒不演出，學者寧願失業而拒絕為共產黨工作。他們還植根於國土，寧願入獄而拒絕當局驅逐出國的政策。這些可貴的素質是培植地下文化不可或缺的。

東歐各國多數目前已基本完成革命和重建政治秩序的前兩步。唯先聲奪人的波蘭和暴力革命的羅馬尼亞，仍然因未能徹底擺脫共產黨色彩而潛伏着隱憂。

由於在非常時期首先進入權力，波蘭團結工會與共產黨共組了聯合政府。然而隨着形勢的發展，這樣的格局已經不再被人民所接受。瓦文薩最早的顧問沙諾斯基教授接受訪問時表示，他已經組織新黨反對聯合政府，提出「不要麵包要自由」的口號。團結工會的馬佐維斯基總理，更由於要求「蘇聯長期駐軍以防德國統一的威脅」而倍受抨擊。加之經濟危機，波蘭正面臨空前的困難。

羅馬尼亞革命後，由受迫害的前共產黨「老幹部」組織的救國委員會，正遭遇人民自下而上的反對，因為是他們曾經身為共產黨員。

臨時總統伊利斯庫因名字的「庫」字與齊奧塞斯庫相同，便被激進的學生判為「帶庫字的都不是好人」。救國委員會執政後，首先宣佈共產黨非法，而後宣佈共產黨解散，後再宣佈由三十八政黨共組臨時國會，仍不足以平民憤。羅馬國首都無日不有示威，士兵白天執勤，晚上也去示威，導致起義的國防部長米里塔魯下台。革命後的羅馬尼亞，仍然處在極其危險的動盪之中。

然而在大氣候下，波蘭與羅馬尼亞勢將通過近日的大選，將共產黨徹底清理出局。那裡的共產黨不再具有抗拒力。故度過了政治重建階段的東歐，在未來歲月裡，只剩下經濟重建和種族問題兩端障礙。

在經濟方面，盡管有理由懷疑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難度。但仰賴西歐強大的經濟實力與支持，東歐的經濟問題有望獲得有效的解決。西歐尋找到最好的投資市場，歐洲的整合已經不再是夢，歐洲的復興業已成為可以預見的未來。需知，舊日東歐的改革之所以困難重重，乃由於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困限，東歐將迅速走出改革的迷宮，徹底實行自由政策和市場經濟。

種族問題一直是歐洲的歷史夢魘。兩次世界大戰導致歐洲版圖的重劃乃是根據戰爭的輸贏和政治的實力，而非以民族、地緣為依據。四十年前，波蘭西部三分之一的國土原屬德國，羅馬尼亞北部三分之一的國土原屬匈牙利。而蘇聯波羅地海三加盟共和國，本來都是獨立的本體。歐洲文藝復興後興起的「民族—國家主義」又一次圍繞着歐洲的安寧。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民主的副作用，一個由專制向自由過度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歐洲統一「利益—區域主義」已現出一線光明，將有助於克服目前圍繞着東歐和蘇聯的種族和領土問題。

# 蘇聯： 莫斯科聳起民主牆

楊漫克

在專制文化和孕育偉人的俄羅斯，戈巴喬夫像彼得大帝那樣，以強力推行民主，為了不讓人民酗酒，他下令酒廠減產，結果酒鬼們去喝香水……

莫斯科新聞報言論開放，異軍突起，報紙沒有紙張，貼到牆上，却造成了異見人士發表政見的民主牆……

蘇維埃本是專制的機器，但薩哈羅夫和葉立欽在其中利用程序，創造空間，終使紅色帝國變色……



二月十九日，從東柏林乘飛機前往多年嚮往的神話般的城市莫斯科。飛機用了四個小時，這是拿破崙當年用了一年時間，希特勒用了半年的時間，以士兵屍橫俄羅斯原野的代價走過的部份。

對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俄羅斯文化是人們所能接觸的唯一精神養料。「三套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比「工人階級是火車頭」要上口、樂耳得多；列賓的「伏爾加牽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大氣雄渾的俄羅斯精神，慰藉了一代中國人苦難的心靈，滋潤了窒息空氣。

俄羅斯畢竟是俄羅斯，在二十世紀的挑戰面前，它比中國做得漂亮，這不是什麼時運。中華民族的歷史太久，包袱太重，而在當今的世界上，除美麗堅外，俄羅斯是最年輕（四百年）富有活力的民族。

俄羅斯是孕育世界級偉人的搖籃。三百年前，彼得大帝以法國為率，下令貴族們剃鬚鬚以昌文明，違者斬首，使俄羅斯成功地應對了西方的挑戰，步入近代文明。而今，戈爾巴喬夫下令限制生產酒品，以消除蘇維埃的生產低效率。

一到莫斯科，便感覺到蘇聯的特質。與東德人的紀律和效率相比，蘇聯人顯得笨拙而沒有邏輯。由於啟程倉促，我同傑克都未辦入境簽證，被海關扣查半小時。本來按法律，我們應被遣返回出發地，但我強調辦簽證可以不惜代價付美金後，他們軟化了。傑克付錢後，我們就找我要錢辦簽證。我說我持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護照，不需簽證，第一個官員被打發過去，但第二個官員却靈機一動，非要我交錢不可，辯稱沒錢可以不辦簽證，有美金則一定要辦簽證。真是法律不照辦，現管說了算。

蘇聯的外匯管制經過兩年開放，可謂一場混亂。美金與盧布兌換率官價一比六，黑市價高達一比十五。但同時所有需要花外匯的地方，則又變成二比一。本來我們住的旅館只八十美金一夜，後來通過「香烟外交」，現管同意我付盧布，却成了九十九盧布，按黑市算不到十美金。

十九日下午，我找到了莫斯科大學的資深漢學家羅曼諾夫先生。他向我介紹了蘇聯改革的基本情況。

目前，蘇聯的政治分為兩大派勢力，一方是黨的官僚機構和保守派；另一方是倡導西式





列寧墓衛兵的閱兵禮

民主的改革派。戈爾巴喬夫則周旋於二者之間，受到兩面夾擊，但却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擁戴。以新思維對待七十年共產制度為社會遺留的老大難問題。

羅曼諾夫透露，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個人作用對八五年以來的改革固然舉足輕重，但他只不過是順應了潮流。真正起根本作用的，是黨內和蘇維埃大會中的一群思維激進的人士。這一點，後來許多人都同感，只是戈爾巴喬夫更為外界所熟悉。

在最高蘇維埃中，如同美國的國會，分成許多不同功能的小組，如人權小組、憲法小組、民族問題小組等。但以著名人權活動家薩卡羅夫和前莫斯科市委書記葉立欽為首的激進派，則在大會中成立了一個「區間小組」，跨越各組，時常提出各種議案要求蘇維埃解決具體問題。逐漸的這個小組影響了越來越多的代表，成了蘇維埃中最強大的政治實體，如同一個獨立的黨派，人數達二百多人。

他們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超過戈爾巴喬夫的作用。例如，取消憲法第六條

的動議，便是由他們提出來的。但在前一次大會上，戈氏迫於保守勢力的壓力，曾發言表示應維持黨的領導，結果沒能通過，但在今年一月的大會上，終於還是被通過了。

目前在最高蘇維埃中，除了已改的羅卡羅夫、葉立欽外，尚有沙普切克、阿里哈謝夫等一批驍勇的健將，在推着戈爾巴喬夫向前走。

對於戈爾巴喬夫會否因改革開罪於黨的官僚階層而被彈劾的問題，大部分莫斯科人認為無此種可能。莫斯科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學者稱，戈爾巴喬夫正在強化自己的權力，他目前四位一體，自兼蘇維埃主席、黨的總書記、俄羅斯黨書記、軍委主席，還有憲法改革小組主席等多項職位。現在共產黨的獨裁地位被取消了，戈氏又順理成章地將成為蘇聯的第一位總統，按規定一屆做五年。

另一個原因是戈爾巴喬夫成功地運用了平衡政治藝術，常常不去直接面對保守派，而是有意無意地培植一些改革派的政治對手，使自己顯得中規中矩。最明顯者如葉立欽。但事實上，誰都看得出來，戈氏是最大的改革派。

第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風格在外界看來很石破天驚，但在蘇聯國內，並未發生過觸及靈魂的革命。例如，五年來，改革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很多社會方面沒有受到影響。人們意見最大的是官僚特權五年來依然故我。戈氏的策略似乎是，一直在創造改革的環境和影響，而未在實質上向制度和特權階層挑戰。對此，人們見仁見智。我覺得，以現在的結果來看，戈氏的策略是成功的。他着力於條件的成熟，而不急於冒進，因此穩操勝算。例如，他先在東歐各國煽風，把火點起來，然後再引向蘇聯自身。

蘇聯社會的變化是最近一兩個月的事。例如蘇維埃中成立了一個「反特殊化小組」，開始觸及官僚特權的利益，這個小組甫一成立，立刻下令取消政府的第四局。這個局是一個管理高檔物質如藥品、短缺商品的部門，專門供應黨政官員。現在這個局已被劃歸兒童部，所有賤售商品讓兒童，而不是高幹優先佔有。

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我注意到普通的基木生活用品還是很充足的，只是品種不夠豐富。例如蘇聯人最喜歡吃的魚子醬。在五十年代是五個盧布一公斤紅魚子，現在却是一百四十盧布一公斤。這個價錢是蘇聯普通人半個月的工資。但生活必須品是相當便宜的。例如手錶二十五盧布、皮包三十盧布，按黑市只有兩、三塊美金。

在採訪中我感覺到，與其它東歐國家比較，蘇聯相對開放程度是最低的，他們對外國人很冷漠。在紅場我們向十幾個人請求交談，都被拒絕。對於未來，無論老百姓或大學教授，都缺乏基本的想像力，好像一隻鳥在籠子裡關久了，放出來後已不會飛。蘇聯目前的政治變化，對中國人而言，真是振奮莫名，但許多蘇聯人似乎沒有任何感覺。他們不大相信，沙皇和共產黨長期塑造的俄國的現實，未來會有什麼變化。

然而，這個社會已經開始了一場大變革，

而且會日益兇猛，震撼世界。通過走訪「莫斯科新聞」報和它創造的「民主牆」，我對此是堅信不移的。過去，蘇聯言論大膽的報刊，當屬「火花」雜誌和「事實與論證」雜誌。但近一年來，「莫斯科新聞」異筆突起，獨佔鰲頭的左側，是莫斯科第一家美國麥當勞店，右側便是「莫斯科新聞」社址。他們經常將報紙貼在牆上，結果吸引了各方異見人士到此，將不能在報上發表的材料也貼到此處，形成了一塊「民主牆」。

訪問「莫斯科新聞」負責人瓦洛維茨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問：「莫斯科新聞」受到讀者的歡迎，你們怎樣把刊物搞起來的？



莫斯科新聞報負責人瓦洛維茨（左）接受本刊採訪。

普西金廣場是莫斯科政治中心下圖為普西金塑像，左下圖為莫斯科新聞報前的民主牆

答：我們的週刊已有近四十年的歷史，過去屬於「對外友協」，國際新聞很多，但無甚特色。八五年以來，我們開始言論獨立，立場新銳，現在發行量已達一百五十萬份。除俄文外，還有英、法文版。由於國家紙張短缺，我們目前的發行量只能滿足訂戶，在報攤上洛陽紙貴，所以我們把它貼在外面，讓人們閱讀。

問：您對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政治前途有何看法？

答：戈氏是一個富有新思維精神的共產黨領袖。他很穩健，按部就班地引導蘇聯走向民主。但由於改革，他正受到左、右兩種政治力量的挾擊。一部份人認為他走得快；另一部份人認為他走得慢，雙方的衝突在戈氏身上形成了危機的焦點。戈氏自己認為不能走得更快，否則會出現爆炸性局勢。目前，蘇維埃面臨幾個重大的問題：如土地私有、出版自由和廢除黨的行政權力。今年夏天，這些問題會有結果。

問：說不定共產黨會分裂，出現多黨狀態，是不是說，在如此嚴重的難題面前，





葉立欽是蘇共改革急先鋒

戈氏的政治前途也很危險？

答：這是很難預言的。人們希望戈當政的時間長些。如果戈氏在下個月做上總統，蘇聯的國體改為總統議會制，這種蘇聯未來的政局也許會穩定。

問：戈爾巴喬夫有沒有競爭對手？

答：他沒有對手，甚至接近一些對手都沒有。誰也不懷疑未來的總統就是戈氏。除了軍事政變的非常情況，這種可能性不大，沒有人能向他挑戰。

問：為什麼蘇聯的保守派沒有像中國那樣，把搞改革的戈氏搞下台？

答：這主要是由於蘇聯的危機深過中國。中國的經濟改革較早，緩解了部份社會問題。而蘇聯五年來實質性的成就很少，有也是近月的事情。所以，人民的不滿很嚴重，很支持改革。

問：黨的元老沒有想挽救黨嗎？

答：黨內大部份人支持改革，因為不改革，全黨都會毀滅，民族也會爆炸。這好像與中國有所不同。前不久有四個城市的人民示威，要求當地黨的委員會總辭職。因此，蘇維埃大會考慮取消行政黨委制。

問：在中國，軍方常常支持保守派，戈的改革是否有軍隊的支持？

答：在蘇聯，軍隊絕對服從黨，發的政委領導軍隊，軍隊的最高領導是黨的政治局。有一些高級將領不喜歡改革，但也只好服從黨的決定。在蘇維埃中可以看出，中、下級軍官的代表與高級軍官的代表發言不一致。高級軍官不公開反對改革，但中、下級軍官公開支持改革。

問：我聽說，戈爾巴喬夫現在自兼數種要職，這與民主原則相違。我的印象是，戈在用專制的手段推行民主。譬如說禁酒。

答：我想這是臨時的情況。蘇聯還沒有真正進入民主程序。估計戈在作了總統後，將辭去總書記的職務。

禁酒的問題在蘇聯是大問題，戈氏曾責令酒廠停止生產。他問老百姓酒鬼太多怎麼辦？老百姓說禁酒，他就禁了。後來酒鬼們用一切有酒精的東西替代酒，如香水，許多酒鬼因此生病，所以不到一年去恢復了原狀。

問：您對葉立欽有何看法？他好像是改革的急先鋒？

答：我不太贊同葉的一些激進作法。他對一些人與事的批評很過份，不民主。他是黨的書記出身，做過各級黨的負責人，他的作法也許受到經歷的影響。當然，葉在蘇聯的威信很高，在改革派中最激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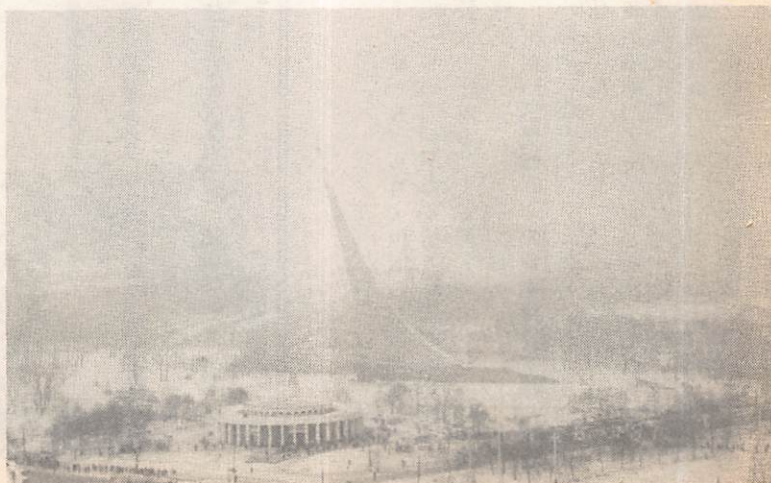
問：他與戈爾巴喬夫的衝突也很激烈，但我覺得這裡邊有一種權宜之機，好像在演戲？

答：戈和葉之間的衝突，主要是葉認為戈的步子走得太慢。戈爾巴喬夫很支持改革派，但對葉立欽很不感冒。

問：改革派中還有那些人較為出色？

答：經濟學家波波夫、歷史學家防美那西也夫，但最出色的是已故的薩哈羅夫。

問：蘇聯民主的前途如何？在歷史上，蘇聯的民主制度只有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的八個月，之前是沙皇專制，之後是共產專制。這



莫斯科一瞥

樣的歷史是否不利於實行民主？

答：我不贊同此一說法。看歷史，日本、拉丁美洲國家都沒有民主的歷史，它們也實行了民主制。智利在經過十七年的專制後，又重新走回民主。這主要是時代的大趨勢。

問：但蘇聯是社會主義，問題更大，如公有制如何轉變成私有制？

答：蘇聯目前尚無這麼做的跡象。東歐只有波蘭這麼做了，也許蘇聯也會這麼做。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效率，不是制度。公有制、私有制都可以搞民主。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人民選擇自己的制度。瑞典、荷蘭、法國都有



戈巴喬夫的威正問題族  
亞人吉魯格為圖革  
威行舉科斯莫在

很大部份的公有制，並沒有破壞那裡的民主制度。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不可一錘定音。

問：目前蘇聯有沒有反對黨？起什麼作用？

答：現在有幾個反對黨，但還停留在宣傳階段，在蘇維埃中沒有代表。但我想一兩年後，俄國將是反對黨的天下。

問：目前蘇聯的民族問題很嚴重，好像一搞民主，大家都乘民主之危。民族問題會否影響到民主的進程？

答：這很有可能，民族問題最複雜，民主社會也沒有辦法解決。我擔心今後可能有一些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

蘇聯憲法上一直明文寫着：「加盟共和國有權利退出蘇聯」。但怎麼退？今後的代表大會將對此進行討論，即三月四日召開的代表大會。現在一部份保守派的代表要保障國家的完

整，而另一部份代表則起來反擊，衝突很激烈。

最困難的還是產權歸屬問題。在那些加盟共和國，有很多大企業是屬於蘇聯全國的，而不屬於加盟國。目前尚無計擺平。

問：請問您對中國問題怎麼看？中蘇改革是否有相似之處？

答：我和許多蘇聯人全心支持中國青年的民主運動。在六四時，許多蘇聯學生批評戈爾巴喬夫沒有適時地表态支持中國學生。「莫斯科新聞」譴責過中國政府，也譴責蘇聯警察在格魯吉亞的暴力，那裡有十九人在示威中被打死。

但戈爾巴喬夫在去年五月訪問中國時，曾對中國示威學生表示關注，結果中共領導人却說：「那是我們的內政」。蘇聯的報紙都刊登了這個消息。



第二天，我又在莫斯科市四處走訪，採訪了一些一般老百姓，但對政府部門，如「真理報」的訪問却不得要領。蘇聯的政府機關，無論大小，都有門衛站崗，還有傳達室等層層關卡。

在「真理報」，我便在傳達室裡花了兩個小時而未得其門而入。傳達室裡的小姐很負責任，但她無法傳清楚我是來幹什麼的。而真理報的編輯們，一聽我是美國來的就大為認真，開始層層審。由於時間倉促，我只好放棄，繼續到街頭採訪。

在紅場附近，我遇到格魯吉亞人組織的一場遊行示威，有一、二百人。他們是四十年代

被斯大林強迫遷離家園的人，現在遊行要求回歸故土。

我向示威組織者詢問了一些問題。他告訴我，格魯吉亞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不喜歡留在蘇聯。他們要求民族主義的民主權利，並相信戈爾巴喬夫會答應他們的要求。

我問他是否想過戈爾巴喬夫如果因民族問題而下台，屆時蘇聯其他領導人也許會強化對格魯吉亞的控制。他說，因為戈爾巴喬夫是開放的，他們才得以到此遊行。他指着旁邊執勤的警察說：「過去我們示威，他會向我開槍。」

我在格魯吉亞中間做了一個小統計。我問他們是否喜歡斯大林？因為斯氏也是格魯吉亞人，結果沒有一個人說斯大林好。我又問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態度，三分之二的人說戈氏是好人。「如果戈是格魯吉亞人，我們會擁他做我們的總統。」我感覺到，儘管像彼得大帝一樣用強力推行現代化，強行禁酒，但戈在人民草根階層，是有很高的信心的。



開放小景

上：莫斯科女郎總是迷人地笑

中：便衣警察在大飯店檢查青年

女子的身份證，不過是收點門坎錢罷了。

下：麥當勞店前總長排着長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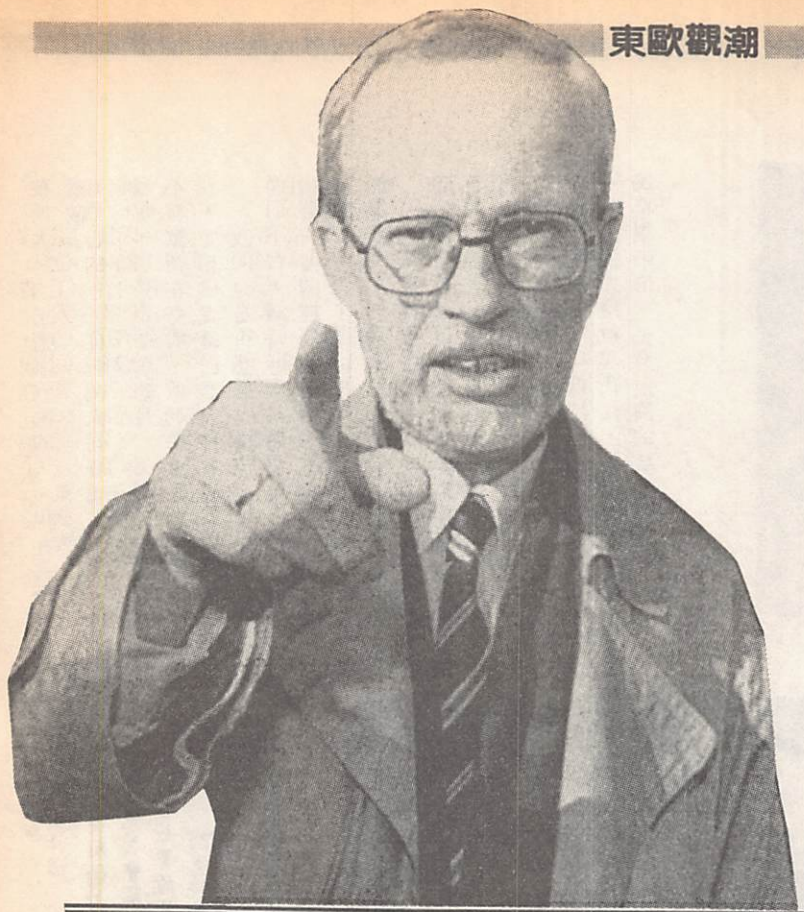
莫斯科雖然經過七十年的共產黨文化，但民族的傳統沒有變。布爾什維克盡管也迫害過當代的文化人，限制自由，但對傳統文化還是尊重的。在加里寧大街一端，有一段上百年畫



坊街。整個莫斯科充滿文化氣息，這也許對俄羅斯的未來是有益的。

二月二十三日，在從莫斯科駛往匈牙利的火車上，看着窗外廣柔的大地，聽着麥克風裡雄壯的「馬刀舞」，讓人感受到這個民族的強大生命力和潛力，自由的俄國將再度創造歷史，影響世界。

在烏克蘭大草原，你可以一個小時看不見城市，但不時會透過樹林，看到工礦企業。從卅年代斯大林起，便在內地建立了大批疏散的工業基地，已適應戰爭的需要，除了造船業、化肥、機車、石油樣樣都是縱深建設。然而，在長達萬里的國際鐵路綫上，樹着隔障視綫的白樺樹屏障，列車員禁止外國人對窗外攝影。這些冷戰時代的遺骸令人傷感。但不必傷感，那個時代過去了。俄羅斯成功地應付了挑戰。



大選中獲勝的基督教民主黨黨魁麥哲，將組閣新政府。

# 東德： 一個精彩的右轉彎

楊漫克

據歐洲一家報紙報導，富有歷史象徵的柏林牆將在一週內被拆除，我們「六四」攝製組於二月十八日兼程奔往東柏林，去拍下這一個將消失的歷史鏡頭。

## 東德仍走在世界前頭

柏林，德國的心臟，歐洲最偉大的城市，建於一二三七年，已有七百五十三年歷史。然而，從今日的面貌上，人們已經看不出過去這一切。從飛機場進入市區，寬闊的柏油公路，外觀漂亮的水泥大樓，使得東柏林完全成了一個新興現代化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柏林城的大部份，在戰爭中變成廢墟。不知是由於柏林人想要忘却過去，還是由於共產黨喜歡炫耀建設的成就，柏林的舊貌已蕩然無存。新柏林雖然整齊、寬敞而漂亮，但不免有些呆板。比起華沙，它綽有餘裕，比起布拉格，它已沒有任何特色和魅力。

十九世紀末，隨着德意志的崛起，柏林的製造業、化工業領先世界。與工業革命同時，柏林也培育了最發達的工人運動和政黨政治。至今，李甫克內西、盧森堡、塔爾曼等一代社會黨創立者的名字，還樹立在主要街道的標牌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發端於德國；同樣，幾

乎毀滅歐洲的希特勒納粹主義也是德國的產物。歐洲有諺：「猶大人的教育，德國人的秩序。」盡管被共產主義實踐了四十年，德國畢竟是德國。東德是共產黨國家中的佼佼者，它的人均產值達到一萬二千美金，在今日世界排第十一位，平均五人有一部私人汽車。無怪乎中國的鄧小平，把東德舉為「社會主義成功的樣板。」

## 不怕私有制，會比現在好

大選前的柏林並沒有非常熱鬧的場面。人們關注的是德國的統一。在柏林牆前，一提到國家統一，德國人那傲慢、古板的面孔立刻和音悅色起來。

一位東德的工人接受採訪時說：「共產黨將在三月大選後下台，統一已沒有太大的障礙，因為東西德將沒有制度上的差別。」

問：那麼東德是否將實行私人經濟？你做為國營企業的工人，是否擔心失業？

答：我不大擔心這樣的問題，我是電工，有技術。在東德，工人的技術構成很高，沒上過大學的，也都上過職業專科學校。實行私有制後，我相信生活會比現在要好。

問：那麼共產黨的幹部擔心失業嗎？

答：那是他們的事，他們可以去學習技術，他們應學會在新的社會裡生存。

問：共產黨在下月大選中，能獲得多少選票？

答：估計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間，不會更多。

問：如果有機會，你會去西德定居嗎？

答：現在很多東德人有這樣的打算，但我本人再等等看。西德很發達，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

問：那麼大選後的東德，不管統一與否，前景會怎麼樣？

答：肯定比現在和過去好。這位工人的回答，可見東德人對未來是抱信心的。一位波蘭人同我說，德國人讓人恐怖，因為他們不知道沮喪。這話一點不假。

西德政客做施主

在旅館裡，我又訪問了一位西德小姐，她在「美國快捷」信用公司工作，現在到東德來渡假。

問：你是第一次來東德渡假？是否害怕共產黨警察找你的麻煩？

答：沒有這種憂慮。東柏林的人都很熱情，這裡物價也便宜，玩起來很開心。至於共產

格蘭登堡門前的東西過往長龍



黨人，他們很快會變成普通人，他們並不可怕。

問：經過四十年共產黨統治，你覺得東德人與西德人是否有一些差別？

答：我感覺不出來有明顯的差別。東德人就是德國人。東柏林給我的印象比我預料的要好些。比如吃得不錯，物價便宜但東西少。很多西德人跑來東德買東西。

問：東德人大批逃往西德，是否對西德的勞力市場造成壓力？影響西德人的生活質量？

答：目前還沒有這種憂慮。因為東德逃往西德的人，多半都是專業人士，反而彌補了西德就業市場的人才短缺。例如，東德的許多醫生到了西德，便很受歡迎。他們醫術很好，西德很缺醫生。再如西德人平均年齡太大，青壯勞力的市場也供不應求。

當然，如果過來的人太多，將會造成問題。不過東德人沒辦法生活，也許就回去了。留下的大都有辦法。

問：那麼，西德政府鼓勵東德人西移嗎？

答：好像是這樣。我不喜歡科爾那種救世主的姿態。譬如，每個東德人到西德去，都可以從政府那領取一百西德馬克。這樣許多東德人便總來，每次都可以領一百馬克。數目雖然不大，但沒有意義，為什麼要給他們錢呢？許多西德人對此提出批評。錢不是問題，這樣的作法心態上不大對頭。

問：你喜歡德國統一嗎？你認為應立刻統一，還是慢慢來好？

答：我不太相信東西德很快會統一。科爾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迅速統一德國。這不僅是德國問題，也是世界性問題，很難短期內有結果。

問：如果東德政府還是共產黨把持，或者東德公有制的現實無法改善，統一後會否給西德造成政治經濟負擔？

答：政權的問題可以通過選舉和議會的途徑解決。東德人應該自己解決他們的問題。西



柏林繪剖面：上面的圓頂以防人們攀越

德不應該把東德吞併，他們有自己的國家，有自己的選擇。西德的政客不能代替他們決定。

問：您是搞經濟的。統一後東西德經濟能否融為一體？比如關稅和貨幣。西德似乎很願意在財政上支持東德！

答：其實錢並非東西方關係的主要問題。東德人未必真的喜歡合併，但他們也許願意要錢，因為他們需要錢。我不知東德民衆怎麼想的。我們的原則應該是，東德需要，而且提出要求，我們才有理由去幫助，否則施捨。

問：西德人是否認為統一之後，德國在戰爭中的失土應該歸還，其他東歐國家很怕德國統一，如波蘭，其理由就是如此。

答：歷史就是歷史，已經過去了。比如像我，便不大清楚德國有什麼失土，也許老年人更關心此事。我想東歐國家上述看法是沒有道理的。德國不會再發動戰爭。



現代童話：賣滷的小女孩

反對黨選戰大起大落

東德的大選，在東歐各國中捷足先登，頗引誘世界的注目。然而，大選前反對黨的狀態並不很好，各新黨此起彼伏，風雲叵測。十月底發動柏林、萊比錫等城市大示威，衝開柏林牆功不可沒的「新論壇」，由於政治綱領上的失誤，從先聲奪人變得無聲無息。

四個月前，「新論壇」領導人成功地聯合了社會各界、各種立場之人士，組成統一戰綫，迫使共產黨僵硬巨頭昂納克下台，執政黨的總理易人。但「新論壇」領導人哈雷女士提出的政見，既照顧社會上的左派，又囊括了綠黨精神，政策極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在東西德日益升溫的統一問題上，「新論壇」提出「一步一步來」的保守主張，結果聲勢日下。

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是一個採取西方的右翼保守黨型態的政黨，他們提出了兩項鮮明的主張，一是用自由經濟取代公有制計劃經濟，一是「德國現在就統一」。正值西德現在也是同名的基督教民主黨主政，其總理科爾給予東德的同盟者以強力支持，促成它與另外兩個小黨的結盟。

然而通過選前在東柏林的觀察，最看好的政黨並非右翼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而是左翼、穩健的「社會民主黨」。該黨相當於西歐的社會黨型態，法國、西班牙，以及北歐如瑞典，目前均是社會黨的天下。根據一般估計，東歐各國變色後，不可能一下子進入徹底的自由主義狀態，而首先要經過社會民主主義階段，因為這樣的情形更接近於東歐的現狀。因此，東歐各國採社會黨形態的新政黨，普遍被人們看好。

在自由選舉下，原來執政的共產黨究竟還能保持多少政治地盤？一般的估計均低於百分之十。可能保持最佳狀態的匈牙利社會黨（前共產黨）領袖波茨蓋，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曾說，匈牙利共產黨的改革派八六年便開始了結束一黨專政的努力，他希望該黨在大選中獲得百分之十以上的選票，成為第三大黨足矣！這是東歐各國的普遍狀態。

民族主義與自由經濟的勝利

三月十八日，東德舉行了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後，中斷了五十七年的自由選舉。以德國統一，自由經濟為政治訴求的基督教民主黨，出人意料地獲得壓倒性勝利，它與「德國社會聯盟」、「民主覺醒黨」共組的聯盟，共獲得百分之四十九的選票。該黨領袖著名律師 MAIZIERE 將出任總理，組閣新政府。

這次由一千二百萬選民參與的選舉，對 MAIZIERE 而言，是一次「夢一般」的勝利。他將制訂政綱穩定民心，「使東德人民為

了未來留在家園裡」。他的第一承諾是與西德實施貨幣和市場的聯合，加速統一的到來。

最被看好的社會民主黨成為最大的輸家，僅獲得百分之廿一的選票。該黨承認他們在統一問題上的猶豫不決，是導致失敗的主因，大選前夜，該黨還被普遍認為是最可能的贏家。基督教民主聯盟已肯定地明示，他們將會與社會黨結盟，而後者亦贊同此舉。

經過改造後的共產黨——民主社會主義黨，落居第三大黨，獲得百分之十五的選票，該黨籍總理莫卓對此結果表示知足。而將共產黨鐵幕打開的「新論壇」，僅獲得百分之三的選票。這樣的結果對他們似乎不公平。

戰後重建的柏林市容





社會黨政治過度論失算

通過選舉前後的觀察，可以從這場東歐第一個大選中獲得一些具普遍意義的啟迪；首先，一旦自由，共產黨便將失去執政黨地位，已成爲不可避免的現實。德國共產黨對反對派的讓步雖然較波蘭和匈牙利利晚，但亦不可謂不夠充分。然而，共產黨的妥協，最大限度的收益，不過是其角色轉換爲左翼反對黨，若要繼續執政決無可能。當然，沒有像羅馬尼亞共產黨那樣身敗名裂，當屬較爲體面的下台。

這一點給予中國民運啟示深刻。如果今日中國的反對派，仍然寄望於共產黨內的改革派

復出，以平反「六四」昭雪不白之冤，恐將受到時代的無情嘲弄。

第二，專制制度垮台後，社會的變動將十分劇烈。最初對時局發生過決定性作用的角色，由於功能的完成，會迅速遭到淘汰。例如東德第一個反對黨「新論壇」的大起大落，足以說明問題。而且各反對黨無法取得絕對優勢，此點對於中國各階段的民主運動人士而言，當心領神會，不可太過自負。

第三，專制解體造成社會反彈，最明顯的現象是，右翼保守黨比中間的社會黨，左翼改造後的共產黨，更有成功的可能。故過去理論界認爲，公有制變私有制，必須要經過一個過渡階段，已被證明爲不合實際的設想。一旦人民自由選擇，他們會毫無猶豫地一步跨入西方

的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

當然，社會黨型政治的過渡階段未必徹底破產。由公有制轉變爲私有制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保守黨的徹底自由主義政策在實際運作中不見得行得通。那時社會黨必將捲土重來。

東德大選的結局，最根本的影響是兩德的統一不可避免，指日可期。西德總理將獲得東德姐妹黨政府的無隙的合作，正計劃將今年十二月的西德大選，變成一場泛德國大選，即兩德一起參與，選出合法代表兩個德國的政府。德國統一意味着德國的再崛起，勢將改變世界目前的政治、經濟平衡，成爲實力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強國。\*

捷克：

# 我們的外交原則是理想主義

楊漫克

在戲劇作家哈維成爲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後，人們不無憂慮。哈維是一位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但他能成爲一個好總統嗎？兩個多月過去，答案是肯定的。人們都知道，哈維的成功，與他的五人「總統顧問委員會」是分不開的。最近一段時間，捷克國家內外政策出現了戲劇性的大幅變化，而這個五人委員會，正是這些變化的策源地。

馮德拉 (DIENSTBIER VONDRA)

男，二十九歲，現任哈維總統外交顧問，五人委員會中最年輕，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位，每日與總統形影不離。馮德拉在八九年十一月革命前，曾爲著名地下刊物「手槍評論」編輯，八八年成爲「七七憲章」的對外發言人，八九年與哈維一道創立「公民論壇」。目前，他是國家外交政策和總統外交活動的主要參與和制定者。

三月十一日，筆者前往馮德拉家中訪問，



請他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觀念和變化，發表看法。

說出真理

問：馮德拉先生，作為總統的顧問和外交助手，您與他的交往和友誼是怎麼開始的？

答：我認識哈維先生只有四年，之前只是看過他的作品，對我的影響很深刻。他時常說出我們深感需要但未能說出的話。之後在與共產黨的鬭爭中，我認識了他。他教給我一個人生的原則，即在任何情況下，要堅持真理並說出真理。這也是我今天做為他的外交助手，在工作中堅持的原則。

早在我作為「手槍評論」編輯時，便認識了哈維。「手槍評論」是捷克青年人的雜誌，只有一個中年撰稿人就是哈維。這是我們之間友誼的開始。

一九八八年，由於我是研究地理的，被任命為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也是哈維先生和反抗運動的發言人。七七憲章的參與者有三大成份：一是左派人士，包括共產黨內的反對派；二是宗教界人士；三是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這三方面人士各有一個發言人，我是第三方面的對外發言人。

一九八九年，我協助哈維組織了許多反抗活動，如一月份持續一週的示威請願，請願書是由哈維、我和電影工作者克里贊（KRIZAN）一道起草的。克里贊現在也是五人委員會的顧問之一。

對話不成，便要反抗

八九年十一月革命爆發後，我和克里贊協同哈維籌備成立了「公民論壇」。其實八九年一年中，我們每天都在一起生死與共。在革命後，我是最初提議由哈維出來做總統的人之一。哈維對我說，「讓我做總統，你要作顧問」，我便同意了。他需要一些他相信的人去協助他的工作。

問：您在做為七七憲章發言人時，作了那

些工作？怎樣反抗共產黨的壓迫？

答：七七憲章發言人，要代表兩千多名知名人士對外發言，並準備文件。我時常接待老百姓來訪，並回答和解決他們的種種問題。

八九年舊政府沒收了我的護照，我不能出國，於是在布拉格接待外國來訪的訪客，主要是各國政治家。他們來到捷克，一方面同政府官員見面，同時與七七憲章方面來往，我們也接待過大批東歐各國的反對派人士，包括波蘭團結工會、匈牙利民主論壇等。

我在七七憲章工作時，主要的努力是與舊政府展開平等對話。但政府總是拒絕。後來我們只好用反抗代替了對話，以迫使政府方面明白，他們應當而且必須同我們對話。

理想主義的外交觀念

問：目前捷克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準是什麼？

答：新政府基本廢棄了過去的外交政策，努力創造獨立、公開的新外交政策，同世界上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

我們的新外交觀念有兩個原則：第一，我們不把經濟、政治方面的短期利益看得很重，而是着重於理想主義；第二，我們要奉守歐洲安全的赫爾辛基條約，最終打破東西歐分裂和對立的格局，實現歐洲的和平和多元化，而不是美蘇兩國決定歐洲問題。

問：根據我的觀察，哈維總統本人的外交風格很重與政治專權國家的反對派的交往，如他邀請達賴喇嘛訪問、會見中國學生領袖沈彤和作家劉賓雁。

答：哈維總統所遵循的基本政治文化是理想主義。反映在外交風格上，即不應該只同政府對話，也應該同民間，特別是反對派溝通。這要視具體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定。一些國家現在的政府還很專制，我們當然地與反對派的交往要比政府密切。

問：中國是否屬於您所指的專制國家之例

方勵之比鄧小平重要

答：中國正是一例。在中國，我們對方勵之更有興趣，而不是對鄧小平更有興趣。方與鄧的差別比撒切爾首相和堅諾克（英國在野黨工黨的領袖）的差別更大。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會與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保持密切的關係。

問：據說中國政府認為，哈維總統無視中國政府的尊嚴，將影響兩國政府間的關係。

答：總統當然應與政府的聯繫多些。有時與政府的關係是與反對派聯繫的先決條件。我們當然也不願意與中國政府關係惡化，如取消外交關係之類。

問：哈維和您的理想主義外交，會否傷害捷克的國家利益。如中國取消雙方的貿易往來。

答：如果中國因為我們與反對派來往，便



劉賓雁、沈彤應邀訪捷，接受學生的獻花。

取消雙邊貿易，那是不智的。那首先會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那會嚴重地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

問：達賴喇嘛訪問捷克時，中國政府反應很過敏，你們緊張嗎？

答：達賴來訪之前，中國反對得很兇，達賴到達後，中國反對得更兇。但達賴離開之後，中國方面也沒有怎麼樣。

後來，中國政府採取了一個實際步驟：即取消了捷克工業部長對中國的訪問，但有趣的是，過了兩個星期，我們辭掉了這位部長。因為他是舊政府的代表，我們也不喜歡他。

我要強調，我們的外交政策和理想絕不會受到別國政府的影響。在歷史上我們有過太多的歷史教訓，如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我們。任何以激烈的方法對待捷克的國家，同時也會傷害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們不害怕。

問：在世界各國政府中，包括美國和法國這樣最支持中國民運的國家，都從未向捷克這樣公開邀請持不同政見者來訪。我想中國的民運人士會永遠記住這段歷史，我們很感激哈維總統和捷克可愛的人民。

答：捷克是一個影響有限的小國，離中國很遠。迄今已有宗教界、天安門學生領袖和貴刊的代表前來訪問，我們對這樣的交往亦十分快慰。捷克的國力很有限，但對中國一定會有幫助。

捷克的民主力量與中國的民主力量的合作對我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過去與你們有相同的境遇。我想，我們之間的合作比中國取消雙邊貿易更重要。因為世界和平比貿易更重要。達賴來訪時，中國曾威脅取消一項計劃，就是捷克將在中國援建一座發電廠。但我方沒有屈服。因為我們懂得，我們的利益要求我們支持中國的民主而不是一黨專政，它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因素，但它沒有前途。四月在柏林舉行的東歐會議很重要，將討論各國民運合作的計劃。希望你們的代表與會。

### 華約、經互會皆已落伍

問：捷克新政府對華沙條約和經互會的政策如何？與過去比較，有何變化？

答：華約與經互會都處在歷史的危機中，經互會過去四十年沒有成績可言，在新的現實下更沒意義。應當用新的多邊關係取而代之。我們應與整個歐洲合作，創立一些現實的合作方式。目前與西方的經濟合作還有許多障礙，應把經互會與歐洲共同市場混合起來。



文徹斯拉廣場，自由的象徵。

華約這樣的軍事聯盟，不能以過去的方式繼續。我們在華約內，不能與蘇聯維持平等的關係，不合理。此外，華約的目的是與西方對峙，這個需要也過時了。

現在，華約國家可以退出，甚至可以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如匈牙利外長就曾表示，匈牙利需要參加「北約」。我個人覺得未必好。

。匈牙利有它自己特殊的歷史原因。可以理解。

現在東歐正在向民主制度過度，歷史給予我們大好的機會去除東、西歐的衝突，創立全新的歐洲安全系統。所以，無論是「華約」還是「北約」，都失去存在的意義。

問：您如何考慮與蘇聯的關係？對蘇聯駐軍如何處置？

答：我認為東歐國家應當考慮蘇聯的利益或者說是立場。如果東歐國家一下子全部背離蘇聯，讓蘇聯單獨面對歐洲，那很危險，不利於歐洲的安全。我們應給予蘇聯時間，讓他們多搞些民主，一步一步參與歐洲安全系統。

### 新政府的構建問題

問：哈維的新政府給世界一個全新的印象，而您本人參與了捷克新形象的建樹工作。恕我直言，就捷克給我的感覺是，一方面朝氣蓬勃，另一方面有些脫離慣例，顯出新政府的經驗不足。您認為自己以三十而立之年，是否勝任目前的重要角色？

答：我自己經常感到缺少外交經驗和政治經驗。但舊捷克過去四十年從沒有真正的政治或外交，大學裡也沒有政治科學。外交也不是獨立的。

如果比較的話，我要說，過去共產黨的政治家水平並不高，但我們曾試圖與他們合作。現在我們取代了他們，幹得並不比他們差。比如，過去的外交是靠蘇聯，不能繼承；過去的國會是橡皮圖章，誰也沒有經驗可言；過去的政府是專制的政府，那是我們必須反對的。

問：聽說總統顧問中，成份十分奇特，有作家、畫家、演員、運動員，而總統本人是劇作家。這樣的構成做為社會反抗運動很棒，但做為總統班底是否恰當？

答：您的問題很有趣。我想我們正處在一個特別的歷史時刻。我們現在的情況如此。將

來捷克會有很專業的政治家，我們會高興地讓  
位。但現在只好把這個責任接下來。

其實，捷克的情況其它國家也有。雷根總統是電影演員；冰島的總統也是戲劇家。我曾去冰島訪問，發現他很有治國的能力。

問：總統的顧問班底平均年齡幾何？

答：華格納年齡最大，六十歲，我最年輕，二十九歲，平均年齡四十歲。

問：那麼哈維總統和現政府用人的標準是什麼？僅僅是過去反抗運動的同志大概不行吧！治國畢竟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 新舊政府的換血問題

答：可以說，總統用的主要是他以前的朋友，是他可以信任的人。這很容易理解。行政工作需要效率。

問：我之前走訪了波蘭、匈牙利等國，發現那裡的反對派，和新政府皆苦於沒有自己的管理人才，從共產黨手裡接過政權後困難很多。你們是否留用了一些過去共產黨政府的行政

人員？

答：過去政府各部門的第一把手都換了反對派的人，但中下級人員大部份留用了。進一步的換血是必要的，但要等待五月大選和九月地方選舉之後，才能發現大批新人才。

問：如果你們將舊官僚機器中的人全部換掉，他們的人數也很多，失業以後會不會反抗新政府？

答：這是一個民心問題。人民對舊政府人員的批評很厲害，他們不再被信任。他們也許會因為失業而反抗現政府，但不可能成功。我們沒有選擇，必須順應民意換掉他們。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原則。

問：過去共產黨對警察和軍隊的控制很深，你們如何接管，處置這些武裝力量？

答：警察是否真在共產黨手掌之中很難說。警方有很多共產黨員，不可能把他們一下子都換掉，否則真的很危險。而有能力的共產黨員，也應該被留用，犯了罪的必須走。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共產黨員未必支持共產黨，他們入黨和做警察的目的是賺錢。而

現在的內政部長是個基督徒，不是共產黨。他過去從事反對秘密警察的鬭爭。因此，目前的內政部我們很放心。

### 幹得不好，共產黨會再來

問：軍隊的情況如何？過去是很保守的。

答：現在的國防部長 VACEK 仍是共產黨員。但他不是那種鐵桿共產黨，如果我請他退黨，他肯定沒意見。目前尚無人可以代替他。但按憲法規定，軍隊最高統帥是總統，而總統本人也服過兵役。

VACEK 讓我們很放心，他支持新政府的態度是明確的。現在有些老將軍想取代他成為國防部長，即六八年被整肅的軍內反對派。共產黨內有個復興會（OBRODA），是改革派，他們也參加了「公民論壇」。復興會的三位老將軍會要求總統發佈命令讓他們作部長，但他們對目前軍隊的情況不甚了了。

其實現在軍隊的問題不是在不在共產黨手裡。共產黨現在只是一個名義。麻煩的問題有二：一是裁軍。我們的武裝力量太大，沒有必要，必須裁，但裁下來的軍人無處安置，他們除了服兵役，什麼都不會；第二個是士兵們要求縮短兵役期，但現在不過兩年，怎麼再縮短呢？

問：那麼是不是說，共產黨已無任何實力了？

答：並非如此。共產黨在城市裡已沒有威信，但在許多農村，他們仍然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共產黨還是黨員人數最多的黨，他們發行的「紅色政權報」，還是最大的一份報紙。不可低估其力量。他們今年五月也會參加大選。如果我們遇到嚴重問題，誰也不敢保證共產黨不會捲土重來。



捷克的軍人不願干涉政治。

# 匈牙利： 共產黨大選敗走麥城

\*\*\*\*\*  
 匈牙利共產黨一直是東歐集團的「壞孩子」，六十年代便通力改革，可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改革就像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人民在大選中拋棄了共產黨，也為沒有出路的改革打下了句號……

楊漫克



多瑙河曙光

二月二十四日乘火車橫越烏克蘭大平原，到達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她在大選的熱浪中，布達佩斯街頭，到處是各色的黨旗和印着人頭像的競選廣告。走過東歐各國的鄰城，這裡的氣氛是最熱的。兩個月前，一百多個反對黨選在「天下大亂」。然而，一些重要的黨團已經脫穎而出，名列前茅。三月二十五日的大選迫在眉睫，未來的總理、總統人造業已柳暗花明。「匈牙利民主論壇」、「自由民主聯盟」等近十家的反對黨，經過半年的形象建樹，業已聲勢大振，執政黨的易位已不可避免。

競選活動可謂奇招百出，例如：「青年民主聯盟」出版了「匈牙利橘子報」，最為引人注意，它的黨徽也是一個橘子。橘子典出於五十多年代的故事。當年斯大林搞經互會，命令匈牙利種植橘子，勞民傷財之後，由於氣候不適，計劃破產。著名導演巴索（BAGSO）拍了一部影片：一個農民拿着檸檬告訴黨的幹部說，這是檸檬，不是橘子。因此，青年聯盟以橘子為諷刺性象徵，與共產黨展開競爭，收到奇效。

匈牙利大選將全國分為二十一個選區。三百八十人的議會席位中，一百七十席給自由候選人，一百三十席給地區候選人，九十席給全國候選人。此外，每個少數民族有兩個席位。目前在反對黨的，安陶爾·約瑟夫領導的

匈牙利民主論壇獨佔鰲頭。人們相信，安陶爾將成為未來的總理。該黨成立於八九年九月三日，五十八歲的安陶爾是一位哲學家。民主論壇代表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立場中間偏右，主張自由經濟和西式民主制度。目前該黨有兩萬六千名黨員，推出一百六十九名候選人。

由費倫茨（FERENC）領導的「自由民主聯盟」是第二大反對黨。該黨是傳統性的政黨組織，立場右傾，與西歐國家的自由黨頗為類似。人數最多的政黨是代表社會下層的「獨立小農、農業工人和市民黨」，由文采（VINCE）所領導，他們政治訴求明確，要保護勞工階層的利益，但出色的政治家不多。

反對黨中最有特色的是青年民主聯盟，該黨規定黨員年齡不得超過三十六歲，立場激進，思想摩登，深受青年大學生、藝術家和民族主義者的歡迎。青年聯盟目前擁有四千黨員，朝氣蓬勃。它的領袖佐爾丹（ZOLTAN）現年三十歲，是社會學研究生，另一個領袖伊凡（IVAN）現年二十五歲，是青年經濟學家。

二月二十五日，我出席「青年聯盟」的競選大會，訪問了佐爾丹。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自我講述了青年聯盟的宗旨。

佐爾丹說，該黨是唯一擁有一套計劃反制通貨膨脹的政黨，這表明該黨雖然激進，但亦十分實際。佐爾丹說，他們已經注意到，由於



裴多菲廣場。

立場的激進，已使得中產階級不喜歡青年聯盟。但他認為，政治家最優秀的品質是立場始終如一，他將堅持激進的政治立場，不會因為別人無理而放棄。

青年聯盟認為，目前匈牙利最嚴重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和外債高築。該黨主張削減國家預算，降低物價，出賣國營企業，建立自由經濟刺激生產。佐爾丹說，他們要求蘇軍無條件立刻撤出匈牙利。

我問佐爾丹，共產黨控制國家機器，有錢有勢，青年聯盟憑什麼與其競爭？佐爾丹認為，只要有正確的主張，成功運用競選手段，如集會示威、發動群眾等，就能夠戰勝執政黨。目前青年聯盟已經吸引了此執政黨更多的傳媒和公眾注意力。他相信在未來選舉中，將獲得百分之十的議會席位，而執政黨可能位於這個數字。

佐爾丹告訴我，青年聯盟是中國青年的真正朋友。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是青年聯盟



扛着黨旗的市民在看競選招貼。

發動了在中國大使館門前的示威抗議。他說，「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支持中國民主，天安門事件也可能在匈牙利重演。中國人民的鬥爭是最艱苦的，我們今後還將全力支持中國民運。」

二月二十七日，匈牙利本屆國會召開大選前最後一次會議。經過曲折的申請，我以記者身份列席了國會會議。並訪問了執政的社會黨領袖波茨蓋（POZSGAG）。

匈牙利共產黨的名稱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去年十一月黨的代表大會表決更名為「匈牙利社會黨」，由改革派的波茨蓋和涅什（NYERS）領導。但黨內的部份保守派反對更名，繼續保持原黨名。結果執政黨一分為二，但在人數上仍然是最大的黨，兩黨共擁有八萬多黨員。

執政黨的革新運動始於一九八六年。首先由波茨蓋組織了一個「愛國陣綫」，要求執政

黨改革。一九八七年，在愛國陣綫的努力下，改革派在首都附近的拉基泰萊（LAKITELEK）鎮自行召開會議，成立「新三月戰綫」（三月戰綫是四二年時的反法西斯組織）。由涅什領導。一九八八年，黨代會和議會召開聯席會議，將長期領袖卡達爾免去總書記職務。大局開始活絡。

在訪問中，我問了波茨蓋先生四個問題：問：匈牙利執政黨近年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主要是被動的，還是改革派的長期努力？比如您和涅什的努力？

答：我們今天社會黨的許多人，過去一直嘗試改革。所以我黨的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最好的。匈牙利現在已經進入民主的軌道，我亦希望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向匈牙利一樣，共產黨在未來民主社會中，應改變自己過去的角色。

問：你們改造共產黨的努力很真誠，但據我瞭解，人民很不喜歡以前的領導人，你不擔心在三月大選中，喪失現有的權利嗎？

答：我很有信心，我相信社會黨將獲得百分之十以上的議席，也就是說，我黨的議席，將在前三名之列。

問：可否請您將匈牙利社會黨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一些比較？

答：中國共產黨在八十年代正在完成他的現代化工作，有一定的成功。但是現代的中共害怕政治演變。然而問題是他們不得不變，歷史不會停頓的。中共領導人應認清時局，加速改革，否則未來會不利於他們的生存。

問：社會黨將同中共保持什麼關係？

答：我們與中共的關係，主要取決於中共未來的狀態如何？即中共自己如何表現。我想我們的原則和態度是很清楚的，是不會改變的。

目前，有資格參加全國大選的政黨共十二個，各黨旗鼓相當，難分高下。其中，以「民主論壇」和「社會黨」力量最強，但都不敢說



民主論壇在大選中名列前茅，其領袖安陶爾將可望成為新總理。

自己能獲得半數以上的席位。原執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預計至多可獲得百分之七的選票。多黨執政，註定成為大選後匈牙利政治的主要特色。

在政府人事方面，看好當選為總統的可能會是「社會黨」領袖波茨蓋，看好總理位置的是「民主論壇」的安陶爾。儘管波茨蓋的呼聲甚高，但匈牙利的老百姓却說，波茨蓋當選意味著還是共產黨執政，他們不會同意。顯見執政黨改革派雖然對歷史的變遷功不可沒，但亦很難被時代所接受。

據現在看守政府中的一些實力派人物稱，從去年十月起，反對黨方面的力量與日俱增，但最近有所停滯，原因是他們對現政權的下層批評太過強烈，導致這一實力社會階層的反感。根據波蘭和捷克的經驗，即使反對黨大獲全勝，他們亦需要大量留用舊政府的行政人員，因為許多部門不可能一下子換上反對黨的人馬，如軍隊、外交和經濟部門。所以社會黨的支

持面最近有所擴大。

匈牙利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目前處於不冷不熱的狀態。但與台灣和南韓的往來却日益擴展。「匈中（指大陸）友好協會」會長戴伯納在接受訪問時，他已經接受台灣學者張京育的邀請，今夏前往台灣出席第七屆「中、歐會議」。目前台灣正在努力取代中國大陸往日在東歐的位置，已準備在布達佩斯設立商務處。匈台貿易去年僅僅三千萬，預計今年可望突破一億元美金。

大選使匈牙利社會沸騰，另一方面也使匈牙利經濟出現暫時的停頓。儘管本屆國會已經立法允許拍賣國營企業事業，但人們仍然握緊票子，不敢下手，要看大選的結果再做決定。

三月二十五日，匈牙利開始第一輪大選，百分之八十的票決出後結果如下：

第二輪選舉將在四月八日完成，但大局基本確定。

匈牙利的政黨色譜，如同東德一樣，從左至右可分為：社會主義工人黨（正統共產黨）、社會黨（改革派共產黨）試圖演變為西歐式左

翼社會黨）、民主論壇（中間偏右，西歐式社會黨形態）、自由民主聯盟（西歐式自由黨形態）。

從大選結果可見，採西歐社會黨和自由黨形態的政黨，已取得半數優勢，勢將在日後結盟執政。兩黨皆已排除與前共產黨結盟執政的可能性。右翼政治力量獲勝已是人們意料中事。

改造後的共產黨——社會黨，僅獲得百分之十的選票。這對匈牙利改革中起關鍵作用的共產黨改革派而言，似乎不夠公平。其領導人波茨蓋一九八六年便已在東歐陣營中標新立異，動作比波蘭還要早。另一領導人涅什在四八年前是資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他的黨同共產黨合併後，四十年來，涅什一直在倡導改革，六八年因改革而被撤銷總書記職務。可以說，匈牙利的變遷，匈共改革派功不可沒。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在共產主義大退潮的國際大氣候下，只要沾了共產黨的邊，改革派也好，強硬派亦好，都將被淘汰出局。因為人民不再信任任何形式的前共產黨。這個標籤太臭了。

在即將執政的反對黨方面，「民主論壇」、「自由民主聯盟」、「獨立小農、農業工人和市民黨」、「青年民主聯盟」等超過百分之十的政黨，今後必須組織一個跨黨聯盟，實行多黨執政。不像波蘭、捷克擁有長期知名的反對派領袖瓦文薩、哈維，匈牙利的反對派一直推不出一個可孚眾望、公認的領袖。今後組閣時將可能出現困難的局面。

儘管選戰中雙方攻擊得很猛烈，但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民主論壇」和「自由民主聯盟」在政見上似無幾差別。前者強調基督教和民族主義傾向，要求蘇聯撤軍，但暫時仍留在「華約」之內；後者則要求匈牙利徹底納入西方的軌道。有一點是沒人懷疑的，在放棄共產主義，奔向民主政治的跑道上，匈牙利將跑在最前頭。

# 中共中央文件：

## 對蘇共二一中全會的批判

原件（機密）

一、二月五日至七日，蘇共召開擴大的中央全會，戈爾巴喬夫作了報告，通過了行動綱領草案，提出要修改憲法中有關蘇共領導地位的條文，準備實行多黨制，重新考慮民主集中制，建議實行總統制，準備在蘇聯建立各種形式的聯邦關係。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說，共產黨「不應該依靠法律強行合法化」，而應當「放棄某種法律和治優越地位」；認為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應當「重新認識」，把重點放在「包羅萬象的民主化」；主張「建立總統制」，並且要求「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利」；主張改變蘇維埃國家體制，「為存在各種聯邦形式開創可能性」等等。戈爾巴喬夫把這些主張，歸結成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實際上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它的實質是否定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改變共產黨的性質，推行西方議會民主政治。

二、戈爾巴喬夫這套由「新思維」到「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在全會上引起了一片混亂，受到了強烈的反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問，按戈爾巴喬夫這套主張去辦，「蘇共是否仍是執政黨？仍是人民政治先鋒隊？它是否仍然站在共產主義理想的立場上？還是向社會民主黨方向擺動？」並且對戈爾巴喬夫要實行總統制公開表示不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里加喬夫在發言時指出，他提出的綱領草案，在某種程度上正為實行私有制打開縫隙，它將會導致「民族主義、分裂主義和反社會主義派別」的「致命威脅」，並且

表示「反對把黨變成無定形的組織即政治俱樂部」。蘇軍總參謀長指出，「這個綱領對東歐、我們國內和華約內部當面發生的變革沒有表明政治態度」，認為廢除蘇聯憲法中肯定共產黨作用的條款給「武裝力量內部的政治機構的作用」造成了一種「許多問題」，同時還抱怨說，現在有一種「把軍隊排除在社會之外的傾向」。蘇駐波蘭大使在會上慷慨陳詞，認為蘇聯當前的社會危機「都是狂妄自大的結果，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所犯錯誤造成的」，他尖銳指出，「有人使祖國狀況惡化，把一個舉世欽佩的強國變成一個過去充滿錯誤、現在沒有歡樂和前途未卜的國家，這都是為了取悅西方，對現在所犯錯誤不加評論，珍視的却是西方先生們的評價」，認為「這至少在政治上是正不派的」。戈爾巴喬夫這套政治綱領，在蘇聯社會上也引起了一片混亂和強烈反響。著名蘇聯作家亞歷山大·普羅多羅夫發表文章說，「放棄共產主義思想使蘇聯失去了共同的前途和鼓勵民族主義運動，從而使我們四分五裂」。蘇聯「真理報」總編認為，「蘇共綱領草案基本上是戈爾巴喬夫的作品」，並且警告說，「蘇共的分裂迫在眉睫」。一些地方黨的領導人和工人群眾都對戈爾巴喬夫的「行動綱領」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蘇反對派頭面人物葉利欽也認為，二月全會「未能制止住危機，蘇可能面臨內戰危險」。

三、近幾年，蘇聯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進行的所謂改革，已經給蘇聯社會造成巨大的混亂。黨正在分裂，反對派公開與蘇共分庭抗禮，所謂「蘇共民主綱領派」、「民主選舉組織」以及葉利欽等人都在醞釀另立新黨；本來就存在的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阿塞拜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加盟共和國相繼出現動亂，甚至發生暴力衝突；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生產下降，商品短缺，人民怨聲載道。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以及他的支持和插手，也是東歐國家急劇演變的重要原因，既是外因，也是內因。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麼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蘇共二一中全會的「行動綱領」只能加速蘇聯朝着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越走越遠。這不僅不能擺脫蘇聯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危機，反而會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使蘇聯、東歐陷入長期動蕩和混亂之中。

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對戈爾巴喬夫這套搞法拍手叫好，對蘇聯正在進行的「和平演變」表示熱烈歡迎，但是，對蘇聯的前景和戈爾巴喬夫的命運都不敢樂觀。法國「費加羅報」說，「戈爾巴喬夫迫使蘇共選擇了自殺」，「開闢了通往動亂的渠道」。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戈爾巴喬夫的前途表示擔憂，認為他在這次全會上「鞏固了個人權力但可能會面臨充滿暴風雨的未來」。「日本經濟新聞」指出，「蘇共綱領草案同考茨基的修正主義有許多相同之處」，「列寧在天之靈也要為蘇共的變質而哭泣」。西德一些報紙認為，蘇共這次全會之後，「黨內鬥爭可能進入決定性階段」。芬蘭政界和輿論界分析，「蘇共放棄權力壟斷，黨和國家將出現分裂」。英國「金融時報」也認為，「黨將會分裂」，並且預測，「分裂極有可能在下屆代表大會之後而不是以



前發生」。

五、隨着東歐、蘇聯局勢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其它國際敵對勢力有可能進一步對我國施加更大的壓力，採取新的制裁措施。今年一月，美國國會眾、參兩院置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不顧，重新通過了附在一國務院授權法上的制裁中國的修正案，企圖用立法形式，繼續對中國實行制裁。美國國務院也即將發表對我國進行肆意攻擊的所謂「人權報告」，毫無根據地誣蔑我國「犯下了所有人權方面的罪行」。這些都說明，國際反動勢力繼蘇聯、東歐之後，將把主要矛頭指向我國。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切不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六、蘇聯是列寧創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演變會比東歐劇變對我國產生更大的影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進一步施加更大壓力，也會給我們增加新的困難。在這股逆流面前，可能更加深一些人的思想混亂，擔心社會主義大旗還能打多久，社會主義這塊陣地我們是否還守得住。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敵視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也會興風作浪，挑起事端，破壞政治穩定，妄圖動搖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形勢是複雜的，鬭爭是尖銳的，我們必須有鮮明的立場和態度，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

1、我們對蘇聯和東歐局勢發展的性質要有明確的認識。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不遇到挫折，甚至出現反復。但不管道路多麼曲折，社會主義終將代替資本主義，這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改變不了的，不能由於蘇聯、東歐出現暫時的演變，就對社會主義發生動搖和懷疑。

2、必須看到，我們的國情與蘇聯、東歐不同，我們的黨是久經考驗的、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長期的革命鬭爭中與人民群眾建立了最緊密的聯繫，有着深厚的群眾基礎。建黨

七十多年來，我們黨沒有受到過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思潮的影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直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關係，這是在長期鬭爭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西方的多黨制在中國沒有市場；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鬭爭作出的歷史選擇；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這一真理，社會主義思想已經深深地扎根在廣大人民的心中；我國進行的改革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改革開放十年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效，生產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提高，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四十年來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凝聚力；黨的各項民族政策調動了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我們不存在蘇聯那樣尖銳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糾紛；經過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嚴峻考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策略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和警惕，更加堅定了社會主義信念；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帶領全黨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進一步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同蘇聯、東歐的根本不同點，也是在我國防止發生蘇聯、東歐那樣的事變的政治思想基礎。

3、我們應對克服蘇聯、東歐局勢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充滿信心，集中思想，集中精力，努力作好國內各項工作。要採取有力措施，鞏固我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認真落實中央關於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向前發展。要抓好長

業，保持農業的穩定發展。要加強企業思想工作，特別是停工、待工企業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認真貫徹黨的各項民族政策，進一步加強民族團結。要繼續反對腐敗現象，加強廉政建設，進一步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要保持高度警惕，防範敵對勢力的挑釁，把各種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維護正常的社會生產、工作和生活秩序。

4、在國際關係方面我們的方針仍然是堅持原則，利用矛盾，廣交朋友，多作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要看到，雖然由於美蘇靠攏，中美關係「一六·四」以後處於低潮，去年中蘇關係正常化以後又出現目前蘇聯、東歐形勢的變化，但總的世界格局並沒有改變。美蘇之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仍然矛盾重重，在兩德統一、蘇聯提出重建「歐洲大廈」、裁軍和經貿關係等問題上，這些國家之間有明顯分歧和激烈的利益衝突。我們還是要處理好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美、蘇、西歐、日本的多角關係，使其對我有利。同蘇聯的國家關係仍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黨的關係仍按黨與黨之間的四項原則，保持和發展正常關係。我們要更加重視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這些國家長期受帝國主義歧視和欺侮，是反帝、反霸，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國際力量。要加強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的聯繫，從政治上、道義上支持他們。

總而言之，不管蘇聯、東歐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們都要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黨的正確路線，我們的國家一定能夠經得住任何風浪的考驗。只要我們努力工作，排除各種干擾，腳踏實地地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不得翻印，用後收回）

✱

# 新二月革命浪拍南岸

——評中共的一個內部文件

林青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曾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新二月革命的浪潮又會給中國帶來什麼？

一九八九年世界壯麗的民主運動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迴響，是蘇聯政治改革的新變動。其中包括取消原有憲法中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文，實行多黨制，建立總統制。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進程具有劃時代意義。發生在二月間的這個事件，被人們稱為繼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的「第二次俄國二月革命」。

對於俄國新二月革命，中國共產黨本能地作出了迅速反應。依據傳統的「外懸內緊」謀略，中共中央發了一個名為「關於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參考資料」的文件，明確表示了共產黨領導集團的立場，以期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口徑。這個文件的目標很清楚，意在穩住陣腳，遏制這樣一個民主革命浪潮在中國蔓延。現在的問題在於，中共統治者是否有能力阻擋住這個革命浪潮南下中國？剖析這一文件，認清其荒謬之處，有助於我們部份地回答上述問題。

## A. 關於「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

中共文件直截了當地宣佈戈爾巴喬夫「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因為他主張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屬於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體系，實質是「否定

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改變共產黨的性質，推行西方議會民主政治」。

這裡需要討論兩個問題。

第一，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否包含於馬克思主義之中；

第二，如何公正評價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

對於第一個問題，蘇聯理論界大多作了肯定的回答，連得相當保守的老一代哲學家康斯坦丁諾夫等人，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的最高表現，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包含了人道主義。

在中國學術界，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量討論文章表明，相當一部份學者，包括專門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認為，人道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或構成部份。

對於一個未有定論的學術問題，中共領導人完全應該在自己認真鑽研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基礎上（可惜他們大多是「不讀書、不看報」的黨閥）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不宜武斷地下政治結論。

至於第二個問題，在中國理論界基本上還是一個禁區，是一個被禁止討論的問題。但是近年來已經有一些關於第二國際的內部資料出版。就中人們至少了解到，列寧——斯大林

第三國際（或稱共產國際）對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第二國際的批判過於武斷；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處理社會政治、經濟事務比共產主義來得柔軟，後者過於僵硬；第三國際共產黨人內部鬭爭殘酷，慣於自相殘殺。

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上，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紛紛建成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都遇到了不能解脫的經濟、政治困境，都以一種落後的面貌出現於世界之林。而那些具有某種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西歐、北歐國家——那些被劃入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倒一個個生機勃勃，居於世界經濟的先進行列。

倘若在中、蘇諸國來一次自由的公民投票，那麼，贊成人道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人肯定會遠遠壓過贊成非人道的共產主義的人。東歐一些國家的變動，具體表現了這樣的人心所向。

## B. 混亂及反對來自何方

中共文件指出戈爾巴喬夫的這種新思維在蘇共黨內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和「一片混亂」。對此，我們應當仔細分析。

首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出現各種不同意見，這倒真是黨內民主的正常現象。共產黨是不講民主的，而在全世界的共產黨中，最不講民主的要數中國共產黨了。其表徵之一是在中

共中央的全會上基本上聽不到不同聲音，只有機器般的「一致通過」。在重大的民主進程步伐中，蘇聯領導機構中的不同聲音是好事一樁。

其次，在不同的批評聲音中，有些人並非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而是嫌他改得太慢。中共文件中提及的前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利欽，就是如此。中共文件把他拉入反對改革行列，實在也是貽誤之技。

第三，中共文件所說的社會混亂的表現之一，是一些共產黨外的民主政治組織都在「醜態另立新黨」。稍具民主政治意識的人都清楚，多黨政治，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它的主要社會功能就是反對獨裁。對於習慣於獨裁體制的中共領導者，多黨政治是十惡不赦、大逆不道之舉，對於平民百姓，却是要舉雙手歡迎的新事。

第四，中共文件把蘇聯當前的民族動亂和經濟下降也歸罪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政治改革，這也不符合事實，因為民族問題及經濟問題在蘇由來已久。生產下降和經濟落後，其源蓋出於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正是蘇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要解決的困難。在這一方面，蘇聯改革不是走得太快而是遠遠不夠。至於民族問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那麼，各民族人民自由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意願，恰恰正是政治民主化的表現之一。如果像中共對於西藏、新疆少數民族大開殺戒，將達賴喇嘛長期放逐在外，自然「風平浪靜」。難怪蘇聯一些少數民族權益爭取者要說，他們能在莫斯科示威，也要感謝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了。

### C. 「和平演變」之老調重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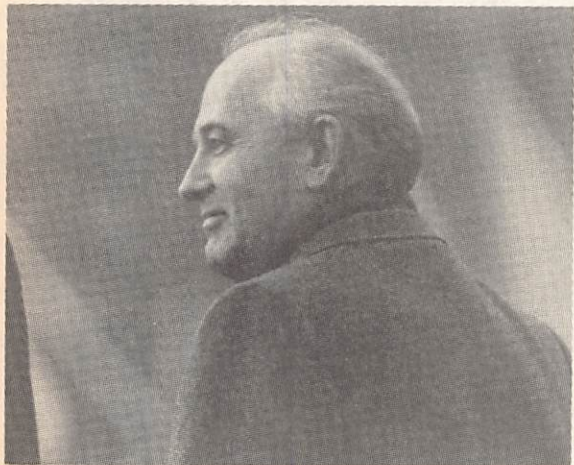
中共文件借西方輿論之口稱蘇聯在搞「和平演變」，是「修正主義」。對於這類說法，中國讀者最熟悉不過了！

想當年中國共產黨高舉反修大旗，與蘇聯共產黨開始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論戰，連續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是何等氣壯山河！過了幾年，等到文化革命結束，一看不對了，人家不是修正主義，自己也不是馬列主義，而是貧窮的假社會主義。

現在怎麼辦？再來一次反修？再來一次大論戰？再來一次「九評」？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這等能力，也沒有這般自信。且不說政治上難以調整，理論上無法自圓，連得一個像樣的寫作班子，我敢說中共也沒法組建起來。只好低調處理。於是，在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蘇聯的變動隻字不提。

如果蘇聯真的能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成功地「和平演變」，讓一黨政治演變為民主的議會政治，讓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演變為自由市場經濟，那麼，這將是蘇聯人民之大幸，中國人民之大幸！

### 新二月革命的推動者



D. 曾記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共文件說了一句老實話，這就是，蘇聯的演變「會比東歐劇變對我國產生更大的影響」。為了抵禦這種影響，中共文件又一次強調中國國情之特殊種種。

一般說來，每個國家都可以說出一大堆不同於他國的特殊性。我在這裡想說的中國的一個特殊性就是，作為它的立國之本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來自蘇聯。這就是毛澤東當年說過的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儘管從六十年代開始，中國對蘇聯採取了隔離政策，但是兩國的經濟模式，政治體制，理論淵源有着極其相似的地方。而且，地理的接近，歷史的聯結無法切斷。

所以，現在的問題也許是：俄國新二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民主主義。這就是說，現代民主主義的潮流不僅在從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國家」中接受文化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心中激盪，而且還在歷年來從蘇聯、東歐國家接受文化的為數不少的人物心中激盪。況且，後一種潮流更容易為共產黨的一般幹部 and 群眾所接受。兩股潛流正在合一，其勢為獨裁者所不可阻擋。

### E. 內藏殺機，亟須警惕

對於這種潮流，中共極權者不會坐視。在這個文件裡，殺機已露端倪，這就是所謂要「把各種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

這當然不是說說而已。親身體會到機槍坦克巨大威力的共產黨領導人仍然會迷信武力。對此，海內外民主運動力量應當提高警惕，密切注視中國法西斯力量有何新的動作。

# 倒霉的馬克思和幸運的馬克思主義

在現代史上造成如此重大影響的是馬克思主義，究竟留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

楊小凱

馬克思主義是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潮之一，有人認為它是危害最烈的思潮之一，我不希望如此輕易地作好惡判斷。但是我希望總結一下馬克思主義形成如此廣泛深遠的影響給我們的一些教訓（教訓一詞在此不含褒貶意義）。

由於在大陸生活過多年的背景，我會仔細留意過馬克思的各種傳記和人們寫的有關他的回憶錄。在我印象中馬克思並不是一個智商很高的人。有一篇回憶錄說他下棋老下不過別人，有時還發輸氣。我年輕時坐過牢，坐牢時經常下棋，我相信，下象棋、圍棋是測驗一個人的有效方法。但打撲克却不同，因為抓到的牌好壞對撲克中的勝負比智慧有更大影響。我坐牢時花了很多時間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覺得他對價值理論的思辯極為深刻，等到我讀懂了他的價值理論後，我長嘆一口氣，覺得他的觀點簡單而平庸，我用幾頁紙就能把他有關價值、價格、剩餘價值的觀點寫清楚，而這觀點中內在的邏輯衝突比比皆是。其最根本的錯誤是對「使用價值」（效用）存而不論，把決定價值的最重要因素拋棄了。以馬克思同時代的經濟學水平而言，當時經濟學的前沿是導數概念和數學中的最優決策概念引入對效用的研究，這就是有名的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與這一當時第一流的經濟學水平相比較，馬克思經濟學思想在他那個時代只是二、三流的。正如黃有光教授所觀察的，馬克思理論中有價值的東西（如勞動價值理論和分工學說）都不是

他的獨創，而他獨創的東西（如剩餘價值理論）都是錯誤的。

為什麼這麼一個從學術觀點而言，平庸的經濟學家會形成對現代歷史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呢（不管其影響是好是壞）？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主要從三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我們來看馬克思本人的事業。馬克思是個在世時非常倒霉的人，他從事過哲學研究，從事過在野的政治活動，從事過經濟學研究和政論，但都不成功，被社會所忽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做學問不成功，學術上不受人重視，於是改從政。在當時自由主義盛行，政黨政治開始制度化的條件下，從事在野的政治活動的確是前途無量的。但馬克思又遭到慘重的失敗。這與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想當霸主，用自己的主義統治一切有關。這種過時的政治作用，與當時在德國活躍於在野政界的拉薩爾等現代政治家相比當然不是敵手。第二國際的成立是這種現代在野的政治家的勝利，也是馬克思從事在野政治的最大的失敗。在這種失敗的沉重打擊下，馬克思又退回學術，這次是從哲學、政論轉到經濟學研究。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東西最有學術味的，還是他那幾年的研究成果——資本論，雖然那在當時的學術界只是二、三流的貨色。

最糟糕的是，馬克思在不斷失意的打擊下情緒越來越偏激，因此他的很多著作越來越帶有一種失意後的忿激情緒。這種忿激情緒有一

個嚴重的後果，那就是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造成自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等政治思想家以來政治理論的大倒退。洛克、孟德斯鳩的思想都是對英國第一次大革命中平等派革命民主主義（改朝換代）思想的否定，是向現代民主制度（三權分立，代議制民主）的進步。其中思想是要回答如何控制控制者的問題，而不是人民的直接革命民主主義（改朝換代）。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却是原始的革命民主主義加一點淺薄的二、三流經濟學的混合物。我們可以看到後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政體的設計都打下了這種革命民主主義的印記，它無疑是對現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反動。

這也可能是一個悲劇，一個在學術界意外的知識份子，把自己的忿激情緒變成政治思想史上的反動，用一點學術的裝飾而影響了億萬對學術水平沒有判斷力的大眾的思想。這裡有幾個問題，一個是如何以這種平庸的經濟學、反動的政治學會有這麼成功的影響力。第二個是為什麼這種思想會導致一種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的制度的實驗。不管這實驗後果如何，一種新制度實驗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它會給人帶來任何老制度內的制度創新所沒有的信息。第三個是，為什麼社會主義政治實驗這麼多年，却没有類似當年洛克和孟德斯鳩一樣的思想家，提出對這種政體的深刻而劃時代的理論。

我在本文中不回答第二、三個問題，而將其留給讀者。第一個問題與馬克思治學方式的特點有關。當代學術界的發展是朝專業化發展

，即使跨學科邊緣學科的發展，也會在方法論的某個方向專業化。以控制論而言，反饋概念是跨學科概念，但反饋的研究在控制論中却變成一個非常專業化的名詞。在這種專業化的特點下，學術界不斷細分和重組，形成了某種文化秩序。這種文化秩序的一個特點是依賴文獻積累和分工協作。那種孔子或柏拉圖能囊括整個人類思維所有領域的大思想家再也沒有地位了。而哲學這類過去涵蓋一切的學問却把自己大部份陣地讓給了經濟學、政治學、智能研究、邏輯學、數學等專門學科。哲學今天真正留下的東西只剩下語義學和非理性行為研究的一些方面。但馬克思的治學方法正是反這個專業化潮流而動的，他什麼都研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但什麼都不精。這一方面是他對專業化的治學方法理解遲鈍，而且這種遲鈍造成他學術上的不得意更助長了他那種「雜家」傾向，加上他的念世傾向助長了他想發展思想體系的願望，使得他和恩格斯後來有意識地把他們的學說發展成包羅萬象的宗教。

宗教和現代科學的重要區別有兩個，一個是科學是可以證偽的，而宗教不能；二個是科學裡專業化的，它不會自稱能涵蓋一切領域，而宗教的一個特色就是它企圖解釋一切，涵蓋一切。馬克思主義是宗教，而不是科學主要是因為第二點，而不是第一點。因為很多共產黨人都承認可以用實踐來證明馬克思主義之偽。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涵蓋大部份人類思想領域。這就是宗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這一點都很清楚，他們有關馬克思幾個部份的論述，他們有關來世的論述都是這種把學術宗教化的公開努力。恩格斯在不少地方明白無誤地表達過這種把學術宗教化的目的。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響的原因。可悲的是，第一流的學術不會也不可能宗教化，而只有二、三流的學術才有願望也有可能（因為它水平低）宗教化。

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種現代化的，有學術色

彩的宗教。這是馬克思主義不同於一般學術的地方，是它成功的原因，也是它失敗的根本。這種分析又引導我們到另一個問題，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問題，應該怎樣處理馬克思主義問題。我的回答很簡單，不需要大家一致地批判馬克思主義，而只需要來次新的政教分離運動。

社會主義國家的當政者可能不會接受政教分離的說法，因為他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種宗教。那我們可以改個說法，用一個詞來嚴格定義把馬克思主義這種宗教活動與世俗政治分離開來這件事。只要政教分離了，批馬克思主義就會變成今天西方社會中不同教派之間的鬭爭及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一樣普通的事，不需要當權者去干預的。

我不喜歡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是因為我擔憂青年一代知識份子的批馬情緒很像當年五四運動中的批孔情緒。這種情緒最糟的地方就是沒有一種容忍多元容忍哪怕是荒謬的東西的氣度。馬克思主義雖荒謬（至少現在我這樣認為），但也可能一百年後很多人（包括我的靈魂）會改變這種判斷。一百年前，哪有今天這麼多人痛恨馬列主義？中國的悲劇不就是有些人真誠地相信馬列是理性的（至少一九四九年是這樣），而孔子、國民黨反動派是非理性的。人類最大的悲劇不是那種被大多數人認為明顯錯誤的思想造成的，而是被大多數人認為是理性的東西造成的。正因為如此一個成熟的社會就要學會容忍，在大多數看來極荒謬的東西。比如說，馬克思主義雖荒謬，但社會主義制度的實驗的確給人類帶來極多信息，要不是這個實驗，可能現在各國的馬克思主義信徒要多得多，至少會像二次大戰前那麼多。現在之所以人們不願再重複社會主義試驗，當然已與有的試驗給我們的信息有關。因此從長遠而言，容忍看似荒謬的試驗可能是種極可貴的大智若愚的態度。

從宗教的歷史看，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前有

壟斷地位，因此服務質量低，價格高。宗教改革加歐洲政教分離的潮流（這是以多國並存互相關競爭制度改革為基礎的），使天主教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現在全世界有數百基督教派，這種近乎完全競爭的狀況，使看似荒謬的宗教能很好地迎合社會需要，容納科學，造成了文化燦爛。所以只要把馬克思這種現代宗教與政治分離，讓他變成普通宗教，並不讓任何教派有壟斷地位，則馬克思主義也有可能在將來復興，正像西歐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只要我們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從政治分離出去了，則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大權就不是我們這類世俗之人太關心的事了。

但我想強調的是，當前中國的民主派要提出一個好辦法來嚴格定義將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分離這件事，想辦法一步一步把它做成，既不要提批判馬列主義的口號，也不要籠統地喊反對「四個堅持」，正如有提打倒共產黨，而要提開放黨禁一樣。

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對我這類知識份子有着深刻的教訓。如果你想在學術上成功，就要老實實地遵從文化秩序，依靠文獻積累，專業研究一步一步朝成功邁，不要做大雜家，總想出奇制勝，一步登天。如果學術上不成功，轉而從政（不管在朝在野），就要做個實實在在的世俗政治家，不要總想創造新思想體系，做思想界霸主。如果從政，搞學術不成功，也可以做生意、搞技術，如果什麼都不成功，就到宗教去找歸宿，但不要又企圖把宗教和學術結合起來殺回學術界、政治界任何可能走得通的路。不管一個人選擇什麼道路都要老老實實面對同行年級的競爭，不要內行競爭不過了，又去求助外行的幫助。馬克思經濟學學術上競爭不過同行，從政競爭不過同行却刺激了他搞出一種宗教和學術相結合的東西來吸引外行的崇拜，而這種心態正是馬克思主義悲劇（至少對我來說是悲劇）的根源之一。

# 我們用什麼迎接下一個高潮？

當代中國民主力量由以海外、台灣、大陸為基地的三方面力量構成。未來中國社會的模式，宜先引入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爾後轉入北歐式福利社會主義國家。

伍凡

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經過六四大屠殺之後，已進入了一個對中國民主事業的沉思反省和認識深化的階段。在中國大陸有組織的民主活動已處於低潮；在海外的民主團體中正蘊釀着聯合或合併，以準備迎接下一個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高潮的到來。目前處於兩個高潮之間，無論大陸和海外的民主力量都在思考，下一次高潮來臨時應該確定何種戰略和戰術目標，採取何種策略手段，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是漸進的還是革命的。這些重大問題將關係到下一次高潮來臨後能否獲得成功。這些是每一位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都要研究的。

## 一、中國民主力量的定位

我們從事於中國民主自由事業的人們，首先要確定那些力量是屬於民主自由事業的，那些是可以團結的，那些是要孤立打擊的。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的民主力量由三個組成部份：(1)以海外為基地，包括香港在內，絕大多數華人，不論他(她)們的國籍如何，都是支持和同情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在海外以中國大陸留學生為主而組成的中國民聯、民陣、全美學自聯、港支聯和其他民運團體，是中國民主力量中最活躍的一支力量。雖然這些民運團體中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觀點不盡相同。有溫和的

、有激烈的、有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也有要徹底打倒共產的。儘管有分歧，但他們都在努力把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向前推進。六四之後從中國大陸外逃的民運人士參加了這支力量。海外的民主力量將為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保存和培養一批精英份子，以供日後中國大陸事業來到時發揮重要作用；(2)以台灣為基地，由國民黨、民進黨(非台獨派)和台灣人民組成的第二支民主力量。四十年來，台灣朝野共同努力，使台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不同於大陸的階段。中華民國政府處於台灣社會發展的現今階段，已步上民主漸進深化發展的道路，已不可能再退回強人政權的階段。中華民國政府一再公開宣稱堅持一個中國，並堅持代表全中國的法統，這樣它不得不關心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的發展，否則它將喪失中華民國存在的意義。從最近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台灣朝野有一股強烈關心中國大陸的力量在活動着，它們反對台灣獨立。只要是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仍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獨立，並且台灣社會繼續向民主化、自由化和國際化方向發展，則台灣可被認為是整個中國社會中的一支迄今最有實力的民主力量。它的存在和發展，將對中國大陸產生深遠的影響。隨着海峽兩岸的經貿和人員交流和深入發展，這種影響將會日益增

加。儘管以台灣為基地的民主力量有其自身利益要求，和海外的以及大陸的民主力量在策略觀點、戰術作法上不盡相同，但在總的戰略目標——結束中共一黨獨裁專制上是一致的，在具體的做法上可以相輔相成。海外的民主力量受助於台灣的民主力量不少。在今後長期的民主事業活動中，台灣這支民主力量可以發揮更有力的支援作用；(3)以大陸為基地，由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共和解放軍內的民主派所組成的第三支民主力量，這是一支決定中國大陸命運的力量。目前這支力量尚未組織化，但存在着巨大的潛力，正在等待着時機。從去年天安門廣場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民主活動中可以看出，這支力量對中國的民主自由的觀念還有待提升和發展。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們，甚至中和軍隊內部的改革派、民主派已從六四屠殺中得到教訓，更從東歐和蘇聯的變革中獲得了新的觀念。在下一大民主運動高潮到來時，他們將會有一個新的面貌出現。世界潮流在變，共產主義運動的氣數在變，中共頑固派也必定逃脫不掉這個大氣候。我現在不擔心中國會不會變和何時變，我最關心的是中國如何變，向哪個方向變，變的結果是什麼？

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上述三個民主力量應該聯合和合作，相互支援。除此之外，中國的民主自由大業將無法完成。既然談聯合

和合作，也就要照顧到各方的利益。不顧利益只談合作是夢想。在推倒中共一黨獨裁專制之後要在大陸形成多黨競爭機制，要讓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進入大陸，讓海外的反對黨派回國參政。

## 二、體制內改革或體制外改革

在我看來，體制內改革和體制外改革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大量的體制內的改革，就不會發展成體制外改革的要求。選擇體制內或體制外改革的唯一標準是符合大多數中國人民（包括港台、海外華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並且要考慮到當時人們能夠接受的程度。一般的來說，體制內的改革，在初期階段，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也多少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但在它的深化階段，由於體制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會逐漸發展出體制外改革的要求。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在農村和城市中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一部份人民的利益，但同時又損害了另一部份人民的利益。滿足了農民的利益，損害了知識份子和部份工人的利益，增加了黨政官員的利益，削弱了軍隊的利益，大幅度增加了近海地區的利益，小幅度增加或不增加內地邊遠地區的利益。這種利益分配不均勻，是由於中共的體制所決定的。這種體制內的改革是利益相衝突又相包容的矛盾的大組合。中共企圖不斷調整這種矛盾，使其處於平衡狀態。但終因其根本制度所限，觸發了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方面的矛盾的大衝突，最後引致了六四大屠殺，導致體制內的改革不得不大幅度縮減。這場矛盾大衝突大暴露，促使相當多的人們向體制外改革思考，企圖把中國引向體制外的改革。體制外改革在政治上的標誌是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立多黨競爭；經濟上的標誌是建立自由經濟機制。可以預見到，在中共老人黨未自然淘汰之前，體制外改革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在鄧小平

、楊尚昆、陳雲等未全部歸西天之前，中共仍只能採取體制內改革，海內外的民主力量應審時度勢，除了堅持體制外改革的政治和經濟主張之外，應充分利用一切對人民利益有利的體制內改革的形勢。具體的說，絕不放棄和中共接觸和談判的機會，以擴大民主力量的影響。對一些與中共改革派有密切關係的人，不要一味排斥他們。在中共還未放棄權力之前，他們這些領導人可以做中共內部高層的工作，促使他們的分化。在中國大陸民主事業中，應有不同的角色，擔當各種不同的工作，總的目標是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發展自由經濟。因此主張體制外和體制內改革的人們，在共同的綱領下，可以相輔相成的配合。政治活動是複雜的事件，我們只能用複雜的眼光和手段來處理。

## 三、和平改革或暴力改革

這是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在海內外的民主力量中不斷在研討的重大課題。和平改革或暴力革命僅是手段而已，是為目的服務的，這二個手段應該是可以交替使用的。這完全取決於中共對待人民要求的態度，也取決於人民的組織力量和人民覺悟的程度，不應事先規定究竟是和平改革還是暴力革命。我們無法預知中國大陸民主改革進程中的細節，只有事態發展的狀況，即中共的態度，人民的力量，軍隊的動向，國際的支援等等條件，才能確定是繼續和平改革或採用暴力改革。我們現在就規定未免有點紙上談兵。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我們不應束縛自己的手脚，我們可以採用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來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民主中國陣綫強調非暴力，自由民主黨（籌備中）強調暴力，我認為都有點偏頗，不能把民主力量保持在靈活機動的地位，長此以後會失去人民的支持。

盡管如此，還是有必要討論和平改革和暴力革命的後果問題。我們的目的是要結束中共

一黨專政，實行多黨競爭，民選組成政府，發展自由經濟。我們應該以最小的阻力和最大的長程效果來選擇我們的手段。回顧蘇聯七十年前用徹底的暴力革命，推翻沙皇政權，現在戈巴喬夫不得不走回頭路，爭取在蘇聯用和平的方式引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之道。與此同時，北歐國家也在大約七十餘年前，由社會民主黨採用和平方式，強調階級調和，避免階級鬥爭，成功的建成了社會主義類型的福利國家。蘇共和北歐社會民主黨的目標不盡相同，手段完全不同，長程效果則大不一樣。再看看中國的歷史，中共七十年來一直強調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弄得經濟落後，民不聊生，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採用比較溫和的方式發展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結果相差之大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些歷史事實，促使我們不得不仔細研究，和平改革和暴力革命的長程效果。和平改革看似緩慢，暴力革命痛快些，「欲速則不達」或許可以說明這種種結果的差異。暴力革命的最直接的後果是如何處置中國共產黨。我們能把四千萬黨員都殺、關、管嗎？就像中共執政後對待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黨員和官員，甚至民間鄉保甲長，都一概殺、關、管，斬草除根，製造世代仇恨。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應該尋找出一條路子，走出以暴易暴、世代仇恨的惡性循環。我主張，在結束中共一黨專政之後，用民族和解的方式，用談判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大陸的一切事件和事端。可以說今天在中國大陸沒有幾個人真心實意的喜歡中國共產黨，但有不少人仇恨中共，作為負責任的政治家，不能以仇恨作手段來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那只能以暴易暴，惡性循環不止。有人會問，當中共要動武殺人怎麼辦？有二條辦法：一，在中共未動武殺人之前，要盡量避免大屠殺的發生，用談判化解，爭取局部勝利或大步退讓，以保存人民的生命利益，以利長期鬥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又有軍警的支援，迅速組織人民和

中共展開武裝鬭爭，以最少的損失，結束戰團，最後仍以談判結束中共一黨專政，這有點類似菲律賓和羅馬尼亞情況。中和國民黨自一九二七年來的世仇至今仍未了，我們絕不能再造成大陸人民的仇恨。如何化解中共四十年來造成大陸人民對他們的仇恨，是個相當大的問題。只要中共放棄一黨專政，中共仍可以平等的身份參加競選，就如東歐國家正在舉行的選舉一樣。化解仇恨的方法之一是大力發展自由經濟，開放人們的生路，不必為權力而爭得頭破血流。一般來說，以暴力革命成功後組成的政權大多是不民主的。除了美國革命是個特例之外，其餘國家的革命政權都經過反覆多次的革命，如法國，才能穩定的走上民主道路。

我們不得不考慮，如果用暴力革命把中共消滅了，中國大地的權力真空如何填充，由誰來填充。非常可能是二種情況，軍隊管制，這又是獨裁專制的另一種型式；另一種情況是地方割據，形成大大超過於文化大革命混亂程度的大混戰，這都是我們所不願見到的悲劇，屆時民主運動的要求又會被獨裁者們利用後而葬送。在此，我們不得不再深思，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對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的有什麼的後果。

#### 四、未來的中國社會的模式

由專權獨裁制度轉變為民主制度，在世界上有不同的模式。有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式，即從獨裁走向權威主義型；有目前東歐式，即由共產專政走向民主道路，但至今東歐各國的模式仍未明朗化；有蘇聯戈巴喬夫企望走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應該走哪一條路呢？經過四十年的中共統治，要把中國演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如美國、英國或日本等制度，恐怕不是件易事。原因是中共一再提倡的社會主義平均思想深入人心，人們害怕競爭，工人和幹部抗拒改革的心理阻力相當大。所以由這

種現實狀況立即轉入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但中國又不能不改革，我想以減力阻力和穩定大局起見，先把中國引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然後經過一、二代人的適應，再轉入到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設想是為了在制訂反對派政黨綱領時作為參考依據。我想這樣的改革道路阻力會小些，

也能為多數中國人所接受。另外，台灣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比較接近於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對台灣海峽兩岸的統一也會有利。要走上這條路的關鍵是中共放棄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公平競爭，民選組成政府，大力發展自由經濟。這條路也是所有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可能走的道路。\*

## 納吉在絞刑架下的遺言

——我不願由殺害我的人替我平反昭雪。

李 封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的蘇聯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市。以伊姆雷·納吉為首的政府被推翻了。蘇軍逮捕了納吉和他的政府要員，開始了對這位改革者的審判。審判是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檢察長以莊嚴冷峻的聲音問了第一句話：

納吉答：「不，我無罪。」但他還是被判處絞刑。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是納吉的最後一次審判，他留下了他的政治遺言，他說：

「我曾兩次努力在我國維護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榮譽，那是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第一次，科拉西反對我，第二次反對我的則是蘇聯的整個武裝力量。在這個由熱情和仇恨構成的訴訟中，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願意奉獻它，我相信，歷史最終會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不過只有一點我不願看到，這就是由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

納吉站起來，扶正眼鏡，平靜地答道：「匈牙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檢察長楞了一下，大廳裡一片寂靜。

法官拉多輕聲對不知所措的書記員說：「前部長會議主席。」

納吉立即給予反駁：「不，據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職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合法機構對此任命表示過異議。」

法官又問：「被告是否認罪？」

兩天以後，六月十六日星期一，納吉在布達佩斯中央監獄的小拘留所院內被送上絞架。當絞索還沒有絞斷他的聲音時，人們聽到這位被稱為社會主義敵人的政治家發出的最後呼聲：「獨立的社會主義匈牙利萬歲！」



## 民主也是一種

## 生活氣氛和環境

陸丙甫

讀了「新聞自由導報」第九期上「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深有同感。是的，既然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那麼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做起。而且，民主還是一種生活環境，我們每個人既可以是她的受益者，也可以成爲她的一部份。

造成中國社會民主環境的缺乏，領導者固然要負重大的責任，但人民群眾也有不可否認的失責之處。畢竟，決定社會環境的，是佔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具體地說，從根本和長遠上看，廣大人民按民主方式辦事，行使民主權利的膽量，同領導階層寬容民主行爲的肚量，是成正比的。正是因爲人民長期來缺乏行使民主權利的勇氣，對上面一再地委屈求全和退讓，結果慣壞了領導人，使他們的民主肚量越來越小，越來越暴戾和爲所欲爲。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人人應該有意識去提高自己按民主原則辦事的膽量，如用真名講真話等等，從而影響周圍的人們，造成一種氣氛，使人們感到許多「犯禁」之事其實並不那麼可怕，習以爲常，最終使領導階層也對此習以爲常，潛移默化逐漸改變視民主爲洪水猛獸的習慣心理。

我常常痛感到，當人們埋怨民主不夠，呼籲更多的民主時，他們是否想到，對於自己手中已有的民主，是否充分地利用了呢？

應該承認，自打倒「四人幫」（實爲「五人幫」）後，特別是三中全會後，中國人民手中的民主權利，有了一次飛躍的長進。可惜除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積極鼓吹者外，大部份人們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民主權利不能適應，感到將信將疑，不敢認真地使用。這固然有歷史的原因，因爲上當次數太多，生怕又遇上一次「陰謀」。但其實許多事情當初無所謂真假，真如「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一樣，最後成了就是真的，最後不成就是假的，全由結局決定。結局未出來之前，無法判斷真假。我們所應做的就是盡量去做，使之鞏固，使之進一步成爲既成事實。退一步說吧，即使是「假民主」，我們也要假戲真做，努力使假的成爲真的。可惜，大部份群眾不敢去做，至使群眾呼聲微弱，上層缺少來自基層的壓力，從而措施失當，導致種種社會、經濟危機。而一旦上層覺察到危機深重，人民怨怒時，他們對於人民的行使民主權利就更加不放心和非加鎮壓不可。

曾經一段時間，國內對於一般群眾的違反「四項原則」的言論，是相當放鬆的。本人未出國之前，每逢政治學習，必大放厥詞，抨擊毛澤東，聲稱「糞土當年救世主」，比希特勒還壞，大淫棍，有世以來第一大偽君子；堅持「毛澤東時代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時代」的觀點，等等等等。周圍人或以爲本人牢騷太盛，

大概是插隊多年怨氣太多，損失太大所致，或以爲我故作驚人之語，嘩衆取寵。其實本人的真正意思，是深感這種講話機會，民主權利來之不易，是千百萬張志新烈士們的鮮血換來的，需加珍惜，充份使用，並造成一種不怕違反「四項原則」的氣氛。應該承認，只要不搞組織活動，這類嚴重違反「四項原則」的言論決不致於招至受迫害坐牢。至多被打上小報告穿穿小鞋而已，或升級評薪時受點委屈而已，或被譴小慎微者視爲是非之人而疏遠而已。但如果我們連小點小虧都不願吃，中國社會民主環境的改進還有希望麼！退一步說，即使坐班房的進步。如果我們不敢冒吃虧以及極小可能的坐班房的風險，去爭取先烈們用生命作代價去爭取的事業，我們還對得起那用鮮血染紅的五星紅旗麼！

本人出國後不久，又在「反動刊物」上發表「反動言論」，至今也沒有感受到家屬受迫害的壓力。我相信這也是一種普遍的情況。這本身表明了民主畢竟是歷史潮流，大勢所趨，正當情況下要堅持毛澤東時代那種全面的法西斯專政已屬不可能。有次領袖人員同我交談，說「你不要那麼過激麼，現在不是已比過去進步多了。你看，連你這樣二十年前的反動學生國家都放出來了，你在這裡發表錯誤言論後，我們也不追究，你愛人孩子不是照樣來探親了麼。這不就是民主嗎？」我回答說：「是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不這樣作，又有誰替你們證明中國的民主已有巨大的進步？你自己不也拿這點來證明現在的進步嗎！我們這樣作，正是以實際行動支持改革，參與改革。還有誰能比我們更有效地幫政府樹立民主和開明的形象呢？可惜政府配合不力，把一個楊巍抓起來，致使開明形象大受損失。」

很大程度上，民主是一種習俗，一種社會的約定俗成，一種既成事實。法律不可能太具

體，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和執行很大程度上依靠習慣和先例。相似憲法條文下的兩個國家，實際執行的民主會大相逕庭，原因之一也在於此。只有越來越多的入敢於以身試法（也是以身造法）去闖禁區，我們的自由空間才會越來越擴大。劉賓雁曾說過他用自己的行動，不斷擴大自己的民主權利，同時也擴大了別人的路。讓我們和他併肩奮鬥。

如果更多的人們能更早地更勇敢地去嘗試民主、行使民主，恐怕此次民族悲劇也不至於慘重到這個地步。這正如一個小病不斷的人大會暴病死去。在風平浪靜時多鬧點小衝突，可增強社會對民主的適應力，彼此學習和培養理智處理衝突的能力，反倒有助於避免危機時期的毀滅性衝突。

因此我深為贊同「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提法。民主精神處處可體現出來，推進民主也可以落實於日常一舉一言之中。民主不僅是一項偉大的政治事業，也是你我每個常人的生活。重要的大家都要有意識地去造成一種民主氣氛。通過我們行使民主的言行，使統治者明白：民主已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你們必須多多包涵學會習慣她。只要我們有膽量，他們遲早會學得有度量。

## 下一個聯合目標是誰？

——與李三元商榷

河鳴

民聯、民陣大聯合的趨勢實在令人振奮。在這鼓舞人心的時刻，李三元先生的觀點就顯得有些刺眼。他認為民運應該走「精英路線」，不必照顧那些反正不會怎麼參與、奉獻而只是看着熱鬧起哄的人。因為絕大多數留學生多只考慮個人利益。他們將來只是在中國發生變革之後，回去講講學，做做買賣（中春八二期）。顯然這個觀點是具有來表性的，但害處極大。

八九民運最深刻的意義就是向人們揭示了中國民主運動廣泛參與的可能性和必須性。在這樣一個形勢下，我們民運骨幹是沒有任何理由或借口來自我孤立的。回憶八九民運，其可驚之處在於有足夠的人參與，而其可嘆之處恰又在於沒有足夠的人參與。試問難道這上萬的參與者和那上億的我們期望的參與者，其中能有多少強於這四萬多留學生？其實毛澤東一生一再成功，看穿了就是他懂得最大限度地團結（和利用）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難道不知道農民最自私？他難道真相信工人最大公？然而他們都圍繞在他身邊直到他死去多年。換

一個角度講，如果我們連聯合起幾萬受過高等教育留學生的信心都沒有，我們何以有勇氣去為一個擁有幾億工人農民的落後國度爭取那不能吃、不能穿的民主和自由？於是我們的清英們的操勞不就顯得無益和可笑了嗎？在這上面，筆者十分敬佩胡平先生的胸懷與遠見。只要你翻讀一下他的文章，就會意識到他在始終平靜地面向着最廣泛的人們。我們的確需要幾員能役善戰的勇將，也需要能把民主當成哲學甚至邏輯學來加以研究的學者。可在這兩陣已經對峙的時刻，我們更需要一批像中共早期時的戰略指揮家，也需要更多的、不同層次的參與者。我有個好友，曾對一個認為中共固然可行也無人能替代的同事十分不滿。我以為這大可不必。此人畢竟是在「無人可替代」的認識前提下認可中共的。一旦他看到有新的力量可能推翻中共時，他很可能會來幫一把，而這種幫一把的積累效應之大可能成為基本動力。人們已從天安門廣場的百萬人示威中看到了這一點。

民聯、民陣組合的意義在於海外民主力量

開始成熟了。但要使這個力量本質地壯大，顯然還須與學自聯聯合，當然這種聯合不必是組合，不過發表一些聯合聲明仍是很有意義的事。劉永川已經表態：樂見民聯、民陣聯合。為什麼樂見？姑娘大了總是樂見別人的婚事的。因為覺得自己也該要輪到了。可惜身後有一群李三元先生信不過的人。反過來他們對我們也信不過，於是就這樣僵着了。有人說，打破僵局的最好辦法是誠坦。可民陣又太誠坦了。做了什麼好事又不顧或不說，怕人家不領情多難堪。其實，這大可不必。比如說，學自聯自成立起幹的最起勁也最出色的事無疑是J——簽證提案了。可憑心而論，在這長達半年之久的LOBBY工作中，隱姓藏名的「民聯份子」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是全一色的民聯份子在做事。可總部却旗不揚鼓不鳴。因此沒人知道。如果當初總部成立一個LOBBY小組與學自聯的LOBBY小組一起始終不懈地工作，恐怕效果會好得多。雖然案情不會變化，但這幾萬J——學生家屬及有良知的F——學生就會對你敬重而非敬畏許多。這樣也就給學自聯領導人以很大的主動權。事實上，世界上任何組織贏得擁護的基本手法都是為其可能的擁護者大張旗鼓地謀利益，無一例外。不過，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民聯、民陣與學自聯的公開合作，都無疑是海外民主運動的重大轉折。對中國的民主事業有百利而無一害，既然如此，那麼還等什麼呢？

民聯、民陣組合的意義在於海外民主力量

# 走出農民·政府·市民的百慕大三角

## ——改革反思之二一

中國現代化的困難，終究要回歸到農村——這塊凝聚着兩千年中國文化元氣的大地。

靜光

中國以往十年的變遷，最令人振奮的領域非農村莫屬了。這是幾乎所有人都承認的基本結論。但是，細細品味這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發展、農業增長和農民身份的種種變遷，人們可能會感到，根深蒂固的傳統深植在我們的鄉土社會中，一些事情的框架依然如故。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困難早晚要回歸到農村這片凝聚着兩千年中國文化元氣的土地上。

今天在國外學習的學生，絕大多數無法想像養育我們的中國農民是怎樣懷着希望拿到一片土地，又怎樣絕望地放棄在這片土地上追加資本。十年過去，歷史不久會告訴我們，制度的變遷需要不斷的投入和辛勤的耕耘，否則，傳統的力量會消蝕掉一時光彩耀人的碩果。

中國人口的壓力之大，技術之落後，制度之腐朽，文化之深遠，在人類棲息的這塊土地上，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縱觀中國發展的格局，如果能擺脫工業和城市的迷惑，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問題歸結到土地為本的經濟基礎，家（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結構和官為本位的國家運作三位一體的結構中，許多問題就會看得更加明確清晰了。

### 包產到戶——根本性的突破口

早在一九七九年，當滁縣偷偷實行包產到

戶且在第二年大豐收後，中央及地方各級的官員從恐懼、懷疑、震驚到最後一窩蜂地仿效，為中國農村變遷打開了一個根本性的突破口，農村公有制，這個令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今天社會發展，民族進步的絆腳石）傾注畢生心血於其中的烏托邦制度終於像花園口決堤的黃河水一樣，一洩千里而不可收，而這一生機勃勃的變革實際上是完全沒有制度設計前提的。只不過偶然觸到了機關——私有制，土地承包雖然不是標準的私有制形式，但在從完全公有到完全私有的制度光譜中，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確確是誘發個人利益最恰當的形式。生產效率的全面而大幅度的提高，不僅與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的新實用主義相吻合，並且也為由平反起家的新權貴提供了政治資本，使岌岌可危的中共帝國大廈又找到一根支柱。經濟的恢復從農村開始，這才有最後城裡的民主浪潮和革命。經濟欲望稍有滿足的人才會更迫切地去追求人權和自由。

想想中國農村走過的路，真有些黑格爾的邏輯學味道在其中。我們這個由中共一手建起的社會帝國主義是以生產全面社會化為模本而塑造的，而土地承包又將這一泡影擊破，使中國全社會陷入充滿銅臭的金錢角逐之中。而展望未來，新一輪的工業化社會的必然到來又會將中國農村重新在社會化的組織構架中形成新的

制度。這種循環輪轉便致力於改造中國的仁人志士多少有些感慨。因為，前些年的種種直接、間接的努力，都是推動中國向私有化總目標進軍的嘗試。而這些在中國制度中涵蓋表達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嚮往，在「六四」槍聲中告一段落。新的一輪希望何日能從東方重新升起，恐怕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悲觀嗎？這是事實。在這種禁錮人發展的制度中，唯一留給我們的只是失望，漫長的漸變過程。

以我個人對制度的理解，一個制度的好壞，並不在於它能創造多少財富，而在於它是否能提供一種健康有效的環境，在此環境中，人們可以形成努力工作，認真生活的合理預期，一切行為以此為基準作調整，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關係才有可能趨向和諧。而今日我們尚且謂之為祖國的那片土地，其制度之不穩定和腐敗，其統治者之冥頑不化，怎可能使老百姓有安居樂業之努力工作的心情？中國的困難雖然當前是集中在北京政府，也是集中在城裡，但用不了多久，農村的問題就會把這個政府送上斷頭台，如果僅在投資上作併盤遊戲，而不着手制訂土地繼承法和私有制財產方面的保護，中國農村的走下坡趨勢是難用中央財政的幾把米擋住的。頹勢必然。

## 農村社會的核心——家

中國社會結構之核心為家，而當初農村變革的主綫也一直圍繞着家在打轉轉，今天中國農村發展的徘徊和制度困境，在很大程度上看，依然是尚未擺脫出家的窠臼。而以家為核心的農村變革，正好適應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鄉土文化的表面需要。今天，中國農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土地無限細分下去的趨勢面前正坐以待斃，仍然是家的局限性在發揮作用。按人頭均分的土地使土地繼承的經濟合理性與社會效用發生了衝突：一方面，土地的無限細分威脅着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點，另一方面，無法控制的分家結果又進一步威脅尚未被瓜分的公地。照此下去，中國農業的生產格局在投入方面將是有限土地資源的無效利用，中央政府的農業投資，明眼人一看即知，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只是徒增農業部的官腔和大官們下鄉時隨行人員的隊伍，威風是威風，杯水車薪，難濟於事。

很多人認為農村的事好辦，關鍵是要有錢。而事實上，這些年，是農民手裡已有的錢，却没有多少投入現代化農業生產工具以提高生產力，而多數資本轉向住房，這是純私產，任何政府都難動的財富積累形式，不動產的投資膨脹顯示出農民對中共從骨子裡就不信任的程度。

中國農村以往十年的變遷，雖然總體上是制度變遷的探索，但平心而論，大多數的變化內容並無新意，只是以前舊事的重提和翻版，「包產到戶」五十年代就搞過，鄉鎮企業的發展也不是新鮮事，雖然在經辦形式上略有差異。事實上，比較新的困難主要集中在城鄉關係上，自一九八四年以後，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大發展，糧食供大於求的短期繁榮和城市工業體制開始走向市場以的那一興高彩烈的階段之

後，全面緊張的城鄉對立格局開始形成，以後一系列的農村發展之困難均可在其中看到城市在其中的影響。

細看中國的城鄉關係，其實不像發展經濟學者所說的什麼「二元結構」，中國的政府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政府在收購農村農副產品中，扮演著獨個頭者的角色，從而成為買方壟斷的市場，面對聲色俱厲的政府收購員，年收成愈好，農民愈吃虧，糧食多了，政府收購時就壓級壓價，拖欠糧款，以致豐年也有農民鬧事；其次，政府給城裡人的糧細補貼愈來愈多，以致形成各級財政的重大負擔，而這筆負擔最後還要有相當一部份通過工業品價格的漲價和農產品的壓價進行不斷扭曲的調整，以達到暫時緩解矛盾的目的。城裡市民面對狂漲的農產品價格，一方面大罵政府的無能，一方面却在盡情享受多樣化的農產品，而政府夾在其中，深知「舉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小市民之厲害。在政府、市民和農戶的「百慕大三角」中，市民扮演純消費者的角色，政府扮演家長，從農民兒子的手中搶過饅頭去喂給市民女兒，而農民兒子老實，乾受氣。

## 如何保護私人財產？

雖然政府在中國農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包產到戶過程中，基層「瓦解」，上層「理解」，但隨着改革時間表的推移，能夠在中國現實條件下實施的錦囊妙計是愈來愈少了。而在農村財富增長的同時，各種對財富的保護並沒有形成。因此，種種黑暗行為頻頻發生在遠離大都會的窮鄉僻壤之間。

中國共產黨之腐敗並不是中央政府官員的特權。我們常常痛恨鄧小平的兒子，賀龍的女婿，趙紫陽的兒子等高官顯貴的行為，其實，中國的共產黨，可以說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暗的，各種侵權行為，俯拾皆是，在鄉下開

車跑一百公里，可以遇上十幾道卡，每卡收費一至五元不等，但來頭都是各級政府。警察的兄弟可以互借制服，攔路收取「護路費」，然後兄弟倆瓜分。各種各樣的「稅」、「費」，巧取豪奪，層層「剝收」，以供養縣城辦公室裡的老爺，這批老爺除了陪上邊的大員吃酒，大概只識四季的變更了。雖然中國縣鄉村各級政府中有不少埋頭作事的「清官」，但能出污泥而不染者，真謂鳳毛麟角，清朝有一「養廉制」，以養廉銀控制官員的收賄，今天，面對發了財的鄉鎮企業家們，寒酸的縣官們為什麼拒絕送上的門的「紅包」呢？一切都很自然，在中國這樣的制度構架中，提高生產效率換來的幾許剩餘就這樣被政府消耗掉了，吃紅包的不僅是政府，社區的長老和各種關係都要打點到，否則，換地方吧！在鄉下跑企業調查時，常在一鄉見到鄰鄉的人在該鄉建廠，且多為成功，追問其原因，曰：「此地無人識我，只識貨，故生意好；家鄉人頭熟，大家都來順一把，小本經營哪裡擔得起！」只好易地創業。

怎樣保護住自己的財富呢？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建房子；對於農民企業家來說，無外乎三條路：找到盡可能高且夠得着的官方大員作保護傘，如在家掛一張和省長或地委書記的合影，那就大不一樣了。這種護身符並不是人人能得到，因此大多數人只能靠不斷的發送紅包來打點收費的官員。總之，紅包的數額總比開出的名義上的官方標準要合算，也就是較低的交易費用，政府官員也樂得一筆現金入腰包。在農村改革後期，人們的膽子也愈改愈大，當然因為官方收費的標準也愈來愈高。最為令人悚目的是，很多地方開始了「捐官」，一開始是秘密的，以後漸漸公開，大有重演清朝捐官舊戲的趨勢。當然，捐官依條件不同而價錢不同，僅轉為地方城市戶口，且有一個「文祕」虛銜者，二萬；若轉戶口為城市且有糧油關係並有幹部待遇，五萬以上；各種名目，應有盡有。「頂戴花翎」的鄉鎮企業家自身家小從此



包產到戶為農村帶來生機。

轉變了農民身份而與城裡人比肩了。許多企業主由於失去獨立人格，政府官員要聽上司的話，企業從此不斷虧空，常有人來借這借那，從來不還的，企業一旦約束沒有了，財產界綫沒

有了，很快就顯出一片破敗。中國的鄉下才是中國的本色，一切都和一百年以前一樣，那些人，那些手段，雖然機器換了，語言時髦了，但「元氣」還在，源遠流長。

農業、農村、農民三位一體

毛澤東的時代，對農業做過水利化、機械化和電氣化的夢。今天，這個夢依然盤迴在許多人的腦海中。舊時的農業官僚總寄希望中央能夠在財政盤子上給農業多切出一塊，而年輕的一代農業經濟學家則希望能夠農業、農村、農民形成三位一體的和諧發展。這種努力必須整合在某種主動的制度創新之中。

隨着一九八四年農業生產達到巔峰之後，農村戰綫的改革措施一片沉寂，人們很少聽到真正的改革措施出台。而我們深知，在中國農村這個舞台上，可唱的戲還很多：土地私有制的立法、公地資源和地稅改革、戶口和移民政策以及糧食市場的建立等等。但問題涉及的方面愈多，阻力也愈大；事情愈難辦，想辦的人就愈加謹慎，在中國官場制度中，想作康有為、梁啟超的人有之，想作李鴻章和張之洞的人也有之，那麼問題在於如何行事了。

一九八七年，當李鵬一行人馬進駐國務院後，趙系改革派在京城的實力和勢力日趨孤立，加之城裡的通貨膨脹所引發的牢騷使陳雲一伙的緊縮計劃派頗為得勢。此前胡耀邦的下台，其實是中國改革之完結。當然，還有人抓住農村這塊唯一屬改革派的陣地不放，希圖通過建立實驗區的方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農村點火，在城裡冒煙，推動制度變革。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改革的最後一場戲登場了。制度建設試驗區，全國以縣為單位的試驗區有十個，地級試驗區一個，這一最大試驗區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下屬發展研究所的一批年輕人蹲點二年，先後調查、研究並推出幾十項頗具突破意義的制度試驗項目，以後又為世界銀行所關注，並為中國農村政策貸款引來大筆美金，作為扶植政策實施的財政後盾。

一九八六年以前，中國農村的改革可以歸結為一個「放」字，一切束縛農民發展生產力的舊條文和舊框框，統統在包產到戶的大潮下蕩蕩一新。但自一九八六年開始，怎樣保障農

業發展的長期穩定性的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以農業部為主的政府官員在沉默了八年之後，現在跳出來大喊，包產到戶把中國農業引向分散化，水利失修，再投資不足將引發新一輪的農業危機，因此，大聲呼籲中央政府增加農業投資，中央農業投資一增，農業部就會有權，地方官才會來巴結。他們認為，包產到戶的潛力已經基本枯竭，農業發展的進一步問題主要是一個國家投入的問題了。以杜潤生為首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則認為，包產到戶的政策所誘發的制度變遷過程進入需要全面制度保護的階段，農村各方面的立法工作如果不能跟上的話，很好的政策會走樣，各種規範不建立，傳統的鄉規習俗就會佔統治地位，其中有些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摻雜着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因此，在從中央到地方對農村發展前途均有些茫然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現行的政治結構和各種條件，及時地從「上下結合」的角度，積極引進一些法規和經驗，無論來自中國還是其它國家，在可操縱、可觀察的有限地域中進行制度創新的試驗，可能不失為一良策。

具有戰略意義的試驗區

中國的事情，唱改革就難，憋着勁去幹就更難。許多人只會說，中國應該怎樣改，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還是市場經濟也好，目標大抵認同，但究竟怎樣去操作，有幾分成功的把握，一步步走多遠。其中的甘苦，大概就鮮為人知了。從世界銀行在中國的調查報告中看，在全國範圍內設立的試驗區，真正是有國家級眼光和戰略意義的試驗區，大概是設立在安徽省阜陽地區的試驗區為頭號。今天，由於發展所參與「六四」民運，作為幕後黑手，全所已被撤消，但試驗區辦公室却保留下來，因為它手裡掌握世界銀行的貸款。

從試驗區建立之初到逐個「立項」，先後

花費了近一年的時間作全面的調查，從政權運作結構、人際關係網、經濟優勢或民意、從農民企業家到純農戶，僅訪談記錄就整理出幾百份報告。在此基礎上，試驗區先後建立了二十項「項目」作為一期實踐的目標，從這些項目中，我們應該能嗅到其背後隱含的制度意義。

位於安徽省中部的阜陽地區是中國的典型傳統農區之一。因此，選擇這樣的地區作為制度建設的實踐，本身就是一種希望這樣的試驗能具有盡可能廣泛的意義。

全部試驗分為三個部份：一是企業制度的規範化；二是政府形象和行為的塑造及調整；三是市場的社會環境之清理。

就中國農村廣泛興起的鄉鎮企業而言，其根本問題並不在於這些企業是多麼「土氣」，而在於企業本身存在的種種「模糊性」使企業的性質令人捉摸不透，企業是誰的，說不清，產權不明晰，債權債務糾纏不清。中國經濟的根本在產權制度的重建，這種嘗試要在城市裡的國營企業中較為系統和徹底地進行，其困難程度要大得多，相對而言，在中共控制不那麼嚴密的鄉村可行性大。為了有效地積累制度建設的經驗，試驗區的工作人員由中央農研室

發展所的研究人員和省、地、縣三級幹部組成調查小組，對一百多家企業進行了訪談並對四百家企業設計了調查表，將當地企業類型按照國際企業分類標準和各企業特性，適當地進行分類，並對各類企業分別選取樣本，做重點考察作制度規範的設計，其中主要包括：純私人所有制的企業；合股企業，以政府部門掛牌的「掛靠企業」；租賃制企業等等，都相應有了行為準則和制度規範。不僅調整了企業內部的勞資關係和企業間的技術關係，也調整和完美了企業與各政府部門的關係，西方現行制度中的「一分享制」也在傳統中國的鄉鎮企業中找到了試驗的機會，所謂「一分享制」是指工人和資本家共同分享利潤部份，工人參與分紅過程，相對穩定了企業內部的衝突關係，並穩定了企

業在風險環境中的預期，從而較容易對付宏觀形勢波動造成的經營風險。

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受到鄉土關係的約束，且分佈極為分散，中國耕地之稀缺是未來發展的重大課題之一，集中布局需要極為恰當的制度調配過程。佔地過多，佈局分散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關注，試驗區的作法是創辦農村工業用地，形成企業成組佈局的聚集經濟，同時，利用地理集中的優勢，在工業小區內進行戶籍、金融和財稅的集中性制度創新活動，以期杜絕傳統體制和血緣及地緣關係對企業財富的蚕食。

中國農民一向遭受「官」的欺負。「衙門難進臉難看」。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却不得不和官去打交道，蓋章是小事，關鍵是根本不知蓋什麼章。在政府辦事程序方面，幹部任用方面，機構設置方面，試驗區都利用現行體制的弱點，積極引進「合署辦公」制度，放棄任命幹部制而實行全縣公開招聘局長，編訂辦公企業的百科叢書和指南，以期改變政府形象——把事情搞得難辦來顯示自己的權力。這大概是顯明的體制內改革的嘗試了。

對於各種集市和交通線上亂收費的現象，試驗區首先將權力集中在稅務局，統一行政管理，確實應收服務費的部門，如藥檢、衛生檢疫、環保部門，則由財政稅收中統一劃撥，以斷掉市場內部進行的種種櫃台下的交易。

中國的建設和改造，在經歷了十年辛苦探索中終於明白，單純的經濟改革只能局部、短期地刺激生產者的生產效率，長期穩定發展的預期必須對人、對財產有明確的保護和規範，單純放開政策之後，更重要的是要有制度的創設。

中國農村的興衰，往往標誌着中華民族的興衰，當中國尚在工業化的起飛跑道上一度「一起飛」中，農業的結構變化和發展，決定着中國能否盡快實現現代化。而這一切希望，在九〇年代，好像重新變得遙遠了。\* \* \*

紀念[六四]烈士犧牲一週年評選並獎勵優秀歌曲(新作)

中國海外文學、藝術家人權同盟 籌備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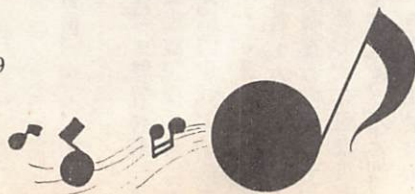
敬 啓

鑒於聯合紀念「六·四」一週年活動之需要，本組織原徵集的六·四歌曲全部移交至美國史丹福大學「有獎徵歌比賽」處。凡有新投稿者，請直接寄

地址：P.O. BOX 8872 STANFORD CA94309

截稿日期：五月十五日 歡迎踴躍投稿

詳見世界日報三月五日廣告



# 三十八軍徐軍長走上軍事法庭

易京兵

三月底的一天，徐軍長和新兵們一起進行

投擲手榴彈的軍事訓練，不幸將腿摔成骨折。

這位卅八軍軍長住進了北京軍區陸軍總醫院。

在四月初至五月中旬的四十多天的住院治

療期間，徐軍長有幸耳聞目睹了北京發生的學

運。每當他從報紙上、電視裡看到了絕食的學

生，便熱淚盈眶，他被學生們的救國獻身精神

深深打動了。他總是愛從醫務人員和病友那裡

打聽各種消息和他們對學運的看法。據在北京

接近他的人說，「徐軍長那些天變得沉默寡言

了。」

五月中旬的一天，這位卅八軍軍長突然被

召進北京軍區司令部，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和政

委劉華清向徐軍長傳達了由鄧小平簽署的軍委

命令，要卅八軍火速開進北京，制止動亂，徐

軍長沒有表露任何違抗命令的言行，他立即架

着拐棍，奉命趕回卅八軍。

在軍部，徐軍長召集各級指揮官，進行戰

前緊急動員，並親自做好了各項兵力部署，和

進京日程安排。當一切就緒後，徐軍長給軍區

打來電話，說他因病不能帶兵進京。軍區司令

員說他這是違抗命令。徐軍長回答說，不管上

級給他定什麼罪名，他都絕不親自掛帥出征。

隨後，徐軍長掛上電話，便以請病假為由，

的確，他的腿傷還沒有好，要知道「一傷筋動骨

一百天」私自離開部隊，又回到北京的陸軍

醫院。

楊尚昆聽到此事後連續幾夜不能睡覺，他

大發脾氣，驚恐不安。他親自簽發一道軍委命

令，解除這位卅八軍軍長的職務，並將他立即

押送軍事法庭。

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拿着這道命令，帶

着一隊保安人員，來到座落在朝陽區的陸軍醫院

，他們把軍委命令拿給徐軍長看完後，問他：

「你還有什麼意見嗎？」徐軍長平靜地回答說

：「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準備。我是軍

人，沒有服從命令，埋該如此。你們執行命令

吧。至於學生運動，我有我的看法，現在還不

能下定論。」

隨後這位卅八軍軍長被押上警車

被關押在軍事法庭期間，徐軍長那雙炯炯

有神的眼睛並沒有失去它的光芒。那是捍衛真

理的光芒，那是一個軍人絕不屈服的光芒！他

用平和婉轉的語氣告訴審問的人說：「人民軍

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不能沾污這個

歷史。」

同學們，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感人

的故事。讓我們永遠記住這位民族英雄吧！你

們也有做父母的那一天，但是，請別忘記將這

個感人的故事告訴你們的子孫後代。

徐軍長，您的戰士不會辜負您的希望，全

國老百姓會永遠記住您的。

向民主英雄徐軍長致敬！

李封

## 斯大林的



李封

葉弗申·留彼茨基是烏克蘭文尼察市的一

個會計，如果不是位秘密警察偶爾看中了他

他也許一輩子都是一個最普通的人。他成爲傳

奇人物是因爲他的相貌。他酷似斯大林。

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天，留彼茨基突然神

秘地消失了。沒有人引起注意，在當時，神秘

失蹤的事情不足爲奇。留彼茨基被秘密警察帶

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棟豪華別墅裡。從此他成

爲斯大林的替身。

留彼茨基經過了嚴格的訓練。他要學會斯

大林的講話口音，走路姿勢，生活習慣，甚至

抽斯大林式的烟斗。他裝扮斯大林第一次公開

露面是接見蘇格蘭的一個礦工代表團。當然，

騙過這些外國人是很容易的，他們從來沒有見

過真的斯大林，見到留彼茨基就足夠了。一切

都很順利圓滿，成功的留彼茨基回到了他的別

墅，從此他應有盡有，享受着和斯大林一樣的

待遇。

留彼茨基代替斯大林露面的次數越來越多

，他不斷上工廠、下農村，和勞動模範握手。

最後他竟然代替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節和五一勞

動節站在列寧臺上檢閱遊行。每當他從紅場回

來後，心裡都激動不已。

後來，留彼茨基扮演的斯大林到了爐火純

青的地步，以致斯大林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分辨

不清了。斯大林有時也開玩笑，讓他去騙一

下自己的翻譯和衛士。有一次秘密警察頭子葉

諾夫來滙報工作，斯大林讓留彼茨基去應付他

，而自己隔着玻璃窺視。當他發現連葉諾夫也

上當時，大爲開心。

斯大林死前的一年，留彼茨基又一次失蹤

了。逮捕他的人同情地對他說：「我們也沒辦

法，斯大林同志，我們是執行命令，您知道得

太多了。」

# 一個大學生按摩女的自述

純潔的海南島成了一個大賭場

多少女性在這裡苦苦掙扎

未名

「未名，你好！」

自從北大畢業時一別，匆匆過去了七個年頭。我們每個同學的命運差異極大。回顧過去，彷彿做了一個很大很長的夢。想當年我們曾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一起在大飯廳爭論，一起在大操場跑步、打排球……太久太久的事情了，每當想起這些我就會淚流滿面……」。

聖誕節前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來自大陸的大信袋，娟秀的字體使我想起那個苗條漂亮可愛的中文系小女生夏黎。她是我們五四文學社的詩人，也是中文系的系花，曾引起無數燕園才子的追求和愛慕，我也曾是她戀人隊列中的重要一員。說不清由於什麼原因，在我臨畢業時，我們分手了，一幌這麼多年沒再見面。出國前聽說她由於不滿在某兒童出版社呆板的編輯工作，以一個湖南姑娘特有的果斷和勇敢，毅然辭職離京到海南島尋找新生去了。以後似乎沒有再聯絡過。我很奇怪她為什麼來信，又為什麼寫這麼厚的信。

「我由於不滿北京的古板和窒息的社會空氣，隻身來到海南，但一切更令我失望。這混濁的政治，荒唐的改革。把一個純潔的海南島變成一個大賭場。看到昔日同學一個個躍升高位，有的爬到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職位，有的成爲作家、經濟學家；有的則遠涉重洋去鍍金和淘金，而我却在這塊已被污染的土地上苦苦

掙扎，又沒有勇氣回到北京。六月四日的慘況使我完全喪失了回去的信念，我相信命運。也許上帝就專門安排我去體驗各種生活，然後在一間冷清的小屋中去寫我的大半生。這是真的嗎？未名，記得我們在一起時，你曾說過我永遠當不了作家，永遠不會像我的同學陳建功、張曼菱那樣安靜地坐在桌前，因爲我太浮了。爲此我很痛苦，如果你知道我的現在，你也許會更加強你對我的「偏見」。但我還是想告訴你，我必須告訴別人我的現在，要知道我是多麼地孤寂……」。

我很瞭解這個會迷醉北大男性世界的湖南女孩，但當我讀完下面的材料，我幾乎驚呆了。我好像不認識她了。她所經歷的世界是那麼遙遠，那樣難以接受。她的任性，她的勇敢，她的遭遇，她的經歷確實是我們北大人所少見的。也許對於我的讀者，她的所歷所聞會幫助你們認識一下今天的海南世界，瞭解改革開放所提供的另一側面。所以，我在徵得作者同意之後，將這篇題爲「一個大學生按摩女的自述」如實照錄：

## 一、走進祭壇

我拎着身邊唯一的漆皮小箱，作爲一個大學生按摩女，走進位於海口市郊的海南桑那浴

按摩院的門內。

按摩院的大門口供奉者持刀怒目而視的關公，像的兩邊對聯寫着「忠同日月義同天，志在春秋功在漢」，據說是請關公保佑老板平安地招財進寶。另一說法是按摩院邪氣多，關老爺可以鎮邪。我在關公像前香火的裊裊輕烟中，合掌祈默默禱關公驅邪避難，保佑我度過難關。

## 二、崛起的「綠房子」

在海南被宣佈爲經濟大特區後，起初連桑那浴和按摩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人們聽說這行當非常賺錢，也都紛紛自己掏錢或與港商合資在旅館或商業區樹起光怪陸離的霓虹招牌，桑那浴按摩院便以雨後春筍之勢孕育而生，由零發展到幾十家。大可以大到包下整幢賓館，裝飾豪華，富麗堂皇，按摩小姐人數達六十多，小可以小到私人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美容美髮店後面也提供按摩服務。按摩小姐只有二、三人。這些按摩女郎百分之九十九的是一大陸妹。這也是根據顧客心理挑選的，她們來自北方，身材苗條，皮膚光滑白嫩，相貌很「靚」，所以能招客。

我坐在老板辦公室，等待和經理見面，四週靜悄悄的，沒一個人影。牆壁上貼滿關於公



司員工的各項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及罰款制度，以及按摩房裡按摩的程度。

經理是個保養得很好的矮個中年男人，問我會不會按摩。我說不會，他說原則上學五天實際上學一個下午就可以工作了。隨後拿出合同要我簽名，我只記得其中的主要幾條。簽完賣身契似的合同，經理便領我去宿舍。

這所按摩院設在一座賓館的整個頂層，進門的第一個感覺是光綫灰暗，供奉在木盒中的財神「關公」在暗紅的燈光下顯得威武軒昂而又有點滑稽可笑；彷彿是守衛收銀櫃。旁邊收銀櫃的正前方緊閉着兩扇用紅綢遮住的大門，一扇上寫着淋浴室，另一扇門上什麼也沒寫，但來人自然明白，那裡肯定通向按摩房（鐘房）。門外有一名身著大紅錦繡旗袍容貌秀美笑容可掬的迎賓姐，旗袍的側縫一直開到大腿根部。淋浴室的外間四週的牆壁立着木櫃，每個木櫃上有許多小抽屜，掛着鑰匙，專裝客人換下的衣物，兩個木櫃間擺放着一個巨大的化粧櫃，各種進口的化粧品和吹風機可供客人選用。浴室裡間便是沖涼和芬蘭浴蒸氣浴的地方。沖涼的地方和一般地方沒什麼區別，只是每一間都用木板隔成單間，一般人都不會蒸浴，裡面封閉嚴密，蒸氣悶得人透不過氣來。只有患感冒和欲減肥或有其它疾病的人才會進去。在浴室的盡頭，有一扇小門，推開小門便到了貴賓休息室。在這裡由經理和公關小姐負責招待客人和安排做鐘小姐，客人也可以點自己喜歡的小姐。

推開那扇什麼也沒寫的紅門，眼睛竟一下難以適應裡面暗淡的光綫，絳紅的地毯筆直延伸過去，在黑暗中泛出郁郁黑光，在不足三米的走道兩邊按摩房並立，每邊約有六間，每個門前放置的長青樹因缺少陽光和水分而奄奄一息。鐘房的面積約有十五平方米，米黃暗花之帆呢窗簾嚴實地遮住日本拉門式的窗戶，透不進一絲光。乳黃色的隔音壁顯得富麗華貴，與整個屋裡的光綫很協調，天花板上懸着三對雙

杠式的鐵桿拉手，用於按摩小姐踩背時用。普通房有三張沙發床並排橫放，床的寬度僅夠一個人躺，在床的前端有一圓形洞孔，供客人臥下時便於呼吸。在床與床之間用和窗簾同樣面料的簾子拉上。但聲音是隔不住的，每張床都配有一個和床差不多高的四方凳，以供小姐休息用。靠近門的那面牆壁砌了窄窄的壁台，上面擺放着兩個烟灰缸，一盒潤滑劑。豪華房和普通房不同的是只有兩張床位，多一付沙發和茶几。在客人不多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安排一個人一間。每間房都裝有無線電話，供起鐘和報時用。看着這些房間的格局和佈置，我不知道怎麼搞的，一下聯想到電影「望鄉」，心裡頓時不自在起來，很想馬上逃離這個地方，但腳却沒有抬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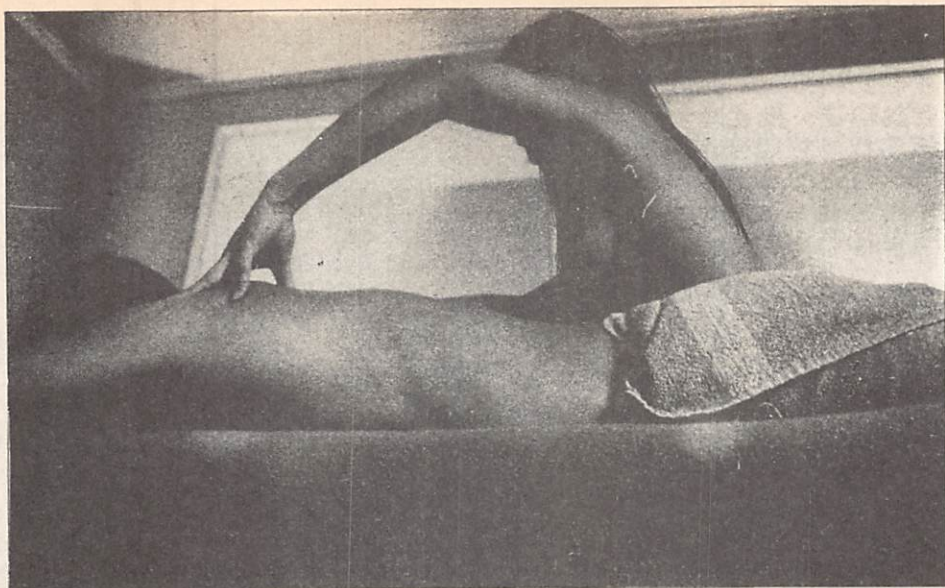
在鐘房通道的盡頭，一拐角裡面竟還有三間房並立，迎面一道鐵門使裡面與外界隔絕起來。經理說：小姐們白天睡覺，晚上七點到第二天早晨七點為工作時間，隔三天做一次白班，上完白班後繼續上晚班。以後你慢慢就會習慣的。他將眼睛在我過時的衣服上停留一會，說道：在這裡工作一定要注重儀表，穿著華美一點，對公司對你自己都有好處。從他注視的眼光裡，我看到了一種淫欲。我一下明白為什麼大白天這裡四週沉寂的原因。按摩小姐們的宿舍離我想像的實在相差太遠。十幾張上下舖的鋼絲床像枕木一樣緊緊挨着，彼此之間用白絨帳隔開，有幾個披頭散髮，戴着乳罩，下體只穿條巴掌大的三角褲的女郎像患了軟骨病一樣東倒西歪地坐在地上吸煙，其中的一個正在用撲克牌算命，看見我進來，她們並不熱情，只是用漠然呆滯並帶有排斥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下，我打了一個寒顫。一位看上去像個大姐的女人走過來幫我安置好，看她體型一定成家並生育過，一下子我覺得有些親切感。

我躺在床上，蒙起被子，我不知道在這座「綠房子」裡將會發生什麼，今後的日子怎樣過？心裡一團亂麻。

### 三、我覺得自己像乞丐一樣

華燈初上，霓虹燈做作地閃爍着，充滿某種暗示。

小姐們的宿舍裡一片忙亂，供小姐沖涼的僅有的兩間浴池。門外排着罵罵咧咧的後來者，似乎晚幾分鐘便會損失幾個客人。「一四八號，喂一四八號，叫你到四號房做鐘了。」「猛」然間，有人在叫我的代號，大姐推了推我說：「別犯傻了，好好幹，祝你走運。」我木然地走在通向鐘房的狹道上，猶如一頭迷途的羔羊。在四號房門口猶豫了一下，輕輕推開門，在昏黃的燈光中映入我視野裡的竟是一堆肉團，面目不清，只模糊看出如皮球樣的圓腦袋。隱約覺得那人也在上下打量我。我走進去，極力調節自己的情緒，心裡說，既然幹了，就要幹好，以指法取勝，我臉上打起笑容，對那人點點頭，胖子也用很濃的廣東普通話說道：「小姐，您好」，仍然用眼睛打量着我，我讓我躺到二尺見方的按摩床上，說道，請您趴下我先給您按背，他將「皮球」埋在床前的圓洞裡，將背部的一大塊脂肪呈現在我面前，我只感到一陣厭惡，趕緊抓起一條長毛巾捂上，開始做脊椎指壓，不一會，大拇指便開始隱隱作痛，汗水沿着面頰淌了下來，流進嘴角，鹹鹹的，像我的淚，我將鹹水咽進肚裡，昏暗中，從地底傳來胖子發出的愜意的呻吟。「我什麼事不好幹，跑來做這種下賤的工作，我這時非常痛恨自己，此刻我多麼渴望愛人的手把我從這個火坑裡拉出去，我將眼睛徒然地望著如一堵牆將我和外界隔離的窗簾。外面的人聲車聲彷彿來自另一世界。強烈地誘惑着我，我在心裡調整着，把客人當成蘿蔔乾，半個鐘頭過去了，一切都平靜，什麼事也沒發生，該做頭部了，胖子翻過身，我看到一張典型的南方型的面孔，他問我，小姐是哪裡人，我說是湖南人，我反問他，他說是香港人，開有一個汽運公司



按摩女心中苦，誰能知？

，來海南考察。他問我來海南多長時間，我說大概半年。他從反面翻了翻眼皮看看我：「這麼長時間，你都做些什麼？工作一直在這裡嗎？」

轉說道：「小姐你很美，身材很苗條」，我謝謝，他說他很挑剔選了幾個小姐才看中我，問我能不能夠特殊服務，我說你來這裡又不是選太太，他說花錢不是看老太婆和醜八怪的，說完有意無意地將手搭在我的腰上，我順勢將他的手拉下來裝作按摩手臂，問他對海南印象如何，他說不行，基礎太差，交通不便，不過想從旅遊或運輸上試試，他又問我是否一個人來，我說是一群老鄉一塊來的。孤獨寂寞了好長時間的我忽然產生了很強的交談欲，於是給他講了很多關於海南的事。找工作、開公司以及所遇到的困境，還有眾多女孩的遭遇，他坐起來注視着我問我是否大學生，我說是，「那你為什麼到這種地方來，這裡名聲很糟糕。」我心裡猛地往下一滑，他的話一下把我拉回到現實處境中，拉回到所處的低賤的位置上。而這種處境又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我不願在他面前流露自卑心理，顯得氣短，我說選擇的就是理智的，這種選擇對我不妥，但既然選擇就有選擇的理由，他探究地看著我說你似乎不僅僅是為了錢，我說是為了收入為了一個小窩也為了文學，他說他只信商品，不信文學，文學是個騙子，讓幼稚的人痴心妄想，文人都只是務虛不務實的人。我固執地說我喜歡。他看看我，眼裡又湧起一股油滑邪氣，「你喜歡，當然我就喜歡了。」到鐘了，他說認識我很高興，下次還找我。臨起，塞了叁拾元錢在我手裡，又高興又不滿足似的走出了門。我手裡拿着小費，覺得自己像個乞丐一樣，自尊心受到嚴重的挫傷，我明白在這種地方不僅身體會受到侮辱，而最重要的是人格也要受到蔑視。心裡難受極了，非常不平衡，我不知能否呆下去。

#### 四、由講師到桑拿小姐

？「我說不是，曾做過許多工作，幹按摩是第一天。他似乎不信任地看了看我說：「是嗎，小姐的指法不錯呀」，我笑了笑，他忽然話題一

在這一群按摩小姐中，她顯得格外突出，不僅僅年齡比其他人大多，而且氣質高雅，

從言談舉止看得出是知識份子。她原來是一所省內有名的經濟學院的講師，曾出過幾本經濟理論書，發表十幾萬字的文章。她講課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很受學生的歡迎，但由於她生性活潑，少年時曾在京劇團呆過，在大學四年間又拜師學習聲樂。平時很活躍，喜歡參加學生討論和一些活動，又不善於搞好領導關係，所以在評定職稱時爭論很大，一場持久戰持續了近三年，等講師職稱評定下來，她已精疲力竭。對這一切名利之爭厭倦之極，她有一個在外人看來很圓滿的家庭，丈夫英俊瀟灑，是一家大型企業頗有成績的廠長，但只要回到家裡便像具木偶。在這個沉悶的家庭裡，唯一是那六歲的活潑伶俐的小女兒給她帶來希望和安慰。想到這些，她便感到悲哀，「沒有共同語言」、「性格缺陷」，她曾試圖改變他，但一敗塗地，後來，她有了個在報社工作的情人，喜歡舞文弄墨，他的好動多情正好滿足了她活躍的思維與空虛的情感世界。兩人頗為契合，愛得動心動肝。好動的人是流動型的，思想太活躍多半也管不住行為，終於有一天他離她而去，投入了別人的懷抱。「文人的愛情是什麼？是幾行小詩外串幾滴眼淚。」她覺得自己在感情上的籌碼太重，想改變自己的個性，在事業上幹點名堂。於是不辭而別，單身一人來海南闖世界。「掙筆錢，為了女兒也為了自己只好降格走進了按摩院」，她說來到這裡雖然「心裡很不平衡，但非常快活，這種舒暢是三十年來從沒有過的，生活的樂趣靠自己尋找，也只有靠自己才能從生活的漩渦中擺脫出來，過去的生活太壓抑、活動太沉重了。」剛進來時，她只要求每天有伍拾元的小費就夠了，比起她當講師每月百來元已是天壤之別，以她的格調和層次接待的客人都是比較有錢的大老板，有的人還有情有義的請她喝茶聽歌上飯館，她先是一概拒絕，她說到這裡來是為了掙錢，過度時期，尋找機會到好單位跳槽，「和進按摩院的人談情說愛那不是扯淡？設法逗他們開

心就行了，弄到小費叫他滾蛋。」時間一天天過去，按摩小姐之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一般按摩小姐的平均年齡二十一、二歲，含苞欲放，充滿青春魅力，來按摩的客人畢竟大多數是來這裡體驗小姐的青春活力和放鬆神經，尋歡作樂的，並不需要高雅和高層次。點她的客愈來愈少，而安排做鐘的經理和公關小姐的目光總是光顧那些漂亮開放的或從前的老按摩小姐，更大的危機是從前的小姐都唯恐別人懷疑自己打炮或有性病，現在公然在鐘房裡行事並且收費極低，伍拾的、壹百元竟然都有，這樣規矩搞壞了，來的客人幾乎都有要求了，由於收費低廉，這樣無形間壓低了小費，有的客人甚至不打炮就不給小費。她連伍拾元的標準都很難維持了，這種情況持續了四天，她一邊咒罵那些降價的小姐一邊想辦法，既然都這樣，我要麼呆下去，要麼想法找錢，而這個世界有錢才有事業，有錢便能敲開一切大門。評職稱也是爲了錢，孩子的鋼琴要錢，生活豐富多樣要錢，可在按摩院幾個月賺的錢是一個講師幾十年甚至一輩子都掙不到的，看穿一切就是那麼一回事。於是她買來避孕套避免性病，白天去賓館上門服務，晚上在鐘房裡「打炮」。她的收入明顯地提高了，但是整個人格却在日漸堆高的鋼板中破碎了，喪失了起碼的廉恥心、自尊心。她的錢一部份寄給她的丈夫和孩子、父母。但她的孩子知道了這一切會怎樣看待她的母親？像她這樣的知識份子每個桑那中心都有，中國的讀書人歷來「不爲五斗米折腰」，虛榮、清高、愛面子，現在，竟然爲某種魔力的驅使，再度跌到了「娼妓」的下賤地位了。

### 五、褪去衣冠後的君子們

來桑那浴按摩中心的客人有一部份是在政府上層有一定地位的官僚，我所接觸的就有上至省長的太子、廳、局級幹部、公司經理和政府出資前來考察的大小官員。他們一般一個星

期或十天左右上一次按摩院，每次由隨從人員和司機前後擁護頗有氣派地走進來。領帶西服整整齊齊，一付正派人的模樣，走在街上，誰也不知他們會出入這種場合，連西方的總統若有這種傷風化的行爲都會被罷黜，這畢竟有損形象，違反傳統道德。所以他們都極避諱有人知道他們的這種行徑。而現在搞特區，政治氣候比較寬鬆、自由，人們有些隱藏得很深的東西，這時紛紛出籠，在這種寬鬆的空氣下每個人充分表現了自己的本來面目，解除了武裝和一切面紗，他們除了搞情婦，也新奇地想體驗芬蘭浴和按摩的滋味。他們還算有些地位和文化層次，出手都很有風度，一般要求素質較好的、斯文一些的小姐，當然這些小姐必須既得按摩，又能交談，當然還須懂風情，一定程度上的開放。自己滿意的小姐一個晚上做七、八個鐘，一行人得花上幾千元，有的甚至弄到賓館包鐘，或包賓館開房間養起來，給月薪千元的情況屢見不鮮。我曾經接待過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的經理，在鐘房按摩時，竟然叫新招聘的男秘書坐在一旁觀助興，他一連換了好幾個小姐都不滿意，最後輪到我，我進去後，男秘書說：「我們經理是打過仗的，在華北一帶很有名，你要好好服務喲，小姐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服務？」我說「等我按摩完了一整套的動作便知道了。」等按到一半，他知道並無特殊之處，就不幹了，說要給我來按摩，聲稱自己對按摩有兩招，於是便抓過我的手臂胡捏幾下，並說道你穿着衣服不好看，能不能像我一樣脫掉衣服？男秘書在一旁發出猥褻的笑聲。先考慮到他是老幹部我還有幾分尊重，現在終於忍受不了，站起來要求結束按摩或換小姐。這經理以爲我是變相要小費，示意男秘書出去拿，等秘書剛一走，他便拉住我說，你開放點，我給你安排一個好工作，給你一大筆錢。我说不行，房外有保安，發現了要罰款，經理用眼睛示意說有秘書在門外放風，你不用怕。這時到鐘電話響了，男秘書跑進來，見事未成，很惱

怒地對我說，開放就加鐘，不答應就換小姐，我也很氣憤地說我是正規按摩不開放。對那經理一句一頓地說：你太可憐了，你已失去了一個長者應有的風度和高貴。又衝着那男秘書道：「你是個可惡的小衙內、小狗腿子。」轉身便走了。

### 六、日暮途窮的選擇

巧珍從湘西一個偏遠的小山村逃婚來到海口，在露宿汽車總站時，一個包工頭聽了她的身世，似乎頗爲同情，關心地讓她去工地幫忙做飯，月薪壹百元，對此，她已非常滿足了，但上工後的第二天晚上，包工頭趁她熟睡之機姦污了她，因她是處女，事後塞給她伍拾元，她痛不欲生，再次逃亡，絕望中雖然看到桑那浴招按摩女郎，聽人說得很可怕但很賺錢，她一咬牙踏進了按摩院的門。

初進按摩院她感到了和我們這些大學生一樣的不適應，這裡的和陌生男人開放的接觸方式，姑娘們豪華的裝飾，還有白天大塊的空餘時間都和她以前的生活環境大相徑庭。公關小姐看見她的舊衣裙「厭惡得想吐」。怕客人退掉損傷公司利益也挫她的自尊，所以不給她安排鐘，有幾個鐘客人又反映說她像個啞巴沒趣。捱過一段時間，她咬牙將剛賺到的幾百元小費去買了幾套華麗的衣裙，學會調笑，唯然細聲細氣且帶有快意，畢竟有了些效果。但這裡收入最差的還是她，爲此，她又着急又自卑，幾次問其他人是怎樣索取小費的，她們都啾啾嘴說，「看你的本事。」她不好再問，暗暗尋找訣竅。漸漸地，我們發現她的床頭沒有拉鍊的皮包換成了密碼皮箱，一件件高級華貴的衣服懸掛起來，電話和請客聲不斷。終於有一天我和她同房做鐘時，發現她竟在隔着布簾的那邊和客人「打炮」。貧窮落後和封建愚昧習俗的勢力殘酷的扼殺了那個純潔無瑕的巧珍。

(未完待續)

## 我一個玩笑把雷鋒捧成世界明星

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吳玉婷 (ANDREA WORDEN)

徐原譯

我第一次知道雷鋒是在耶魯大學的一門社會學課程上。雷鋒是六十年代模範的中國共產黨人，他現在在中國風頭十足地再度流行起來。文化大革命期間，雷鋒無處不在——無論是在宣傳欄上還是在歌曲裡；無論是在教室裡還是在工作單位，雷鋒都在孜孜不倦地鼓吹無私地為人民服務和對共產黨的忠誠。我在耶魯的那位教授就對雷鋒有點懷疑，總覺得他有點太完美了以致於不真實。

一年以後，我發現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長沙離雷鋒的家鄉只有幾英里遠，在那裡，你仍然能夠發現他的影子：在某些畫店裡仍然可以看到雷鋒的廣告畫，畫上還寫著「學習雷鋒，處處為人民服務」。於是我試圖買這樣一張畫，但是商店服務員却遞給我一份年歷畫，上面是身穿暴露泳裝十分性感的中國美女，因為「這個比較合適」。我謝絕她的好意，並堅持要那張雷鋒的招貼畫，她看了我一眼，這種眼光我很久以前就習慣了——「我永遠也弄不懂這些古怪的外國人」。

我的學生們也弄不懂為什麼我要把雷鋒的畫掛在我房間的牆上。

「我只不過是對雷鋒感興趣，真的」。我解釋道。由於太客氣，他們並不深究這個問題，而只是尷尬地笑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我最好的朋友是個工廠工人，她就比較坦率，去年春天，當我說我想去雷鋒的故鄉時，她問道：「沒有人再去那裡了，你幹嘛要去？」

「我只不過是對雷鋒感興趣，真的」。不過這次我有點辯護性地回答說。

「雷鋒只是個笑話，我們都這樣認為。他只是毛澤東的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他不是個真人。沒有意思」。她作出這樣的結論。

後來，我還是同我的幾個學生去了雷鋒的故鄉，不過他們同我的那位朋友不同，他們並不關心去什麼地方，他們只是珍惜這個能同外籍老師練一整天英語的機會。當我們參觀完雷

鋒紀念館後，雷館長請我們到來賓室，他不但給我們喝茶，還向我們灌輸他那位遠親的思想，他看看我，而後又看看我的學生，想弄明白他們為什麼要來參觀，最後他說：「外國人比中國人對雷鋒更感興趣。」

機會來了，我馬上問他是不是有些關於雷鋒的資料，能送給我以便我將來「學習」。他十分高興地拿來一本他協助編寫的小冊子，同時他遞給我來賓留言冊，要我寫些東西。因為他把那本小冊子作為禮物給我，我實在不好意思拒絕他的要求。我心裡竊笑道：「如果雷鋒今天還活著的話，他也會要學英語出國留學。」

「我們告辭時，雷館希望我能在將來的「學習」中取得很大的成功。」

一年以後，雷鋒的畫像掛到了我在斯坦福大學的家裡的牆上。我的一個中國朋友第一次來我家，像宗教儀式一樣，同樣的程序又重復了：

「你怎麼把雷鋒的畫像掛在牆上？」她問道。

「我只不過覺得關於雷鋒的整個事情有點滑稽，真的。」我回答道。

她笑了。

二月初，我的這位朋友說她有很重要的東西要給我看，她遞給我二月三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我去年五月開玩笑寫下的那句話被用很大而且黑體的字印出來，清清楚楚地印入我眼帘。大標題是：「雷鋒屬於世界。」這條新聞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出自對雷鋒的敬佩，一位美籍教師吳玉婷（我的中文名字）去湖南望城縣的雷鋒紀念館參觀。當參觀完後，她激動地在留言簿上寫下了『雷鋒屬於世界』。」

「你知道有幾百萬人看『人民日報』嗎？你可出名了！」我的朋友說。

幾天後，這位朋友又給了我一疊報紙，並告訴我最近在「人民日報」上有許多關於雷鋒的文章。這絕對不只是可怕的巧合了，因為三

月六日的一篇文章標題為「雷鋒屬於世界」。毫無疑問，我出現在文章的第三段——不過這次沒有點名：

「最近一位訪問了湖南望城縣的雷鋒紀念館的美國教師在留言簿上表達了來自三十八個國家的外國朋友們（據留言簿上統計）的共同深深的心願『雷鋒屬於世界』。」

雷鋒的畫像已經從牆上取下來了。我對他總是纏繞在我身邊有點厭倦了。無奈的畫放在他的位置挺不錯的，我想荷花「合適」多了。今年春天（直到現在）在中國有這樣一個流傳：說是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引用西點軍校的發言人說：「西點軍校沒有人記得有關雷鋒的教育，也沒有任何雷鋒的畫或塑像在西點的校園裡。」

當第一篇「雷鋒屬於世界」的文章發表後，我在二月初給西點軍校打了個電話，因為文章的一段寫道：「在西點軍校的大廳裡，掛有五位重要英雄人物的畫像，雷鋒的放在首位。」而且這篇文章還說雷鋒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等等」被印在學生手冊裡。覺得這些有點難以置信，我便打電話給西點軍校接電話的是西點的外事部主任，他說他第一次聽到「李」鋒的名字是在去年夏天，當時有一個中國電影攝製組在西點拍些鏡頭，有一個組員老是問他關於雷鋒的問題。

不用說，有關雷鋒在西點軍校的事完全是假的——這真是對「人民日報」及其為之辯護的鑒賞力的絕佳控告。

關於雷鋒已經談夠了，該去工作了，誰知道呢？也許那裡還有一篇關於這事的論文呢：

讓雷鋒安息吧！



# 我就是上路的羊

姜原

北京人愛養鳥，黃鸝鳥叫聲最好聽，老屋子嗑瓜子兒最有趣，可從來沒聽說誰養家雀兒；有年冬天，隔壁的大明在雪地裡支個破臉盆，撒上幾粒米，逮了隻家雀兒。大明挺高興，一會給籠裡添小米，一會加水。可那鳥兒三天不吃不喝，死了。那時我家住在德勝門內，偶爾在半夜看到幾個羊倌趕着一群羊在大街上過。城裡孩子很少看到羊，總是站在一旁好奇地看，那時也不知這些羊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只知道那羊從德勝門那邊來，過西安門，再順中南海西城根走。前幾年看了阿成的小說才釋了謎，那羊是從關外來，趕到城裡大飯店去宰。聽說那羊要一路走掉了膘，肉才好吃，阿成的結論是：「城裡人心真狠，要吃羊肉，還要羊自己把肉扛來。」

論文答辯上週才完，一閑下來就忍不住地想兒時的事。想來那年頭兒的進士也並不一定比當今的博士風光多少。父親許過願，等我衣錦還鄉時，慶賀酒宴一定比送行酒宴排場好幾倍。只是到閑下來，才突然意識到幾年的寒窗苦讀就要過去，學位就要到手了，可此刻壓在心頭的却是一種失落感，就像自己要失去什麼寶貴的東西。

再過兩個月就要見到時時惦念的母親和刻刻思念的妻子了。幾年來，每夜總是妻子的圓圓的笑臉伴我入夢鄉。可這異國土地却有着那寶貴的東西使我眷戀不捨。

三年前打算接妻來美伴讀。家人又是路跑公安局，又是登單位頭頭們的門，求爺爺告奶奶都白搭。單位說單位人手緊，公安局就硬是不給發護照。可她這個大學畢業生，也不過是

在單位裡打雜兒，三天兩頭沒事幹，咳，真沒折兒，這單位就像個陷阱，掉進去就出不來了。

紐約的夏天跟蒸籠一樣，晚上好像比白天還難熬，心靜不下來，在床上翻烙餅，煎了兩、三個小時才入夢。我夢見自己在黑暗裡走，不知是走在森林裡，還是走在曠野上，走着走着，突然覺得身體向下落去，不知是掉下懸崖還是落下陷阱，那陷阱深深的，只覺得身體不住地向下墜……從夢裡驚醒，天還是黑的。起來擦乾身上的冷汗，心裡還是怕怕的，就像隻被人追捕的野獸。胸中悶悶的，喘不過氣來，就像隻要被捉回籠的鳥兒。背上仍在淌汗，我就像隻馬上要上路的羊兒。

不知我將落入哪個陷阱，我彷彿又在聽方

叔叔向我述說他在新疆勞改場二十年的遭遇。他當年中了人家的陽謀，只多說了一句話。也不知我將受到怎樣的宰割，當年父親藏着遊街的那頂漏划右派的尖帽又在我眼前晃動。他當年雖被記上黑名單，只因反右任務已超額完成，才有幸被「漏劃」的，我也才有幸「漏」到這個世界。可我出生在那飢餓的年代啊，從小就營養不良。我出生在那沒有自由的國度啊，只能在異國他鄉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我珍惜這寶貴的自由啊，可如今又要登上民航飛回軍籠。不要只想着要我扛回八大件啊，親友們，我是在扛回自己的肉，就像一隻待宰的羊。

哈德遜河對岸已經映出一抹紅色，窗外的鳥兒在枝頭上唱。我真希望自己是隻自由的鳥，沒有護照，沒有國籍！可以自由地飛，自由地唱。可如今我是隻就要上路的可憐的羊！米

## 爭鳴

- 本刊每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美洲版在美國三藩市同日出版）。
- 全年定價（包括郵費）：**平郵** 香港：HK180元 香港以外：HK210元  
**空郵** 亞洲：HK250元 亞洲以外：HK280元
- 可用支票、銀行本票或滙票郵寄訂費，並寄回訂閱單。
- 抬頭寫「百家出版社」（PAK KA PUBLISHER）
- 地址：香港軒尼詩道郵箱20370（P.O. BOX 20370, Hennessy Rd. P.O. Hong Kong）
- 查詢電話：5-740664

## 馬祖事件：中共投石問路？

李三三

最近有一個很值得人們密切注意的事件。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中國新聞社三月十四號發自福州的新聞都講在馬祖海域，台灣駐軍射殺大陸漁民。宣稱被射殺的數字是四十一名，傷數十人。

台灣中央日報國際版三月十六日也在頭版頭條報導了這個事件，說中共是在「栽贓」，要「不予理睬」。中央日報報導，駐馬祖台灣軍人說，每天晚上都有大陸「漁民」駛入他們的防區，其中有偽裝成漁民到那去做試探與收集情報工作的。如週大批大陸漁船進入防區五百公尺的海域時，他們就用機關槍驅散。

由於八九民運，目前中國大陸經濟在急劇走下坡，政府高層中的矛盾也在暗中不斷激化。老百姓對政府沒有信心，工作沒有積極性，再加上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個在人民的推動下拋棄社會主義原則，走向民主。在這種形勢下可以說中共的日子是非常不好過的，如果能在台灣問題上做些文章，如由於台灣軍方不斷射殺大陸漁民（這當然不一定是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得不出面還擊，中國共產黨便可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一場自衛戰，在這之中，又會像七九年中越之戰中那樣，湧現出不少解放軍的英雄事跡。

對台灣進行有限軍事行動對於內部矛盾日益嚴重的中共來說是有好處的。但如果中共真對台灣採取了軍事行動，它要冒的風險，承受的代價也是很大的。首先是各國對於中共的經濟制裁立刻就要嚴厲地全面展開，再者中共內部的矛盾也可能在這個時候總爆發。打起仗來，地方的能動性大了，有可能不聽中央號令，或者與中央裡一些派系聯合，裡應外外地造反

。所以說不到窮途末路，中央是不敢輕易打出這張王牌的。

但中共已經開始在那製造輿論了。宣揚中共官方機構對台灣漁民如何友善，而台灣軍方對大陸漁民如何殘殺，這表明了什麼呢？中共是在那裡投石問路，要看看台灣方面的反應，也要看看大陸人民、解放軍方面的反應。中共是在考慮在一定時候採用某種軍事行動。如現在任何準備都不做，冒然採取軍事行動，到時候輿論上說不過去，大陸人民、中共的一些中、下層官員是會感吃驚的。

中共如採取軍事行動是什麼樣子的呢？如果中共中央政府還是一個整體，還能號令全國，它不會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因為它還沒有被形勢逼到要冒那麼大的險，承受那麼高代價的地步。中共最可能採取的就是擺出很多姿態，如大量調兵到東南沿海，搞大規模軍事演習，但只是略帶動一動台灣的駐軍、設防或海軍力量。如向馬祖前放炮，捉幾個所謂台灣軍方特務，將台灣一兩艘艦隻打傷等。中共可製造足夠的借口來混淆視聽，如請大陸漁民、邊防駐軍來控訴台灣軍人殺戮的罪行，展出被台灣駐軍擊毀的船隻、展出屍體、紐衣照片或錄影等。

中共一旦採取了這種有限軍事行動，給台灣政治、經濟帶來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台灣會進退兩難，回擊吧，打不過。而且中共主要是在威脅，並沒真正向台灣本土動手；不回擊吧，又會將自己軍事、政治上的弱點大曝光，無法向人民交代。另外，在經濟上，台灣會立即受到極大衝擊，以出口外貿為基礎的台灣經濟會在中共強大的軍事威脅下迅速下滑。台

灣的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都會因中共的軍事行動而蕩起大風波。

中共目前雖然是在為某種政治目的製造輿論，但它講的有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呢？換言之，在必要時中共能否拿出一些使大陸人民和西方記者信服的證據呢？從台灣的反應，中共的報導看這種情況是有可能存在的。根據中央日報的報導，台灣的馬祖駐軍對日間潛入防區的真正漁民都予以接待贈送衣物食品，而對夜間大批闖入防區的漁船則用機關槍驅散。首先，馬祖軍方無法完全準確地判斷潛入防區的「漁民」中誰是「真正的」，誰是冒充的。那麼他們對於認為是「冒充者」的行為就有可能為中共的遺責提供某種依據；第二，晚上對大批潛入防區的大陸漁船進行機關槍驅散時，能保證沒有傷亡嗎？假如真像台灣軍方所講，不會有傷亡，那麼這些潛入的漁船認定了這一點就是不散去怎麼辦呢？可以推論，中共如果真要對台灣進行有限軍事行動是可以找出一些，或製造一些「像樣的借口」的。

作為大陸留學生，我們決不願意看到正在走向繁榮民主的台灣遭到中共軍事行動的干擾。更不願意看到台灣同胞，大陸人民因中共的軍事、政治冒險而流血。但現實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中共高層一些人為了維持其統治，不惜將坦克大隊開進北京城，用機關槍來屠殺學生和北京市民。在他們認為必要時，也一定會向台灣挑起軍事事端。人們應該對此事予以足夠的重視，作出適當的反應。目前前兩件事可以做，一是台灣方面應對中共的講法作出反應，對事實做較詳盡的說明，加深台灣人民和世界輿論對此事的知情度。另一件可做的事是允許海外大陸留學生、民運團體、華人團體對此事到現場進行獨立的調查。這種獨立調查的結果會起到澄清事實的作用。由於這些團體的獨立性，他們所做的調查報告將會有很高可信度。

# 台北幹得比北京漂亮

楊力宇

## 台北與北京對學生民運處理之比較

為反對國民大會擴權爭利，阻礙民主改革，台北大專院校學生於三月十七日開始，群集中正紀念堂廣場，展開了絕食、罷課，及靜坐等抗議活動。參加學生人數迅速增加，各校教授及其他各界人士亦紛紛表示支援，而抗議學生代表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要求。

### 學生的民主訴求

- 一、解散四十年未改選而缺乏合法性的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而具有代表性的國會制度。
- 二、廢除「違章建築」的「臨時條款」，重建憲政秩序。
- 三、召開國是會議，以便全民共謀體制危機之解決。
- 四、提出民主改革之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

### 世界民主化的洪流

台灣的學生民主運動顯然是世界民主化洪流的一部份。一九八九年春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雖被鎮壓，但其影響力却迅速到達東歐。已醞釀多年的東歐民主運動從而獲得重大的啟發與鼓舞，於去秋迅速展開，打倒了幾個共產政權，亦加速了一些國家的民主化的步伐。東歐民

主化的浪潮亦加速了蘇聯民主化的進程，促使蘇共放棄永久執政的專制及日漸走上多黨的民面對目前的政治困境。

然而，六四的北京慘劇對台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教訓。李登輝總統的談話及反應顯示台灣處理學生民運的重大原則。

### 處理民運的原則

- 一、肯定學生民主運動的正面意義，確定學生民運是推動民主改革的動力。
- 二、積極與學生領袖對話，並將雙方的溝通提高到最高層次，由李登輝親自與學生代表對話。
- 三、對學生合理的民主訴求，表示從速予以推動；目前無法推動的要求亦說明其原因。
- 四、維護學安全，絕不允許武力鎮壓。

主體制。世界民主化的激流今年終於到達亞洲，激發了蒙古的民主改革及台灣的學生民主運動。只有中共仍然「處變不驚」，繼續抑制民運。

### 台灣的政治危機

在去年十二月的選舉中，國民黨遭受重大挫敗。其後國民黨內部又因副總統人選、黨政領導二元化、總統制和內閣制之爭議，及決策程序等重大問題導致嚴重分歧，甚至瀕於分裂之邊緣。後雖有黨國大老之奔走及溝通，終於化解危機，但甚多重大政治問題仍未解決。緊

接著這些發展，台北大專院校學生因民主訴求而展開了絕食、罷課，及靜坐等抗議行動。而民進黨亦展開了強烈的民主抗議活動——台灣在享有了將近四十年的安定政治環境後，最近半年來却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及危機。

### 政治危機的成因

造成今日台灣政治危機的原因甚多，但最重要者不外以下數端：

- 一、甚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如國會改革）拖延多年，未能解決，致使問題日益嚴重，而問題亦日漸增多。
- 二、民主化的步伐過於緩慢，民衆的不滿及不耐情緒日益高漲。
- 三、政經秩序的空前混亂大幅度地降低了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 四、國民黨內部的分歧及矛盾嚴重影響執政黨內部的團結，各派系因而不能合作一致。
- 五、靜坐現場不允許警力出現，以免造成鎮壓假象及刺激學生情緒。
- 六、對學生與民進黨群眾（並非全然和平抗議；某些民進黨人士採取燒毀國旗及砍斷旗桿等激烈行動予以隔離。

### 果斷的行動

上述原則確定後，台灣當局立即採取以下行動：

- 一、發表談話，肯定學生民運。
- 二、三月二十三日李登輝親自會見學生代表五十多人，與之對話，並同意於六月底舉行由海內外具有代表性的各界人士出席之國是會議，為民主進程及具體步驟達成全民共識。對其他學生要求，李氏亦作了具體的回應。
- 三、警方從靜坐現場撤離，並在現場外圍確保學生安全，迄今並無任何傷亡。所有抗議及保護活動均在和平中進行。

四、妥善地處理成功地分離學生及民進黨的群眾，兩項運動並無合流的趨勢。

### 台灣民運的前景

各方對台灣當局之處理學生民運之原則及方式均給予高度的評價。學生亦紛紛返回校園，一場可能導致重大政治危機的民主運動終於獲得了妥善的解決。台灣與北京處理學生民運

的原則及方式形成一個明顯的對比。

台灣此次和平的民運產生了甚多正面的意義：

- 一、提高了台灣人民的民主意識。
- 二、加強了各界人士對民主訴求、目標、進程，及具體步驟之共識。
- 三、促使政府及執政黨加速民主改革的步伐，政府必將迅速提出可行的方案。
- 四、增加了人民對「萬年民代」的壓力，

促使他們儘速退休，大量減少對國會改革的阻力。民主的洪流終於戰勝了民主的逆流。

台灣未來的民主化雖然問題仍多，但通過三月的學運，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必然加速，其前景是相當光明的。

台北與北京顯然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原則及方式處理學生民主運動，其不同的結果亦呈現在世界人士的眼前。

\*

# 中共中央關於留學生政策的文件

「關於具有大學和大學以上學歷人員自費出國留學的補充規定」

(教留「一九九〇」十四號文)

原件

一、全日制高等教育機構公費本科和專科畢業生、獲雙學位畢業生、研究生班畢業生、碩士和博士畢業研究生，在讀四年級以上(含四年級，下同)學生、研究生及在這段學習期間退學的人員，全日制成人高等學校本科和專科畢業生，均有為國家服務的義務，完成服務期限後方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

二、服務期限如下：

(一)全日制高等教育機構公費本科畢業生、獲雙學位畢業生、研究生班畢業生、碩士和博士畢業研究生、在讀四年級以上學生、研究生的服務期均為五年(不含見習期和脫產進修時間，下同)；四年級以上學生、研究生中退學人員的服務期亦為五年；二年制和三年制專科畢業生的服務期分別為二年和三年。

(二)全日制成人高等學校公費專科畢業生的服務期為二年，本科畢業生的服務期為五年。

三、全日制高等教育機構公費在讀四年級

以下(不含四年級)學生和全日制成人高等學校公費在讀學生在償還學習期間國家負擔的培養費後，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自出境之日起八年內回國服務，退還其所交的培養費。

四、歸國華僑、國外華僑、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和外籍華人(簡稱六類人員，下同)

在國內或內地的直系眷屬；配偶及子女、孫子女和外孫子女(均含配偶)，非直系眷屬；親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均含配偶)，屬在讀或退學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機構公費學生或研究生，如申請自費出國留學，須提交六類人員在境內、外定居的有效證件的複印件和直接負擔申請人全額經濟資助的證明，由所有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僑務部門或台辦對其眷屬身份

按有關要求進行核實。六類人員的直系眷屬自費出國留學可免交培養費，非直系眷屬在償還學習期間國家負擔的培養費後，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屬第二條規定應完成服務期限人員中的直系眷屬可免除服務期，非直系眷屬在償

還培養費後，亦可免除服務期。

五、完成服務期限的在職人員自費出國留學，應提前半年向所在單位提出申請。已與單位簽訂聘用合同(協議)的人員，須認定其已履行合同(協議)後，方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

六、具有大學和大學以上學歷人員申請自費出國留學，經所在單位同意，並取得本人完成服務期限或償還培養費的證明後，報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委員會(高教局)歸口審核。符合規定者，由審核部門出具證明，方可到公安機關辦理出國手續。

七、本規定同樣適用於具有大學和大學以上學歷申請到國外語言補習學校就讀的人員。

八、非全日制成人高等學校公費在讀學生和畢業生申請自費出國留學，所在單位可參照本規定，考慮其已有工齡，對服務期和償還培養費等作出相應的規定。

\*



# 台灣：大選危機有驚無險

學生始終維持一定的理性水平，民進黨諸大老也適可而止，執政當局謹慎小心，軍界的表現也甚可佩，一場有驚無險的政潮終於度過……

朱永德

一九八九年是中國大陸多事之年，一九九〇無疑輪到了台灣。自去歲歲末公職人員選舉開始，台灣的政情，已顯得有些浮蕩。民進黨的代表們先在立法院會場不斷做秀，繼而在國大筵席上有掀桌翻椅之創舉。加上街頭暴民的燒車放火、和軍警對峙、與堂堂的國民代表提出的政治勒索，相互交輝。致使台灣的政情一時醜態畢露。是而喚起了群眾的不平，激發了全省學生的靜坐抗議。後有主張絕食、聲討國大、召開國是會議等要求。

此次純自發性的大規模學運，自國府遷台以來，尚屬首次。可慶幸的是，這次學運自始至終維持了一定的理性水準，所提出的要求，亦甚合常情，決策會中，諸領導學長，對整個情勢的危機有相當的認識，堅持不為外力滲透與堅持不更改主題是負責和成熟的充分表現，應當祝賀。

另一方面，民進黨雖擁有一些學生群眾，但並未積極組織學生、運用議會中之抗爭手段，插入學運來翻雲覆雨，來製造事端，可謂民進黨諸大老皆能適可而止，顧全大局，亦是極其可喜的現象，應當讚揚。

在這次驚險的過程中，尤令人捏把冷汗的是決策會中，亦有人提到從天安門模式中所得到的啟示，並有北京中共的公開申明，顯然有意從旁揶揄，有所欲為。使得台北當局汗流頰

背、心驚肉跳，深恐一有差錯，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這場運動總算是在有驚無險的情形下，各方皆保全了面子而度過了難關。幸哉！幸哉！

這次堪稱滿意的收場，除了執政當局處理過程中的謹慎小心之外，執行任務的軍警人員，任勞任怨，不辭堅苦，不僅平時訓練有素，且對自己身處危機第一線的任務之意義，也表現了有充分的認識。他們的職業化，並對一個民主社會中警員的雙重任務——維持法令和秩序與保護人民權利與安全的責任——這種二者雙全的艱巨的工作，能以如此完善的執行，無疑已達到了世界第一流的水準，是應當大加頌揚和稱讚的。

對台灣整個的安全來講，軍界的表現，亦甚可佩。對政事完全採取中立，對政爭中的小型騷擾，完全採取聽便和不干涉的態度；但對於台島的安全，一旦有了威脅，則隨時準備採取無旁貸的立場，也充分表現了軍隊職業化的結果。只有到了危機關頭，如年底台北縣長選舉時可能觸發的暴民運動，繼二二〇立法院前亂事之後，到二二七選舉日又可能出現亂局之時，軍方皆清楚表態，作好準備，以應付萬一產生失控局面。這些例子，對島內不負責任，唯恐天下不亂的野心肇事份子，無疑是起了一定的阻遏作用。

若回頭看這次整個局面的演變，何以到達這種失控的邊緣，造成四十年來，台灣空前的政治危機，是與國民黨內部高階層的政爭失和是分不開的。從國民黨開年來的臨中全會起，因副總統候選人確定過程的不盡完善所造成的黨內諸實力派之不滿與不安，進而延續到國大會場中的連署風波，致引起的政治動蕩，說明了國民黨的領導當局，對任何事項的決定，仍不能稍有鬆弛，更不能看任何事態為理所當然。

台灣這一屆的總統選舉，不論從那個角度來看，皆可說對中國的民主前途有長遠的影響，而台灣民主的推行，是基於國民黨的領導，也就是說，唯有國民黨率先實行黨內的民主，台灣的民主始有望焉！

按照西方民主的經驗，民主無疑的應從分權制衡開始，如美國，黨政領導應有某種程度的劃分。總統與內閣的權限，比如法國，也必須有適度的調節。台灣的政治制度，雖在轉型期間，但其基本的大原則、民主的模式必先建立起來，所以今後對「一起立」了事與不「整合」即「整肅」等做法之不能容許是顯而易見的。這次引發的政潮，當是最好的教訓。

對於政黨制度的認識，在觀念上尤應有進一步的更新。國民黨本身的組織，從二〇年代容共時期開始，改組成革命政黨，是深深受了

靜坐示威的台大學生



蘇聯共黨組織的影響，故與西方一般的民主政黨是有些距離的。在過去一黨專政的強人領導之下，往往黨是人的工具，故黨內有一派系之分，其特點是相互對立鬭爭，你成則我敗，以鬭倒另外之派系為目的。一個民主政黨，應是利益集團的組合，其特徵應是妥協與互容，有所給也有所取，沒有所謂清一色或通吃之理。

試以一九六〇年美國的大選為例，當肯乃迪當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後，他即刻與其黨內最強的勁敵——約翰生言好，遂為競選伙伴，絕不因對方實力浩大而棄之於溝渠。同樣的約翰生即刻放棄自己的政策，全力支持肯乃迪的政策。十年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在黨內提名成功之後，同樣邀請黨內最大政敵布希來作其競選伙伴。唯如此，黨內力量始能整合，

進而匯集成流，造成不可抗拒之勢，來推行其政策。

故這次國民黨因黨內選舉的處理不當，造成了實力派的疑懼，又造成國民大會中因連署而引起的危機，給在野黨有機可趁，給私利份子造勢勒索，致使民心浮動，學生不安，以致態勢緊張，政局動蕩，總統的威信大降，對政府的領導，形成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的尷尬局面，實在是萬萬不該的。

這次台北因政潮而引起的學運，雖已有驚無險的得以順利地度過了，但千萬不能像有些人民已表明的希望這次事件是第一次學運，也是最後一次的台灣學運。因為近幾十年來，海峽兩岸的學生，皆受足了種種的轄制，國府自遷台以後，一向對學運噤若寒蟬，多年來，救國團和青工會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如何去疏導台灣青年們的熱能，但今天的台灣，已邁入了一個新時代。

由於台灣青年而今對世界各地接觸的擴大，自我謀生能力的加強，獨立自主本領的提早養成，對世界各地青年活動情況瞭解的普遍增進，是而對政治參與的興趣與能力皆不斷的提高，再由這次學生的靜坐抗議，全省串連，對局勢提出之要求，態度的理性有序，組織與程序的成熟表現，並未與政治抗爭合流，皆不應看為是一種突發現象，而應視其為今後台灣社會中，新興的一股社會力量，今後台灣社會動力之一個新源頭才是。

六十年代美國的學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乃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一個高度發展的工業化社會，年輕人的意願，往往是這個社會開拓新方向之動力所在，是歷史齒輪向前推進的重要力量，故應給予充分發揮的機會，適當表現的渠道。

是故今後國府當局所應做的是發展出一套新的青年政策，和一套新的方法來處理這個新時代中青年學生和群眾的運動，這顯然也是當前國是要務之一。\*

## 「六四」之聲廣播電台呼救

六四之聲從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起一直向中國大陸播音，時間和頻率如下：

北京時間	0:30--2:30	6:15--8:20	10:15--11:40	14:15--16:00	17:15--17:55	18:30--21:00
中波 [千赫]	603; 750 900; 1000	747; 900 1098	900	750; 900 1100	900	603; 750 900; 1100
短波 [千赫]	7150; 7250 11905	7150; 7250 11905	7250	7150; 7250 11905	7150 11905	7150; 7250 11905

從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日起，為進一步加強對大陸播音，六四之聲又加設以下定時定頻播音：  
每天北京時間清晨5:00-6:00點，短波15280千赫。

六四之聲正在為打破中共新聞封鎖，增強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信心發揮重要作用。

來稿捐款請寄：P.O. BOX 15-7939 CHICAGO, IL 60615 支票抬頭：CHINA CRISIS

電話：(312) 288-6320 電傳：(312) 288-6840

# 一九八九年國際人權報告中國部分

本刊摘譯

## 基本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屬權威主義國家。八九年六月初北京發生大屠殺後，中國政府以極權方式控制政治秩序，幾個高齡領導人組成的集團，掌握着國家最高權力。其中，鄧小平是仲裁者。這些老人佔居政治局、中央軍委等關鍵機構的要職。還有一些人在當局沒有職位，但仍然保持可觀的影響力。

政府通過全國範圍的安全系統維繫其統治，包括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國防部、法院和刑事系統，以及傳統的社會壓力。八九年中，上述安全系統介入了廣泛的人權破壞實例，特別是在北京和西藏兩地。

儘管十年經濟改革企圖擴大市場經濟的作用，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仍然控制着物價，分配重點物質的供應。政府曾經使一些經濟決策部門分權化，鼓勵小型私人事業的發展，主要是零售業和服務業。但至八八年開始，政府再度鼓勵節約，審查私營公司，懲戒逃稅、漏稅，限制私人企業家的收入。中央政府並將下放給地方當局的一些經濟決策權力回收中央。中國的人權狀況在八九年度遭到劇烈的破壞。三月五至七日，人民武裝警察殘酷鎮壓了西藏的示威，槍殺了多人。然而，後來當局調動人民解放軍鎮壓學生和平爭取自由的運動，比西藏的例子更惡劣。六月三至四日，北京有

數百人甚至上千人遭到屠殺。繼屠殺之後，政府又在全國範圍掀起對學潮參與者、支持者及同情者的迫害。數千人被捕，大批異見份子被判刑。其刑事標準觸犯了通用的國際標準。此外，還有大量無法證實的、未宣佈的迫害案件。直至年末，迫害仍在繼續。中國政府通過逼逐和騷擾等種種方式，限制外國記者報導實情，並禁止異見份子出版書籍、發表言論、干擾外國電台、電視台播發新聞，如驅逐「美國之音」記者。

## 人權方面

### A. 政治性和越過法律程序的殺戮

最嚴重的未經法律程序的濫殺，發生在「六四」北京大屠殺期間。充分證據顯示，中共領導人命令使用致命武器鎮壓和平示威。濫用暴力導致許多手無寸鐵的平民無辜死傷。如前述，死亡數字的估計很大，但精確的統計也許永遠無法獲得。

在三月下旬，武裝警察在西藏拉薩開槍射殺大批藏人僧侶和支持他們的平民。數百人，或許更多的人數，在支持藏獨的示威中，因警察濫用致命武力而死傷。

許多獨立的觀察家相信，在八九年全國範圍的示威事件中，被處死的人數遠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數字。證實這些估計目前尚無可能，中

國官員拒絕回答通過外交途徑詢問訊息的請求。

另外，按可靠消息來源，八九年四月，警方在河北省石家莊市襲擊一個地下的天主教堂，造成兩人死亡，一百五十人受傷，其中十人有生命危險。

### B. 失蹤案件

中國政府不願公開宣佈遭到逮捕和拘留人士的名單。在北京大屠殺後，被捕數目十分巨大。由於他們未經法律審判渠道，其命運令人擔憂。

可靠的報導證實，六四後解放軍和公安系統曾無數次突襲大學校園、私宅、工人宿舍、研究所，以及旅館等，大批學潮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被捕。這些案件多發生在屠殺後的數日至數週內，但一直持續到數月之後。

在大學開學後，所有返校的學生受到當局和校方審查，一些學生被捕。當局證實一些被捕學生的名字，如劉剛、周烽鎖、馬少芳，均屬於二十一個被通緝名單，但他們一直沒有受到公開審判。大部份學生被捕案件未經公佈。

此外，電腦公司的工人，北京各報紙的記者、知識份子大量被捕。至六月底當局宣布總數兩千五百人被捕後，它拒絕就後續案件發表任何評論，提供任何有關被捕者的訊息。

八九年當局繼續逮捕非官方的宗教團體的

領袖，通常不告知他們的家屬和信徒。去年一年裡，估計至少二十多名地下天主教堂的主教、牧師和俗人被捕，他們其中一些人的情況至今不明。

在西藏拉薩示威事件後，許多西藏人被捕後的情況和關在何處無從知曉。一位公安官員告訴西方記者，截止八九年十月，計有四百餘藏人被捕。其中三三二人陸續獲釋。但其它消息來源報導的數字，顯然高於這個統計。

### C·拷打和其它不人道的待遇和懲戒

有關拷打和其它不人道方式對待所謂「反革命罪」的報導持續不斷。許多參加過示威的市民遭到毆打以及其它方式的虐待。通常發生在警方刑求罪證和口供時。一位參與豎立自由女神像的被捕者，遭受毆打要他供出他人名字。他被拘留許久無人知道是否已被官方判決。自去年底，陸續的可靠報導證實，公安部門毆打被捕政治犯。

在西藏，官方拒絕外交渠道要求訪問坐監者和論及人權問題。自三月五至七日在拉薩的鎮壓後，拷打監禁者的消息有增無減。美國眾院提出的有關報告指出在西藏發生以殘酷和罕見的方式懲罰藏人，材料獲自對逃亡藏民的訪問。

中國監獄中的情況亦相當惡化。根據新聞渠道的報導，二百多學生和知識份子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北郊的秦城監獄。囚犯們八人住一間牢房。囚犯，無論刑事犯還是政治犯，都面臨「坦白錯誤」的強大心理壓力。拒絕坦白者曾遭到拷打和禁止家人探監的懲罰。據一位最高人民檢察官的透露，正在調查中非法逮捕和拷問坦白的案件，八九年上半年比八八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七點七。該檢察官承認有二一八三八例案件涉及刑求拷打。

### D·有關不合法逮捕、拘留和驅逐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禁止隨意逮捕和拘留。按此項法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須進行審問，被拘者家人和工作單位應獲知其被拘理由和拘留地點。

但該法規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條，却允許警察在「通知家人或單位可能妨礙調查」的情況下，推遲通知。通常因政治理由，被捕者的家人不會接到通知，被拘者可以在監禁十天後才正式被捕。某些案件中，被拘者被監禁數月尚未被起訴。

按照第十九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公共安全管理刑罰的規定」，警方有權對「破壞安全，散播謠言，妨礙政府官員公幹和擾亂公共秩序者」遣派「勞動教養」，最高教養期可至三年。按官方公佈的一項新聞：過去十年約二百萬中國公民被送往勞教。

刑事法院定案的犯人通常送監或勞動教養，而勞教所在法律上的功能無法做明確解釋。許多勞教所設在邊遠地區如新疆、青海。根據這些勞教所公佈的新聞，許多犯人已被允許返回他們的原居住地，而被強制留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地方。這是一種內部流放。

按刑法第九〇至一〇四條，許多「六四」後被捕者，將被判「反革命罪」。這些條目涉及廣泛的情況，賦與國家廣泛的權力拘留觸犯該法律的人。這些因反革命罪被拘留者，在理論上與其它類型的犯罪相同，他們的案件似乎亦按刑事訴訟法處理。

五月份北京部份地區施行的戒嚴法，授予戒嚴當局發佈命令，拘捕公民，這些行為超越北京地方當局。大批被捕者將長期監禁而不做任何公佈。他們是由軍方和警察單獨調查的。

八九年春季示威，導致政治犯急劇增加。曾被拘和仍然被拘者的數字無法知悉。六四後估計有二千五百人（官方六月底公佈此數字）到十萬人（記者和人權組織的調查）。西方新聞界引述可靠政府消息來源的數字為一萬以上

多數被捕者是工人，另有一定數目的知識份子，如記者戴晴、民主牆人士任曉明，黨內改革官員鮑彤和一些學生領袖如王丹。據報導一些申請外國簽證者也曾被捕並審問了數日。

在拉薩，數百涉及三月獨立示威的西藏人被捕。西藏日報九月十四日、二十五日公佈了十四名尼姑的名字，她們被判處二至三年的勞動教養，罪行是在九月二日和二十二日在拉薩示威。她們在公共場所呼喊藏獨口號，警方逮捕這些尼姑後，當即指為「分離活動」並在中國當局的部門中判罪。西藏地區的有關情況和數字，由於中共的特別限制，目前無法獲悉。

### E·違背公開起訴原則

中國司法受共產黨控制而不能獨立，司法系統分為最高人民法院、省級高級人民法院、中級地方人民法院、基層縣人民法院。此外，還有獨立的軍事法庭、海事法庭、鐵路法庭，亦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

近年來，中共黨和政府正在朝更獨立的司法系統的建設而努力，多方面確定了各項範圍限定的法律條款，包括「反革命罪」，以及觸犯的行爲。

中國也通過海外職業訓練，培養職業法官，接受西方的法律規典。然而從八九年六月起，司法界的改革便停滯了。

雖然憲法規定了按期起訴權利，但實際應用中時常被忽略。法律亦規定所有案子公開審理，惟涉及國家機密、少年犯和個人隱私的情況除外。它亦規定被告受到拘留審查的時間不得超過兩個月，雖然最高檢察官在需要「補充調查」時可以請求延長一個月。

但實際情況是拘留期曾被非法延長。有兩名美國公民在中國因涉嫌偽造文書，在最後免起訴之前，被拘留審查達七個月之久。\*

# 宋教仁：典型的民主主義政治家

在中國近代史上，宋教仁是一開始就踏上西方民主政治之路的革命者，他不同於章太炎，也有別於孫中山。

陳雪

## 一、謀自由於湖湘

「謀自由而獨立於湖湘之一隅兮，事竟敗於垂成。

驍騎遍於道路兮，購吾頭於千金。

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荆與地棘。

展支那之大索兮，無一寸完全於淨

漢族自由之土地。

欲完我神聖之主義兮，亦惟有重振夫干

戈……」

這是一九〇四年長沙起義事機敗露，宋教仁乘一艘運煤船，從長沙逃往武漢，路經螺山時寫的。讀着這首騷體長歌，使我們聯想到作者當時的心情，正像八百里洞庭湖水那樣，洶湧澎湃，翻滾疊宕；他望着那陰霾的天空和遠方天水相接處凝聚着的雲烟，想着天下的興亡和人民的禍福，想着屈原以來中國歷史上關心民瘼，立志要治好社會瘡痍的人們那種被迫逃亡，行吟哀歌的生涯，不禁寫下了這些出自肺腑的詩句。而在這次未曾爆發的起義中，他負責五路義師中常德這一路的發動和組織工作；為此，他曾經着手變賣祖傳在湖南省桃源縣香沖的一百多畝田地，以作為舉事的經費。

當時在年僅二十二歲的宋教仁可謂少有大志，長為才俊。在他十七歲，也就是一八九九年——戊戌變法的第二年就讀於桃源漳江書院時

，就曾在漳江閣上與同學縱談天下大勢，抒發胸中抱負。他說：「中國苦滿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湖，擊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得志於天下。」他此後一生的活動，大都濫觴於此。一九〇一年，他中了秀才；一九〇二年在武昌投考普通中學堂時，他在考題為「漢武帝論」的答卷中，也曾「推崇漢武經營西域，擴張國土，奠定大漢族之基礎」，功績遠在漢高祖劉邦之上，很受主考官梁鼎芬的激賞，被錄取為第一名。一九〇三年，在黃興的倡議下，他在長沙預決定組織革命團體華興會。一九〇四年華興會成立時，他被選為副會長，又在武昌，成立了科學補習所，並決定於是年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十六日）西太后七十壽辰時在長沙舉行武裝起義。可惜事機洩漏，他只得從長沙逃到武昌，又逃到上海；最後東渡日本。

## 二、民主之堅志，愛國之熱衷

亡命日本期間，宋教仁與革命志士陳天華共同發起、籌辦一份綜合性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並參預了革命的聯合組織——與中會的籌備工作。與中會成立之後，他又被選為司法部檢察長及同盟會湖南分會副會長。這時，日本政府為了取締中國留學生的政治活動，剝奪

言論自由，禁止集會結社，檢查書信來往，強迫遵守清朝法令，制定了一個「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從一九〇六年元月一日起執行。當時，孫中山、黃興都不在日本，留學生內部對此事的反應又不一致，分為忍讓與反抗兩派意見。宋教仁堅主反抗，立即發起成立了留學生聯合會，以停課、退學、返國等實際行動進行抗爭。革命烈士秋瑾就是在這次運動中毅然回國領導浙江省的實際鬪爭的。而這次運動，也以適可而止結束。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民主革命的志士，他更將自己的學習與革命的需要結合起來。他與其他留學生一起，打算成立速成陸軍，進行騎馬、射擊等操練，並在第一次乘馬中蹣跚。但他並不氣餒，將名字改為宋煉，從事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研究和介紹，先後翻譯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國的政治制度概要和官制，還翻譯了各國的警察制度和日本憲法，從而為革命成功後祖國的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設計了最初的藍圖。

在一九〇七年，中、日兩國政府為中國東北延吉地區的領土主權問題發生了爭執，即所謂的「間島」。恰在這年初，宋教仁被派往東北與長期活躍在安東一帶的草寇「馬俠」進行聯繫，以便與將要在南方舉行的惠州起義遙相呼應，佔瀋陽，攻山海關，進逼北京，形成南北夾擊之勢，以挽回屢次南方起義失敗的頹勢

宋教仁到東北後，即寫信給「馬俠」首領，曉以大義，講明形勢，與會參加過「馬俠」，對其內部較熟悉的白逾桓、日本人古川清到大孤山與「馬俠」頭目李逢春會晤，得到了李的贊同，表示願與同盟會一致行動。於是，宋教仁在這裡建立了同盟會遼東支部，並開展了招兵活動。不幸在招兵活動中，白逾桓在碱廠被捕，宋教仁遂返回日本。

在東北活動期間，宋教仁得知日本參謀本部組織的長白山會正在製造假證據，企圖將中

對這一地區的主權。最後，以沉痛的心情指出：「嗚呼，前車豈遠乎哉！清廷今日外交當局者，其尚一回首焉，勿再貽白山黑水之羞，而使鄂多里城邊之鬼，不安於地下也。」

在此期間，中、日政府之間的交涉更在緊鑼密鼓中進行。日本政府利用手中的假「證據」進行要挾，清政府苦於對此一問題不甚清楚，一籌莫展。前者通過一位日本「學者」向宋教仁進行遊說，要他不要幫助他所要推翻的清政府弄清情況，並願用重金購買他的書稿；後者則電令駐日公使楊樞物色兩名吉林省籍留學

後，請講點情面，將來我等回國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獲，請勿用刑訊」，並在封面上寫着「宋京堂啟」的字樣。宋閱信後，見自己的內衷不為同志所理解，痛哭流涕，遂取消回國的計劃，並把楊樞硬塞給他的千元贈款大部份散發給了有困難的中國留學生。並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賺幾文錢也。」

在這一事件中，宋教仁為保衛祖國的領土完整克盡了中國人的一份職責，使得清政府在談判中未能像以往那樣，以喪權辱國而告終。然而，革命隊伍內部對他的猜疑和誤解却與日



宋教仁遺像

四千餘年黑點奇制  
 族沈淪甚於男子振曠  
 聲女士任之女士而外  
 從其扶之宋教仁

宋教仁為《亞東叢報》發刊題詞

國的延吉地區併入日本領土。在愛國激情的支持下，他假扮日本人，化名貞樹，打入長白山會，將他們所假造的「證據」全部拍照帶回。途經朝鮮時，又在漢城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有關資料；回東京後，又在帝國大學圖書館翻閱了有關圖書，用了幾個月時間，寫成「間島問題」一書，以確鑿的證據，證明延吉地區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駁斥了侵略者所繪製的「大東輿地圖」的謬誤，以及他們所散佈的「亞滿江，鴨綠江以北為局外中立說」等謬論，從國際法的觀點，證實了中國

生，回延吉地區查明情況。楊樞瞭解到宋教仁著有「間島問題」一書，便通過宋的朋友覃理鳴索要原稿，並給國內負責與日本交涉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拍了兩千多字的電報，簡述了此書的概要。袁世凱立即回電嘉許，贈款千元，並令宋教仁回國在談判席上作證。宋以「我係通緝有案之人，焉能回國？」作答，袁世凱立即奏請西太后取消對宋教仁的通緝，並賞給四品京堂，著其回國任職。經過孫中山的同意，宋教仁正要啟程返國，忽接到「民報」轉來留學生的信件，說是：「回國做官

俱增，甚至有人還指責他勾結清政府，出賣同志。為了剖明心跡，他在一九〇八年十月，給清政府寫了一封信，重申了國內事務上與清政府不調和、不妥協的立場，並請求清政府取消他的留學生資格和月費金。與此同時，惱羞成怒的日本政府也把他當作清政府密探，對他進行種種迫害。在這內外夾攻的情況下，他並不為個人的困難處境而沮喪，却只是為革命內部的失和，和革命起義的失敗而憂心如焚，狂歌當哭。當時在孫中山與黃興之間發生國旗之爭（孫主張用革命烈士用鮮血繪製的青天白日

旗，黃興主張用象徵着井田制度的「井」字旗。在孫中山與章太炎之間發生經費之爭（日本政府及股票商鈴木久五郎贈款一萬七千元，孫主張大部用於南方起義，章主張用於民報。）同時，更重要的，還有革命起義重心地區由南方邊遠地區向中部地區轉移的有關革命全面的策略、戰略方面的論爭。宋教仁提出三策：

上策，一舉攻佔北京，號令全國，是為中央革命；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發動，成立政府，進行北伐，是為中部革命；下策，在邊遠地區發動起義，向內地深入，是為邊遠革命。大部份人贊成中策。於是，由譚人鳳出面，在東京召開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會議，決定成立中部同盟會，作為中部地區發動起義的領導機關。宋教仁捐出所翻譯的「比較財政學」一書的版稅，充作革命經費，並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離長崎回國。一九一一年四月中旬，宋教仁被同盟會由上海徵召到香港擔任廣州起義統籌部的編制科長，負責草擬文告、約法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制度草案，以便起義成功後實施。然而，當他於四月二十八日清晨由港乘船到達珠江口時，才知道起義已經失敗，清兵盤查很嚴，他只好返回香港。

在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同盟會的精神雖然喪失殆盡，一些人也難免有悲觀失望情緒，但更多的人却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中部革命的重要性和正確性。於是，宋教仁便被中部同盟會推舉為總務會幹事，分掌文事部，管理參謀、立案、編輯及其他事務，成為中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

在宋教仁所制訂的一九一三年中部起義計劃中，武昌是起義的中心和首先發難的地方；事發之後，四川、湖南為後援，解除圍困，接應糧餉；陝西、山西為中鋒，攔腰截斷京漢鐵路，使清兵無法集中；南京起義為護衛，扼住長江口，使海軍無法增援。

然而，事變的迅猛發展却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預料。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

由於起義的倉促，同盟會的領導人都不在武昌，起義後的領導權便落入了清軍協統黎元洪的手中。

為了將革命的領導權奪回革命派手中，宋教仁於十月二十四日趕到武昌後，即提議設立湖南、湖北大都督，由黃興擔任此職，而將黎元洪置於革命黨人的監督之下。但黎的親信使元洪置於黎元洪仍仍是高高在上。接着，他急忙乘輪船去南京，企圖在南京起義後，用南京來節制武漢。但到達南京後，才知道南京第九鎮新軍已被張勳的辮子軍繳了械。於是，他又繼續乘船到鎮江，對上海起義後江、浙各軍的矛盾予以協調，使之攻下南京，從而將革命中心移到了南京，成立臨時政府，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副之。但由於黎元洪和江、浙軍人的反對此議却顛倒為黎元洪副。於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回國後，宋教仁更積極為臨時政府的組織方案而搖筆鼓舌，不遺餘力。

### 三、為「政黨政治」而流血的第一个人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搜奪之後，民主革命派的營壘中，有的退隱朝市，遜跡政治；有的同流合污，幫閑幫凶；而主流派則一分為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些人準備從事實業救國，願以在野之身，籌款六十億元，修築鐵路二十萬里，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而孫本人則接受了袁世凱的委任，擔任全國鐵路督辦。以宋教仁為代表的一派則以「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為武器，積極着手改組同盟會，建立第一大黨，組織責任內閣，以分散並進而奪回被袁搜奪的政治權力。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在一九一一年四月黃花崗起義的準備期間曾有過一次完整而具體的表達。他在那時的一篇文章中說：

「今後吾國政治變革，結局雖不可知，然

君主專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而趨於民權的立憲政體之途，則固事所必至者。」

在堅持內閣責任制的問題上，他也曾解釋說：

「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

當時，章太炎曾公開說過：「總理莫宜於宋教仁」。一些人也以宋教仁鼓吹「內閣責任制」是他本人想當總理。宋教仁為此曾做過一次申辯。這段話，正顯示宋教仁做為民主政治革命家的光風霽月之懷，經天緯地之志，傳為民主政治史上的佳話，至今讀來猶令人感奮。他說：

「世人誣吾運動總理，由來已久，吾雖無其事，實不欲辯，且因以自勵，蓋已久矣。夫人之志為總理，豈惡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實不解。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願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能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願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則不可耳。」

事實上，宋教仁並不以組成責任內閣為滿足，他還懷抱一個「大計劃」。這就是，憑借議會所取得的優勢，通過民主的手段，甩開專橫跋扈的袁世凱，選舉「最為愚笨脆弱的黎元洪」為總統，以便於控制總統「組織同志內閣」，將國家大權穩操在革命黨人手中。

為了實現這些政治目的，宋教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於建立政黨上。他認為，在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裡，政治的優劣，決定於一個具有「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確不破之政見」之大黨。誰能組織起這樣一個「強健而良善」的政黨，誰就有資格組織政府，建立志同道合的政黨內閣，「以其所信之政見

舉而措之裕如。」即使退而在野，由他黨執政，「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兩黨「相摩相蕩，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機。」於是，他四出奔走遊說，經過幾個月而努力，終於成立了以同盟會為基幹，聯合四個小黨組成的國民黨。這個黨，於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以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等為理事，黨務實際由宋代理，實權也為宋所掌握。它的本部設於北京，支部遍於各省市和海外，黨員人數眾多，在臨時參議院中佔有三分之二席位。而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到一九一三年初，全國參、眾兩院八百七十名議員的選舉中，國民黨獨得三百九十二席，佔總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五強；袁所支持的其他三個黨，僅得二百二十三席，佔總席位的百分之二十六弱。其餘二百五十五席為超然派。而他本人則在湖南桃源縣以百分之百的全票當選為國會議員。

在選舉勝利的形勢鼓舞下，宋教仁滿懷信心地說：「大局已定，政黨責任內閣一定可以成功。他理直氣壯地說：「選舉的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麼嫌疑，講甚麼客氣的。」

宋教仁的民主政治的理論和行動，使一切獨夫民賊都為之震懾和膽寒。袁世凱曾向當時屬於復辟派籌安會的楊度私下透露：「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置上。」為了不讓宋教仁南下競選，袁世凱親自向宋饋贈五十萬元。但宋不為所動，將支票海退回，如期南下。袁世凱對他惱恨已極，咬牙切齒地說：

「噫！宋教仁意欲組織政黨內閣耶？抑相逼之甚也。」而他又認為，宋教仁非高官厚祿所能收買，於是，就醞釀着一場極其卑鄙無恥的暗殺陰謀。而正當此時，宋教仁還堂堂正正地說：

「不久的將來，（袁世凱）容或有撕毀約

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

在探望了離別八年之久的老母和妻子之後

宋教仁被刺殺後的情形



趙東鈞給應慶丞的密信。宋教仁死後，人們查出主使行刺的是袁世凱的內閣總理趙東鈞。

即送  
應先生 啓  
趙東鈞

密稿送後  
檢收以後有電直寄  
國務院趙百也  
桂馨兄鑒 勵步啓

，宋教仁未暇多享，天倫之樂，就匆匆東下。在路經長沙、武漢、九江、上海、杭州，到達南京的途中，他到處發表熱情洋溢的競選演講

，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宋教仁就是在這樣一種志得意滿的心情中到達上海的。他聆聽到了國民黨在各選區的大勝，與在上海的其他國民黨領導人商討了應付國會的策略，草擬了國民黨的政見，準備到北京國民黨本部去付諸實現。這時，袁世凱催他北上的電報也來了，他決定與其他幾個國會議員同行。

在到「民主報」社辭行時，他還為革命前的種種宏偉的建設計劃未能實施，致使全國人民無法享受革命之福而慨嘆不已。而他的好友徐天福還緊緊握着他的手叮嚀說：「先生此行責任重大，願宵小多欲不利於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危險，願先生慎重防衛。」而他却仍是光明磊落地說：

「無防，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併力赴之。」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十時二十分，宋教仁取道滬寧、津浦路北上，送行者有黃興、廖仲凱、于右任等。當進入上海車站時突被刺殺，二十二日凌晨因彈毒劇發，不治身亡。宋教仁，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民主革命政治家為在中國的大地上實現民主共和而貢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而在臨終前，他還簽發了致袁世凱的電報，希望袁：「開誠心，佈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其心胸之坦蕩，對憲正之熱望，真正達到了「鞠躬盡瘁，死猶未已」的地步。

#### 四、寶貴的經驗，深刻的啓示

從長沙起戰到上海喋血，宋教仁以他的十載光陰，璀璨年華，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史寫下了絢爛的篇章。他給我們留下了以下幾點啓示：

首先，他是貫徹始終，為民主共和的政綱



而奮鬥終生的革命志士。從一九〇三年以強烈的反滿意識參加華興會，到了九〇年以明確的政綱參加同盟會，到一九一二年成立國民黨，他的一切活動都圍繞着「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個政治綱領而開展着。這其間，內部的分化，沒有使他離開組織；同志的猜疑，沒有使他動搖意志；革命的挫折，沒有使他喪失信心；敵人的誘惑，沒有使他軟化屈服；而更重要的是，事業的成功，並沒有使他功成身退，腐化墮落。革命成功以前，他撰寫文章，批駁君主立憲的荒謬；編譯書稿，宣揚民主政治的優越；編制法典，為未來的共和國繪製藍圖；參與組織，到東北、廣州、上海等地策劃起義。革命成功後，他仍然站在革命的最前綫，與袁世凱進行正面的合法的鬭爭。即使孫文去職下野，黃興解除兵權、章太炎離開革命，而他，仍強調民權，建立政黨，一心推行責任內閣。他的這種朝氣蓬勃，始終如一的鬭爭精神，到今天仍是一切矢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們的楷模。有了這個楷模，將會顯現出那些朝秦暮楚、見異思遷的機會主義者的渺小，將會顯現出那些畏縮不前，勇於內鬭，怯於外戰的分裂主義者的懦弱，將會顯現出那些腐化墮落，以革命而謀私利的利己主義者的可卑。

其次，他的一切活動，都圍繞着政黨、政權、憲法這三個要點來進行，這是宋教仁為我們創造的進行民主革命經驗；既是他睿智的創造，也是他未竟的事業。他所組織的國民黨被人們譽為「民權黨」，就是為強調民權，反對專制，與袁世凱御用的共和黨即被人們譏為「國權黨」相對抗而產生的；他所提出的責任內閣，也是為了把政權從袁世凱手中奪回到民主派手中而設計的；而他所至死不忘的「憲法」，更是為了使中國從此走上法治的即長治久安的道路。

因此，我們今天的民主事業，如果也能在政黨、政權、憲法這三個方面痛下功夫，中國

民主革命的勝利將是指日可待的。

復次，堅持不懈地從西方尋求民主革命的真理，是宋教仁為我們留下的重要啟示。他不像章太炎那樣，曾經參加過康梁的改良運動，而後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像孫中山那樣，曾經向統治者上萬言書，並希圖獲得召見，此路不通，才另闢途徑。他是一開始就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他也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和揮灑自如的寫作才氣，但他並不拘泥於此，而是勇敢地大膽地堅決地向西方學習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典章制度，並介紹到中國，以之作為制定中國民主制度的規範。他陸續翻譯了「俄國制度要覽」、「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澳大利亞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澳國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以及「普魯士官制」等書，草擬了廣州起義的文告、約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和設施，共有三大本之多。在他身上，很少有中國舊式讀書人的迂腐和保守的氣息，有的只是西方的進取和革新的勇氣，以及說幹就幹，雷厲風行的作風。

當然，對於宋教仁的評價從來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認為他熱衷於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而沒有針鋒相對地用武裝鬭爭來對待袁世凱的武裝，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但筆者以為，唯其如此，才表現了宋教仁對民主政治的真摯和執著。這在中國資產階級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時尤其可貴。只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反撲應當保持高度的警惕罷了。

末了，筆者願以七律一首，表達對這位典型的民主革命政治家無限的讚頌和崇敬之情於萬一：

為憲捐軀唯此身，百年繼起尚無人。  
紀元另闢支那路，滬漢騰飛赤子心。  
欲去專權與內閣，總將民主寄黨群。  
巨奸唯死流毒在，常教後生愧先生。

##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_\_\_\_\_ 中文 \_\_\_\_\_

訂費（每年）  
\*\*\*\*\*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港、澳地區）：  
概 關：60 美元 200 港幣  
普通訂戶：28 美元 96 港幣  
學生訂戶：24 美元 84 港幣  
\*\*\*\*\*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航空  
加拿大 US\$15  
中美洲 US\$25  
歐洲、南美洲 US\$35  
亞洲、澳洲 US\$45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總 \_\_\_\_\_ 期）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P.O.-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歐洲地區：PARISER ST 52 5300 BONN W. GERMANY  
港澳及世界其它地區：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二樓4室

#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 薛偉整理

- 三月 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財產法，准許人民擁有工廠雇用工人。
- 六日 中共教委擴大大學新生送軍訓計劃，校方若不積極搞「政治學習」，招生數將遭削減。
- 八日 大陸旅美人土申請政治庇護案獲加連處理，國務院開具「意見書」腳步明顯加快，認係國會施加壓力迫使改善。
- 九日 民主女神號廣播船正式命名，數日內將駛離法國洛瑟爾港，四月二十日起在大陸外海全天候播音。
- 十日 抗議中共嚴格限制出國留學政策，學自聯發起各國華裔生簽名運動。海地全國性抗議行動持續一週，迫使軍事強人艾美爾辭職。中共密切注視台灣局勢，大陸東南沿海實施一級戰備。
- 十一日 立陶宛宣佈獨立，選出非共元首，要求克宮立即談判脫離手續。愛沙尼亞爭取主權，國會向聯合國求援。智利結束軍人統治政府，艾爾溫就任民選總統，大赦「良心犯」，保證重建民主自由國家。
- 十二日 國府大陸工作會通過三項作業要點，商人、公務員准赴大陸考察、開會，大陸文物動物可輸台。蒙古共產黨向民主低頭，總書記、政治局總辭，今年將舉行大選。中共在一份文件中將美國列為頭號敵人，布希對北京現況不快，却宣稱不悔。
- 十三日 蘇聯人代會通過廢除共產專政，創設總統職位。胡績偉被指支持民運，人大代表職務遭撤除。傅拉薩五千人示威又遭鎮壓。
- 十四日 戈巴契夫當選蘇聯首位大總統，任期五年。閣明復已辭去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也將不保。「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召開籌備會議，民運人士陳一諮、張鋼和余英時教授等主持工作。台灣民進黨、大學生、社會運動團體會師中正紀念堂，齊聲討伐「濫權」國代。江澤民「候選」國家軍委主席，中共人大無重大人事變動，趙紫陽仍是代表。反對國代擴權牟利，台北抗議活動掀起高潮，民進黨發起群眾大會，中正堂前呼應人數不斷上升。東德第一次自由選舉，保守派勝利，代表德國統一，自由市場經濟贏得民心。在台北中山堂前抗議的部份學生開始絕食，民家丟擲石塊，扳倒旗桿焚燒國旗。為化解危機，重整政局，國府將召開國是會議。蘇聯地方選舉，改革派贏得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市議會的控制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國會自由選舉，民族主義者大幅度領先。中共人大會召開，李鵬強調鎮壓有理，不放棄權力控制，重申對台灣絕不坐視。大陸逃亡民運份子，在國內成立全國性反對組織，翟偉民任發言人。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在中山堂靜坐、絕食的學生代表要求會見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全面改選國會。中共人大會通過接受鄧小平辭去國家軍委主席，並選出江澤民繼任這一職務。李登輝會見學生代表承諾就職前後
- 十五日 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改革時間表，學生們結束一百五十小時和平抗議，撤離中山堂。烏克蘭成立的鼓吹獨立的「新蘇魯克」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誓言追求獨立。蘇聯軍隊開進立陶宛，立總統宣稱將作非暴力抗爭，美警告蘇不可動武。蒙古國會議員正式取消對共黨專權的憲法保障，並批准在選舉中可有多名總統候選人。電腦界巨擘王安病逝。新疆出現鼓吹分裂主義傳單，武裝警察奉命加強反暴動訓練與情報工作。中共已與以色列互設聯絡辦事處。蘇軍佔領立陶宛首都部份建築物，羅馬教皇呼籲蘇方進行「坦誠的對話」。愛沙尼亞通過六個月後獨立的時間表。匈牙利大選揭曉，右派社會黨慘敗，民主論壇、自民黨等非共勢力護高票。蘇聯封閉立陶宛，限令所有外國人離境。國民黨十三全會代表秘密連署舉行臨時全會，計劃改選黨主席。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如果美方「干涉內政」，雙方關係將大倒退。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表示：人大支持鎮壓民運做法，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廿一日 立陶宛斯克宮同意進行談判，依公民投票討論脫盟問題。盧泰愚、戈巴契夫互通信函，南韓與蘇聯可能今年內建交。中共支持蘇聯對立陶宛用兵，北京決心與蘇俄修好。中共嚴防四月一日會發生示威活動，北京實施一級戰備，當局計劃將天安門廣場列為禁區。廣州火車站發生一起嚴重爆炸事件，有五人死亡，三十多人受傷。天安門廣場整個封鎖，武警站崗三十步一哨，軍用摩托穿梭巡邏，中國嚴防市民、學生示威集會，北京人大會堂江蘇廳發現一枚定時炸彈，許多大城火車站，都受爆破恐嚇。蘇聯歷史上第一個非共政黨自由民主黨成立。北京大學生不能去天安門廣場「散步微笑」，不少在校園喝酒發洩悶氣並三五成群藉機摔小瓶。榮玲、封從德巴黎露面，向愛自由人們報平安，並悼念為民主戰鬪而犧牲亡魂。蘇聯封閉立陶宛與波蘭邊界，蘇外長表示將以忠誠對話解決立陶宛事件。中共提出新要求，交換方勵之出大陸，要求美國恢復軍用物資和高科技產品輸出。中國民聯發函邀請榮玲、來美領導六四紀念活動，並對榮玲夫婦轉告全體盟員誠摯的慰問。美國主動表示願提供政治庇護給榮玲夫婦。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再度被封鎖，當局禁止民衆舉行集體追悼活動。
- 廿二日 蘇聯地方選舉，改革派贏得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市議會的控制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國會自由選舉，民族主義者大幅度領先。中共人大會召開，李鵬強調鎮壓有理，不放棄權力控制，重申對台灣絕不坐視。大陸逃亡民運份子，在國內成立全國性反對組織，翟偉民任發言人。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在中山堂靜坐、絕食的學生代表要求會見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全面改選國會。中共人大會通過接受鄧小平辭去國家軍委主席，並選出江澤民繼任這一職務。李登輝會見學生代表承諾就職前後
- 廿三日 江澤民「候選」國家軍委主席，中共人大無重大人事變動，趙紫陽仍是代表。反對國代擴權牟利，台北抗議活動掀起高潮，民進黨發起群眾大會，中正堂前呼應人數不斷上升。東德第一次自由選舉，保守派勝利，代表德國統一，自由市場經濟贏得民心。在台北中山堂前抗議的部份學生開始絕食，民家丟擲石塊，扳倒旗桿焚燒國旗。為化解危機，重整政局，國府將召開國是會議。蘇聯地方選舉，改革派贏得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市議會的控制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國會自由選舉，民族主義者大幅度領先。中共人大會召開，李鵬強調鎮壓有理，不放棄權力控制，重申對台灣絕不坐視。大陸逃亡民運份子，在國內成立全國性反對組織，翟偉民任發言人。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在中山堂靜坐、絕食的學生代表要求會見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全面改選國會。中共人大會通過接受鄧小平辭去國家軍委主席，並選出江澤民繼任這一職務。李登輝會見學生代表承諾就職前後
- 廿四日 蒙古國會議員正式取消對共黨專權的憲法保障，並批准在選舉中可有多名總統候選人。電腦界巨擘王安病逝。新疆出現鼓吹分裂主義傳單，武裝警察奉命加強反暴動訓練與情報工作。中共已與以色列互設聯絡辦事處。蘇軍佔領立陶宛首都部份建築物，羅馬教皇呼籲蘇方進行「坦誠的對話」。愛沙尼亞通過六個月後獨立的時間表。匈牙利大選揭曉，右派社會黨慘敗，民主論壇、自民黨等非共勢力護高票。蘇聯封閉立陶宛，限令所有外國人離境。國民黨十三全會代表秘密連署舉行臨時全會，計劃改選黨主席。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如果美方「干涉內政」，雙方關係將大倒退。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表示：人大支持鎮壓民運做法，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廿五日 蘇聯軍隊開進立陶宛，立總統宣稱將作非暴力抗爭，美警告蘇不可動武。蒙古國會議員正式取消對共黨專權的憲法保障，並批准在選舉中可有多名總統候選人。電腦界巨擘王安病逝。新疆出現鼓吹分裂主義傳單，武裝警察奉命加強反暴動訓練與情報工作。中共已與以色列互設聯絡辦事處。蘇軍佔領立陶宛首都部份建築物，羅馬教皇呼籲蘇方進行「坦誠的對話」。愛沙尼亞通過六個月後獨立的時間表。匈牙利大選揭曉，右派社會黨慘敗，民主論壇、自民黨等非共勢力護高票。蘇聯封閉立陶宛，限令所有外國人離境。國民黨十三全會代表秘密連署舉行臨時全會，計劃改選黨主席。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如果美方「干涉內政」，雙方關係將大倒退。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表示：人大支持鎮壓民運做法，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廿六日 匈牙利大選揭曉，右派社會黨慘敗，民主論壇、自民黨等非共勢力護高票。蘇聯封閉立陶宛，限令所有外國人離境。國民黨十三全會代表秘密連署舉行臨時全會，計劃改選黨主席。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如果美方「干涉內政」，雙方關係將大倒退。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表示：人大支持鎮壓民運做法，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廿七日 蘇聯封閉立陶宛，限令所有外國人離境。國民黨十三全會代表秘密連署舉行臨時全會，計劃改選黨主席。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如果美方「干涉內政」，雙方關係將大倒退。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表示：人大支持鎮壓民運做法，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廿八日 國民黨十三全會代表秘密連署舉行臨時全會，計劃改選黨主席。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如果美方「干涉內政」，雙方關係將大倒退。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表示：人大支持鎮壓民運做法，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廿九日 在北京部份學生、市民與中國民聯共同發起天安門散步活動後，中共如臨大敵，北京進駐反恐怖部隊，夜間恢復街頭臨檢。中國民航嚴查托運行李。
- 三十日 立陶宛斯克宮同意進行談判，依公民投票討論脫盟問題。盧泰愚、戈巴契夫互通信函，南韓與蘇聯可能今年內建交。中共支持蘇聯對立陶宛用兵，北京決心與蘇俄修好。中共嚴防四月一日會發生示威活動，北京實施一級戰備，當局計劃將天安門廣場列為禁區。廣州火車站發生一起嚴重爆炸事件，有五人死亡，三十多人受傷。天安門廣場整個封鎖，武警站崗三十步一哨，軍用摩托穿梭巡邏，中國嚴防市民、學生示威集會，北京人大會堂江蘇廳發現一枚定時炸彈，許多大城火車站，都受爆破恐嚇。蘇聯歷史上第一個非共政黨自由民主黨成立。北京大學生不能去天安門廣場「散步微笑」，不少在校園喝酒發洩悶氣並三五成群藉機摔小瓶。榮玲、封從德巴黎露面，向愛自由人們報平安，並悼念為民主戰鬪而犧牲亡魂。蘇聯封閉立陶宛與波蘭邊界，蘇外長表示將以忠誠對話解決立陶宛事件。中共提出新要求，交換方勵之出大陸，要求美國恢復軍用物資和高科技產品輸出。中國民聯發函邀請榮玲、來美領導六四紀念活動，並對榮玲夫婦轉告全體盟員誠摯的慰問。美國主動表示願提供政治庇護給榮玲夫婦。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再度被封鎖，當局禁止民衆舉行集體追悼活動。
- 三十一日 立陶宛斯克宮同意進行談判，依公民投票討論脫盟問題。盧泰愚、戈巴契夫互通信函，南韓與蘇聯可能今年內建交。中共支持蘇聯對立陶宛用兵，北京決心與蘇俄修好。中共嚴防四月一日會發生示威活動，北京實施一級戰備，當局計劃將天安門廣場列為禁區。廣州火車站發生一起嚴重爆炸事件，有五人死亡，三十多人受傷。天安門廣場整個封鎖，武警站崗三十步一哨，軍用摩托穿梭巡邏，中國嚴防市民、學生示威集會，北京人大會堂江蘇廳發現一枚定時炸彈，許多大城火車站，都受爆破恐嚇。蘇聯歷史上第一個非共政黨自由民主黨成立。北京大學生不能去天安門廣場「散步微笑」，不少在校園喝酒發洩悶氣並三五成群藉機摔小瓶。榮玲、封從德巴黎露面，向愛自由人們報平安，並悼念為民主戰鬪而犧牲亡魂。蘇聯封閉立陶宛與波蘭邊界，蘇外長表示將以忠誠對話解決立陶宛事件。中共提出新要求，交換方勵之出大陸，要求美國恢復軍用物資和高科技產品輸出。中國民聯發函邀請榮玲、來美領導六四紀念活動，並對榮玲夫婦轉告全體盟員誠摯的慰問。美國主動表示願提供政治庇護給榮玲夫婦。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再度被封鎖，當局禁止民衆舉行集體追悼活動。

#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 中國民聯總部：  
P.O. BOX 15273  
WASHINGTON, D.C. 20003-0273  
U.S.A.  
港澳聯絡站  
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2樓4室
-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號信箱
- 印度聯絡站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DISTRIC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INDIA  
南韓聯絡站  
서울 特別市 江東區 蟬室洞  
BOX 153, SEOUL,  
SOUTH KOREA  
蘇聯聯絡站  
CCCP MOCKBA 117463  
УЛ. ЛЯВСТОВСКОГО  
Д. 3. К. 350 USSR  
匈牙利聯絡站  
H-1360 BUDAPEST, Pf. 6  
HUNGARY  
捷克斯洛伐克聯絡站  
SLADKOVICOVA 1241  
14200 PRAHA 4-KRC  
CZECHOSLOVAKIA  
羅馬尼亞聯絡站  
STR. ALEEA MACARALEI  
NO. 5 D26 ET1 APT. 21  
BUCHAREST, ROMANIA  
波蘭聯絡站  
UL. WATY PLASTOWSKIE 24  
80-855 GDANSK, POLAND  
南斯拉夫聯絡站  
11000 београд  
македонска 29/IV  
BELGRADE, YUGOSLAVIA  
土耳其聯絡站  
HALASKARGAZI CAD.  
183 PANGALTI-ISTANTUL  
TURKEY
- 法國聯絡站  
3 ALLE G LEBLANC  
9300 AUBERVILLIERS  
PARIS FRANCE  
西德聯絡站  
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EST GERMANY  
荷蘭聯絡站  
DEVELST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英國聯絡站  
P.O. BOX 58  
MANCHESTER M14 6XL  
UNITED KINGDOM  
澳大利亞墨爾本聯絡站  
G.P.O. BOX 4881 VV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大利亞悉尼聯絡站  
P.O. BOX K710,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澳大利亞堪培拉聯絡站  
G.P.O. BOX 2851  
CAMP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澳大利亞珀斯聯絡站  
P.O. BOX 636  
CLAREMONT WA 6010  
AUSTRALIA  
澳大利亞青斯聯絡站  
G.P.O. BOX 5616  
CAIRNS, QLD 4870  
AUSTRALIA  
南美洲聯絡站  
P.O. BOX 10A  
ALBORADA GUAYAQUIE  
ECUADOR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55 McCAUL ST. BOX 182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W7
- 加拿大阿爾伯特聯絡站  
P.O. BOX 2487  
DRUMHELLER AB  
CANADA T0J 0Y0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F.,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740787  
HOUSTON, TX 77274-0787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2411 CONCORD DR.  
WOODBIDGE, IL 60517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麻塞諸塞州聯絡站  
47 CENTRAL ST. APT. 5  
WALTHAM, MA 02154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 OTTEE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印第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2796  
W. LAFAYETTE, IN 47906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1404 RASPBERRY CT.  
EDISON, NJ 08817  
美國北卡州聯絡站  
115. WOODBURN RD.  
RALEIGH, NC 27605  
美國俄亥俄州聯絡站  
P.O. BOX 10747  
COLUMBUS, OH 43201  
美國田納西州聯絡站  
P.O. BOX 576  
TULLAHOVA, TN 37388  
美國愛荷華州聯絡站  
P.O. 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
-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夏威夷州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喬治亞州聯絡站  
P.O. BOX 80969  
ATLANTA, GA 30366-0989  
美國佛羅裡達州聯絡站  
P.O. BOX 4572  
HOLLYWOOD, FL 33083  
美國密西根州聯絡站  
P.O. BOX 6347  
E. LANSING, MI 48826  
美國密西根阿那伯聯絡站  
1659 MCINTYRE  
ANN ARBOR, MI 48015  
美國科羅拉多州聯絡站  
690 CORORADO BLVD.  
DENVER, CO 80206  
美國奧洛岡州聯絡站  
2030 W. 16TH WAY  
EUGENE, OR 97402  
美國阿拉巴馬州聯絡站  
5213 GREENWOOD LANE  
MOBILE, AL 36608  
美國內布拉斯加聯絡站  
P.O. BOX 80755  
LINCOLN, NE 68501  
美國猶他州聯絡站  
P.O. BOX 282  
SLC, UT 84110-0282  
美國康乃迪克州聯絡站  
P.O. BOX 161  
STORRS, CT 06268  
美國新墨西哥州聯絡站  
P.O. BOX 21832  
ALBUQUERQUE, NM 87154  
美國蒙大拿州聯絡站  
P.O. BOX 5065  
BOZEMAN, MT 59717-5065  
美國賓西法尼亞州聯絡站  
P.O. BOX 19116  
PITTSBURGH, PA 15213



(1)捷克總統哈維爾會見中國學運領袖沈彤 (2)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接受本刊記者楊漫克訪問 (3)匈牙利在大選的熱浪中  
 (4)團結工會紀念碑 (5)羅馬尼亞士兵白天執勤，晚間也示威 (6)柏林牆陳跡仍在，東西德可望統一。 (7)莫斯科普西金廣場的民主牆

發行：中國之春出版社

美國：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香港：香港，九龍，廣東道501號2樓4室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澳洲：P.O. BOX 3272, ASHFIELD, NSW 2131 AUSTRALIA

G.P.O. BOX 4881 VV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 GERMANY

東歐：1072 BUDAPEST, MAJAKOVSKIJ U41 BUDAPEST, HUNGARY

加拿大：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零售價：(美) 2.50美元；(加) 3.00 加元；(港) 12.00 港幣。

ADDRESS: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TEL: 718-429-6777

T.P. Lee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93

5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